

## 译 者 的 话

---

052 102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是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成立的又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虽然只存在了133天，但它是匈牙利人民历史上闪耀着光芒的一页，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也占有重要位置。

本书于1965年由匈牙利科苏特出版社出版。以后又陆续出了第二版和第三版。在197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纪念日前夕出了第四版。作者利泊塔伊·埃尔文是一位有声望的历史学家。他对匈牙利人民这段受到列宁高度赞扬的历史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入研究，查阅了大量史料并在书中对这场威武雄壮的斗争作了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论述和总结，因此它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受到匈牙利广大读者和史学界的欢迎和好评。

关于本书的技术规格问题作以下几点说明：

1. 关于引文。书中多处引用列宁的讲话、电报和文章，凡在中文版《列宁全集》和《列宁文稿》中能查到的，都引用其译文。个别未收入的，按匈牙利语译出。所引用库恩·贝拉的讲话和文章，凡收入库恩·贝拉所著《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中文版）一书的，均用其译文。书中引文凡引自当时出版的匈牙利报纸者，均不注明出处。

2. 关于人名。匈牙利人名由姓和名两部分组成，姓在前（如卡罗伊），名在后（如米海伊），译文保留了这一顺序。译法与

库恩·贝拉著《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一书中译本的译法一致。其中一部分沿用了以前的译法，但也有少数人名这次按匈牙利语音重新翻译，如卡罗利与匈牙利语音相差较远，这次订正为卡罗伊。有些人名过去没有译过，现由译者译出。

其他国家人名，凡在有关中文历史著作中能查到的，都沿用其译法。未查到的，按我国出版的译名手册或语音手册译出，并保留其姓名的原顺序。

3. 关于地名。书中地名多沿用我国地图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匈牙利》地图的译法，未收入该图的地名由译者译出。

4. 书中的注释多为作者原注，译者作的注释都已标明。

本书中翻译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译者

1985年12月7日

# 目 录

---

|                             |     |
|-----------------------------|-----|
| <b>第一部分 向三月进发</b> .....     | 1   |
| 一、革命时机在成熟 .....             | 4   |
| 二、“秋菊”革命 .....              | 13  |
| 三、革命没有结束 .....              | 20  |
| 四、停火 .....                  | 29  |
| 五、匈牙利共产党的成立 .....           | 31  |
| 六、不可半途而废 .....              | 42  |
| 七、政府危机 .....                | 51  |
| 八、迫害共产党 .....               | 54  |
| 九、反革命加紧活动 .....             | 62  |
| 十、坍塌 .....                  | 67  |
| 十一、政府倒台，两党合并 .....          | 87  |
| <b>第二部分 苏维埃共和国</b> .....    | 101 |
| 一、接管政权 .....                | 103 |
| 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           | 118 |
| 三、全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 .....         | 134 |
| 四、将大地产收归社会所有 .....          | 145 |
| 五、为了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 .....         | 157 |
| 六、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文化政策 .....       | 166 |
| 七、策划对苏维埃共和国进行反革命的军事干涉 ..... | 183 |

|   |     |
|---|-----|
| 八、发动武装干涉战争 .....                        | 192 |
| 九、无产阶级专政危在旦夕 .....                      | 202 |
| 十、工人阶级拿起武器 .....                        | 210 |
| 十一、北线战役的胜利 .....                        | 226 |
| 十二、无产阶级专政的困难在增长 .....                   | 234 |
| 十三、匈牙利社会党内矛盾激化 .....                    | 242 |
| 十四、党代表大会 .....                          | 252 |
| 十五、北部战线重又开始战斗 .....                     | 261 |
| 十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                      | 268 |
| 十七、六月二十四日：布达佩斯的反革命叛乱 .....              | 279 |
| 十八、红军的撤退 .....                          | 290 |
| 十九、试图巩固军队和后方，无产阶级专政领导机构内部发<br>生叛变 ..... | 297 |
| 二十、帝国主义策划再次进攻苏维埃共和国 .....               | 307 |
| 二十一、外蒂萨的军事攻势 .....                      | 311 |
| 二十二、最后的几天 .....                         | 320 |

## 第一部分

---

---

# 向三月进发

---

---



战后，当国外政界人士正为镇压苏维埃俄国和欧洲革命运动而疲于奔命的时候，1919年3月22日，切佩尔<sup>①</sup>无线电台向全世界宣告：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已在匈牙利建立。这一宣布不仅使这些政界人士感到震惊，就是在国内，不少人也为事件的这一新的转折感到意外。

震惊是事出有因的，因为，匈牙利社会党和革命苏维埃政府的第一个宣言——《告全国人民书》所表达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是根据共产党的原则拟订的，而这个共产党才成立几个月。几周前，它的领导人被资产阶级政府作为社会危险分子投入监狱。

3月21日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偶然的历史事件，它是一个历史进程合乎情理的结果。几年来，这一进程一直以不可抗拒的气势向前发展着。1918年11月，一个新的，忠诚体现工人阶级利益的，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进行着不妥协斗争的革命力量——匈牙利共产党站到了匈牙利工人运动的前列。这时，这一历史进程的发展变得迅猛异常。

---

<sup>①</sup> 切佩尔系地名，布达佩斯的一个工业区，是匈牙利工人运动的摇篮。——译者

## 革命时机在成熟

---

由于1848—184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及其争取自由的斗争被镇压，匈牙利社会发展的最主要障碍，即没有取得民族独立以及封建枷锁等，未能被完全消除。虽然1867年的妥协<sup>①</sup>在一定限度内，使匈牙利的民族独立和经济得到发展，但是，并没有解决国内的基本问题，甚至造成了新的紧张和矛盾。

奥匈帝国的建立使匈牙利把自己的命运与一个反动的、濒于崩溃的国家联系起来。这个国家不可能经得住较大动乱的考验。无论是共同的历史传统和基本的经济利益，还是政治意向，都不能把这个多民族帝国的各族人民有机地联系起来。

在争取自由的斗争被镇压下去以后，匈牙利民族的大多数人仍然坚持国家独立的主张，但是，按当时反动的选举制度产生的历届匈牙利政府完全不顾人民的意志和民族的利益，并使匈牙利人完全屈从于奥地利统治阶级的意图。

匈牙利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它对匈牙利各族人民的统治，放弃了国家的独立。实际上，匈牙利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比奥地利统治阶级在专制主义时期对匈牙利人民的压迫政策，更为反动和

---

<sup>①</sup> 1867年春，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与匈牙利统治阶级达成妥协的协议，建立二元制的奥匈帝国。——译者



不民主。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比匈牙利族人民更低，他们的经济、文化和健康条件也更坏。

虽然1868年的少数民族法为各少数民族人民确定的权利比以前有某些进步（宣布少数民族拥有平等的公民权，允许在学校教育中和与当局接触中自由使用自己的语言等），但是，这一法律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贯彻。匈牙利当局不顾这一法律的规定，继续执行粗暴地违背少数民族人民的自尊心和利益的官僚主义的少数民族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各少数民族要求脱离匈牙利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虽然1848年4月颁布的一项法令废除了农奴制，而且1853年的地租法又重申了这一法令的规定，但是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依旧使匈牙利的农业和千百万劳动者的生活负担沉重。大地主们在经济和政治上都保留了他们原有的特权。这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仍然是个重大障碍。

1895年进行的普查是不完全的，不能反映真实情况。按这次普查的资料，匈牙利全国共有3 768个占有土地1 000霍尔特<sup>①</sup>以上的大地主（占农场总数的千分之二）。他们共拥有土地1 200万霍尔特，占全国农业用地总面积的32.3%。拥有5霍尔特以下的农户总数在125万以上（占农场总数的一半以上），他们共拥有土地200多万霍尔特，只占农业用地面积的5.8%强。

除几百万拥有极少土地的贫困农户和半无产者外，农业人口的45%，加上家属共有近600万人完全没有土地。大庄园的富有与农民的贫困形成鲜明的对照。正如在患病时得不到医治一样，

---

<sup>①</sup> 地积单位，1霍尔特等于1 600匈牙利平方弓或0.57公顷。它与“匈牙利霍尔特”不同，1匈牙利霍尔特等于1 200匈牙利平方弓。——译者

掌握知识的基本要素——写与读，对农民来说也是高不可攀的。

50个大地主每户的年收入已超过10万福林（当时的福林），而88%的土地农户的年收入连50福林都达不到。对人口较多的农户来说，年收入50福林不可能使他们得到温饱。农民们或者哀求大地主和富有农户雇用他们，或者试图在官办的公共事业中找到工作。几十万农户的生活朝不保夕，前途渺茫。

贫困农民的小块土地常常被没收抵债。自1870年到19世纪末的30年中，自耕农和佃农的户数减少了近12万户。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的破产在本世纪初还在持续。1903年，被拍卖的土地大大超过两万块。

为数众多的失掉了土地、无法以农业为生的农民背井离乡，到城市寻找工作或者流亡国外，主要逃往美国找出路。自1891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二十几年中，近200万人流亡海外，其中大多数是被贫困所迫的农民。

农村的贫苦农民并不甘心于他们的命运。贫农受到了城市工人卓有成效的有组织活动的鼓舞，在19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以工人为榜样，也试图以革命的方式摆脱无法忍受的负担，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罢工和争取提高工资的运动此伏彼起。但是，由于政府的残酷镇压以及由于没有和工人运动联合起来，农村的社会主义运动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尽管长期以来奥地利当局试图以各种手段阻止匈牙利工业的发展，但是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匈牙利工业却迅速增长。随着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也日益壮大。

根据1890年的统计材料，全国共有362 856名工人，其中5%是在有5个以下工人的小作坊工作。在有20个工人以上的工厂工作的工人不足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一。20年以后，到1910年，产业工人的数目已超过100万人，其中大工厂工人的比例已上升到52%。

随着人数的增长，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和社会比重也增加了。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在工人队伍中日益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的传播，在几十年中，就把工人运动变成民族进步的领导力量。

1901年工会会员人数仅1万人，第二年底这个数字达到8万。在1905年大规模罢工运动的影响下，到1906年底工会会员人数已达12.6万人。

尽管资产阶级以及以全力帮助它的国家政权力图阻止工人达到他们的经济和政治目的，但是，这一企图遭到了失败。有组织的工人的力量日益加强，他们逐步迫使资产阶级作出不少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让步。

在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统一行动中蕴藏着的无比力量，对社会的所有阶级和阶层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统治阶级也意识到，对他们的统治构成威胁的是革命的工人运动，这一认识决定了他们在各个领域内的态度。进步力量则认为，工人阶级是使争取国家民主改革的斗争取得成功的最主要保证。

“未来已经在街巷里飘荡”，这是诗人奥地·安德烈<sup>①</sup>在工人阶级排山倒海般的示威游行影响之下写出的诗句。奥地全心全意地站在无产阶级事业的一边。他在《在洽克·马德<sup>②</sup>的土地上》这首诗中写到：

“我的心灵与你们一起奔驰、搏斗、欢呼

匈牙利无产者——我的血肉！”

匈牙利工人阶级以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反复证实了他们的革命坚定性。通过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几年内的斗争，工人阶级的

---

① 奥地·安德烈（1877—1919），匈牙利伟大诗人。他倡导的革命文学运动为匈牙利1918—1919年的革命斗争作了准备。——译者

② 洽克·马德（1260—1321），大地主，主张封建割据并在自己的领地上建立了小独立王国。这里奥地借指“野蛮的压迫者”。——译者

觉悟、对自己力量的信念以及对团结的意义的认识都大大地提高了。

在组织产业工人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开展运动，以及在改善工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广大匈牙利工人群众在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指导下，受到了阶级斗争的教育。

但是，在本世纪初，正如在多数欧洲社会民主党内那样，在匈牙利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妥协的改良主义的倾向也开始滋长起来。

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中间普遍持有下述观点：匈牙利的资本主义发展比较落后，与社会其他阶级相比，工人阶级还很弱小，因此，还不能提出夺取政权。夺取政权的先决条件是，匈牙利资本主义要进一步发展，在政权问题上，资产阶级要起决定性作用。

社会民主党的一位领导人维尔特奈尔·雅各布写道，“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能够接过将由工人阶级担负的历史作用的新生力量还没有产生。”这实质上是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正式立场。

既然认为在一个可以预见到的长期演变过程之内匈牙利工人阶级还不能夺取政权，因此，社会民主党的中心任务就是保护工人阶级切身的经济利益，政治斗争的目标也仅限于争取改革普遍选举权。

在为争取实行改革和为争取满足日常经济要求而进行的斗争中所渡过的几十年，也不是完全没有成果的。在这些斗争中，工人阶级的组织得到了加强，也取得了一些经济和社会成果，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生活环境。

缺少长远目标和革命远景也为党和工会领导人的表现打上了烙印：他们在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倾向于不要斗争，只要妥协，不要革命行动，只要求迁就剥削阶级的现存制度。

一些工人由于表现英勇，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和革命坚定性而成长为工人组织的领导人，他们曾因为反对资产阶级和统治制度而坐牢多年，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逐渐变了，成为领取高薪的党和工会的官职人员。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表现也逐渐改变。

在我国也有这种类型的工人领袖，他们把大部分时间消磨在办公桌旁和各种会议上，很少到工人中间去。他们愿意高喊革命口号，而且也常常这样喊，但是实际上他们时刻注意防止某种真正的革命行动扰乱他们的安宁。他们在解除群众精神武装和战胜反对派的过程中，逐步演变成党和工会的官僚阶层。

维尔特奈尔有一次在法庭上曾明确地解释过喊激进口号的作用。他说：“在许多情况下，只有通过使用有力的词句才能使工人们安静下来。表面上我们说：‘我们一定要给权势者们一些颜色看看’，但是，最后我们说：‘现在，大家回去吧’。如果演说者说，应该低下头来，那末工人们会把全城捣毁。”

改良主义也决定了社会民主党的联盟政策，决定了它同千万受压迫、被剥削的农民群众的关系。

政府竭尽一切努力阻止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思想传播到农民中间去。竭力破坏社会民主党在农业无产者中间进行的组织工作。在农村，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即社会主义宣传鼓动员还没有开始工作，就被宪兵们抓到哨所中去了。

把农业无产者组织起来和在劳动农民中间进行政治工作，在几十年内都没有取得较大成果，这首先不是因为宪兵的镇压，而是由于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错误认识造成的。在1914年初，有组织的农业工人还不足工会会员总数的4%。社会民主党拖了25年未能制定出一个符合劳动农民根本利益的农业纲领并不是偶然的。

在少数民族工人中间进行的组织工作也如在农业无产者中间进行的工作一样，在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中未占重要地位。

自本世纪初以来，存在于妥协的改良主义的领导人和有革命思想的工人中间的鸿沟越来越深。

工人的大多数没能及时认清党的领导人的机会主义面孔，因为他们以激进的词句成功地掩盖了他们的机会主义。此外，他们过去的斗争历史也影响了工人识破他们。

在匈牙利工人运动内部也有许多英勇的革命者，他们同党和工会领导内部已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进行了斗争。奥尔巴里·久洛、拉斯洛·耶诺、鲁道什·拉斯洛、桑托·贝拉、瓦戈·贝拉、瓦尔加·耶诺等人与妥协者们进行了反复的斗争，但是，他们在党和工会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不够强大，未能超出一个只有较窄群众基础的反对派的作用。

世界大战加剧了匈牙利社会的所有矛盾。

初期，政府以民族主义麻醉了群众。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也未能经得住世界大战的考验，他们未能站出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流血战争，甚至最初还有一些领导人自己也参加了进行民族主义煽动的合唱队，试图引导工人去迎合统治阶级的战争利益。

但是，群众不久就从战争的狂热中清醒过来。战争是个残酷的现实：千百万人的死亡，日益加剧的饥饿以及工农业生产的大规模下降使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形势。

尽管刑律严酷，尽管有工人运动的右派领导人的破坏，但是，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政治斗争经历了战争初期的低潮之后，又迅速蓬勃开展起来。

俄国无产阶级的榜样对匈牙利的工人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匈牙利劳动者们从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为匈牙利人民的一些决定命运的问题找到了答案。

1917年10月以后，匈牙利社会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军事镇

压并没有能够阻止席卷全国的罢工运动。自1918年1月起，罢工工人和政府的军队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在匈牙利工人运动中，“向俄国无产阶级学习！”成为最受欢迎的口号。

军队的危机也在很大程度上爆发出来。在1917年就可以看清，奥匈帝国及其盟国已经战败。尽管如此，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领导集团仍然不顾已遭受到的巨大损失，不愿停止战争。

在前线和后方，为争取结束战争和签订公正和约而进行斗争的阵营日益壮大。

反人民的匈牙利政府无视人民的愤怒，既不愿解决和约和民主自由权利问题，也不愿解决日益突出的少数民族问题。

人民群众革命热情的高涨也调动了议会中的反对派。但是，他们没有有组织的群众力量为后盾，因此不能对政府的立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议会反对派议员中，独立党的领导人卡罗伊·米海伊的活动变得越来越重要。卡罗伊态度明朗地反对战争，勇敢地站出来为争取国家的民主改革而斗争，这当之无愧地得到了较广泛的阶层——首先是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一部分——的同情。但是，卡罗伊的党的背后没有可以动员起来的，能够以有组织的斗争对事件发展的进程施加决定性影响的群众。

资产阶级激进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比独立党还小得多。这个以雅西·奥斯卡为首的党所依靠的只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一个狭窄的阶层。由于匈牙利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其自己的特点，在这个存在着封建残余势力的国家里，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开明的，愿意为民主权利而献身的资产阶级。因此资产阶级激进党没有这样的资产阶级作为它的群众基础。

在匈牙利唯一的一个能够动员广大有组织的群众来实现自己目标的反对党是社会民主党。各资产阶级反对党都很清楚，即使要取得最小的成果也需要社会民主党的帮助，与它结成联盟。

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力量在战争前两年内曾一度减弱，但在1917年和1918年内迅速壮大。1915年底有组织的工人数只有43 381人，而1917年底已经上升到215 000多人。

党的已经壮大了的力量和工人群众革命热情的高涨潜藏着爆发革命的极大可能性，但是，党的右倾领导没有去利用这些可能性。



## “秋菊”革命

---

1918年夏天，奥匈帝国的政治、军事危机已非常严重。

8月14日，奥匈政府通知盟国德国，帝国已无力继续进行战争，坚持立即签订和约。德国的军事态势也好不了多少。与此同时，兴登堡自己也在德国宫会议上敦促尽快签订和约。

9月底，同盟国成员保加利亚被迫投降。不久另一成员国土耳其也放下了武器。

10月17日，蒂萨·伊斯特万也不得不在议会上公开承认战争已经输掉。

战争的失败并没有阻止奥匈政府命令部队进行毫无目的的战斗和作出无谓的牺牲。

帝国在政治上也开始解体。各少数民族都相继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委员会。7月13日，捷克民族委员会建立。8月中旬在卢布尔雅那成立了南斯拉夫民族委员会。不久，所有南斯拉夫的党派都参加了这个委员会。这些组织都为脱离奥匈帝国而进行活动。

皇帝为了尽量挽救一些可以挽救的东西，于10月中旬宣布奥地利为联邦国家。但是，这一远远落后于形势的措施已经不能改变局势。各少数民族对于在奥地利国内提供民族自治已感到不满足。

此时匈牙利政府还不愿意放弃国家领土完整。政府的僵硬和盲目态度一点也未能影响事件的发展。10月底，捷克斯洛伐克和

霍尔瓦特相继宣布退出奥匈帝国。

10月25日，社会民主党、卡罗伊党和资产阶级激进党共同建立匈牙利民族委员会。

民族委员会在第二天发表的宣言中提出了十二点要求。宣言要求匈牙利独立，立即单独签订和约，解散反动政府，解散国会和根据普遍选举权重新选举议会。宣言还要求保证民主自由权利，进行土地改革，阻止“过分的资本积累”，并将之用于公共目的。主张承认新成立的波兰、捷克、南斯拉夫等民族国家，应当为匈牙利的非匈牙利族人民保证民族自决权。与此同时，宣言还表达了一个已经失去基础的希望：即所有这一切不仅不会危及，相反会更加巩固国家的领土完整。

宣言所提出的要求旨在急剧改变当时的形势。可以感觉得出，宣言的语气和目标受到了社会民主党的影响。社会民主党在半个月以前已向全国人民发表了一个内容多少相似，但是更加明确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包含更加深远要求的号召。

匈牙利劳动群众有决心，如果需要，可以用革命暴力贯彻民族委员会在宣言中提出的要求。

但是，民族委员会的领导人直到最后还幻想避免国家政权和群众之间的武装冲突，幻想通过说服国王和实行宪政的办法来接管政府。他们认为，通过任命部长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历史将为他们提供充足的时间，以便他们通过长期实行宪政的方式来实现国家民主化的目标、宣布民主自由权利、实行土地改革和创建共和国等。

不仅各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不愿意依靠群众用暴力来贯彻自己的意愿，而且社会民主党的右派领导人也力求以合法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曾是革命的同盟者的资产阶级激进党领导人雅西·奥斯卡尔，对社会民主党右派领导人的表现后来作过如下描述：

“如果一部分士兵、学生和工人不迅猛地起来，把他们推到形势的前面，这个党的领导人的大多数很可能永远也不会去搞革命。”

在10月里，民族委员会和群众的大多数都期望国王查理四世能任命民族委员会主席，即当时最受全国人民欢迎的人——卡罗伊·米海伊为总理，以使局势得到解决。这样卡罗伊即可着手实现他的纲领。

国王为了恢复已动摇了的王位的威望和为了巩固与匈牙利人民的已经松弛了的个人联系，他来到了匈牙利。他来匈牙利还有另一个原因，即想通过在当地进行谈判的方式找到使帝国免遭厄运的最适宜的办法。

根据在当地得到的印象，国王表示愿意让卡罗伊组阁。因此，在他10月26日回维也纳时，把卡罗伊也带了去，以便在那里正式任命他为总理并隆重举行宣誓仪式。

但是，在维也纳，国王左右的反动势力又战胜了意志薄弱的国王，这样，卡罗伊不得不在第二天毫无成果地回到匈牙利。

王室的诡计使局势火上加油。匈牙利舆论认为对卡罗伊的污辱性作法是对匈牙利民族的污辱，并认为此事也证明，只有通过暴力才能使民族的意愿得到尊重。

10月28日，在吉泽拉广场卡罗伊党党部门前游行示威的人们通过链子桥向城堡进发，以便向在匈牙利任总督的约瑟夫亲王提出任命卡罗伊的要求。

在链子桥上军队和警察挡住了示威群众的去路。当军队允许群众前进的时候，警察们开了枪。当场死了3人，约50人受伤。

这一事件引起了全国的愤怒。形势益趋紧张。人民群众认为民族委员会是唯一的政权。各种机构和组织的代表以及军队和警察部队的代表都表示支持民族委员会的领导人。

帝国濒于崩溃的国家机器已无任何力量。授给卢卡奇奇将军

（由于他对逃兵惩处残酷，为全国人民所憎恨）统率首都武装力量的全权也不能挽回败局，因为他手中已不掌握能把人民革命镇压下去的力量。

驻扎在首都的部队不再愿意听从上级的指挥。与建立民族委员会的同时，10月25日在布达佩斯也建立了士兵苏维埃。它的影响不久就波及到首都卫戍区的大部分部队。

士兵苏维埃的主席是切尔尼亚克·伊姆雷大尉。这个士兵委员会实际上是一些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预备役军官和几个偶然参加进来的人员的暂时的联盟。这些预备役军官认为以武力推翻主张战争的政府已不可避免，并且有意识地做了这种准备。而那些偶然参加进来的人则不同，他们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设想，他们的参加仅仅是因为对战争不满和具有冒险的性格。社会民主党前反对派成员桑托·贝拉也是士兵委员会的成员。社会民主党左派和士兵委员会通过他建立了联系。

始终坚持运用合法手段的卡罗伊不信任士兵委员会，并力图把它从对事件的指挥中排挤出去。30日早晨，切尔尼亚克来访卡罗伊，并通知他，士兵们想占领各机关的建筑物，建立独立的匈牙利军队，要求任命卡罗伊为总理，而这位民族委员会的主席则力图说服他放弃这一计划。卡罗伊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水兵们一定要从快艇上炮击亲王的住所和政府各部。为了说服水兵们不要这样做，民族委员会付出了超人的劳动。”

布达佩斯的工人也准备推翻现存制度。兵工厂的工人们接管了工厂并自行武装起来。

10月29日，约瑟夫亲王授权哈迪克·亚诺什伯爵组阁。但是无人愿意承认哈迪克政府。如果说任命哈迪克为总理起了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它最终驱散了部分舆论对与宫廷达成和平协议所抱的幻想。

导致革命爆发的星星之火是10月30日夜里在东车站点燃起来

的。示威的群众听说，布达佩斯的军队司令部打算把不受他们信任的部队派往前线，于是他们冲进了火车站，阻止了运送士兵的火车开动。不久他们从一列车上搞到了武器和弹药，把自己武装起来。他们与士兵们一起前往首都卫戍区，并要求参加为民族委员会夺取政权。

事件发展很快。士兵苏维埃几天的工作不是没有成绩的。在它的领导下，军官和充满革命热情的士兵们一起在几小时内，几乎未遇到抵抗就占领了城防司令部，控制了各个兵营，占领了邮政总局和电话局。布达佩斯地区司令瓦尔科尼将军被俘，并被送往民族委员会总部——奥什托利亚饭店。

卢卡奇奇完全无能为力。反动派的最后希望，即专门为了镇压革命而驻扎在布达佩斯的波斯尼亚族部队，也拒绝去镇压起义的人民。

1918年10月31日清晨，布达佩斯各中心街道都挤满了群众。在首都的街道上响起示威群众的呼声已经不止一次了，但是这种声音从来没有象那天这样炽烈、幸福和轻快。

示威群众有时停下来听演讲者讲话并为革命、和平、自由和共和国喊几声响亮的“万岁”，有时候又松散地向前走去。

到处都在讨论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

群众中有许多带着武器的平民和不带武器的士兵。士兵们从帽子上取下了可恨的帝国的帽徽，换上了秋菊花，这时秋菊花已经象征着革命，而不是象征着公墓里的宁静。

在群众集中起来的地方，有人高声朗读一张传单：

“工人们！同志们！现在轮到你们了！反革命很可能想要夺回政权。应当告诉他们，你们是同情你们的士兵兄弟的！到街上去示威吧！把工作停下来吧！”<sup>①</sup>

---

<sup>①</sup> 《匈牙利工人运动史文献选编》，星火出版社1956年版，第5卷第293页。

在别处，群众要求几个起得迟的军官取下自己的帽徽，他们中间，有人在群众的欢呼声中自己取下了帽徽，有人则带着不自然的笑容让“勤快的”人们代他行事。在那一天，总共只有一个军官拒绝换下帽徽。

在奥什托利亚饭店周围聚集了几千人。民族委员会的总部设在这里。革命的人民把民族委员会视为自己的领导力量和人民意愿的体现者。现在，由于革命的胜利它取得了政权。

民族委员会的领导人中，除了在家里睡觉的人外，都在奥什托利亚饭店，在疑虑和恐惧中度过了革命的夜晚。他们并不想革命，也没有做这种准备。在10月30—31日事件的前几天，卡罗伊还宣称，他们“不是要革命，而是要和平”。

高拉米·埃尔诺在《沸腾的匈牙利》一书中，在谈到民族委员会的态度时写道：每个人都知道，“现在革命已经滚滚向前，但是，无人相信，也无人想在当夜开始工作。”<sup>①</sup>

“我们深为震惊。我们还没有想接管政权，我们只想把自己的力量组织起来。但是在这中间，整个革命已经成熟……革命是人民自己搞起来的，人民接管了政权并把它交给了民族委员会。”卡罗伊在回忆10月30日事件时，这样写道。

民族委员会的领导者们在黎明时分才放了心，因为自各方传来的消息都表明，人民起义的爆发不是在他们的领导下，甚至与他们的意愿相反，而且没有流多少血就取得了胜利。士兵们不仅在首都，而且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都站到了革命一边。当约瑟夫亲王召见卡罗伊，代表被迫承认了革命胜利的查理四世国王委托他组阁时，民族委员会的领导人坚定地相信：他们已取得了在当时情况下能够取得的最多的东西。

当民族委员会的领导者们获悉，任命卡罗伊并没有在群众中

---

<sup>①</sup> 莱比锡—维也纳1922年版，第30页。

引起他们所期望的反响时，他们又焦虑起来。国王最后不得不屈服并正式承认已经发生了的事情，这并没有使劳动群众受到感动。每个人都知道，使卡罗伊当上总理的并不是国王好意，而是人民的意志。10月31日，在街上此伏彼起的万岁声中，一声都没有提到国王，而共和国万岁则到处都可以听到。

10月31日，全国越来越坚定地要求建立共和国的意向还未能阻止卡罗伊新政府的部长们（其中有两名社会民主党人：高拉米·埃尔诺和库菲·西格蒙德）在代表国王的约瑟夫亲王面前正式宣誓就职。不久，这次宣誓就变为政府的一个最重大的问题。

民族委员会内各党的领导人都把新政府的任命视为革命行动的终结。从此开始，他们活动的中心问题就是稳定局势，解除群众武装和阻止革命继续发展。

人民民主革命使他当上部长的库菲·西格蒙德，在接管政权的第二天就宣传中止阶级斗争。他在民族委员会11月1日的会议上这样说道：“作为有信仰的社会民主党人，我这样说是感到为难的，但是我还是要说，在这六个星期中我们不想运用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的手段。”

当工人阶级政党的一个领导人发出这一号召的时候，实际上人民的革命要求一项还没有实现，还是旧制度的人控制着国家的行政管理权、宪兵和警察等等。

新政府立即采取措施限制革命群众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还在10月31日下午，首都的街道上就出现了号召工人们复工、士兵们回到兵营中去的宣传画。第二天，民族委员会、士兵苏维埃和工人苏维埃联合发布命令，要求每个人都把武器交出来。

## 革命没有结束

---

1918年10月，劳动人民的革命一下子冲破了长期以来一直是解决匈牙利社会的一些性命攸关问题的障碍。

革命终止了自1914年以来已经为50多万人带来死亡的可怖的大流血。

革命粉碎了四个世纪以来对匈牙利人民进行的民族压迫。

革命把极力维护封建落后，不顾全国人民和全民族利益，只顾自己狭隘阶级利益的大地主特权集团从国家领导中驱逐出去了。

通过取得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权利，这场革命为期望革命继续发展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人民群众掌握自己的命运创造了条件。

此外，革命的胜利提高了劳动人民的觉悟和对自己力量的信念。蕴藏在匈牙利人民中间的，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前所未见的力量正在解放出来。

与政府相反，劳动人民根本不认为，以10月31日为标志，革命已经结束。

在以后的几天内，革命的火焰燃遍了全国。

人民长期以来的积怨首先对着压迫、剥削制度的体现者——乡长、区长和宪兵们爆发出来。

11月间，许多乡村都把乡长赶跑了。农民们不能原谅他们，



因为他们以国家的名义给农民们造成了极大的痛苦，他们中间的许多人，由于贪赃枉法和专横暴戾更加重了农民们的痛苦。人民的愤怒在一些地方变成了行动，有几个乡长被处死。

科马洛姆州副州长在11月4日写给内务部长的报告中说：“人们殴打乡长和区长并以死亡相威胁，迫使他们逃亡。”

同一天，莱西查巴尼亚区的区长也说：“整个地区都在暴乱，各乡的乡长都被赶跑。”

11月11日，克拉斯纳和西拉吉索姆尤区乡长团的文件称：“全国的许多乡长都被迫逃跑，一部分被扫地出门，还有一部分被害。”文件还表示希望，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应把乡长们派往其他州，或让他们休假或退休。

雅西·奥斯卡尔认为，在这些天内，起义的人民把全国乡长的三分之一赶跑了。

由于一些士兵还乡和占领了一些兵营及军火库，乡村居民得到了大量武器，许多地方向宪兵队发起武装进攻，不止一次通过交火占领了这些宪兵队，缴了宪兵们的武器并把他们驱散。

基什孔马伊绍乡宪兵队队长在11月2日向上级报告说：“人们迫害宪兵，想把他们处死，因此，本宪兵队已停止活动。”

同一天，考绍地区宪兵队司令向内务部长报告说：“在许多地方，武装的士兵们成群结伙地进行破坏和抢劫。对兵营发起围攻，进攻宪兵队，殴打宪兵并收缴他们的武装。”

11月初，送往内务部的类似报告不计其数。

在一些地方，武装的群众进攻了大资本家、投机商人和走私者的仓库、面粉厂、铁路仓库和一些商店，并抢劫了它们。少数地方人们把他们所仇恨的地主的庄园给抄了。

11月间，外地人民运动的特点是，人们多满足于对一些罪恶昭彰、为他们所憎恨的人员和机构进行清算。在这段时间里，相对来说，很少发生起义的劳动人民触动私有制的情况。更值得注

意的倒是另外一些情况，当时在首都和外地，农民和工人的一部分都不满足于资产阶级的改良。

11月初，埃格尔切希煤矿工人想把煤矿和整个设备一起没收并宣布归布达佩斯的民族委员会所有。该矿的工程师在关于这一事件的报告中说：“经过长时间的争论，才放低要求，先不涉及煤矿的所有权，只是生产出来的煤归民族委员会所有。”

11月，包尔毛兹新城的农民们没收了附近一个地主的土地，并进行集体耕种，这一消息曾引起全国的注目，几个报刊都报道了这一消息。

11月12日，《德布勒森新闻报》报道说：“包尔毛兹新城的农民们完全接管了面积巨大的舍姆舍伊领地。他们宣称，他们站在共产主义共和国的基础之上接管了土地，并将作为共产主义集体的成员来共同耕种这些土地，收入共同分配。”该报强调说：“整个行动秩序井然。”

不久，这些个别的情况就变成了全国性的现象了。

政府采取了一切措施来解除人民革命运动武装。

民族委员会内各党的领导人力图以口头和书面形式为人民最仇恨的人和机构开脱。《人民之声报》在11月3日，也就是农村的人民正在与宪兵队进行武装斗争的时候，写道：“宪兵队是民族委员会最可靠的机构，将派他们去最危险的地方维持秩序。”

在用语言达不到目的的地方，政府甚至不惜使用流血的暴力。

有一些部长以他们能不顾人民的仇恨在为两手沾满鲜血的卢卡奇奇开脱方面作出配合而终生感到骄傲。这些部长们认为，用恐怖行动来对付起义的人民群众是自然的。

内务部长鲍加尼·蒂沃德尔报告说，他亲自让一个宪兵队长对农民和士兵“正当而果断地使用”武器。当这个队长向他报告使用武器的结果，即死伤人数时，鲍加尼赞扬了这个宪兵队长。

至于宪兵和警察辜负了对他们所抱的希望，这并不是因为政府的关系。因此又开始组建新的、民兵性质的保安部队。

正如在其他人民起义期间一样，当被推翻的政权的暴力机构失去作用时，总会有一些人乘机进行抢劫。在1918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期间也发生了类似情况。为了防止发生这种情况，需要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很自然，这种要求会博得劳动人民的支持。有觉悟的工人阶级很愿意为反对这些破坏秩序者而拿起武器。

然而政府在开始组织保安部队时，有着比扼制普通抢劫者更进一步的设想。

事件的发展表明，保护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家的私有制，比本义上讲的维持秩序更需要这个重新组织起来并经过扩充的保安部队。

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11月初就开始组建新的民兵组织——人民卫队。名义上，人民卫队是民族委员会和工人苏维埃建立的，可是实际上，人员的挑选和组织工作是由各工厂的工会组织去做的。并且特别注意，人民卫队的中央领导对政府来说要可靠，不得为具有革命思想的人员所控制。尽管如此，他们并不能避免人民卫队的某些支队不受左派的影响。

在外地，为了行使保安部队的职权，组建了民族卫队。主管民族卫队的政府委员是前无党派国会代表，记者菲涅什·拉斯洛。

革命后几个星期，资产阶级就已经能够较安稳地睡觉了，在这方面，这一新的民兵组织的作用是不小的。伯姆·维尔莫什在回忆录中写到：“工人阶级保卫了资产阶级的财产和生命。”

被保卫的人对此慷慨地加以赞扬。费黑尔瓦尔教区主教普罗哈斯卡·奥托卡尔博士在一项正式声明中说：“每个人都必须承认，一般地说和特别在本市和本州，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在保护生命和财产方面所进行的活动都是严明而出色的。这光辉地证明了其思想的成熟性，并为高尚地执行义务树立了值得仿效的

榜样。”

全国产业工业者协会的刊物《匈牙利产业工业》对社会民主党也没有少加赞扬：

“在革命的日子里，证明社会民主党是一个坚定的中心，匈牙利的新秩序将在它的周围建立起来。革命在激烈的爆发之后不久即转入了合法的轨道，就是说，突然地，不经过过渡地就跨上了渐变的道路，这应归功于社会民主党坚定的决策。”

\* \* \*

在政体问题上，人民和政府之间在评价已取得的成果和今后任务方面也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那样，民族委员会根本就没有想到，建立政府还有其他方式。他们想到的只是象自1848—1849年争取自由的斗争失败以后的历届政府那样：由国王任命的总理负责组阁，并与新部长们一起宣誓就职。

如果说，民族委员会内的各党认为君主政体是合乎理想的和在其较远的目标中（每一个党都以它自己的方式）没有建立共和国的主张，无疑是夸张的。但是，在1918年10月底，他们仍不认为需要把此问题提上日程，这也证明他们多么不了解人民的情绪和多么落后于形势。

10月26日，卡罗伊在与国王进行会谈时，还把说他想建立共和国称之为诬蔑。10月31日，在政府纲领中卡罗伊还认为需要强调：“我们向陛下宣告，陛下是我们的国王。”

劳动人民认为，部长们向君主宣誓就是放弃共和政体（这种看法不是没有理由的），因而在全国引起了普遍的愤慨。从第一天起，就在全国各地掀起了规模庞大的要求政府宣告成立共和国的运动。

在社会民主党左派和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们的倡议下，还在11月1日，广大工人群众就在蒂萨·卡尔曼广场示威，要求建立共

和国。新佩斯区、切佩尔区、小佩斯区、费伦茨城区和约瑟夫城区各工厂的工人们愤怒谴责政府向国王宣誓，要求宣告成立共和国。

10月31日和11月1日的大规模拥护共和国的群众运动迫使政府重新考虑它在政体方面的态度。由于受宣誓的约束，部长们让卡罗伊出面，要求国王做出选择：或者解除誓言，或者整个政府辞职。

卡罗伊和两位部长一起到城堡见约瑟夫亲王，并通过他与国王取得了联系。鉴于国王同意解除誓言，于是政府向民族委员会提出一项建议：在六个星期内，按普遍选举权进行选举，并由选举出来的宪政会议对政体问题作出决定。

政府的建议是由库非在民族委员会的会议上提出的。他同时发出了把阶级斗争中止六个星期的号召。

政府按照宪政的规则所采取的举棋不定的步骤并没有使人民感到满足。在布达佩斯和外地，要求立即宣布成立共和国的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接连不断。各种组织发给政府和民族委员会的相同内容的电报如雪片飞来。在这些要求中间，希望不要建立资产阶级性质的共和国，而要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共和国的要求越来越多，这使担心革命进一步发展的资产阶级政客和社会民主党人感到焦虑。杰尔市的民族委员会在11月14日发给布达佩斯民族委员会的电报中说：“参加会议的90名委员中，除了5票以外，绝大多数都表达了应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共和国的意愿”（着重是我加的——作者）。

事件的发展使政府相信，拖延决定国家政体对自己越来越危险。劳动人民初期对政府表示的信任明显减弱。因此，民族委员会决定采取与自己原有意图不同的步骤。

民族委员会迫于压力，于11月16日在国家大厦前的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宣告成立共和国。几十万人打着红白绿三色旗和红旗

挤满了广场。几位曾参加过1848—1849年争取自由的斗争当时尚健在的老战士也参加了大会，庆贺共和国的诞生。与会者们对老战士报以热烈的欢呼声。

群众大会以巨大的热情，一致通过了民族委员会提出的决议草案。决议的第一条是：“匈牙利是独立于一切其他国家的自由的人民共和国。”

这一决议以后被称为1918年第一号人民决议。它宣布解散议会下院和上院，指示政府立即制定关于普遍选举权、关于建立人民陪审员制法庭、关于结社和集会自由以及关于“使农民获得土地”的“人民法律”，并使之迅速生效。

在广场上空出现的飞机使兴高采烈的民族委员会领导人的情绪受到干扰。从飞机上投下的传单告诉每一个人，政府自11月10日以来就对劳动人民隐瞒了苏维埃俄国领导人致奥匈帝国各族人民的文告。文告号召劳动人民接管政权，完成民族解放，各自由人民结成“兄弟联盟”。民族委员会在11月16日宣告建立的不是一般的共和国，而是人民共和国。把政府称为“人民政府”，由群众大会宣布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纲领，这一事实也以独特的方式反映了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领导中所起的日益增长的作用。

在1918年秋，人民力量的兴起产生一些新的形式：苏维埃。第一批工人苏维埃在年初就建立起来了。在革命的日子里士兵苏维埃也起了作用。但是，按照俄国的榜样由工人和士兵代表组成的苏维埃只是在10月31日以后才开始对事件的发展产生影响。

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在革命胜利前就开始组建布达佩斯的工人苏维埃。他们的意图是把苏维埃的运动置于自己的控制和影响之下。布达佩斯各工厂在10月30日就选出了工人苏维埃的代表。负责选举组织工作的工会干部力图阻止一些对党和工会领导持反对

派态度和具有革命思想的人当选。尽管如此，在11月2日工人苏维埃的成立大会上，由于受到工人们普遍情绪的影响，一些远远超出党的领导人和政府的意图的要求也被提了出来。工人苏维埃主张武装工人阶级和用人民卫队代替正规军，要求任命由工人苏维埃和士兵苏维埃选出的代表组成的三人委员会来主持首都的工作。此后，几个有经验的右派领导人普莱乌斯·莫尔、万察克·亚诺什和毕赫莱尔·约瑟夫被选为工人苏维埃的领导人，这仍未能使党的领导人和政府感到放心。

对政府来说，士兵苏维埃的活动也是令人不放心的。

11月初，首都实际上存在两个士兵苏维埃。一个在10月25日成立，叫“军官士兵苏维埃”。另一个士兵苏维埃由各部队的代表组成。卡罗伊·米海伊在11月初任命《人民之声报》记者、社会民主党人波加尼·约瑟夫为士兵苏维埃领导人，并授给他政府委员的职权。当时波加尼持中间派立场。

由于社会民主党在军队内没有组织，因此党的领导对士兵苏维埃的组成无法施加影响。因此，士兵苏维埃与大多数工人苏维埃相比能更好地表达士兵的利益和情绪。政府担心士兵苏维埃将来会变成对一些最重大问题有决定性发言权的革命组织。政府的这种担心不是没有原因的。

在其他城市和农村一般都成立民族苏维埃或人民苏维埃。在许多地方，特别在城市，这些苏维埃是由前行政领导人建立的。自然，这一事实为这些组织的活动打上了烙印。在那些工人组织强大的城市，工人们在民族苏维埃内也有代表，因此能够影响它的活动。在大部分农村，民族苏维埃、人民苏维埃或农民苏维埃都体现了劳动农民的意志。多数民族苏维埃认为自己是政权组织，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采取了一些相应的但与国家行政机关不同的措施（把前机关工作人员赶走，没收积存的物资并分给人民等等）。

11月4日，党的领导机关、民族委员会和政府把限制各苏维埃的活动的问题提上日程。

民族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社会民主党领导机关、士兵苏维埃和政府共同商定，吊销各地方苏维埃执行机构的职权并把它们变成政府的检查和宣传机构。

关于上述协议的声明说：“在革命的初期，已取得胜利的民主新机构在某些问题上采取措施和干预执行机构的事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现在因为已经有人民政府作为人民意志的执行机构进行工作，这样政府将受全体人民的委托行使政权……民族委员会、工人苏维埃和士兵苏维埃都是政府的检查机构和宣传机构，它们不是拥有处理事务权的行政机关。”

这一协议的突出特点是，前一天成立的工人苏维埃没有被列入协议各方之内。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机关认为布达佩斯工人苏维埃只是它自己的一个从属机构，因此，连匆忙地制定组织章程的工作也没有让它参加。

《人民之声报》已在11月5日发表了工人苏维埃的组织章程。它明确表明，党和工会的领导人并不认为工人苏维埃是人民自治的革命机构，而是党的辅助机构。

尽管通过采取这些措施成功地使工人苏维埃的人员构成符合党的领导人的意图，但是要把工人苏维埃成员与工人们隔离开来则是不可能的。因此工人们的情绪在工人苏维埃的立场中仍然得到体现，虽然在某些方面有些落后于形势。

事件的发展表明，在士兵苏维埃和外地的民族苏维埃方面，政府的措施并没有达到原定目的：就多数而言，未能成功地把他们的活动限制在检查和宣传机构的活动范围之内。



## 四 停 火

---

11月8日，柏林也发生了起义。皇帝逃跑了。第二天，德国也宣告成立共和国。

革命为人民创造了渴望已久的和平。11月3日，奥地利—匈牙利各军队的代表签订了停战条约。

协约国认为，与意大利迪阿兹将军在帕多瓦签订的停战条约不是普遍有效的，因此，塞尔维亚王国的部队在其后的几天内继续前进。

11月7日，卡罗伊与雅西以及在民族委员会内代表工人苏维埃的波卡尼和代表士兵苏维埃的切尔尼亚克空军大尉来到贝尔格莱德，以便与法国东方陆军司令弗朗歇·德斯佩里上将就最终停火问题举行谈判。这个高傲的法国将军提出了极其苛刻的条件。

在南部，匈牙利部队不得不从大毛罗什河上游经拜斯泰尔采、毛罗什瓦沙海伊、毛罗什河口、绍鲍特卡、包姚、佩奇和德拉瓦河流域到前边境线为止的一条线向北后撤。匈牙利要向战胜者交出大批武器，军需物资，交通工具和马。条约规定，匈牙利军队不得超过六个步兵师和两个骑兵师。

国防部长林德尔代表匈牙利政府于11月13日签署了贝尔格莱德条约。

停战条约条件苛刻，责任完全不在新政府，而在那些把国家推入战争的人，他们又没有及时退出战争，否则可以从战胜国获得较有利的条件。尽管如此，卡罗伊的威望受到了损伤，特别在资产阶级中间是这样。许多人以为，他与协约国有着众所周知的良好关系，因此本可以取得较有利的条件。

贝尔格莱德条约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美国总统威尔逊散布的幻想。已经证实，当同盟国各国不是作为交战一方，而是作为战败国站在协约国面前的时候，威尔逊所宣传的不瓜分领土的“公正的”媾和就立即失去效力。

签订贝尔格莱德条约并没有保证边界的安宁。在其后的几个星期内，在北方和埃尔代伊，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部队先后开始向前推进。

## 五

# 匈牙利共产党的成立

---

卡罗伊政府为反对民主的人民革命和为维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及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妥协态度，使那些想把革命进行到劳动人民获得彻底解放的人们日益积极行动起来。

在10月革命时期，匈牙利工人运动中革命的、组织程度或高或低的一翼有两个较重要的派别。

一个是社会民主党的老左派。工人运动的一些著名活动家，如教员、很有修养的哲学家、著名演说家鲁道什·拉斯洛，律师拉斯洛·耶诺，职员瓦戈·贝拉，布达佩斯工人进修协会前主席克拉麦尔·山道尔，以及反帝运动和后来成立的士兵苏维埃的领导人之一桑托·贝拉等人属于这一派。

另一派由把自己称为“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人们所组成。其中有以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工程师盖兰·约瑟夫和海维希·久洛为首的左派技术人员的代表人物，有工人运动的杰出战士、萨波·埃尔文的学生、反帝运动领导人之一莫索伊戈·安道尔，以及青年革命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他们是从伽利略俱乐部经过反战运动才接触到工人运动的。后者以科尔文·奥托为首，同伴有：行刺蒂萨未遂的雷高伊·亚诺什，还有绍劳伊·伊姆雷、雷瓦伊·约瑟夫、兰捷尔·约瑟夫等人。人们象对待阅历丰富的领导人那样尊敬这位年仅24岁的杰出组织者和坚定的革命者科尔文·奥

托。他为人谦逊，令人信赖。

为了动员劳动人民坚定地把革命进行到底，党的左派和“革命社会主义者”进行了广泛的活动。他们是成立共和国运动的组织者。他们为11月1日在蒂萨·卡尔曼广场举行的群众大会和孔蒂街举行的示威游行做了准备。科尔文·奥托和他的同伴们把政府隐瞒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的电报的事，告诉了11月16日在国家大厦前举行的群众大会的与会者们（迫于舆论的压力，政府被迫公布了该电报，《人民之声报》在11月20日发表了这份电报）。

科尔文等人发表了许多传单，揭露政府的反革命活动和资产阶级的手腕，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

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在工人苏维埃、士兵苏维埃和工厂内进行宣传教育工作。

社会民主党左派和“革命社会主义者”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革命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的妥协性。他们还没有看到，历史要求建立一个新型的党。但是，他们已经意识到，需要加强左派力量的组织性和团结。海维希·久洛写到：“我们的设想是在社会民主党内取得优势，并在群众的帮助之下把党的领导引向革命方向，此外，我们设想不出其他道路。我们最长远的设想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俱乐部，以便在不脱离党的情况下经常进行反对右派领导的原则性的宣传活动。”

11月中旬，有两个这种俱乐部在筹建，一个打算以马克思命名，另一个准备以萨波·埃尔文命名。但是后来没有建成。

在这些日子里，一批以前的战俘自俄国回到国内，其中有一位三十四、五岁的青年人，从证件看，他名叫谢拜什金·埃米尔博士。

只有知情人才知道，谢拜什金就是旅俄匈牙利共产主义战俘的领导人库恩·贝拉。

战前，在匈牙利工人运动中，库恩的名字就已经为大家所

知。还在学生时代他就很关心社会问题。16岁加入社会民主党。在战前是记者。不久，就与统治制度的职业维护者发生冲突，由于进行反资产阶级的鼓动被法庭审判。

战争爆发以后应征入伍。1916年被俘。在这里，他初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得到了列宁学说的补充。他与同他有共同思想的被俘军官同伴一起与西伯利亚的共产主义运动取得了联系，1917年二月革命后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不久作为托木斯克地区党组织的领导成员，成为对战俘进行共产主义的组织和教育工作的领导人之一。1917年底到了革命名城彼得堡，在这里与列宁建立了联系。1918年2月，他参与了红军的创建工作，并亲自参加反对德国入侵者的斗争。

3月，在莫斯科他与萨姆埃里·蒂波尔、波尔·埃尔诺、万图什·卡洛伊、杨启克·费伦茨等人一起建立了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匈牙利分部，库恩·贝拉任主席。在其他国家分部建立之后，他被选为布尔什维克党外国分部联盟主席。

他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为《真理报》写文章，在匈牙利战俘政治学习班上作报告，参与战俘运动的领导，如果形势需要，他又拿起武器来保卫革命。在7月初的社会革命党人暴乱和无政府主义反革命活动期间，库恩亲自领导了匈牙利国际主义者小分队进行战斗。除此之外，他还抽出时间写了几部关于革命、关于苏维埃共和国和关于土地问题等方面的著作。

由于旅居俄国的匈牙利共产党人清楚地看到与社会民主党分裂已经不可避免，1918年11月4日，在莫斯科的德累斯顿饭店成立了匈牙利共产党。成立会议决定，每一个匈牙利共产党人都必须尽快回国，以便在匈牙利投身于“国际革命”。

根据决议的精神，波尔·埃尔诺、明尼赫·费伦茨、万图什·卡洛伊、杨启克·费伦茨、盖尔奈尔·山道尔等70多位匈牙利共产主义者与库恩·贝拉一起不久回国。

他们回国后大力开展组织和鼓动工作，以便争取更多的人认清与社会民主党分裂和建立共产党的必要性。

库恩本人作了更大的努力。回国后，他几乎对每一个可以指望的人都单独做了工作。他没有满足于争取各反对派的领导人，而且，根据雷瓦伊·约瑟夫的回忆，也与他这样一个年仅20岁的青年人“就建党的必要性进行了数小时的谈话。”

“革命社会主义者”的大多数立即理解了匈牙利工人运动分裂和建立共产党的必要性。科尔文·奥托等青年人以前的活动与社会民主党没有联系，因此没有任何感情方面的瓜葛妨碍他们作出决定。

库恩关于建立革命政党的一些思想，很快得到前社会民主党左派一些人的响应。他们在感情上和主观上早已与党的右派领导划清了界线。瓦戈·贝拉、桑托·贝拉、鲁道什·拉斯洛等人自己不久也开始为建立新党而努力工作。

这一选择并不是对每个人都是这样轻而易举的。工人运动的许多老战士认为，尽管党的领导犯有错误和罪行，但是党仍集中了工人阶级最好的力量，这一想法使他们在脱离这个党的问题上感到犹豫。他们很难脱离那些在其中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进行了多年斗争的党组织。

也有人同意建立共产党，但是，他们认为要先使工人们认识到党分裂的必要性。

然而，在社会民主党左派中，有些人在当时连就脱离社会民主党问题进行会谈也不愿意。例如，铁路工会有威望的主席朗德莱尔·耶诺就是这样的人。

毫无疑问，库恩·贝拉等人是对的。在社会民主党内，无法为建立新型政党进行卓有成效的斗争。右派是善于破坏和孤立那些想公开分裂的人的。尽管在11月以后仍继续留在党内的左派工人领导人的意图是好的，但是他们助长了工人们对社会民主党

及其领导的幻想。

11月24日，匈牙利工人运动中的三个革命派别——从苏维埃俄国回国的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左派和革命社会主义者——的代表，在布达的瓦洛什马约尔街42号楼内盖兰·约瑟夫的住所，召开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会议。与会者的大多数认为在匈牙利成立共产党的时机已经成熟。

几天后，在维谢格拉德街15号楼内，在各建党小组的成员和特邀的工厂代表（根据参加会议的兰捷尔·约瑟夫的回忆，大约有80至100人到会）的参加下，正式宣布了党的成立。

这样一个在当时仅有几十个热情的青年革命者，没有群众，只有真理的年轻的党，能不能顶得过一个有着有经验的领导和几十年历史，得到工人阶级大多数的支持，在反共斗争中得到整个资产阶级的支持并且拥有国家政权一切手段的组织？

在1918年11月，匈牙利共产党人以坚定的信念，“肯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当然，他们需要克服很大的困难。

工人阶级最有觉悟的成分不愿意脱离工会组织。尽管右派领导人时常出卖它们，工会组织仍是工人运动的巨大成果。在与剥削阶级进行的几十年的斗争中，工会为他们提供了安全与保护。甚至那些尖锐地谴责党领导的机会主义的人也认为保留工会会员身份是自然的和必要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是分不开的。工会会员自动地也是社会民主党党员。1918年底以前还没有过工会会员参加其他党的情况。

为了使工作能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取得成果，共产党员首先要克服这个障碍。他们必须做到让工会承认共产党。

他们的第一个伟大成果是在一个最大的工会组织——钢铁工人工会中取得的。在工会积极分子会议上，辩论进行了好几天。代表共产党的是库恩·贝拉，代表社会民主党领导机关的是波

卡尼·德热。尽管波卡尼或许是匈牙利工人运动中影响最大的演说家，会议还是接受了机床工人提出的决议草案：“钢铁工人的组织、领导和代表机构宣布，它不阻止它的会员参加共产党”。不久，在印刷工人代表会议上，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在会上，尽管佩德尔·久洛尽了一切努力，但仍未能阻止通过对共产党有利的决定。

坚冰已经打破：共产党小组在职工工会、木材工人工会、铁路工会和裁缝工会内接连建立起来，不久其他工会也跟了上来。

在工厂内，共产党组织也迅速建立起来。12月18日，《红色报》报道说，冈兹—菲亚特厂、匈牙利菲亚特厂、北方总厂、冈兹车辆厂和马加什弗尔德飞机制造厂的工人们各自成立了各工业行业共产党组建委员会。几天后，该报又报道了冈兹—多瑙造船厂、小佩斯利泊塔克厂和泰乌德洛夫—迪特里奇厂建立党组织的消息。

除了行业和工厂党组织外，不久各区的党组织也建立起来。在12月和1月间，布达佩斯各城区和郊区都建立了党组织。

年轻的共产党十分重视党在外地的组建工作。12月，在许多城市已有党组织开始活动。泽姆普伦州的例子也证明，外地的党组织并不是一些仅由几个人组成的、范围狭小的小组。在圣诞节第二天召开的该州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宣布参加共产党。在外地的各大城市，党的筹建工作一般首先以群众大会开始。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向与会劳动者介绍共产党的宗旨。库恩·贝拉在纳吉瓦劳德，瓦戈·贝拉在索尔诺克市，拉比诺维奇·约瑟夫在沙托劳尔姚新地，鲁道什·拉斯洛和萨通·莱热在绍尔戈陶尔扬，拉科西·马加什在塞格德，后来回国的萨姆埃里·蒂波尔在尼赖吉哈佐，召开了有巨大影响的群众大会。会后，许多地方立即建立了党的地方组织。

在共产党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每一个集会和较大的会



议都成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观点激烈交锋的场所。共产党员们参加了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召开的每一个集会，并发表演说。不久，社会民主党人把这个方法接了过去，甚至还组织了专门对付共产党的宣传鼓动队。

共产党利用一切场合揭露政府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妥协政策并宣传革命思想。甚至在那些社会民主党右派占统治地位的组织内，共产党员也要系统地介绍自己的纲领。他们很清楚，即使他们所说的内容对该组织的多数成员未能产生影响，也会帮助关注那里工作的劳动人民了解情况。

布达佩斯工人苏维埃成员中的几名共产党员也抱着这一想法在苏维埃这一论坛上表明党的一些至关重要的立场，如匈牙利共产党的农业纲领或对当时政治形势和工人阶级面临的任务的评价等。是他们人数的35倍的社会民主党委员也无法阻止他们这样做。

共产党为了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尽了最大的努力。它为劳动人民的每一个阶层都制定了建设性的、有动员作用的纲领。

共产党人特别重视对士兵和人民卫队做政治工作。除了军队内的党组织的工作之外，党的领导人亲自进行的宣传鼓动在军队革命化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们时常冒着生命危险到兵营中去做工作，召开会议，解答士兵们提出的问题。在参加兵营内举行的集会的过程中，同其他人一样，库恩·贝拉也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他本人的英勇。有一次在玛利亚·特利莎兵营（这个兵营处在予雷路和环路的交叉路口）中，军官们曾向他开过枪。另一次，他不顾自己的安危，来到一个受右派影响很深的部队，几乎被捕。

“受社会民主党煽动的士兵们（他们不同于社会民主党士兵，因为社会民主党根本就没有自己的士兵）把库恩·贝拉拉到大门洞内，所有卫兵都把武器对准了他。‘我看到他们枪的保险没有打开，就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想射击，就把保险打开吧！这句

话起了作用，我开始和他们谈话，后来事情就顺利解决了’。此事过后不久库恩这样叙述说。”

共产党人在退伍军人、残废军人、失业工人和战俘中也进行了广泛的工作。这些人很快就认识到，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最主要的保卫者。

共产党把最重要的青年组织——全国青年工人联盟争取了过来，这是党的一大胜利。诚然，1918年11月全国青年工人联盟成立时，新选出的领导机关就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这个领导机关的许多成员参加了匈牙利共产党的筹建工作。12月30日，青年工人联盟领导机关全体会议宣布脱离社会民主党。从此，这个以雷高伊·亚诺什为书记的青工联盟实际上已成为共产党的青年组织。

共产党在劳动农民中间进行的组织和鼓动工作比较弱。这个年轻的、在组织上处于发展初期阶段的党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与农村人民建立密切的关系。尽管如此，共产主义思想还是传播到了农村，这首先是通过退伍军人和从俄国回国的战俘实现的。党的传单、报刊和小册子能传到农村，这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为了使政治宣传工作取得更大成果和为了培养宣传鼓动员，党自12月初开始创办了党校。中央委员们亲自去党校作报告。其中，库恩·贝拉报告的题目为《共产党人和土地问题》、《列宁和威尔逊》；鲁道什·拉斯洛报告的题目为《改良还是革命》、《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桑托·贝拉报告的题目为《工会和阶级斗争》；萨姆埃里·蒂波尔报告的题目为《苏维埃俄国人民的生活》；海维希·久洛报告的题目为《共产主义世界革命是生产的必然》。这一训练班的成功促使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也办起了“反鼓动者”训练班。

共产党成立以后之所以能够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各阶层施加影响，党的书面宣传鼓动起了重大作用，这在匈牙利政治运动史中

是无先例的。

它的起步也是不容易的。

中央委员会成立后不久，便委托负责经济事务的塞德莱尔·埃尔诺负责创办印刷厂。在从俄国回国的战俘布尔什维克的帮助下，搞到一个设备陈旧的小型印刷厂。它印刷传单都很困难。遇到较大的任务，则完全无能为力。

这个较大的任务就是出版党的刊物《红色报》。

关于这一重大事件，即印刷党报的第1期，在匈牙利的俄国共产主义者的一位领导者弗·乌拉索夫写道：“1918年12月，《红色报》第1期的材料已经集中到了印刷厂。一个晚上，我们开始了印刷。因为要用手摇飞轮，所以印出一张报纸也要花很大的力气。这一有历史意义的夜晚的每一个参加者都汗流浹背……费茨克、内梅蒂·拉约什、塞德莱尔和我轮流摇飞轮。库恩·贝拉、桑托·贝拉、科尔文·奥托、瓦戈·贝拉等中央委员也帮助工作。但是工作进展得很慢，库恩·贝拉常常申斥我们。他说：‘你们搞不到更破一些的印刷厂啦！’他让我去找几个俄国工人同志来帮忙。不到一小时，我找来五名可靠的同志。但是，工作仍进展得不顺利。库恩等人决定在离市中心较近的地方再搞一个较现代化的印刷厂。不久找到了一家。在这里，印刷速度之快，使我们连堆放报纸都来不及。”<sup>①</sup>

1918年12月7日，布达佩斯街头第一次响起“《红色报》出版了！”的卖报声。这个后来被昵称为《红报》的报刊很快就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最初每周出两期，不久改为三期，共印几千份。印出后总是一抢而光。

《红色报》出版后不久，共产党又开始出版一些其他刊物。

---

<sup>①</sup> 《伟大时期见证人回忆录》，科苏特出版社1958年版，第39—40页。

12月中旬，党的科学和文学刊物《共产国际》问世。1月，青年工人的刊物《青年无产者》出版，接着《红色士兵》诞生。2月初，为农村无产阶级出版了《贫苦人》。

共产党宣传鼓动工作有效而迅速的工具是传单。传单可以马上对事件作出反应，它简单扼要而又尖锐地对违反人民利益的企图进行揭露，并号召劳动人民和士兵行动起来。共产党从成立起到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止的四个月内，出版了大量种类繁多的传单。而社会民主党几年内都没有出版这么多。

共产党的力量并不在于机构设置齐全，也不在于党组织的数量、党的机构网团结紧密和党员的多少。

海维什写道：“象今天这样的党的机构那时几乎没有。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吸收他们的朋友和同他们接近的同志参加，建立起一个小范围的组织，这就是党的机构。”<sup>①</sup>

党在自己的活动中，把宣传鼓动工作放在从本意上讲的党的组织工作之上。这在当时情况下是正确的。共产党虽然把社会民主党的群众争取了过来，但是它自己却在两党合并后溶解到社会民主党几十年建立起来的组织中去了。这种状况产生了致命的后果。尽管如此，当时那样做也是对的。

匈牙利共产党迅速地取得了成功，这首先应归功于它所宣传的思想体现着真理。匈牙利共产党第一次为匈牙利千百万劳动群众所关心的一些重要问题提供了正确的答案。

共产党人口头或书面向人民说明，资本主义已到了崩溃的时候。消除资本主义有破坏作用的规律性——战争、生产无政府状态和劳动群众的苦难——的唯一道路是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民主党的说法相反，共产党证明了，在匈牙利，工人阶级已经

---

<sup>①</sup> 海维什：《革命中的一名工程师》，欧洲出版社1959年版，第202页。

成熟，能够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夺取政权。他们使工人们明白，社会民主党所采用的方法不仅不能促进，相反会阻碍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

匈牙利政府竭力把匈牙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置于世界大战战胜国的保护之下，企图散布威尔逊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幻想，以转移人民对列宁学说的注意力。共产党人揭露了政府的这些企图。

他们证明了匈牙利资产阶级民主政府无力完成它在自己的纲领中所承担的任务：它未能带来和平，它仍在对少数民族进行着帝国主义战争的后卫战；它未能带来自由，因为它利用新老暴力机构残酷地镇压劳动人民的运动；它未能为工人们提供面包，因为它容忍工厂主和地主怠工；它未能为农民分配土地，因为它不愿意以革命方式没收大地主和教会的土地。

党的宣传工作也有弱点和错误。连最有理论修养的库恩和从苏维埃俄国回国的其他领导人也未能足够深刻地掌握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关于党的教导。而较年轻的一代在理论修养方面，还远不如他们。然而，在11月到3月这段时间里，这些错误并未妨碍党起到它的历史作用和为创造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进行卓有成效的斗争。

## 六

### 不可半途而废

---

从10月31日事件和资产阶级民主政府成立以来，日益明朗的是，这个新生的政权的基础是不稳固的。

对这个政府来说，光提出一个与卡罗伊的纲领相类似的纲领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个可供依靠的强大的、在社会中举足轻重的、民主的民族资产阶级，它才能巩固住自己的地位。

但是在匈牙利不存在这样一个资产阶级。匈牙利资产阶级产生得晚并且与试图保护封建主义残余的大地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认为它的敌人不是封建贵族，而是力量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

诚然，被11月爆发的强大的人民运动吓破了胆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把政府及具有群众力量的社会民主党看成是自己唯一的保护神。然而，它在渡过初期的恐惧之后，很快认清，工人阶级不是剥削制度可靠的保卫者，而且政府也没有足够力量抵御日益革命化的工人群众的压力。卡罗伊·米海伊坚持原来的设想，不愿意急剧右转，因此，他自己的几百个拥护者的多数也渐渐脱离了他。

社会民主党右派领导人和工会领导人，想尽一切办法使工人阶级满足于进展十分缓慢的胆怯的资产阶级改革。在布达佩斯工人苏维埃11月13日的会议上维尔特奈尔说：“我们必须认清，通

过这场革命，最多我们只能接近而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而作为社会主义最终目标的取消私有制，现在也无法实现。”

至于工会机构的“革命”勇气到底有多大，《工会通报》1918年第11期的一篇谈论结社集会权利问题的文章很能说明问题。文章说：“考虑到我们生活在匈牙利，我们无法迅速改变区长们的保守思想，应当惩罚那些限制结社集会权的机关和有关人员。”也就是说，在那些人民已经起来把一部分乡长、区长赶走并建立了自己的苏维埃，即实际上已经开始建立革命的国家政权机构的日子，那些与雅萨伊类似的工会领导人只想到要给那些不顺从的区长们一些惩罚！

政府的社会民主党部长中，首先是高拉米·埃尔诺想把部长的丝绒椅子拱手让给资产阶级。连根本称不上左派的根德尔·费伦茨也这样形容高拉米在任部长期间的活动：

“在各个方面他都认为‘刹车’是他的首要义务，我以为这是不对的。他是一位杰出的、有才华的商业部长，完成了大量可贵的业务工作，而他的革命家的特性就恰在这种程度上变得模糊不清。我通过自己的例子体会到，在他那里得到赞许的不是工人而是雇主，不是革命者而是反革命。”<sup>①</sup>

全国产业工业者协会向高拉米作出如下保证并不是偶然的：“商业部长可以指望得到协会的理解和最诚挚的协作。”

但是，特别在匈牙利共产党成立以后，右派工人领袖们的一切努力都不能阻止工人阶级在革命道路上前进。

\* \* \*

在资产阶级民主时期中，自1918年11月到1919年3月这一阶段，是以共产党所传播的思想的迅速发展为特点的。

政府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阻止这一进程发展的企图是徒劳

---

<sup>①</sup> 根德尔·费伦茨：《坦白录》，维也纳1932年版，第64页。

的。共产党人则始终掌握着主动权，并且决定着迅速进展的速度。他们提出的口号几天内就能把群众动员起来去完成一项项革命任务。

共产党领导机关所在的维谢格拉德街15号楼经常有工人、士兵和农民各个阶层的代表来访，请求党的帮助和指示。党理解他们的问题并给他们以支持，从个别事件中也可以找出典型。从一个工厂或一支部队的情况也能得出有普遍意义的结论。这些结论为以后开展涉及整个工人阶级和整个武装力量的行动提供了依据。

正如《红色报》1918年12月14日一期所说的那样，共产党力图动员工人阶级去完成两项基本任务：

“工人阶级今天面临两方面的任务：

一、建立政权机构，以便在任何一分钟内都能够接管中央政权；

二、做好在夺取中央政权后立即着手组织生产的准备，防止雇主怠工和人为地阻碍生产和收回资本。”

也就是说，共产党宣传鼓动工作的首要目标是，一方面，要使工人苏维埃和士兵苏维埃真正成为能够夺取和行使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革命机构，另一方面，要实现由工人控制工厂。

虽然工人苏维埃和士兵苏维埃的领导权目前还掌握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手中，但是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在这些机构的活动中人民群众的左转也日趋明显。出现了一种特殊局面，即工人苏维埃和士兵苏维埃不顾领导的意图和愿望，都在研究共产党所提出的问题，在它们的立场中，共产党思想的影响日益明显，就是当这些机构根据社会民主党右派的倡议通过了谴责匈牙利共产党的决议的时候，也是这样。

担心自己失掉民心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无法直接拒绝共产党提出的要求，只能满足于降低这些要求和阻止它们的实现。但



是，人民群众在共产党宣传的影响下越来越向左转，因此，社会民主党领导不得不一再让步。

自1918年12月起，要求通过工人苏维埃、士兵苏维埃和农民苏维埃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劳动群众日益增多。

12月17日奥索德飞机制造厂工人群众大会的决议说：

“推翻现有社会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有组织地通过工人苏维埃和无地农民苏维埃的专政的方式接管政权。引导我们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不是民主，也不是议会，而是工人和无地农民的苏维埃和无产阶级专政。”

两天以后，即12月19日，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士兵示威游行的主要口号也是“一切政权归工人、士兵和农民苏维埃！”

工人、士兵和农民们并不满足于高喊口号，他们在首都和外地都日益坚定地过问领导工作。

党关于实现工人监督的号召在12月中旬发出后不久，一场波及首都各大工厂的运动便开展起来。

1月3日，冈兹电气厂的工人们把厂长赶走，成立一个新的管理小组来领导工厂。这个管理小组的成员中也有工人代表。此外，还选出一个由12人组成的监督委员会来监督工厂的领导。

同一天，绍尔戈陶尔扬的矿工们也撤销了董事会，宣布矿归他们所有。同时接管了邮局、电报局和铁路。

政府派矿业工会的一个领导人佩耶尔·卡罗伊以政府委员的身分去镇压起义。为了反革命目的而成立的别动队血腥地镇压了矿工们的起义。

在短时间内，有20家布达佩斯的大工厂把工人们最憎恨的领导人撤职并成立了有工人代表参加的新董事会。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工人监督的工厂有：冈兹车辆厂、利泊塔克厂、泰乌德洛夫和迪特里奇机械厂、什利克—尼克尔松车辆和机械厂、老布达造船厂、国家铁路机械厂、匈牙利第一农业机械厂和兵工厂。

这些事件充分表明，越来越多的工人要求工厂按他们的意志行事。很快，这一要求就扩大到全国。

11月上半月，农村爆发的自发农民运动在相对短的时间里结束了。到11月中旬，好象农民的革命热情已在革命爆发后几天内的高涨中耗尽了。

没过多长时间，外地的农民群众又动了起来。这时，在农民中间掀起的新运动比11月初更加深刻地震撼了这个已经过时的社会生产制度。

工厂工人们对国家政治生活施加影响和过问工厂的领导工作，自然不会不对农村贫苦人民产生影响。

农业工人全国规模的要求增加工资的运动，表明贫苦农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日益提高。

短工和雇农已不满足地主和农场主支付给他们少得可怜的工资和实物报酬。曾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农民拒绝接受地主支付给他们的少得不合理的报酬（收获和运回一霍尔特土地的玉米仅给一公担玉米），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收成归公共所有并实行对半分。在全国许多地区雇农们罢工，要求提高工资。

农村人民焦急地期望着实行土地改革。一部分雇农和退役士兵之所以没有与地主和富农签订合同，是因为他们希望不久能够耕种自己的土地，政府旷日持久地拖延制订土地改革法。各资产阶级政党坚持保留土地私有制，坚持要国家给被分掉土地的所有者赔偿损失。要求把免于分配的土地的界限划得高一些。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与其主要区别在于：一方面，社会民主党想把土地收归国有并以永久租佃的形式租给农民；另一方面，除了以地租补偿被征用的土地这一做法外，还提出以征收财产税形式征用大地主的部分土地。各资产阶级党派的计划和社会民主党的计划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想通过改良方式，而不想以激进的农业革命手段解决土地问题。

在布达佩斯工人苏维埃12月13日的会议上，瓦戈·贝拉介绍了共产党的土地纲领。按照这一纲领，不是通过赎买方式，而是由代表农业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农民苏维埃对大地主的土地实行革命征用。

社会民主党人首先从生产技术和供应城市角度考察土地问题。共产党人指出，农业改革的基本问题是“怎样才能保证农业无产者和半无产者支持无产阶级的继续革命和随之而来的无产阶级专政”。

共产党关于土地问题的立场也表现出这个年轻的党在理论和战略方面的缺点。党的领导人中，首先是从苏维埃俄国回来的同志们，本来可以汲取布尔什维克的经验，但是他们没有深刻理解，在一个象匈牙利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只有以革命的、民主的方式实现在匈牙利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被忽略了的事情——使农民获得土地，才能在争取实现和保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保证千百万农民群众始终站在自己事业一边。

他们担心分配土地和大规模增加有地农民的数量会加强维护私有制的势力，从而增强反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力量并会妨碍工人阶级的农产品供应。

因此，由工人苏维埃的共产党小组提出的决议案对下述事实持谴责态度：分配土地这一口号“一时不可磨灭地进入了人民群众的意识中”。

同时共产党主张，土地的命运，即把地主的土地没收后交农民个人还是交集体耕种，由各农民组织的全国代表会议决定。这是共产党的一个功绩。

1918年底，共产党的农业纲领中，首先是以革命手段没收大地主的土地的号召得到了农村贫苦农民的响应。要求立即分配大地主的土地的农民运动在12月下半月广泛展开。他们再次对地主庄园发起进攻，但是目的不是象在11月那样为了发泄愤恨，而是

明确地要求分配土地。

年轻的共产党完全清楚，工人阶级如果不依靠武装力量大多数的革命支持，是不能取得政权的。因此它特别注意做争取士兵的工作。

前线在人为地对士兵们严密封锁后方的事件和消息。党向从前线回来的士兵们讲清了国内的真实情况并号召他们支持工人阶级的斗争。

这种鼓动工作迅速取得成果。12月6日晚，从前线回来的士兵们在布达佩斯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在游行中士兵们高喊社会主义口号，多次发生士兵向对人民使用暴力的宪兵开枪射击的事件。

政府想借助最年青的一代组建新的军队。但是很快证实，应征的青年们不愿意承担武装保卫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义务。许多人对征兵置之不理。应征入伍的人也不愿意服从思想反动的军官们的命令。

11月9日接替林德尔·贝拉当上国防部长的鲍尔道·奥尔贝尔特是政府最反动的成员之一。他看到现有军队已无法用来镇压革命群众，遂于12月6日下令建立可用于反革命目的的特别紧急行动队。由于革命力量迅速发展，部长的命令要求加紧组建。与组建紧急行动队的同时，鲍尔道竭力排斥那些以自己的革命行动给部队的思想状况带来影响的人。

12月9日，在国防部长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布达佩斯保安部队司令认为共产党的政治工作异常危险，因此他要求建立特别法庭和对煽动（即共产党的鼓动工作）进行特别审判。

各士兵苏维埃不顾政府和社会民主党的阻挠日益变成革命组织。在士兵情绪的影响下，士兵苏维埃的领导人波加尼·约瑟夫夫人也越来越经常地抵制国防部的反动头目。

在士兵苏维埃的倡议下，12月12日，首都城防部队的12 000名士兵带着枪炮进入城堡，并用炮瞄准国防部。士兵代表团去部长会议见卡罗伊·米海伊，并把含有城防部队七点要求的请愿书交给了他。

示威者首先要求撤换鲍尔道，但是并不满足于国防部领导内部的简单的人事更动。他们的要求远远超出了这一点。他们要求以革命和民主方式改组整个国防工作：改组国防部；把领导权从总参谋部手中接过来；撤换反动军官；提高士兵苏维埃在军队和各地部队生活中的作用；解散为反革命目的而建立的军官别动队；由士兵选举司令官，允许士兵晋升为军官；改善士兵的生活环境。

为了维护自己的威望，卡罗伊没有就撤换鲍尔道和满足其他各项要求做出具体承诺，但是他本人也承认：“与组建旧军队相比，组建人民军队在方式上是应有所不同的。”

在以后的几天里，外地的一些地方也召开了士兵大会，会上士兵们通过了与布达佩斯城防部队的要求基本一致的决议。

要求撤换鲍尔道实际上是多此一举，因为撤换他和撤换在政府内同样坚持右派立场的鲍加尼内务部长，实际上是已经定了的问题。卡罗伊党的这些反动分子在政府内的地位已经无法维持，这是革命继续发展的必然结果。

虽然不举行示威游行也会撤掉鲍尔道，但是这并没有缩小这次游行的意义。自10月31日以来，士兵们（实际上是穿军装的工人和农民）第一次以革命的方式过问了国家最高领导工作。他们10月的行动为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扫清了道路，但是这已经是正在成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兆。

鲍尔道被撤职以后，在一段时间内由卡罗伊本人来领导国防部。12月30日，大地主费什泰蒂奇·山道尔伯爵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他在霍尔蒂时期成了箭十字运动的一个领导人）。

这个新任的国防部长一点也不比他的前任好。他继续组建反革命的别动队，并且准备解散受共产党影响的部队。他还没来得及在他的丝绒椅子上坐稳，12月31日，由共产党组织的士兵大会已经要求他辞职了。从首都各个兵营聚集起来的士兵们的要求已经超过了12日示威游行时提出的要求。要求中有：军队的一切权力归士兵苏维埃；布达佩斯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应成为国防部的监督机构；在兵营内要为各项革命活动保证充分的自由；取消军衔等。士兵们还要求严惩唆使行刺库恩·贝拉的人（会前不久发生了刺杀库恩·贝拉未遂的事件）。

但是费什泰蒂奇暂时还留在职位上，并不断采取反革命措施。

他试图解除一些部队的武装，但是没有成功。

除试图解除有革命思想的部队的武装外，他继续组建反革命的别动队。他的这一活动得到社会民主党人、防务国务秘书伯姆·维尔莫什的帮助。在苏维埃共和国期间，他亲自指示组建起了不良作用的塞凯伊军团。

## 政府危机

---

到了12月底，事情已经很清楚，政府以其原班人马已经无法维持下去了。

独立党的多数人集聚在文化部长洛瓦希·马尔顿的周围，他们想按照资产阶级的意图来一个急剧“右转”，要把社会民主党排斥在外，搞一个由各右派党参加的联合政府。

卡罗伊宁愿通过向左派让步的办法解决政府危机，因此洛瓦希与卡罗伊尖锐对立起来。于是洛瓦希退出了政府并且与多数持相同观点的人一起退出了卡罗伊党。

资产阶级右派希望政府限制民主权利，并且残酷地以武力阻止日益表现出社会主义倾向的革命的发展。

但是，这些计划忽略了真实的力量对比。资产阶级费尽一切心机仍未能建立起一个可以有希望对抗工人阶级、贫苦农民和士兵群众的反革命武装组织。革命本来在短短的几天内就能把右派集团从政府里驱走。对于这一点某些右派领导人也不得不承认，所以产生了由社会民主党自己接管整个政府的考虑。他们设想，社会民主党利用它对工人阶级和士兵的残存影响，可以有成效地阻止革命的继续发展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加强。

革命力量一方对政府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许多人以为，劳动人民的各项要求之所以未能迅速实现和之所以向反革命力量让

步，是因为政府内资产阶级部长占多数，社会民主党只有两名部长。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的工人阶级不满意地看到，社会民主党在政府内只起着次要的作用，而得不到广大群众支持的资产阶级政客们却坐在部长的椅子上自由自在地继续玩弄着反革命花招。由于还没有看清党的右派和中间派领导人在保护旧制度方面的作用，多数工人以为只要增加社会民主党部长的人数或建立一个纯社会民主党政府就可以为实现革命目标扫清道路。

在社会民主党1月7日的会议上以及在第二天召开的工人苏维埃会议上都把政府危机问题提上日程。

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领导人以及党的委员会和工人苏维埃的大多数成员认为，如果在有可能用政权手段来保证实现党的纲领的时候，错过历史时机和放弃组成社会民主党政府，那将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错误。

与多数人的意见相反，高拉米认为，社会民主党应当完全退出政府。他的理由是社会民主党部长已失去了群众的信任。他解释说，群众会要求纯社会民主党政府毫无保留地实施社会主义纲领，而这——如他所说的那样——是“不可能的”。

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机关——以它特有的胆怯和反民主的态度——不顾党委员会和工人苏维埃多数人的意志，通过了一个折衷方案，即应该坚持联合政策，不同的只是要增加政府内社会民主党部长的席位。

社会民主党向政府内各资产阶级党建议，要它们除保留社会民主党现有的两个部长席位外，再让出两个关键的部：国防部和内务部。这一建议受到资产阶级政客们的激烈反对。他们倒不怎么坚持保住国防部，因为很清楚，一个资产阶级国防部长，如果违背士兵苏维埃的意志什么事也办不成。但是保持住内务部则是重要的，因为它实际上意味着整个行政管理机构、警察和宪兵。

联合政府各党派间的争端持续了一个多星期。在此过程中，



资产阶级一方和社会民主党一方都表示愿意退出政府，让另一方执政。当经济和外交形势十分困难和越来越多的劳动群众团结到共产党周围的时候，双方都乐于担任一个忠实反对派这样一个比较舒心的角色。最后，社会民主党领导机关向资产阶级让了步，只得满足于获得教育部，在当时的情况下，它的重要性是无法与内务部相比的。使这一妥协更加严重的是把以前受国防部监督的公安部队的指挥权也让给了内务部。

1月11日，民族委员会宣布卡罗伊·米海伊为临时共和国总统。政府的新总理由前任司法部长贝林凯伊·德奈什担任。为了扩大政府的群众基础，把富裕农民的代表纳加塔迪·萨波·伊斯特万也吸收参加了政府。<sup>①</sup>

---

<sup>①</sup> 纳加塔迪是个典型的投机分子。在大战期间他投靠了蒂萨·伊斯特万。1918年10月以后表示愿意为民族委员会服务。在苏维埃共和国期间他表示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如果苏维埃政府需要，他是很愿意任职的。自1919年8月到死，几乎历届反革命政府中都有他，如曾是弗里德里希·胡萨尔和贝特兰政府的农业部长。

## 迫害共产党

---

1919年1月中旬，在柏林野蛮地屠杀了德国革命者中的两位世界闻名和受到世界崇敬的领导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这一噩耗极大地震动了整个国际工人运动。这次屠杀有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国防部长诺斯克的背景。

国际反革命力量认为，应该用一切暴力手段反对日益受到群众拥护，因此对他们愈加危险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时机已经到来。

协约国驻匈牙利的代表也多次要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来反对共产党。1月中旬和2月初有两位协约国著名人士来到布达佩斯，以便对形势取得直接的印象和促进反对共产党的行动。1月14日，协约国驻克里米亚和南乌克兰部队司令、法国的贝特洛将军，在一名英国校级军官的陪同下来到匈牙利的首都。正如维也纳消息灵通的报纸《新自由新闻报》在1月16日所报道的那样：“这两位军官的会谈很可能与扼制布尔什维主义有关”。一天后，该报报道称：贝特洛与库菲就“匈牙利布尔什维主义运动的意义和目的”进行了会谈。

2月初，协约国驻维也纳代表、男爵坎宁安上校来到布达佩斯。在卡罗伊为欢迎他而举行的晚宴上，坎宁安专门为社会民主党部长们作了一个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报告”。

夸大在德国发生的事件和协约国代表在开始对共产党进行的

大举进攻中所起的推动作用是错误的。很明显，没有这些推动，政府和社会民主党也会采取恐怖措施。维尔特奈尔在工人苏维埃1月8日的会议上，把恐怖、左轮手枪和机枪说成是消灭共产党的手段，这不是偶然的。伯姆关于维尔特奈尔的这次发言写道：“比这更明确地号召群众起来进行抵制和反抗几乎是不可能的”。毫无疑问，柏林的先例和协约国的压力起了推动和鼓励作用。

诚然，反对共产党的行动并不是始于此时。布达佩斯警察局拥有80名成员的侦缉队，在臭名远扬的侦探纳纳希的领导下，从一开始就注意了共产党的每一个活动。但是，政府很清楚，只有把工人阶级煽动起来去反对共产党，当局对它施用暴力手段才能取得成果。也只有当发现共产党有严重“罪行”的时候，才能把工人阶级煽动起来。由于一时没有这样的机会，因此，他们首先要

把共产党孤立起来。

在反对共产党的活动中，社会民主党右派领导集团走在最前列。他们想要在自己力量最强的地方——布达佩斯工人苏维埃，开始进攻。万察克（后来他准备与贝特兰签订协议，这再一次证明他是工人阶级的叛徒）在1月3日的工人苏维埃会议上就野蛮地殴打了共产党人。1月28日，他们让工人苏维埃作出决议，把共产党人从工人苏维埃和社会民主党内开除出去。这后一点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很自然，参加了共产党就意味着脱离了社会民主党。他们还试图把共产党人从工会中开除出去。由于大部分有组织的工人的抵制，他们的企图没有得逞，只在很少几个工会组织里取得一点成果。

在士兵苏维埃内力量对比明显不同，因此他们没敢搞开除共产党人的尝试。

共产党的敌人很清楚，在增强党的力量和群众影响方面，报刊、有动员作用的传单和宣传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资产阶级共和国把宣布报刊自由视为自己的一项政绩，因此，直接查禁

共产党报刊还是不容易的。处在进退两难境地的政府十分欢迎伯姆的打算。1917年颁布的一个条令规定，未经所谓的纸张中心的批准，不得使用新闻纸。这一条令为伯姆的打算提供了基础。由于共产党没有为其出版物向纸张中心申请批准，这为警察采取行动提供了口实。

新任内务部长纳吉·文采在1月25日向布达佩斯警察局长发出指示，让他查处未经批准而使用新闻纸的人员，并“将在各编辑部内发现的一切印刷品、小册子和有煽动作用的手稿予以没收，同时确定其来源”。虽然指示并没有点共产党的名，但是警察们是心领神会的。2月3日拂晓，警察占领了党在维谢格拉德街的办公处，没收了那里的所有报刊、传单和其他出版物，并把室内设备捣毁。

共产党人都很清楚，这次行动之后，对革命力量采取的其他恐怖措施将会接踵而来。政府的态度和公开进行集结的反革命力量日益猖獗的行动促使中央委员会作出加速武装工人阶级的决定。

“无产者们，武装起来！”这是萨姆埃里·蒂波尔在2月6日为《红色报》写的有动员作用的文章的标题。在布达佩斯士兵苏维埃2月7日的会议上，共产党员们建议，由两个工人党、士兵苏维埃和工人苏维埃的代表在首都和外地组成革命委员会，以便击退反革命的进攻。建议士兵苏维埃要求立即解散所有不可靠的部队，迅速武装无产阶级和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2月11日，在布达佩斯召开了14个工人群众大会。这些大会通过了内容相同的决议，即为了保卫革命，无产阶级必须拿起武器，并争取解除反革命部队的武装。

维尔特奈尔、伯姆和其他人自然要设法防止共产党关于武装起来的号召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得到响应。他们使用在解除工人思想武装方面惯用的伎俩，企图使人们相信，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一个革命的、民主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中掌握武器的是工人。伯姆

在士兵苏维埃2月7日的会议上说：“武器只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中。”在他这样说的时候，反革命别动队和宪兵队的血腥行动，绍尔戈陶尔扬、蒂萨多布<sup>①</sup>和毛科<sup>②</sup>事件以及军官们的反革命集结活动明显地证明，伯姆所说的全是谎话。

他们试图让人民相信，威胁民主的成果和劳动人民利益的是共产党。他们想出了一个“左倾反革命”的提法，以便让人民象仇恨死把住政权和财产不放的反人民分子的作用和企图那样去仇恨共产党的活动（尽管预兆相反）。

但是越来越多的劳动群众和士兵已经认清，应当走共产党所指引的道路。在军队内，把自己视为革命的红色卫队的连队日益增多。人民卫队和民族卫队中拥护共产党的越来越多。一些工厂的工人也开始组建红色卫队。“在这段时间内，共产党把海军民族卫队完全争取了过去，拥有2000人的海军民族卫队公开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人。陆军也完全同情他们，这种状况使他们取得了更大的成功。此外，在人民卫队和防卫队内部也可以看到他们在活动。”<sup>③</sup> 警察局长迭茨在回忆这段时期时这样写道。

---

<sup>①</sup> 蒂萨多布的贫苦农民在1918年12月进入安德拉希伯爵的狩猎场，打死了几只野兽，进入了他的庄园并打开了他的酒窖。为了“维持秩序”，用机枪武装起来的森特加伊别动队被派往该村。士兵们帽子上的白箍也证明了他们是反革命。在村子的广场上，他们把“有罪的”农民当众野蛮地加以鞭笞，把一个长工吊上绞刑架，直到他昏迷过去之后才把他放下来。此事虽然引起全国的愤怒，但是伯姆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最后，德布勒森的人们解除了这一帮反革命匪徒的武装。

<sup>②</sup> 1月底，毛科工人苏维埃主席率领一个代表团，带着和平的意愿到宪兵队的兵营去。宪兵们向他们开了枪，工人苏维埃主席和代表团的几名团员受伤。被激怒了的毛科劳动人民在当地驻军的帮助下占领了宪兵队兵营，并且把宪兵们打出镇去。

<sup>③</sup> 《匈牙利工人运动史文献选编》第5卷，第491页。

在退役士兵和失业人员的组织内，共产党的影响也同样增大了。这些人生活最艰苦。他们认识到，只有共产党维护他们的利益。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联合政府既没有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又未能给他们发放可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的失业救济金。共产党为缓解退役士兵和失业人员的生活状况而提出的建议很快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数千名退役士兵和失业人员举行群众大会表示拥护共产党。他们的运动使政府感到十分不安，因为大部分退役士兵手中还有武器。

2月18日，部长会议作为紧迫问题，讨论了如何消灭共产党的问题。司法部长尤哈斯·纳吉·山道尔认为，资产阶级部长不能提出采取果断措施的倡议，“免得工人们产生是他们让各资产阶级政党去反对工人阶级的印象。如果社会民主党认为消灭共产党的时机已经到来，那末，它应当提出这种倡议。”

社会民主党部长们不愿意未经请示党的领导机关自己对这一重大问题作出决定。伯姆说：“这一问题应提交党的领导机关讨论。”

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机关很清楚，必须先挑起一个事端并把社会民主党自己打扮成被共产党进攻的受害者，才可以向共产党发起进攻。

2月20日晚上，在《人民之声报》报社前发生的枪击事件是一个合适的借口。

失业人员中央委员会决定在2月20日下午2时在维高多大厅<sup>①</sup>召开首都失业无产者群众大会。

动员参加这次大会的号召这样写道：

“失业的无产者们！工人弟兄们！”

---

① 布达佩斯的一个游艺场所。——译者

对我们以前的所有要求，甘当资产阶级奴隶的人民政府完全置之不理。

帝国主义掠夺政策为我们造成的贫困，我们还要忍受多久？！不能再拖延了！我们不愿意继续靠施舍过活，我们不需要苦役。

我们坚决地要求：

立即没收美帝国主义的工厂并把无产者武装起来，以结束今天的贫困和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活动。”

大会气氛热烈。失业者们愤怒抗议《人民之声报》把他们的合理要求说成是要挟。

大会以后，没有散去的工人们来到维谢格拉德街共产党办事处门前。库恩、萨姆埃里和瓦戈对他们讲了话。此后，他们经环路向孔蒂街进发，以便在《人民之声报》社前抗议该报对失业者的诽谤。

从西车站开始就有一队武装警察跟随着这个有几百人的游行队伍。得到将有群众来示威的消息之后，有人给《人民之声报》报社增派了保卫人员。天黑（2月，天黑得很早）以后，警察和保卫人员之间发生了武装冲突。这很可能是有意识的挑衅。交火中，几名警察和保卫人员身亡，多人负伤。

《人民之声报》报社前发生的武装冲突与共产党毫无关系。党中央委员会很清楚，政府要利用一切机会制造进攻共产党的口实。在以后进行的调查中，他们连一件能够证实冲突是共产党挑起的，可以被人接受的论据也没有搞到。

副总检察长瓦利·奥尔贝尔特在1919年3月19日的报告中写道：“连实际上哪些人积极地参加了这次冲突和谁造成的伤亡都无法证实。”<sup>①</sup>

---

<sup>①</sup> 《党史研究所档案》A. I. 3/3。

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维护者们认为向共产党发起总攻的时机已经到来。至于在这次事件中究竟共产党有无某种作用，他们是不感兴趣的。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为他们的行动添上一种色彩，好象他们采取的措施并不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家私有制，而是为了扼制一群发了疯的、顽固不化的无政府主义扰乱治安分子，而且他们竟武装进攻几十年来与工人运动血肉相连的《人民之声报》。

关于警察局行动的真正动机，警察局长迭茨在他的自白书中揭露说：“可以假设，或者说不能排除，这是两伙维持治安人员之间的交火。而我没有等到这项调查结束，就认为再次向共产党发起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因为可以把普通的犯罪案件同共产党的煽动挂起钩来。”

这次事件之后，迭茨立即去部长会议，他向贝林凯伊建议立即逮捕共产党领导人。正在开会的部长会议讨论了这一建议。

每个人都期望社会民主党人总理作出决定。伯姆、高拉米和佩德尔（第四个人库菲在伯尔尼参加国际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三人退出会议另行讨论此事。三人中，主张逮捕共产党最坚决的是伯姆。佩德尔同意他的意见。高拉米则动摇不定，因为他认为理由和证据都不充分。

对共产党提出的指控软弱无力和漏洞百出，这使高拉米和其他部长们感到不安。他们担心政府的真正意图不久会暴露出来，如果这样，会引起群众的普遍义愤。列席会议的警察局长胸有成竹地和稳妥地回答了伯姆提出的逮捕共产党领导人的后果如何的问题。这一情况结束了政府的这场争论。

这样，政府指示迭茨全权处理共产党领导人一案。

2月20日夜里，警察局逮捕了共产党的几乎全部领导人。当夜和其后几天，共有60多位共产党员被捕。

他们把被捕人员送往拘留所。警察们把他们当作任人宰割的



猎获物来对待。许多人被毒打。他们首先把仇恨集中在库恩·贝拉身上。他们用枪托打他的胸部、腹部和头，直到伤口流血和失去知觉为止。

连在现场的资产阶级记者们也都谴责这种行为，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则不然。他们对这帮凶手，对“为父兄和同伴们感到悲伤的”警察们持“理解”态度。警察们“由于伤心过度”才把库恩·贝拉打得半死。这些是伯姆·维尔莫什的话。许多人由于参加革命活动而被政府的宪兵和别动队杀害，这可是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份光荣。而伯姆和他的伙伴们对这些人的寡妇、孤儿所提出的控诉则没有持这种理解态度。

社会民主党右派感到很得意。他们到工厂去散布说共产党要用武力占领《人民之声报》报社，还想对社会民主党和政府发起总攻。21日上午，他们让几万名受骗的工人到国家大厦广场去游行。为了增加恐怖气氛，他们让屠宰场的工人们身穿带血衣服，带着有血的屠刀在首都大街上游行。谁若敢对此事表示反感，就被打得头破血流。

在这一天，社会主义革命的敌人以为他们的计划已经成功：他们斩了共产党的“首级”，使广大工人群众与它对立起来；在匈牙利，即使不是最终，也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消除了共产主义运动。

## 九

# 反革命加紧活动

---

政府为了反对共产党和扼制群众革命运动花了巨大力量，同时对反革命却一味迁就忍让。

“皇帝和国王”的匈牙利的主要受益者和信徒是大地主贵族、主教、高级职员、军官和大资本家。他们从10月以后一段时间的恐惧中清醒过来便立即开始了反革命活动。

1918年底和1919年初，杂七杂八的联盟和协会相继成立起来，有“匈牙利人觉醒社”、“匈牙利妇女民族联盟”、“匈牙利基督教忠君俱乐部”和“匈牙利全国武装力量联合会”等等。所有这些组织都集中了剥削阶级最反动的分子。他们的基本目标是反对革命，以最野蛮的暴力消除人民群众的政治活动和复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的状态。

这些反革命分子们很清楚，在当时情况下，正当劳动人民的大多数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所提供的成果感到不满足和为把革命引向社会主义方向而进行斗争的时候，公开提出复辟蒂萨·伊斯特万那样的匈牙利制度不仅是毫无希望的，而且是极为危险的。因此，在公开场合，他们首先不是攻击在国内发生的带有进步性质的变革，而是以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声调煽动人民群众去反对邻国。他们指责政府以其自由主义的态度加速了武装力量的瓦解和无力保卫国家的领土完整。在霍尔蒂统治年代散布了四分之一世

纪的谎言认为，国家被分割的原因不在于匈牙利统治阶级长期推行的歧视少数民族的政策，不在于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媾和，而在于人民革命。这一谎言的根子一直可以追溯到上述这一时期。

大地主和大资本家的代理人自然不能指望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在他们的计划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反革命武装部队和别动队。他们寄希望于军队的职业军官。

对这些反革命分子来说，前奥匈帝国军队的大多数职业军官在一切方面都是可靠的。这些人大多出身于大地主—乡绅阶级。在联合军队和各级军官学校的上层军官们的脑子里装满了德—奥军事官僚机器的精神，对人民群众的社会问题完全无动于衷。由于他们的出身和所受到的教育，他们从大地主和资本家的角度来看待在匈牙利发生的变化和社会主义革命日渐成熟的征兆，坚决地反对一切革命精神。军队里有些人过去一直认为士兵就是炮灰，不能有独立的思想 and 意志，如果有，最可靠的治疗方法是羞辱柱、禁闭和枪弹。军队的日渐革命化和士兵苏维埃作用的日益增长深刻地地震动了这些人。

总参谋部的某些军官在10月革命之后的几天内就开始盘算以武力推翻新政府。

霍尔蒂的总理根伯什·久洛（1918年秋，作为总参谋部的大尉，他表现出来的野心超出了其他军官）写道：“11月2日，我同通博尔中校和久里埃中校向豪扎伊·绍牟建议，请他同在维也纳的安德拉希·久洛伯爵一起领导从意法前线归来的匈牙利部队去推翻匈牙利的革命政府。”他们的建议是无法实现的，因为无法使回国的士兵们去反对以和平、民主和分配土地为纲领的政府。

后来，在职业军官中间也发生了分化：一些希望适应形势的军官们建立了全国现役军官工会，并宣布参加社会民主党。他们

完全不同意工人运动的奋斗目标，这是不言而喻的。他们在衡量了国内的力量对比之后，认为这种方式最有利于保证自己的生存。他们中间只有少数几个人（如斯特罗姆菲尔德）开始理解，国家的现在和未来是与无产者的命运和运动分不开的。

职业军官右翼分子组织了一个全国现役军官和超期服役的士级军官协会。这个协会以后演变成臭名昭彰的匈牙利全国武装力量联合会。

军官中的反动分子们于1月3日在费什泰蒂奇召开的军官会议上才敢于第一次公开地表达他们的感情和意见。他们狂热反对士兵苏维埃和小组长制度，要求在军队内恢复以前奥匈帝国时期的状态。第二天，1月4日，他们鼓动受军官们影响较深的第一优秀射手团的一些被蒙蔽的士兵，上街进行拥护费什泰蒂奇的示威游行。

某些高级军官在国防部的支持下，开始组建反革命部队。1月上半月，国防部作战部部长朗格·波尔迪亚尔的活动被揭发。他在埃尔谢克新城左近为反政府的部队招兵买马。几天以后，阴险的政治冒险家、防务国务秘书弗里德里希·伊斯特万在筹划反革命政变中被抓住。不久有消息说，卡罗伊党的前部长洛瓦希也在搞旨在推翻政府的政治阴谋。

建立反革命武装部队的企图只取得了部分的成果。反革命提不出一个对士兵、工人和农民群众有号召力的口号，因此，他们只能在人员构成特别的部队里，主要在塞凯伊军团中站住脚。塞凯伊军团的成员由于失去亲人而感到悲伤，因此容易被民族主义所左右。

到了1月下半月，布达佩斯的反革命已经觉得自己羽毛渐丰，以致可以在公开的群众大会上露面。匈牙利人觉醒社多次试图在博物馆环路的鹤堡饭店举行公开的会议，但是都被工人们驱散了。准备在维高多游艺厅举行的几次反革命会议也都得到相同

的结局。

构成外地反革命武装力量的一般是宪兵队，其政治领导是州内的大地主、主教和前国家上层行政官员。在一些地方，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联合政府的政府委员也支持他们的活动。

2月3日，费耶尔州的反动分子在塞克什白堡市召开州的群众大会。在政府委员科维什·埃米尔博士的参加下，会议公开地通过了一项反革命决议，宣布他们“鄙视现行制度，要求复辟旧制度”。州群众大会的发言人和决议草案的起草者是卡罗伊·米海伊的兄弟、州长卡罗伊·约瑟夫伯爵。他宣称：“抗议大街上的人民群众对他，对一位伯爵发号施令。”

普罗哈斯卡·奥托卡尔博士也参加了这次大会。看来到了2月，他已经忘记了几个月以前他曾热烈地赞扬了新制度及其领导人。

这次会议以后，反革命在其他地方也搞了些活动。

除了全国都了解的一些事件外，旧制度的信徒们几乎在各州、各县、各市镇和各乡镇都有活动。在许多地方，特别在多瑙河西部，天主教神甫的反革命宣传也在加强。松博特海伊的主教米凯什·亚诺什伯爵不加掩饰地进行反对共和国和要求复辟哈布斯堡王朝的活动。

政府认为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是主要危险，因此并不努力去消灭反革命活动。只是在群众的巨大压力下，才处理了几件事。与其说这是为了对付反动派，不如说是为了欺骗群众。

2月上半月颁布了关于维护人民共和国国家政体的1919年第11号人民法令。2月22日颁布了关于对危害革命成果的分子进行警察监督和拘留的第20号人民法令。当然，这两个法令首先都是针对共产党的。

与对共产党进行恐怖战的同时，政府认为也有必要采取几项措施，以保持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假象。政府中断了全国武

装力量联合会的活动，不久，在2月26日，大吹大擂地把前部长斯泰雷尼·约瑟夫和肃尔马伊·山道尔作为主要战犯予以放逐。27日，以支持反革命活动为由又放逐了米凯什主教。放逐地点是一个修道院，在那里，斯泰雷尼等人在待遇方面是挑不出毛病来的。

# 十 塌

---

从1919年2月21日到3月21日，这一个月是匈牙利历史的一个最富有戏剧性的时期。

2月21日，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在庆祝胜利：成千上万的人示威游行反对共产党。在监狱中，回响着毒打共产党领导人的枪托声。3月21日，兴奋的喊声响彻了布达佩斯的街头：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思想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联合政府承认自己一败涂地，并不得不宣布投降。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了。

在这两个有名的日期之间的28天内，社会主义革命象雪崩一样滚滚向前，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剥削阶级的抵抗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绝望挣扎。

在共产党的领导人被捕后，那些以为“身首异地”的共产主义运动已经没有生命力，并因此而满意地搓着自己双手的人们不得不很快地清醒过来。

21日在国家大厦前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已经有一些人表示拥护共产党。当天下午，工人、士兵和青年们在维谢格拉德街和柏林广场也举行了拥护共产党的示威。

2月下旬，一个日益广泛的反对逮捕和折磨共产党领导人的群众运动开展起来。政府和社会民主党右派无法长期使劳动群众

相信，在《人民之声报》报社前发生的事件是袭击共产党的真正原因。伯姆和维尔特奈尔等人弄巧成拙：他们在追悼死于挑衅事件的“警察同志”时所表现出来的虚伪是令人作呕的，但是他们对残酷迫害在押的共产党员的人们却给予充分谅解。这本身就使头脑清醒的工人们产生怀疑。不久，工人和士兵们都已认清，打击共产党实际上是针对社会主义革命的。

对库恩·贝拉用刑引起了劳动群众的极大愤慨。尽管《人民之声报》要尽花招，不止一次地饱尝过警察的残暴的工人们怎样也无法把他们自己同他们的新“同志”的“伤心”等同起来。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劳动人民面前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民主自由权利是以不威胁有产阶级为限度的，超出这个范围，监狱、枪托和放逐将代替中听的词句。

2月底和3月，各组织、各工厂和部队召开了一系列群众集会，抗议对共产党进行恐怖战。

在库恩·贝拉被捕的第二天，即2月22日，伽利略小组召开了会议。会议通过的决议激烈地谴责了社会民主党右派。谴责他们“在1月大罢工（1918年——译者）期间就不惜把自己的对手交给警察”。决议指出，小组成员中任何人“也不会不对以民主伪装起来的，缺乏一切道义基础的集团专政和恐怖行为表示厌恶。这种集团专政和恐怖行为与很有希望的革命政治相抵触，阻止革命时机的利用并使整个革命运动陷于危险。”<sup>①</sup>

决议要求以工人代替警察，要求在公众的监督下迅速查清共产党人在2月20日事件中的作用，“并立即释放那些与《人民之声报》报社前的示威活动显然无关，仅仅是因为信仰共产主义而被捕的人们。”<sup>②</sup>

---

① 《匈牙利工人运动史文献选编》第5卷，第566页。

② 《党史研究所档案 传单汇编》Ⅱ.90/1919.Ⅱ.第840页。



退役的士兵们在维高多大厅举行了大会，会上他们表示拥护共产党。大会通过的决议表示，如果需要，他们愿以武力去营救被捕的共产党领导人。

24日，工人们同时在几个地方举行示威，抗议对共产党进行恐怖行动。几千名失业的钢铁工人在民族跑马场举行大会，对以“非人的、胆怯的和野蛮的暴行”对待被捕的共产党人表示愤慨。同一天，在布达佩斯工人苏维埃会议上，与会者们谴责对库恩·贝拉和其他共产党人施用刑罚。尽管《人民之声报》极力想利用2月25日在为在挑衅事件中被击毙的警察们举行葬礼的机会，再一次煽动起象21日那样的反共情绪，但是工人们已经不上他们的当了。在首都和外地，劳动人民抗议警察野蛮暴行的呼声越来越高。伯姆愤愤不平地回忆道：工人阶级的“一切同情都转向了被警察们野蛮折磨的库恩·贝拉和他的同伴。工厂和行业的代表们走访了《人民之声报》编辑部、党的某些领导人和政府部长，强烈要求审判对库恩·贝拉施用暴行的警察，而不是审判库恩·贝拉等人。”

苏维埃俄国政府也采取行动保护被捕的共产党人。它以电报形式通知卡罗伊·米海伊，如果不把库恩·贝拉等人视为政治犯，它将采取相应的报复措施。

由于工人群众的压力和苏联的斡旋，政府不得不缓解为在押共产党人规定的规章，并下令把他们定为政治犯。在以后的几周内，随着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力量的增强，库恩·贝拉等人在监狱的生活条件也有所好转。

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人还在1918年12月就考虑到了中央委员会有被捕的可能，并指定了党领导机关的第二套和第三套班子。这些领导班子的成员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指定的，连在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多数同志都不知道将在秘密环境下工作的党的领导机关由哪些人组成。

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刚刚被捕，第二个秘密的党的领导机关已开始工作。它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告诉广大劳动群众：匈牙利共产党仍然存在，并且不顾恐怖和逮捕，将继续不屈不挠地进行已经开始了的工作。

“尽管有这么多同志被捕，我们一刻也不能中断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工作。并不是某些个人或党的领袖，而是无产阶级的内部力量和需要，创造与推动了这一工作。那些看不到无产阶级不可估量的生命力的瞎子们即使一百次捣毁或逮捕党的领导机关，这种不可战胜的革命力量都将继承他们的事业。

同志们，坚韧不拔地继续工作吧！

苏维埃的共和国万岁，通向它的唯一道路是无产阶级专政！”党的第二个中央委员会在这一时期发布的一个传单这样写道。传单号召共产党员们加紧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吸收更多的工人参加党的行列。

秘密的中央委员会向各级党组织发出通知，建议布达佩斯各区和基层的领导机关尽快开会讨论进一步加强党的组织工作并召开区党员会议，向党员们报告当前形势。

除了第二个中央委员会以外，中央委员会未被捕的委员们——萨姆埃里·蒂波尔、万图什·卡罗伊、波尔·埃尔诺和其他人继续参加领导党组织的工作。在某些区内，例如在党员士兵中间，一些自动工作小组着手进行党的组织工作和领导宣传鼓动工作。

到了3月情况有了变化，党的第一套领导班子逐渐恢复了对党的工作的领导。在监狱中，几乎是一个真正的党中央在工作，这使右派咬牙切齿。库恩·贝拉等人召开会议，进行辩论，接待来访者，时常有工厂代表团去访问他们。

“共产党来自监狱领导的鼓动工作，在规模和作用方面，比2月21日前的布尔什维克宣传工作更灵活、更得力和更广泛。”伯姆辛酸地这样写道。

在逮捕党的领导人的同时，警察局还查抄了《红色报》编辑部和印刷厂。但这并未能使它销声匿迹，萨姆埃里·蒂波尔到了纳吉瓦劳德，在当地的共产党人的协助下，在2月23日就出版了纳吉瓦劳德《红色报》并大批地运往布达佩斯。政府担心工人阶级会以果断的行动支持共产党，因此不得不容忍布达佩斯《红色报》再次出版。3月1日，首都街道上又一次响起了“《红色报》出版了”的叫卖声。

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布达佩斯工人苏维埃2月24日的会议上已经可以体会到，对共产党进行的恐怖战并没有使其资本主义社会的阵地更加巩固。在这次会议上伯姆作了关于匈牙利经济形势的报告。显而易见，其目的是想通过揭示确实严重的经济形势的办法来动摇工人苏维埃接管国家政权的决心。伯姆报告最主要的论点是：在一个“没有物资，没有生产，仅有一个假想的价值——纸币的国家里执政和把这样一个国家搞成社会主义国家，几乎是不可能的。”

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机关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在这些日子里，连布达佩斯工人苏维埃也不象几个月以前那样是党的右派领导人的驯服工具。工人群众情绪的变化也不会不对工人苏维埃成员们的态度产生影响。在持续数日的辩论会上，多数发言人对国家经济形势所作的结论并不象伯姆等人所希望的那样。发言人严厉批评政府和政府中的社会民主党部长对反革命分子和大资本家所表现出的软弱性。许多人要求“用资本家的财产来弥补在国家经济形势中产生的巨大裂痕”。声望很高的经济学家瓦尔加·耶诺在进行了充分的论述以后提出一项决议草案。草案指出，不能用旧的、资本家的方式重新组织生产，“只能按集体精神重新组织生产”。草案要求立即征收财产税，在其税率最终确定以前，先向有产阶级征收累进的预付财产税。为了准备把工厂、矿山收归社会所有，瓦尔加建议成立一个社会化委员会，其任务是向政府

具体建议把哪些工厂国有化。工人苏维埃把瓦尔加的动议变成了决议。

几乎进行了两周的辩论（中间有些间断）特别反映了工人阶级向左摆日益加速。在辩论会的第二天，即3月3日，工人苏维埃就向共产党人（几天前还对他们进行最粗暴的诽谤）发出号召，让他们回到社会民主党中来。在辩论的最后一天，一位发言人批判了国防部长伯姆的“有沙文主义味儿的讲话”和高拉米维护资本家私人所有制的行为。他说，工人阶级应当作出抉择：是要巴黎还是要莫斯科。关于他自己的选择他这样说道：“必须把无产阶级的红色革命搞成。”

3月初，许多工厂的工人都召开了气氛热烈的群众大会。会上除了要求改善他们自己的物质状况以外，还反对迫害共产党人，要求武装工人阶级和把生产资料社会化。

3月6日的《红色报》报道说，对鲁卡奇·久尔吉在佩斯铁路机车北库所做的报告，听众们“示威性地表示了赞赏。”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也想发表讲话，但是听众们“拒绝听取并高喊国际革命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此后，佩斯铁路机车北库小组长联席会议开会，会议的决议要求释放共产党人，“解除警察和宪兵的武装，武装工人阶级”，并要求“由工人和农村贫苦农民的苏维埃接管一切政权”。

3月9日，车工、机械工人、钳工、轧钢工人、炼钢工人、黑白铁工人和安装工人都分别举行了会议。会议采取了与上述相同的立场。共产党也在这一天召开了公开的群众大会，这是在党的领导人被捕后召开的第一次群众大会。尽管天气不好，仍有数千人参加了在城市公园举行的大会，与会者们一致表示拥护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广大群众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在塞格德市也召开了大会并通过如下决议：

“塞格德的无产阶级宣布，它主张不调和的阶级斗争，并力

求无条件地消灭剥削阶级。抗议践踏集会和结社权，抗议监禁为自己阶级而战的无产阶级的领袖们。他们当中有匈牙利人，也有俄国人<sup>①</sup>。”

在3月，许多行业的罢工运动更加削弱了政府和社会民主党的地位。这些罢工主要发生在外地，在那些工人阶级还没有完全掌握工厂的领导权，还无法以其他手段表达自己的意志的地方。

到了3月中旬，工厂工人的大多数已经背离社会民主党右派领导人，并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工厂内的气氛日益热烈。

3月18日，布达佩斯的工人群众为纪念巴黎公社成立48周年在工人运动的摇篮切佩尔举行的群众大会，是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斗争的突出事件。

有5000多名工人和切佩尔红色卫队队员参加的、革命气氛浓厚的大会通过了两个决议。第一个决议谴责逮捕和监禁共产党人，宣告，“切佩尔的全体工人要求立即释放在押的共产党人，并将以其一切威力贯彻执行本决议”。会议号召布达佩斯各工厂的工人都支持本决议。切佩尔工人苏维埃中参加这次大会的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也表示支持本决议，并“在讲话中严厉地鞭答了已经背离了阶级斗争立场并完全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

第二个决议谴责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背离了阶级斗争的道路”。并且指出，“工厂的无产阶级决定完全拥护和接受共产党的纲领。”

会议的参加者要求发放武器，以便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我们的决心是从监狱中把库恩·贝拉和他的同事们解放出

---

<sup>①</sup> 指参加匈牙利革命运动的俄国战俘共产党人，他们被关在塞格德市的星监狱。

来。我们相信，我们的事业会得到其他工厂工人们的支持，因为克里伯科·埃代所领导的小佩斯利泊塔克工厂的工人们在与我们进行初步会谈时表示，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将与切佩尔一起战斗。”<sup>①</sup>一个切佩尔的共产党人这样写道。

在3月20日前的几天里，社会民主党领导机关的最可靠的支柱也动摇了。在工人群众大会上，与会者们根本不想听取右派领导人的讲话。党的领导机关每天都受到新的冲击。最使他们痛心的是以前坚定地支持他们的印刷工人也背离了他们。印刷工人们开始罢工，罢免了旧领导班子，并选出了共产党员占多数的新的罢工委员会。

3月19日，几千名失业工人来到城堡并几乎包围了人民福利部。佩德尔承诺在当天就把他们的要求提交部长会议，才得以脱身。

在这几个星期里，外地农村的气氛也变得热烈起来。

拖了很久之后，2月16日才颁布了土地改革法，即第18号人民法令。这一法令并没有使贫苦农民群众得到满足。在当时，大多数农民要求以革命方式无偿地征用大地主的土地，不愿意因向地主偿付地价而承担无尽无休的债务。法令规定，取得土地有两种方式：永久性租用，这样要支付相当数量的地租；赎买土地，这样要一次或分期偿付全部地价。

法令的一项规定引起了人们的极大愤慨，即曾参加1918年11月农民运动的农民和拒绝为地主劳动的农民不得参加分配土地。这一措施恰好使农民中最革命的分子处于与土地改革法和政府相对立的地位。

政府在分配土地中所表现出来的拖拉作风使农民们最终失去

---

<sup>①</sup> 《伟大时期见证人回忆录》第70页。

了耐性。按照国家机关那套官僚主义的、繁杂的手续去做，农民们获得土地还要等待几年。

为了和缓农民们的焦急情绪，共和国总统卡罗伊·米海伊想以自己为例鼓励地主们认清形势。2月23日，他在卡尔卡泊尔纳自己的领地上正式开始分配土地。但是仿效他的先例的人寥寥无几，2月23日以后一切依旧。

1月和2月初，贫苦农民们对能在会议上要求立即分配土地和派出土地分配委员会，以及制订分配附近大地主土地的计划，一般还能感到满足。但是，随着春天的迫近，农民群众的担忧与日俱增，因为不言而喻，如果春播工作由地主进行，那末收成自然也要归他所有。

大地主阶级抓住土地不放，能够坚持到哪一天，他们就决计坚持到哪一天。然而春耕工作推迟了，因为他们不愿意往不知何时就将不归他们所有的土地上进一步投资。所有这些都使失业的农业工人的数字进一步增加，使局势进一步尖锐化。

日益明显的是，农民群众不会耐心地等着根据土地改革法建立起来的委员会不慌不忙地，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在几个月甚至几年以后分配土地。共产党为农村提出的用革命方式征用土地的口号，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响应。

在农民中间，关于土地占有关系的革命改造问题有两种意见：

大部分农民要求迅速无偿地**分配土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要求把地主的土地**改造成生产合作社**的人越来越增加。首先是雇农们主张成立合作社。雇农们已习惯于集体劳动，他们占有土地的愿望没有其他农民阶层那样强烈。在10月革命以后的要求增加工资的运动中，他们取得了很有利的成果，许多人不愿意用这一成果去换取充满风险和麻烦的小块土地。越来越多的农民主张成立合作社，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取得土地（尽管是集体形式）和

获得劳动机会的最方便和最快的方式。

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日益壮大的左派都支持后一种办法。

在塞格德市工人苏维埃的倡议下，匈牙利大平原各工人苏维埃的约200名代表在塞格德召开了代表会议。

经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倡议，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反映了在农村发生的革命变革。

决议支持布达佩斯工人苏维埃要求尽快把生产资料收归社会所有的立场。决议要求恢复党派之间的和解，没收怠工的工厂主和地主的财产，无偿征用大地主的土地并将其大部分分配给生产合作社。

如何实行土地改革是使社会民主党左、右派领导之间矛盾加剧的问题之一。随着劳动群众的日益革命化，左派领导人越来越大胆和坚定地反对右派和中间派领导人。而这些人依旧对抗一切触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基础的企图。

在社会民主党内，党的书记汉布尔格尔·耶诺博士本人站到了要求无偿征用土地并建立合作社的力量的前列。

汉布尔格尔是瑙吉考尼饶市的一位同情贫苦人的医生。他在青年时就意识到，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才能使人民从最普遍的疾患——贫困中解脱出来。为此他参加了工人运动并甘愿承担社会主义革命者的命运。在大战期间，他领导了瑙吉考尼饶市工人的斗争；1917年的大规模反饥饿示威和1918年1月的罢工。他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并被投入监狱，10月的革命才把他从狱中释放出来。由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没有象他这样的英勇行动，为了提高党领导的威望，于是让受到人民群众欢迎的汉布尔格尔担任了党的书记。

1919年初，汉布尔格尔在生产合作社运动的影响下，背离了党领导机关和政府的官方立场，为以革命方式征用大地主的土地和为建立大型农业合作企业而进行斗争。他的职务使他有可能在



社会民主党组织内传播他的观点，为此他时常利用《人民之声报》。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即政府的社会民主党部长们和社会民主党的正式立场是赎买大地主的土地，而《人民之声报》3月4日的一篇文章则主张不要呆板地逐字逐句地去理解土地改革法，即使将其财务和法律问题抛开，也必须在几天或几周内实行土地改革。

文章说：“也就是说，我们希望的是，在全国应以合作社大企业生产的方式实现土地改革。实现合作社大企业生产的地区越大，土地改革所受到的震动和承担的危险就越小，取得的成果也就越好。当然实现大企业生产要得到农民群众基于自己认识的、自觉自愿的赞同和配合。正因为这样，国家政权不仅不要阻止建立生产合作社和基于合作社的大企业生产，相反要以一切手段予以推进。”

部长会议和党的领导机关一再反对以暴力征用土地和开展合作社运动。但是它力不从心，无法在违背激进的农民群众的意愿的情况下去实现自己的主张。

2月底和3月上半月，首先在绍莫吉州以野火般的不可阻挡之势没收了大地主的土地并建立了合作社。

汉布尔格尔以部长代理人的身分来到考波什堡，与绍莫吉州和托尔诺州的农业工人和小农场主工会书记拉亭卡·山道尔一起领导了合作社运动。

考波什堡市工人苏维埃在2月25日就做出决议，把州内最大的农场“农工有限公司”的4万多霍尔特土地和所属工业企业改变成合作社所有制。3月3日，汉布尔格尔把这个农场及其一切设施交给了雇工，让他们以生产合作社的形式继续耕种。此后几天之内把不少绍莫吉州的地主庄园改造成生产合作社：3月4日在普斯陶拜雷尼村，5日在教会学校位于迈尔涅、圣米克洛什和瓦德各村的庄园，6日在厄赖格洛克和维加，10日在迈斯泰格涅

等地都建立了生产合作社。这一运动很快波及到了托尔诺和费耶尔州和其他较远的地区。

3月6日，部长会议开会研究绍莫吉州的形势。会上，纳加塔迪·萨波·伊斯特万连篇累牍地论述了雇农们做法的危险性。

几天以后，纳加塔迪决定亲自到考波什堡去，以便以部长的身分阻止建立合作社。然而，3月10日，当纳加塔迪到达考波什堡时，等待着他的2万多农民和工人，气氛极为炽烈，以致于这位部长（他几乎得不到发言机会）不得不宣布：他“所以要到考波什堡来，为的是向人民宣告（土地改革）法的生效。并不想干扰生产合作的工作。”

大会以后，被惊呆了的纳加塔迪还与汉布尔格尔等人签订了书面协议，在协议中他再一次肯定：“绍莫吉州社会主义生产合作社的建立……是唯一正确的、符合目标的作法……表示赞同，兹作为农业部长予以确认。”在协议中他还承担了负责为生产合作社提供流动资金的义务，甚至同意授权他所领导的农业部的一位社会民主党人全权负责组建生产合作社的工作。

到了3月20日，全国各州都有生产合作社建立。一般来说，生产合作社多建立在那些在农民中雇农人数占相当比重的地方。政府一直试图阻止运动的进一步开展，为此在一些地方不惜动用武力。例如3月20日的《人民之声报》曾报道说，瑙吉勒采的庄园的雇工们想接管其4000霍尔特土地，政府从瑙吉考尼饶市派出骑兵警察去阻止他们这样做。

共产党全力支持合作社运动，认为它“可以成为革命的真正保护所”，“如果使它走上正确道路，无产阶级的食品供应可以得到保证，可以消除城乡之间的矛盾，农村的人民和城市的工人将组成一个阵营”。《红色报》这样写道。

尽管建立合作社的运动取得不少成绩，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大多数农民想分配土地，当然不是象政府下令要做的那样，

而是要无偿地和迅速地进行。连一部分雇农也认为合作社是过渡性质的。他们只想在分配土地的条件成熟之前留在合作社内。

农民们焦急地等待着土地问题能有所进展。在这日益增长的焦急情绪中，潜藏着一种新的、比11月更加强大的、波及到全国各个乡村的农民起义的能量。大多数农村的农民一再催促移交土地，他们以不加掩饰的威胁为他们的要求增添分量。

“挨饿的人们，即使牺牲生命，也坚持要得到土地。

大老爷您很清楚，您让给居民们的3霍尔特土地无法保证他们的生活。为此，他们一致决定，请您在24小时内通知维巴洛克乡饥饿的人们，您是否愿意按他们要求的数量给予土地。他们同时宣告，威胁他们生存和发展的人只配上绞刑架。”<sup>①</sup>维巴洛克乡的贫农们在8月中旬交给地主的信中这样写道。

外地社会主义革命力量的发展还表现在许多地方取消了旧的资产阶级的行政管理，政权由苏维埃接管等方面。大部分州，如绍莫吉、科马洛姆、费耶尔、诺格拉德、奥包乌伊、索博尔奇、豪伊杜、贝凯什、乔纳德、托尔诺和包尔绍德州都把反对革命的州长—政府委员赶走，其中有些州的领导权由工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接管。不少较大城市，如塞格德、基什孔费莱吉哈佐、霍德梅泽瓦沙海伊等也由工人苏维埃接管了政权。除首都以外，外地也越来越不受政府控制。

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联合政府和共产党都很清楚，最终决定资本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胜负的将是谁能够掌握较多的武装力量。争取军队和其他武装部队对双方来说都是性命攸关的问题。

伯姆在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之后就竭尽全力建立一支符合政府要求的武装力量。

---

<sup>①</sup> 《匈牙利工人运动史文献选编》第5卷，第652—653页。

鲍尔道在他任职期间开始用较小年龄的青年组建的军队，这既不能用于贯彻政府的民族主义外交意图，又不能用于镇压国内的革命力量。由于士兵们的态度趋向革命，不得不把五个人中三个年龄最小的士兵在1919年2月以前复员。

伯姆决定，在新的基础上组建军队，废除强制性的征兵制，用自愿参加军队的方法组建一支完全可靠的禁卫军。现有军队中也只打算保留那些“非农民出身的，审查团认为对共和国有感情、守纪律、可以成为新军队有用之材的人员”。<sup>①</sup>他们首先想从工会中招兵，以便保证社会民主党对士兵们的影响。

共产党向士兵们和劳动人民揭穿了自愿参军的真正目的。

“资产阶级很清楚它在做什么。它想拼凑一支能自愿血腥镇压无产阶级革命的武装力量。缴无产阶级的械，用以武装自己的人。这支新军队的唯一的、没敢公开承认的目的是扼制革命的无产阶级和镇压无产阶级革命。”

……解除无产者的武器，在社会民主党的控制下武装资产阶级的军队。

无产者们，把自己武装起来吧！不要使资产阶级这种卑鄙的阴谋得逞！只要无产阶级自己进行最后的阶级斗争，而不依靠他人，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就有保证。既不要依靠部长，又不要依靠政府委员。革命是由阶级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军队只能是无产阶级本身。”

政府对这支新军队所抱的期望也未能兑现。

组建这支军队的障碍首先是伯姆的新军队所要依靠的那些劳动者所表现出来的极大冷漠态度。按计划到3月10日止得招收7万人，而实际报到的人数还不到10%。工人和农民不愿意充当资

---

<sup>①</sup> 《军史研究所档案，2669/el n 6号条令》，见《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军事档案》第25卷。

产阶级的雇佣军。

现有部队的士兵们也极力抵制军队的改编。因为他们知道，改编就是让他们复员，因此他们坚决反对关于建立雇佣军的企图。

3月13日《晚报》报道说，在塞格德市“倾向共产党的骑兵和炮兵不想让海军去解除他们的武装”。在首都和全国其他地方，要解除受共产党影响部队的武装的企图也遇到了相同的抵制。

部队接二连三地把反革命军官赶走，领导权由士兵苏维埃接管。这一事实对军队团结在社会主义革命旗帜之下起了推动作用。

国防部和各部队司令部力图把士兵和工人隔绝开来，因此作出了与绍尔戈陶尔扬旅司令部相同的规定：“要阻止部队与轻率的工人分子频繁的接触，以免部队受他们的不良影响。”<sup>①</sup>但是他们无法把共产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真理关在兵营的门外。

从胜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看，起着最重要作用的布达佩斯武装力量的大部分，在3月下半月已经做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决战的准备。

面对军队和广大武装起来的工人群众，反革命可以依靠的只是弱得可怜的、被吓破了胆的保安部队。

警察局长迭茨在人们宣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前几天，对布达佩斯当时的力量对比作了如下描述：

“面对有20 000人的城防部队、2 000名海军的民族卫队、18 000名退役士兵和下级军官、9 000名铁路民族卫队和武装工人以及5 000名人民卫队，而我只有700人，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无

---

<sup>①</sup> 《军史研究所档案，资产阶级革命文献》第38卷。

法考虑抵抗问题。还应当考虑到，快艇、炮、迫击炮和无数的弹药都在他们手中。”<sup>①</sup>

从匈牙利共产党成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四个月。四个月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一瞬间，而在这段时间里，共产党人（在开始时只有几十位热情的革命家）已经把工人阶级的绝大部分和军队争取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一边。同时在争取以革命方式取得土地的贫苦农民中间，也取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如果我们纵观一下从11月到3月这段历史，并研究一下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国内基本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上的立场的演变情况，我们就会看到一幅有趣的画面。在任何一个实质性问题上，共产党的立场和口号都没有变化。他们在党成立的时候就提出了明确的纲领，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创建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

而在社会民主党那里情况则不同。整个党的领导都把从政治和经济上巩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视为自己的基本任务。

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想恢复旧的国家机构，让苏维埃只起形式的、无关紧要的作用。尽管如此，共产党的目标——“一切政权归工人、士兵和无地农民的苏维埃”已经实现。到了3月中旬，在全国各地，实际政权都已经操在各苏维埃手中。

高拉米及其同伙最顽固地反对一切危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企望。但是他们仍不得不容忍在共产党的倡议下工人们把最大的工厂控制在自己手中。

社会民主党右派领导人想通过资产阶级改良办法解决土地问题，但是他们仍无法阻止要求以革命方式征用土地的声势浩大的

---

<sup>①</sup> 《党史研究所档案》II 11/237，《人民委员审判案记录，迭茨的供词》。

运动的前进。他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这个问题上，不仅贫苦农民，而且越来越多的社会民主党干部也都站到了共产党一边。

伯姆等人一开始就致力于解除革命士兵和工人的武装，组建一支可以保卫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军队。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把持了最重要的机构：国防部、士兵苏维埃和人民卫队。然而武装力量并没有去保卫资本主义社会，正相反，他们成了决定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力量。

还可以列举出许多社会民主党被迫向共产主义运动做出让步的、意义重大或不甚重大的问题。

1918年和1919年，匈牙利共产党在争取人民方面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是因为劳动人民看到，只有共产党的纲领和行动才体现了他们的利益和意愿。匈牙利共产党取得成功的源泉是忠实地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以革命的勇气去战胜胆怯的妥协和为解放被压迫被剥削人民而进行的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斗争。

社会民主党一些忠于工人阶级的领导人也感觉到并理解了这一点。

社会民主党和工会领导人中间，始终坚持工人阶级信念和无私地服务于无产阶级事业的也不乏其人。尽管在看不到出路的年代里，在改良主义盛行时，他们也曾随波逐流，但是在革命的进程中他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政策已不符合历史形势的要求，也不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面对党的右派领导人的政策，他们的态度越来越具有反对派的性质。

这些领导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向左转中起了巨大作用。

3月，朗德莱尔·耶诺和其他人时常到监狱去就合作和合并问题与库恩·贝拉等人进行会谈。

在民族议会的选举问题上，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领导人和左派

反对派之间产生了深刻的矛盾。政府拖了几个月以后，终于决定在4月举行大选。左派担心，由于外地劳动人民的政治组织性不够强，在选举产生的民族议会中，反对社会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可能拥有较大影响。因此左派反对举行大选，他们认为，如果举行大选，资产阶级会占多数，这样布达佩斯的工人阶级将把议会驱散。

共产党也反对大选，指出，举行民族议会大选实际上就意味着社会民主党已放弃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在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左派的领导下，工人群众十分积极地参与了在大选问题上进行的政治斗争；抗议举行大选，阻止各资产阶级政党领导人举行竞选群众大会。

社会民主党领导分裂的征兆之一是，在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波加尼提出了建立一个新党——独立社会党的主张。

政府和社会民主党右派领导人完全被孤立起来，到了3月中旬，已经可以感觉到，他们一直试图阻止其前进的革命洪流将无情地把他们从前进道路上清除掉。

“表面上还是统一的社会民主党，从3月1日开始便乱了阵脚，步履艰难地担负着革命的重担。毫无疑问，一场强一点的风暴一定会把党吹垮。”伯姆在描述这个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最主要堡垒在3月的状况时这样写道。

3月23日匈牙利共产党在国家大厦广场召开了群众大会，以便表达“布达佩斯及其附近的工人群众反对资产阶级白色恐怖的革命意志”。这次群众大会不是一次普通的示威活动。对这一点无产阶级革命的拥护者和反对者都做了准备。各种预兆表明，武装的工人和政府将要分道扬镳。

1919年3月在国际上发生了几起重要的政治事件。这些事件对匈牙利国内形势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欧洲、美洲和亚洲各革命工人党的代表于3月2日在莫斯科建立了国际工人阶级新的斗争同盟——共产国际。在发起党中也有匈牙利共产党。参加成立代表大会的匈牙利代表是鲁道什·拉斯洛和梅萨洛什·加博尔。

3月21日前的几天，报刊报道俄国红军取得极大成功，正在加里西亚、比萨拉比亚大举进攻。有的报道说，红军已经到了喀尔巴阡山麓，以致于在山的西面都可以听见炮声。

虽然这些消息有些夸张，但是在2、3月间乌克兰红军确实取得极大战果，3月20日它已经到了日美林卡。

在布达佩斯，人们普遍认为，不久红军就将到达匈牙利边界。

关于在乌克兰发生的事件的消息对匈牙利社会所有阶层的态度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社会主义革命的拥护者们认为，红军的胜利前进是为在匈牙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斗争取得成功的保证。反革命力量则认为，保卫资产阶级政权的可能性更加渺茫。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拥护者中间，有些人以奇特的方式对红军的成功抱有希望。他们希望与俄国无产阶级政权的军队结成同盟将有利于保卫匈牙利的领土。

一起新的外交事件使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联合政府挨了致命的一刀。3月20日上午，协约国驻匈牙利代表维克斯中校把一份照会交给了政府。照会要求匈牙利再让出一些领土。

自从签订贝尔格莱德停火协定以来，协约国不止一次地迫使匈牙利部队自临时分界线后退。

12月初，埃尔代伊的罗马尼亚部队越过了贝尔格莱德协议确定的边界线，自毛罗什河向北挺进。

12月24日，匈牙利政府收到协约国的一份照会，要求从军事上把下述界线以北的地区空出来：自多瑙河到伊波伊河河口，自此开始沿伊波伊河到洛松茨止，自洛松茨到里马松博特一线，下

面一直到温格河河口，沿温格河直到乌若克山口止。1月下半月，捷克斯洛伐克部队完成了对12月2日照会所述界线以北地区的占领。

按照3月20日照会所述，匈牙利部队必须自蒂萨河东部100多公里长、平均50到80公里宽的地区回撤。

协约国的这一新步骤使对威尔逊的“公正和约”所抱的幻想最终破灭，暴露了西方民主国家真正的帝国主义嘴脸。

匈牙利资产阶级民主政府战后外交政策的两种选择是：“列宁还是威尔逊”。它从一开始就选定了威尔逊。《人民之声报》1918年11月19日写道：“威尔逊不意味着别的什么，只意味着始终一贯的民主，欧洲民主的一切源泉都将汇入威尔逊和约的大河”。卡罗伊·米海伊1918年12月30日，在党的委员会会议上说道：“我们只有一项原则——威尔逊、威尔逊，第三还是威尔逊。”3月20日，对威尔逊和对西方民主国家的谅解所抱的一切希望都完全破灭。

已经证实，匈牙利政府对协约国表示效忠的多次声明，协约国几乎没有给予重视。在巴黎和会讨论匈牙利问题时，他们基本上只重视两个观点：奖励战争的同盟国并以此来巩固中欧和东欧的影响；加强这些国家，以使用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和共产主义。

胜利者发号施令，匈牙利则必须付出代价。要为匈牙利统治阶级几个世纪以来压迫少数民族和为输掉了的战争付出代价。邻近几个年轻国家新产生的、急不可待和贪得无厌的民族主义得到了战胜国的支持，而匈牙利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联合政府元气不足的民族主义和不合时宜地坚持国家统一，则得不到任何力量的支持。

## 政府倒台，两党合并

---

3月20日下午，社会民主党领导机关开会讨论维克斯照会所造成的局面。伯姆向党的领导机关报告了有关情况。

上午维克斯交照会时，伯姆也在座，他回到国防部以后，征求了军队高级军官们的意见。无论国防部的专家们，如斯特罗姆菲尔德和通博尔，还是战斗力最强的塞凯伊军团司令克拉托奇维尔上校都主张回绝协约国的最后通牒。

通博尔上校（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在10月革命的日子里他与根伯什持同一观点）向伯姆提出一个值得注意的见解：

“现在应该丢掉一切和平主义，因为协约国践踏了威尔逊的原则并欺骗了这个国家。应号召全国人民武装自卫，应当把**倾向东方、倾向俄国**的政策列入我们的纲领，以取代倾向西方的政策。在当前只有社会民主党有能力组织武装自卫，此外没有更合适的政府可以领导这个国家。但是社会民主党必须与共产党讲和并**与之达成协议**，以便同驻扎在旧奥地利北部边境地区的苏维埃俄国部队建立同盟般的合作。”<sup>①</sup>

斯特罗姆菲尔德也支持通博尔的意见：“为了国家的利益，我曾建议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结成同盟。”1920年他在军事法庭

---

① 伯姆：《以两次革命为镜子》，1946年版，第180页。

前的供词中这样说道。

伯姆在部长会议3月17日的会议上曾反对建立社会民主党政府。如果说是斯特罗姆菲尔德和通博尔的建议促使了他改变态度，这是夸张的。但是毫无疑问，这个反映了军官团大部分人观点的建议对他的态度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党的领导机关的会议上，伯姆建议社会民主党接管政府，“与布尔什维克举行会谈，并签订一项协议，在此协议中他们表示愿意支持政府，即便是消极的支持也好。”<sup>①</sup>

这次会议没有作出最后决定。但是党的多数领导成员清楚地看到，违背共产党的主张，或者没有共产党参加，就无法成立一个有生命力的政府。因此，他们派朗德莱尔去会见库恩·贝拉并了解共产党的立场。

在部长会议晚上的会议上，卡罗伊·米海伊阐明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是联合政府辞职，建立一个纯社会民主党政府。他表示需要有新的外交倾向，因为“只有共产国际才能够帮助逃脱”困难局面。卡罗伊也认为，不与共产党达成协议，社会民主党政府不能存在下去。部长会议经过短时间的辩论，一致决定辞职，并把位置让给社会民主党政府。

政府中的资产阶级部长们都很清楚，共产党拥有巨大的群众影响，因此，他们几乎无例外地都表示，社会民主党应当与共产党取得一致意见。

但是有一点他们并不清楚，而这一点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不得不亲身体会，这就是共产党已经把工人阶级和武装力量的绝大部分争取了过去，与坐在部长席位上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相比，被关在监狱中的共产党领导人对群众拥有更大的权力。

---

<sup>①</sup> 高拉米·埃尔诺：《沸腾的匈牙利》，莱比锡—维也纳1922年版，第111页。

卡罗伊和政府内的其他资产阶级政治家（他们首先是通过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才对工人运动有所了解）希望通过成立一个过渡性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渡过难关，同时通过采取几项不至于从根本上危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措施满足群众的要求。等到情况好转时，可以重新把握缰绳。资产阶级在一些欧洲国家成功地运用了这种方法，但是在1919年3月的匈牙利，它不可能成功。社会民主党部长们比他们更了解真实情况，他们毫不怀疑，一个纯社会民主党政府也无法使这个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停下来。库菲在部长会议上提出，纯社会民主党政府也将“必然地靠向共产主义”，高拉米在早些时候曾多次表示过这种意见。库菲等人知道，即或建立了纯社会民主党政府，引导形势发展的也将是共产党所领导的群众，而不是部长们。

3月21日清晨，切佩尔各大工厂的代表和士兵苏维埃的代表们开会，讨论营救共产党领导人问题。会议的参加者完全同意共产党的要求。

上午朗德莱尔来到监狱，以便根据社会民主党领导机关决议的精神与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谈。在会谈中，朗德莱尔介绍了前一天发生的事情，并向库恩·贝拉等人建议：两党在共产党行动纲领的基础上合并并接管政权。他还说，社会民主党右派领导人，如高拉米、布清格尔、佩德尔等将不留在合并后的党内。参加会谈的中央委员们根据朗德莱尔所述，表示愿意达成协议。

上午10时，社会民主党领导机关开会，工会理事会的委员和党的几位有威望的党员，如瓦尔加·耶诺和朗德莱尔·耶诺等也应邀参加了会议。每个与会者都了解切佩尔所发生的事情和布达佩斯工人代表们与士兵代表们的立场。这一事实决定了会议的气氛和与会者们的态度。

“因为已很清楚，政府危机已经发生，很自然，共产党行动的目标就要推迟，政府已不存在，因此已没有一个可以坚决有力

地反对政变企图的力量。党的领导机关就是在这种气氛中开会的。”<sup>①</sup>

伯姆向与会者介绍了部长会议昨晚作出的决议并重申了前一天的建议。

高拉米建议社会民主党完全撤出政府。

高拉米说：“社会民主党已丧失了对群众的影响，战斗已经失利，这样社会民主党已无路可走，只有引退。”<sup>②</sup>布清格尔突然建议保留联合政府和接受协约国的最后通牒，但是每个人都清楚这是不现实的，并一致予以否定。佩德尔·久洛反对与共产党和解和接管政权。普罗派尔·山道尔也表示了类似的态度。

没有人提出抛开共产党成立社会民主党政府的建议，“因为每个人都感觉到，在当时情况下进行这种尝试是不会有结果的，也是不可取的。”<sup>③</sup>

朗德莱尔在会议进行中间从监狱回到了会场，通知与会者，共产党的领导人愿意就协议问题与社会民主党的代表进行会谈。此后，社会民主党领导机关的代表团——朗德莱尔、维尔特奈尔、波加尼、库菲和豪布里赫——去会见了共产党，以便签订协议。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上午对会谈做了准备。他们讨论了在什么样的基础上进行合并，制定了谈判方案，并指定了谈判委员会的成员。

社会民主党的谈判委员会是带着签订投降书的思想准备去监狱的。“已取胜的共产党发出指令，基础已经动摇了的社会民主党宣布投降。”<sup>④</sup>伯姆这样写道。

在监狱中，维尔特奈尔通知库恩等人，**社会民主党愿意接受**

---

①② 伯姆：《以两次革命为镜子》，第194、195页。

③④ 同上书，第196页。

**共产党的行动纲领，在与共产党合并后接管政权并宣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关于合并，库恩·贝拉要求澄清几个基本原则问题。他提及了印刷工人工会左派领导人波加尔·伊格纳茨几天前在答复关于合并的条件时曾经阐明的合作标准问题。维尔特奈尔等人认为没有必要进行辩论。“维尔特奈尔和库菲都申明，行动纲领他们没有读过，但是他们知道，其中包含了共产党纲领的所有基本原则，社会民主党无保留地接受这些原则。”<sup>①</sup>曾作为共产党中央委员参加会谈的桑托·贝拉这样写道。

只在一个问题上，即党的名称问题上，社会民主党有些期望。他们原则上并不反对使用共产党的名字，但是他们指出，如果接受这一名称，那就不是合并，而是社会民主党投降。最后双方商定，合并后党的临时名称叫匈牙利社会党，最后名称请共产国际决定。

对共产党的条件，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没有提出其他不同意见。

我们“径直地接受了……称为最后通牒也不过分的布尔什维克条件”。<sup>②</sup>后来维尔特奈尔这样写道。同时为自己辩解说，我们以为以后在党领导机关的会议上，仍可以对协议的一些令人担忧的细节加以变动。这后一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事件的前因、决议的条文和后来事件的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

两党的代表最后作出了如下决议：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和匈牙利共产党今天在双方领导联席会议上决定实行两党完全合并。**

---

<sup>①</sup> 桑托·贝拉：《匈牙利无产阶级的斗争和专政》，维也纳1920年版，第53—54页。

<sup>②</sup> 维尔特奈尔·雅各布：《革命、布尔什维主义和流亡》，布达佩斯1929年版，第148页。

合并的新政党在革命的共产国际尚未为其最后命名之前，暂称为匈牙利社会党。

实行两党合并的基础是：两党共同领导党和政府。

党以无产阶级的名义立即接管政权。通过工人、士兵和农民苏维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原订的民族议会选举计划自行作废。

必须立即建立无产阶级的军队，并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全部武装。

为了确保无产阶级的政权和反对协约国，必须同俄国苏维埃政府缔结最紧密、最真诚的军事和思想联盟。”<sup>①</sup>

在狱中达成协议以后，下午3时，布达佩斯士兵苏维埃举行会议。首都各部队的代表极为热烈地表示拥护宣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下午3时15分，社会民主党委员会开会。委员会的成员们兴奋地对党领导机关提出的关于与共产党达成协议的建议表示祝贺。

有两个右派领导人罗奈伊·佐尔坦和罗特·奥托发言反对与共产党达成协议，与会者们的愤慨打断了他们的发言。最后以一票反对通过了建议。

下午4时，贝林凯伊政府最后一次开会。各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不知道将发生什么事情，社会民主党人则认为没有必要通知他们。这样，部长会议的这次会议好象不是在匈牙利，也不是在宣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当天召开的一样。除了对维克斯作出答复外，会议日程中，几乎一个与当天发生的事情有直接关系的议案都没有。部长们认为最紧迫的问题是任命机关公职人员和教会人员，提高部长们私人补贴和国务秘书的工薪。

---

<sup>①</sup> 《团结文献集》，布达佩斯1919年版，第4—5页。



根据党委员会决议的精神，库菲和伯姆建议政府下令释放共产党人。经过简短的辩论作出了决议（资产阶级部长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这样紧迫）。瓦利·奥尔贝尔特总检察长恰好适时赶到监狱，否则，聚集在监狱前的群众，即使没有部长会议的决议，也会在短时间去他们要做的事情。

晚上7时过后，布达佩斯工人苏维埃在新市政厅开会。高尔保伊代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机关向与会者介绍了协约国的最后通牒、贝林凯伊政府辞职以及党决定与共产党合并并接管政权。高尔保伊没有按照真实情况，也没有用工人群众要求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可抗拒的意志去论证社会民主党的决定。他的论证正适合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口味。“他强调说，是协约国迫使社会民主党转向这个新的潮流。这个新潮流就是：从西方没有得到的东西，我们想从东方得到。我们应当顺应潮流的发展。俄国无产阶级群众战斗的军队正在向我们靠近。”

此后波加尼发了言。他通知说，关于两党合并和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的建议士兵苏维埃已经通过。他宣布：“今天，全国一切武装力量只认定一个目标，即服务于将成立的匈牙利苏维埃政府。”

武装力量代表的立场具有决定性意义。在工人苏维埃的会议上无人反对合并和宣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与会者们热烈地、一致地通过了关于两党合并的决议。

会上，共产党的正式代表波尔加尔·埃莱克对工人苏维埃的决定表示了祝贺，并宣布，共产党人下午在前下议院大厅举行过会议，与会者们也以同样的热情一致通过了这一决议。不久前还以压倒多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去的工人苏维埃，现在向共产党的代表们长时间地高呼万岁。

这次简短但却是热烈的会议由主持会议的波卡尼宣布结束。他的讲话深深地打动了听众。他号召工人们做好遵守纪律、迎接

战斗和忍受痛苦的准备。号召与会者在离开这次会议时要抱定一种观念，即就要来临和应当为之奋斗的将是社会主义本身的体现。波卡尼最后说：“我们应当为此去忍受痛苦，在需要时为此做出牺牲，但是这种忍受痛苦和付出牺牲的结果必将使我们得到一个世界。”

就是说社会民主党的所有领导机构都决定拥护合并和宣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毫无疑问，影响事件发展的首先不是这些机构的决议，事情正好相反。毋庸置疑，伯姆是对的，他写道：“监狱协议的字面内容与党的领导机关、党的委员会和工人苏维埃的决议实际上只是形式。它只是对外使实际形势神圣化。”<sup>①</sup>

工人苏维埃会议以后，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去了党的书记处，以便在那里与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就接管政权的细节问题取得协议。

伯姆和佩耶尔等四人乘车去党的书记处的途中被群众拦住，并受到了冷淡的问候，这很能说明街上群众的情绪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受欢迎”的程度。“在环路和安德拉希路交叉路口，武装的群众拦住了车队。佩耶尔要大家让开路，因为国防部长要去党的书记处，回答他的是诅咒声和砸破车窗。”<sup>②</sup>而与此同时，群众以真正的凯旋仪式把库恩·贝拉和其他共产党人从监狱护送到书记处。

共产党领导人到达以后，两党领导机关的联席会议根据在狱中拟订的文件，决定两党合并、接管政权和宣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成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根据波卡尼的建议把政府定名为革命苏维埃政府，其成员称为人民委员。

---

<sup>①②</sup> 伯姆：《以两次革命为镜子》，第201页。

关于革命苏维埃政府的组成，两党领导人达成如下协议：

“主席：高尔保伊·山道尔；

内务人民委员：朗德莱尔·耶诺博士；

副内务人民委员：瓦戈·贝拉；

农业人民委员会由部务会议领导，其成员有：齐斯马第奥·山道尔、万图什·卡洛伊、汉布尔格尔·耶诺、尼斯托尔·久尔吉；

财政人民委员：瓦尔加·耶诺；

副财政人民委员：塞凯伊·贝拉；

教育人民委员：库菲·西格蒙德博士；

副教育人民委员：卢卡奇·久尔吉博士；

劳动人民委员：波卡尼·德热；

副劳动人民委员：菲埃德莱尔·莱热；

外交人民委员：库恩·贝拉；

副外交人民委员：阿戈什通·彼得博士；

商业人民委员：朗德莱尔·耶诺博士（暂任）；

副商业人民委员：拉科西·马加什、豪布里赫·约瑟夫；

国防人民委员：波加尼·约瑟夫；

副国防人民委员：桑托·贝拉、萨姆埃里·蒂波尔；

司法人民委员：罗奈伊·佐尔坦；

副司法人民委员：拉道伊·伊斯特万；

社会所有制人民委员：伯姆·维尔莫什；

副社会所有制人民委员：海维希·久洛、多乌洽克·安托尔；

德意志族人民委员：考尔玛尔·亨利；

喀尔巴阡乌克兰族人民委员：萨波·欧莱斯特<sup>①</sup>；

---

<sup>①</sup> 萨波·欧莱斯特没有接受这项委任，因此改由什泰凡·阿戈什通担任。

食品人民委员：埃尔代伊·莫尔；

副食品人民委员：伊雷什·奥尔图尔。”

新成立的革命苏维埃政府立即开始了工作，并颁布了两项法令。第一项是设立特别法庭，对以武力反抗苏维埃共和国命令者、煽动暴动者和抢劫者进行特别审判；第二项是禁止零售、销售和饮用酒类。

\* \* \*

斗争的胜负终成定局：无产阶级专政诞生了。在匈牙利历史上，劳动人民第一次掌握了政权。匈牙利人民的生活开始了一个新时期——自由的时期。挣脱了千百年剥削的枷锁，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感充满工厂和农村的无产者的心田。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光辉前景已经展现在这个被统治阶级的罪恶推入苦难深渊的国家面前。

这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胜利。在俄国人民之后，匈牙利工人阶级第一个走上了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有人散布谎言说，无产阶级革命和工人阶级的专政只是落后俄国的特有现象。匈牙利工人阶级的胜利对这些旨在欺骗世界工人群众的谎言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匈牙利无产阶级通过非流血的革命，通过和平方式夺取了政权，为各国劳动人民提供了一个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富有吸引力的榜样。列宁在谈到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曾多次指出，在1919年3月21日，社会主义革命也取得了**精神上的胜利**，因为，匈牙利资产阶级已经承认，“在最严重的危急关头，当一个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的国家面临新的战争的时候”，“匈牙利的工人和农民、新的无产阶级的苏维埃民主制应当拯救国家”。<sup>①</sup>

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库恩·贝拉等人的历史功勋就是抓住了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29卷，第195页。

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关系所提供的有利时机，不是通过武装起义，而是通过与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达成协议的方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

拒绝社会民主党的建议就等于共产党人放弃利用接管政权的有利历史时机。也无法向团结在共产党周围的工人群众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为什么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的行动纲领和宣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拒绝他们的建议。拒绝这一建议就意味着共产党人要在更加艰难的环境下，承担着内战和工人阶级自相残杀的风险去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回绝协约国的照会本身就潜藏着帝国主义进攻和对国家实行军事占领的危险。反动的资产阶级倒愿意看到美、英、法或意军占领匈牙利。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力量不仅要与匈牙利统治阶级，而且要与它的同盟者——帝国主义军队作战，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希望就会更小。

\* \* \*

两党的合并也带有一些消极的方面。这在以后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并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

这次合并实际上意味着在组织上把年轻的共产党取消了。

可悲的矛盾是，匈牙利工人阶级在取得辉煌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却失去了工人运动的伟大成果——一个新式的革命先锋队。

在1919年3月，匈牙利共产党人还没有很好地理解列宁关于党的学说。他们不知道，无产阶级不能没有一个有组织的革命先锋队。他们以为，在社会主义中，无产阶级的国家组织也能够完成共产党的使命。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社会民主党右派和中间派领导人同意与共产党合并和宣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被迫的。

伯姆在其回忆录中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一种自杀的方

式，他承认，他和他的同伙所以同意在苏维埃政府中任职，为的是能尽量多地挽救一些东西。通过表面上接受共产党原则的方法，保住他们在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取得的地位，以便在复辟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时发挥其作用。

共产党的领导人犯了错误，因为他们对三个右派社会民主党人脱离党已经感到满足，他们没有采取坚定的步骤，把那些无产阶级专政敌人的面孔已经暴露的人从党、国家和工会的领导岗位上清除出去。这样，象维尔特奈尔、佩耶尔、雅萨伊·绍牟、罗奈伊·佐尔坦那样的人还继续留在关键的岗位上。两党之间在合并时的力量对比情况本有可能把革命苏维埃政府、党和工会领导机关的人员构成安排得对共产党更有利些。

共产党人对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很了解。他们对佩耶尔、维尔特奈尔、万察克等人的革命性并不抱幻想。但是，在3月21日，有几个重要因素影响了对待他们的态度：

由于社会民主党左派领导人和一些中间派，在工人群众日渐革命化的影响下，真心实意地向共产党的观点、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靠拢，他们以为其他人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

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前一个月内，共产党的多数中央委员还被关在监狱里，尽管情报的传递是完善的，但是他们没有很好察觉到在对待社会民主党右派领导人问题上群众情绪的变化。

共产党领导人很清楚，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需要克服极大的困难。只有整个工人阶级共同努力才能取得胜利。因此，他们认为把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吸收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中去是维护工人阶级统一的必要保证。

共产党对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国际形势和对欧洲革命运动发展的过分乐观估计的影响，以及受到“在几个月内，无产阶级专政将在欧洲不少国家取胜”这一坚定信念的影响。他们坚信在这种情况下，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将没有

能力起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即使他们试图这样做，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他们从前进道路上清除出去。

3月21日，共产党领导人还不知道，或者虽然知道，但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即一部分社会民主党和工会领导人在思想深处是带着反革命企图来参加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工作的。共产党领导人不知道，对他们的忍让态度将使无产阶级专政付出高昂的代价。但是，库恩·贝拉也感觉到有些不大对头：

“进行得太顺利了。我一夜未睡，总觉得我们在哪里犯了错误。因为在某一问题上是有错误的。进行得太顺利了。以后我们会认识到的，只是我担心已经晚了。”<sup>①</sup>

---

<sup>①</sup> 桑托·贝拉：《匈牙利无产阶级的斗争和专政》，维也纳1920年版，第56页。





## 第二部分

---

# 苏维埃共和国

---



## 接管政权

---

伟大变化即将到来的紧张气氛在3月21日下午已经可以感觉到了。

虽然报纸没有出版，但是，关于协约国照会和政府危机的消息已经传开了。工厂、兵营和机关内气氛紧张。每个人都在议论形势将向何处发展。

在士兵苏维埃下午的会议以后，一些受革命力量领导的部队占领了首都的一些重要据点。在街上，无产阶级政权的武装红色卫队在巡逻。警察们已经从他们的岗位上消失了。

下午6时，一些共产党人在前下议院会议厅开会，鲁卡奇·久尔吉作了题为《新、旧文化》的报告。这时与会者们已经知道了在监狱进行谈判的情况和士兵苏维埃的决议。他们已不顾报告，而在激动地进行谈话和辩论。突然，自2月20日以来一直处在地下的萨姆埃里出现在讲台上，他打断了报告，宣布了达成协议的消息：两党已经合并，无产阶级将接管政权。他在结束这次简短但影响巨大的讲话时高呼：

“匈牙利工农兵的苏维埃共和国万岁！我们的俄国兄弟万岁！”

考沙克·拉约什在其题为《一个人的一生》的书中这样回忆这一难忘的时刻：

“激情从人们的内心迸发出来，突然间，每个人都振奋地高呼起来。报告已无法继续进行。这一群人象一个被点燃了了的干草垛，立时以一种要毁灭一切的气势炽烈地燃烧起来。人们争相涌出门外。

夜晚已经来临，春寒料峭，下着小雨。群众自动形成整齐的游行队伍，经过博物馆环路向拉科奇路进发。

有人找来一面旗帜，高举着走在队伍前面。路边楼内的居民都打开了窗子，向着高呼口号、唱着《马赛曲》、《国际歌》的游行群众挥动花头巾或红色头巾。”

正象1918年10月底那样，各主要街道又一次挤满了群众。演讲者向聚集在街角上的群众介绍形势。

在维谢格拉德街共产党的办公处门前，自下午直到深夜，群众集会不断。不时有演讲者来到阳台发表简短的演说。但是，他们的话都被热情群众的欢呼声所湮没。

“无法想象的激情。‘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俄国同志万岁！’‘列宁万岁！’‘库恩·贝拉万岁！’以及类似的欢呼声不时打断演讲者的讲话。”<sup>①</sup>

这就是党办公处门前的情况。党中央的一个工作人员来到楼前时几乎无法挤进楼去。

党办公处内部也挤得水泄不通。各工厂、武装部队和人民卫队请求指示的代表接踵而来。一些代表团也前来对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表示声援。

“要求举行效忠宣誓的代表中间有卢多维卡军事学院的学员和屠宰业工会的领导人，这次他们没有携带屠刀。”<sup>②</sup>加博尔·莫哉什这样写道。

---

<sup>①</sup> 兰捷尔·约瑟夫：《维谢格拉德街》，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98页。

处在人群中间的是萨姆埃里，他不懈地和周密地布置着工作。他下令占领武器库和弹药库，保护银行和珠宝商店，阻止坏人乘机抢劫等。他还抽出时间把党中央的办事机构从维谢格拉德街（这里地方狭小，已经无法工作）迁往自由广场的交易所大楼。

没有发生武装抵抗事件。当塞德莱尔·埃尔诺和两位其他同志来到警察总局接管警察局的领导工作时，“当时处在楼内的警官们在高级警官的率领下列队表示愿意为新制度服务”。<sup>②</sup>西拉吉·德热这样回忆道。《人民之声报》当时报道说，在莫索尼街的警察兵营内“士兵和军官们热烈地欢迎新生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并为无产阶级专政高呼万岁”。

夜里，强盗们试图利用警察不工作的机会，抢劫了几家珠宝商店和食品店。但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保安部队的巡逻队很快就使这帮强盗们失去了幻想。他们失望地看到，他们上了反革命的当。反革命分子散布说，共产党上台就意味着抢劫自由。

3月21日夜里，已由武装的工人负责维持首都的治安。

贝林凯伊政府的部长、苏维埃共和国新任人民委员库菲·西格蒙德当夜在党的书记处开会。会后必须由一位当天从监狱释放出来的共产党人陪同才敢回到他在特奎里街的家里去。这一点很能说明当时的形势。

根据革命苏维埃政府的决议，3月22日晨，人民委员们已各就其位。各机关的官员们全部归降，欢迎无产阶级专政政府成员的到来。

拉科西·马加什在谈到他在商业部受到的接待时说：“第二

---

<sup>②</sup> 加博尔·莫哉什：《在苏维埃共和国期间组建国际团》，1959年《社会评论》第3期，第85页。

<sup>③</sup> 《伟大时期见证人回忆录》，第57页。

天早上，当我到达人民委员会，即部时，被引见给国务秘书——我想他的名字叫梅海伊——他即刻自我介绍说：‘我是梅海伊同志！’……我知道他是全国产业工业者协会的秘书，他也是‘同志’，使我感到惊异。此后，副国务秘书和参事们都跑来见我。每个人在自我介绍时都自称‘同志’。当时我只一个人，连一支手枪也未带。来见我的人中，没有一个怀有反抗动机的。”<sup>①</sup>

大批工人群众从郊区涌向布达佩斯市中心。表示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自发的群众集会接连不断。成千上万的人从报上或招贴上宣读着革命苏维埃政府的第1号宣言。人们把贴有这种招贴的广告柱和墙壁围得水泄不通。

这一宣言是库恩·贝拉和波加尼·约瑟夫受革命苏维埃政府的委托在夜间拟就的。

“告全国人民书

匈牙利无产阶级从今天起把全部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宣言这样宣告后接着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破产，联合政府在内政和外交上已完全失败，“只有确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把国家从崩溃的无政府状态中拯救出来。”

宣言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决定性条件是无产阶级的完全统一”。因此，两个工人党决定合并为匈牙利社会党。革命苏维埃政府受党的委托执掌政权。

宣言说：“匈牙利的国体是苏维埃共和国。”宣言还宣布了革命苏维埃政府关于消灭剥削和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纲领，“宣布把大地主的土地、矿山、大工厂、银行和交通企业收归社会所有。实行土地改革，但不是分散成小块土地，而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合作社。”

接着，宣言宣布，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将无情地镇压反革

---

<sup>①</sup> 《拉科西案》，星火出版社1950年版，第311—312页。

命、投机分子和抢劫犯。“组建强大的无产阶级军队，以确保工人和农民对匈牙利资产阶级和大地主以及对罗马尼亚的封建贵族和捷克的资本家实行专政。”

在谈到苏维埃共和国的外交政策时，革命苏维埃政府宣布它与俄国苏维埃政府“在思想上、精神上完全一致”，并希望与俄国无产阶级结成军事同盟。宣言号召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不要容忍自己的政府向苏维埃共和国发起掠夺战争，号召邻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霍尔瓦特国的劳动人民在反对剥削者的共同斗争中结成同盟，号召沸腾的奥地利和德国的无产者学习匈牙利工人阶级的榜样。

宣言没有回避匈牙利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将面临的困难：“贫穷、灾难和痛苦在等待着我们。但是我们应该跨上，同时我们也敢于跨上这条道路，因为我们对匈牙利无产阶级的英雄主义和献身精神充满信心。勇敢向前，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拯救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

中午时分，切佩尔电台广播了这一宣言。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消息象野火一样迅速在国内传播开来。

设在伊利沙伯环路上的党的书记处在21日晚已经用电报把有关情况通知各州的政府委员、较大城市的工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指示各地工人苏维埃接管政权。

在21日晚上，几个较大城市——蒙卡奇、塞克什白堡、松博特海伊和考波什堡的群众已举行了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示威游行。22日，在所有较大城市和乡村都接管了政权。值得一提的是没有发生反抗或较大的骚乱。

22日下午，革命苏维埃政府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在历时数小时的会议上，人民委员们共讨论了三十个问题。作出了关于取消爵位和官阶、关于国家与教会分开、关于建立由非正式法官组成的革命法庭、关于向前线派遣政治委员以及关于任命州工人苏维

埃执行委员会并用以代替政府委员的决议。为了准备选举工人、士兵和农民苏维埃，指定了一个由五人组成的委员会。指示社会所有制人民委员会领导人尽快制定出把工厂和出租房屋收归社会所有的方案。要求教育人民委员就如何使人民群众能够较容易地看上戏和如何使剧院为普及社会主义文化服务问题提出建议。

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已经开始工作。

\* \* \*

匈牙利人民以无法形容的热情欢迎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

在3月21日以后的几天内，全国劳动人民举行了规模宏大的群众大会来庆祝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

3月23日，星期天，匈牙利社会党在国家大厦前举行了有10多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因为在当时还没有扩音设备，所以同时要有几位演讲者向群众讲话。库恩·贝拉、波卡尼和高尔保伊由工人们抬着；伯姆站在汽车顶上；汉布尔格尔和尼斯托尔站在农业人民委员会办公楼阳台上；瓦戈则站在司法大楼的阳台上向听众们讲了话。大会与会者们热烈地、暴风雨般地高呼无产阶级专政万岁，革命苏维埃政府万岁，苏维埃俄国和苏维埃匈牙利同盟万岁，共产国际万岁和列宁万岁。

外地的城市和乡村也举行了类似的群众集会。杰尔市群众大会的决议“祝贺匈牙利和俄国的苏维埃政府，祝贺无产阶级的代表——列宁。号召每个人更加努力工作，因为现在已经为自己工作。号召没有工作的人参加红军，保卫无产者自己的国家。”《人民之声报》这样写道。

许多乡村，如图尔凯韦，也召开了群众集会，为了表明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诚意，他们通过决议，要以食品支援革命的首都——布达佩斯。

城乡无产者无比兴奋地获悉，他们这些受了几个世纪剥削和凌辱，被当作无感情、无智能的工具使用的千百万劳动群众竟成



了国家的主人，成了他们以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一切价值和成就的主人。在1919年3月以前，祖国对工厂和农村的贫困群众来说，只不过是后娘，而现在却成了慈爱的亲娘。

尽管这位亲娘是个遍体鳞伤的、憔悴的乞丐，一时还不能为她的子女提供温饱、富足和安定的生活，但是，在当时这并没有使无产阶级感到沮丧。

尽管革命苏维埃政府的第1号宣言已经提醒人们，他们将面临的是贫困和痛苦，但是，劳动人民有如儿童们期望奇迹降临那样憧憬着未来。多少年来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剥削制度已被推翻，社会主义社会诞生了。当时不仅工人、农民们不知道，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人究竟应该如何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也是不够明确的。它要求全国人民团结奋斗、遵守纪律、英勇牺牲和通过耐心的、忘我的、长期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工作才能建成。

工人运动团结的实现使工人们感到宽慰。他们为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走上正确道路（起码他们以为社会民主党接受领导职位的动机是正直的）和消除不幸的自相残杀感到高兴。

农民的绝大多数也欢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在宣布成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前，无地的与无财产的农业工人、雇工和贫农们就期望社会主义革命使他们交上好运。中农也赞同取消1000霍尔特以上的大庄园，赞同革命苏维埃政府在帝国主义进攻面前表现出的坚定态度。但是他们担心无产阶级专政将消灭土地私有制，这会侵犯他们的利益。

无产阶级以极大的、战胜一切的热情迎接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这种热情和工人阶级所表现出来的意志的高度统一也在社会各阶层的表现中得到反映。

匈牙利知识界的最优秀分子（学者、作家、艺术家等）不仅以兴奋的心情欢迎这个比过去更人道、更公正和更合理的人民国

家的诞生，而且他们自己也积极地参加了工作。他们指望人民的国家会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愿望。我们文化界的优秀人物并不是随波逐流地成为苏维埃共和国的拥护者。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所采取的积极立场是他们过去表现的合乎逻辑的继续。以前他们也不是站在剥削者和蒂萨·伊斯特万等人的立场上去探讨匈牙利人民命运的基本问题，他们是以奥地为最伟大最有远见的代表和精神领袖的阵营的成员。

在战争期间，没有任何力量能够迫使艺术家们为罪恶的流血服务，而现在他们则全心全意地站到了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国家一边。

托特·阿尔帕德祝贺苏维埃共和国诞生的诗篇体现了他对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拯救世界的力量所寄予的信念，体现了他对人、对民族和对全世界的幸福未来充满信心，同时也表达了知识界最优秀分子的思想：

### 新的神明

祝福你，新的神明，祝福你！  
愿你的言辞成为创造万物的真言，  
我们这破败的行星积满污垢和罪恶，  
这是以前统治者们的罪过。  
在诸神中间你是新生的和无产的，  
创造幸福吧，用你那粗壮的手，  
把我们举起来吧，用你那双巨掌，  
并把我们的改造成你的模样！

——托特·阿尔帕德

工厂知识分子（工程师们）的大部分在苏维埃共和国取得胜利之前就站到了工人群众一边，并积极参加反对军国主义的运动

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工作的。政治上和技术上最杰出的工程技术人员在工厂的领导中起了主导作用，后来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参加了红军，与工人们肩并肩地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而战。

在谈到知识界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态度时，应当提到知识界的一个广泛阶层——教师阶层。在地主资本家的匈牙利，他们是受歧视、过着贫困生活的有知识的雇工，受到神甫们的任意欺凌。他们亲身经历了城市和农村贫苦人民的不幸遭遇：贫困，富豪和官职人员们的作威作福，埋没人材和在精神方面的严重落后状态。多数教师认为苏维埃共和国是人民和他们自己解放的保证，因此，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中，他们是积极的战士，其中不少人为了工人阶级的政权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出身于绅士—资产阶级的国家官职人员阶层从来就是没有骨气的。这些人不加思索地贯彻执行蒂萨政府反人民的法令，后来他们又带头对卡罗伊·米海伊表示效忠（自然是在力量对比发生决定性变化之后）。在3月21日以后，他们又表现出了类似的奴隶性，热烈地向无产阶级专政投诚。

不应否认，官职人员的一致投诚，除了担心丢掉职位的机会主义外，也还抱有某种期望。官职人员作为中等阶层也清楚，只有工人阶级的政权才能够在保卫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取胜。大部分官职人员也不能不参加为实现工人阶级政府的纲领中规定的伟大任务而进行的斗争。尽管如此，毋庸置疑，国家机关的领导人所以迅速地对无产阶级专政表示效忠，除了想保住职位外，还想阻止革命的前进并在机会到来时利用他们的地位去复辟旧制度。

资产阶级共和国前总统卡罗伊·米海伊在3月内发表的几次声明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众所周知，卡罗伊并没有促进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的意图。他指望通过建立一个纯社会民主党政府和左派做出一些让步，能够稳定住国内局势并使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获得保卫国家领土完整的能力。事件的迅速发展和劳

动人民一致的、高亢的激情也使他逐渐认识到，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不可避免的。3月23日，卡罗伊在贝林凯伊政府的部长向他正式道别时说：“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事件的无情逻辑的结果，是顺乎自然的进程。试图扼杀我们的协约国的盲目性和罪恶企图加速了这一进程。”“应该创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它的使命是以其新的经济和道德内容改造整个世界。”一天以前，他向《人》杂志发表声明时这样说道。而后他宣称，对他本人来说只有一项使命，就是“为了神圣的事业和为了拯救祖国人民而鞠躬尽瘁”。<sup>①</sup>虽然卡罗伊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忠诚态度是不容误解的，但是，他没有可能担任与他的政治影响和威望相应的职务。随后便隐居起来。有几次他曾试图对事件的发展施加影响，但未取得成功，后来经苏维埃政府的同意到了国外。

在许多地方，卡罗伊党的党员集体加入匈牙利社会党。3月23日，《人民之声报》自新佩斯报道说：“卡罗伊党的领导人宣布取消党，并携带所有财产和设备加入了社会党。”在霍德梅泽瓦沙海伊，卡罗伊党的领导人发表声明说：他们“想从内部支持社会党的工作”并集体加入了匈牙利社会党。<sup>②</sup>

在3月底和4月初，想个人和集体加入匈牙利社会党的人络绎不绝。

3月23日，匈牙利记者工会举行全体会议并宣布参加党。3月27日，德布勒森市工人苏维埃执委会宣布解散各资产阶级政党，于是他们就溶入了联合的工人党。3月30日，在费耶尔州的扎莫伊，在当地天主教神甫布道的影响下，“全体与会者参加了社会党。”1919年4月2日的《人民之声报》这样写道。璠吉考

---

① 1919年3月25日《人》杂志。

② 拉斯洛·耶诺：《霍德梅泽瓦沙海伊市革命史》，1924年版，第37页。

尼饶、佩奇、瑙吉卡罗伊等地的教会教师也决定加入党。“我们对心灵的转变表示理解……无产阶级的伟大解放斗争理应把每个人都卷入。”《人民之声报》4月5日这样写道。4月23日又报道说，在考波什堡市，纳加塔迪·萨波·伊斯特万带领小农党全体党员加入了匈牙利社会党。

如果象《人民之声报》那样过高地估计新党员的道义信仰的力量，而不看到他们加入党的动机首先是欺骗无产阶级，保住自己的职位和想通过入党取得某种经济、政治利益以及保证自己的活动自由，自然是十分错误的。这样为工人阶级政党带来的组织不纯给无产阶级专政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但是，各阶层人民群众大批入党直接反映出千百万劳动群众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

共产党员们在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感到兴奋的同时，也感觉到了一种忧虑。因为在革命苏维埃政府内，在人民代表之间只有两名共产党人——库恩和万图什，而社会民主党人仍保持着他们在党和工会领导中的职位。这些工人领袖们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拥护者，因此匈牙利共产党的多数党员对他们的诚意是有怀疑的。3月21日《红色报》的一篇文章表达了这种不信任：

“要警惕和监督革命苏维埃政府的每一项措施！会使广大共产党员感到不快的是，那些曾经试图在无产阶级专政面前大肆诽谤我们的人，正是现在站在建立苏维埃政权工作前列的人。革命的无产阶级现在要克服对人的偏见，但也不应当忘记过去。共产党人要把过去体验到的东西贯穿到革命监督的义务中去。共产主义革命的领袖们的义务是建立和扩展苏维埃并以革命思想去武装它们。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苏维埃的政权。无产阶级自己是一切决定的倡议者和执行者。

我们相信革命的领袖们，但要监督革命政府。”

共产党人不愿意放弃党组织的独立性，在许多地方，党员们不愿意转入以社会民主党组织为基础的联合党组织中去。他们在新的党组织中也没有隐瞒他们对那些直到最后还为资产阶级效劳的人们的看法。

在3月和4月初，库恩·贝拉不止一次地以最坚定的态度主张消除共产党员们这种保持距离的做法。借助于他的威望，最后各地的共产党组织才融合到联合的党组织中去，很遗憾，实际情况是融合到了社会民主党中去。

多数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的一段时间里隐居起来，慎于公开发表意见。这样做是有其原因的，因为工人们是不会忍受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观点及其代表人物的。但是，如果这些人在某地占有优势，他们就尽一切努力排挤共产党人。

人民群众的热情使中间派也随波逐流。当无产阶级专政在全国取得辉煌胜利时，库菲在1919年3月28日的《红色报》中写道：“凡真正具有革命造反思想、凡真正把社会主义视为内心的需要和道义上自我的一部分的人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宁肯与为完全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无产阶级同归于尽，也不愿与为挽救过去而枉费心机的资产阶级一起苟延残喘下去。”

右派和中间派一般都力图在人民群众面前隐瞒一个事实，即社会民主党在3月21日以前之所以反对共产党，是因为他们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力图把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政策不同粉饰为策略和进度的不同。在苏维埃共和国存在的最初几周内，他们对实现党的统一表现出了最大的热心，因为在那种情况下，这样做最能保住他们的职位。维尔特奈尔在4月初写道：“我们应该全面地恢复最完全的一致，那些为了同一目标但又各自单独作战的阵营应当联合起来。”

人民群众是拥护共产党的，这一点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也不得不承认。4月3日，全体布达佩斯城防部队在城堡内举行反对国

防人民委员会领导人波加尼的示威游行，赶去解围的伯姆费了许多周折才免于挨打。士兵们高呼库恩、桑托和萨姆埃里万岁。在同一天，库恩·贝拉在革命苏维埃政府的会议上建议把绝大多数由共产党人担任的副人民委员任命为人民委员，社会民主党人未表示异议地接受了这一建议，这是很自然的。这一事实也证明，共产党依靠着人民群众，从一开始就可以提出更高的条件。

\* \* \*

世界每一个有觉悟的劳动者都以无比的热情欢迎匈牙利工人阶级的胜利。他们认为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阶段。

3月22日下午5时，切佩尔电台与莫斯科取得了联系，请苏维埃国家领导人列宁到电报机跟前来。20分钟后，莫斯科回电说：“列宁在电报机旁”，列宁要找库恩·贝拉通话。

库恩正在参加革命苏维埃政府会议，因此由共产党中央委员波尔·埃尔诺代表库恩接谈，他说，匈牙利工人阶级已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向列宁致敬，请他向俄国工人阶级转达匈牙利工人阶级的革命声援和祝贺。波尔简短地向列宁介绍了匈牙利的形势，要求第三国际就匈两党合并后的党名问题表示意见。他宣称，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建议与俄国苏维埃政府缔结防御同盟，最后请介绍俄国的军事形势。

晚上9时以后，切佩尔电台从莫斯科收到如下电报：

“我衷心地向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无产阶级政府，特别是向库恩·贝拉同志祝贺。您的祝贺我已转告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大家都很兴奋。我们将尽快地把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莫斯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关于军事形势的通报拍发给你们。布达佩斯和莫斯科之间经常的无线电联系是绝对必需的。致共产主义敬礼，握手。列宁。”<sup>①</sup>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29卷，第196页。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向年轻的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伸出了兄弟的右手。在历史上，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缔结了同盟。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事件。

很自然，在国外，列宁所领导的年轻苏维埃国家的劳动人民最欢欣鼓舞地欢迎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的诞生。当时，苏维埃俄国和苏维埃乌克兰正在国内反革命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军队的包围圈中为自己的生存而战。苏维埃匈牙利的出现对苏联人民来说意味着第一个同盟者的出现，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向西方的延伸，坚定了他们的胜利信心。

布尔什维克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3月22日发出电报祝贺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

“俄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热烈祝贺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代表大会确信，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俄国工人阶级将竭尽全力帮助你们。全世界的工人群众将继续密切关注你们的斗争，并将不容许任何一个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伤害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苏维埃的匈牙利万岁！

国际共产主义共和国万岁！”<sup>①</sup>

苏联劳动群众举行无数次群众集会和会议表示声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匈牙利报刊，首先是《人民之声报》和《红色报》，不断刊登苏联各地群众集会的与会者向匈牙利工人阶级表示祝贺的电报。

高尔基也发来电报：“我们的新生活破晓了，不久全世界都将学习你们的榜样。”

奥地利、德国和其他国家最优秀的代表也都以极大的热情表示声援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

---

<sup>①</sup> 《匈牙利工人运动史文献选编》第6/A卷，第6页。



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伟大战士克拉拉·蔡特金写道：

“匈牙利无产阶级的胜利以火一般的语言告诉全世界被奴役的工人群众……匈牙利无产阶级的英勇行为……将加强被剥削的人民群众的信心、斗志和创造精神。并将在帝国主义以为已将社会主义击败的地方促进革命的爆发。”

当时在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霍尔瓦特—斯洛文尼亚王国，共产主义力量的团结与无产阶级革命党的组建工作还处在初期阶段，尽管如此，有觉悟的工人群众在这些国家里也做出了许多同情匈牙利革命的表现。

##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

在人类历史上，与1919年3月21日在匈牙利诞生的国家相类似的只有巴黎工人1871年的伟大尝试和1917年11月俄国无产阶级开创新纪元的社会主义革命。

建立新的压迫和剥削制度不是夺取了国家政权的阶级——工人阶级的利益所在，正相反，它的历史使命恰是利用专政的手段最终消灭一切剥削和阶级、民族和种族压迫。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宣称：“无产阶级专政只是消灭一切剥削和各种阶级统治的手段，是为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制度做准备。在这个社会制度中，阶级统治的最主要工具——国家政权也将消亡。”

当时的立法权和司法权统一由各地人民苏维埃行使，它们同时也是执行机构，这个年轻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构就是建筑在人民苏维埃这个最广泛的基础之上的。

乡、市和布达佩斯各区苏维埃的委员由劳动人民直接选举。县级苏维埃由乡和市苏维埃选举产生。州级苏维埃由县和市苏维埃选举产生。

布达佩斯各区苏维埃按居民数的多少向中央工人苏维埃选送委员，它共有500名委员。

各地方苏维埃为了直接处理事务建立了执行委员会。它在乡一级由5人、在县一级由15人组成，在市和布达佩斯区一级为20人、在州一级为40人组成。布达佩斯中央工人苏维埃有执行委员80人。从各执行委员会中选举3至5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各级苏维埃的工作由常务委员会直接领导。

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主要国家政权机构是苏维埃全国会议，其委员由州和市苏维埃选举产生。委员会全国会议闭会期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其职权。中央执行委员会由150名委员组成。

按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的规定，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产生革命苏维埃政府的委员和主席。在苏维埃全国会议召开以前，革命苏维埃政府根据布达佩斯工人苏维埃和士兵苏维埃3月21日的决议进行工作。

3月21日以前，全国大部分地区政权已掌握在革命的人民苏维埃手中。在3月间，向新制度的过渡所以进行得迅速和基本顺利，上述事实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宣布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后的几天里，全国一切城市和乡村的政权都由苏维埃接管。在没有成立工人苏维埃和农民苏维埃的地方，通过临时选举产生临时苏维埃。到4月普选以前，现有的苏维埃继续工作。

在行政管理工作中，一些没有经验的普通人开始做所管辖地区的领导工作，但是他们的工作是很周全和富有责任感的。

革命苏维埃政府4月1日颁布的条令对外地各苏维埃和常务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作出了规定。

条令规定，“**外地各苏维埃的任务就是建立新的制度**”。条令并为各苏维埃规定了最紧迫的任务：

接管现有保安部队的领导权，如果需要，可派可靠人员到其中工作。

接管各乡的行政领导权。封存各银行和储蓄银行的现款。如

果认为较大的资本家有可能把财产隐藏起来或私自运往国外，可以冻结他们的现款和有较大价值的物品。

要派有才干的、政治上可靠的人去接替被辞退的旧公职人员的工作。

盘点食品存货，必要时可予征用。

接管地主庄园，并将其中文物和珍贵物品造册登记。

如有反革命活动，应向内务人民委员会提出报告，如果需要，将参加者予以逮捕。

保证生产顺利进行，但是，任何地方不得分配土地。

要严惩盗窃犯、抢劫犯和破坏无产阶级的财产的罪犯。

革命苏维埃政府特别重视在各地方苏维埃内要由能真正代表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人进行工作。同时认为尽快举行普选是重要的。革命苏维埃政府在3月22日的会议上成立了一个五人委员会筹备选举工作。

4月3日颁布的条令规定：“革命苏维埃政府认为有必要尽快使匈牙利劳动人民的意志通过工人、士兵和农民苏维埃得到体现。”条令规定，乡和市苏维埃的选举于4月7日、县级苏维埃的选举于4月10日、州一级苏维埃的选举于4月12日进行。4月14日选举苏维埃全国会议的代表。革命苏维埃政府准备在4月内举行苏维埃全国会议。

苏维埃共和国临时宪法规定，凡年满18岁，以有益于社会的劳动为生的公民，不分性别，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为了获取利润而雇用工人的人、不劳而获的人和由于犯罪而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

匈牙利劳动人民为了取得普遍的、无记名投票的选举权进行了几十年的斗争。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以前的选举法剥夺了大部分劳动人民和全部妇女的选举权。

在1919年4月，全国人口的一半，共450万劳动者可以参加选举。这个数字是参加1910年在相同地区举行的最后一次选举的人数的许多倍。

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市和乡的苏维埃的选举于4月7日进行。这天是星期一，革命苏维埃政府规定这一天为休息日。城市和乡村都洋溢着节日的气氛。人们穿着节日盛装，许多地方在乐队伴奏下集体去投票。

1919年4月9日的《红色报》在报道布达佩斯的选举时写道：“当春日和煦的阳光普照大地的时候，布达佩斯的无产者们早已起床，他们兴奋地准备着这一历史事件……8时前几分钟，第一批选民已经出现，接着，一队队前来投票的无产者络绎不绝。公寓楼的居民们在组长的率领下以整齐的阵容前来投票，许多人打着红旗。某些街道的居民集体列队前来。目光激动热情的男女无产者们佩带着红色的革命徽章，面庞上露出兴奋的红晕。”

选举在全国顺利进行。新选举产生的苏维埃的决定性多数的委员都是工人和农业工人，尽管有一些困难，他们对这一责任重大的工作都很能胜任。

但是在外地的一些地方，有人利用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的无知，使一些资产阶级分子混入了苏维埃。

在选举以后，州苏维埃对乡苏维埃的组成进行了检查，如发现突出的问题，责令举行新的选举。尽管如此，旧行政机关的许多反动职员和不少新“投机分子”（主要是律师）还是混入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机关。后来，这些人利用他们的经验常常把苏维埃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妨碍了无产阶级专政职能的行使。

某些地方在选举过程中，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了。例如在布达佩斯第八区，右派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中有不少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共产党人也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名单。选举结果右派的名单以微弱的多数获胜。革命苏维埃

政府研究了这件事，并指示在该区重新进行选举。第二次选举时把那些得不到工人阶级信任的人员从名单中划掉了。

两党联合以后，由于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人数多，在苏维埃的机构中，首先是他们获得了职位。

不久就得到证实，苏维埃这些新式的、与人民紧密团结的国家政权机构，虽然缺乏经验，但是与旧的行政机构相比，有能力完成更重大的任务。与旧国家机构的工作相比，他们的任务更为艰巨，因为消灭旧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重担都落在他们肩上。他们不能满足于执行中央的指示，还要征集必要的农产品供应首都和保证补充红军。还要与地方上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反革命分子、抬高物价者和损害公共财产者作战。最后，还得不断保证以必需品供应劳动人民。

大部分首都和外地的苏维埃都是独立地、没有官僚主义地和以革命的方式去完成各自的任务。革命苏维埃政府发出的关于接管政权、关于把大地主的土地和工厂收归社会所有、关于封存银行和财政部门的财产等指示，在全国很快得到贯彻。

苏维埃开始组建新的保安部队，镇压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例如在松博特海伊市，在建立专政的第一天就把反革命的几个主要组织者——一名记者、一名职业军官和佐洛埃格塞格市的传教士派姆·约瑟夫逮捕了。派姆就是后来有名的明曾蒂。

苏维埃镇压了抢劫犯和盗窃犯。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的几天里，革命法庭在亚萨罗克萨拉什以盗窃罪判处三个人死刑，在费吉韦尔奈克判处一人死刑。

为了保证生产的持续进行也采取了一些果断措施。

苏维埃把救济缺衣少食、生活无着的人员和失业者当作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由于各地苏维埃掌握的库存物资很少，所以多半是通过向发了战争财的投机商和大资本家征税及征用他们的存货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例如，在皮什珀克洛达尼，常务委员会

向70人征了税并作为救济分给了居民。全国大部分州都采用了类似的做法。在托尔诺州，也向资产阶级派了税并将其大部分用来救济失业者。苏维埃利用从有钱人那里征用来的物资建立了人民救济食堂。

在这个经济破了产的国家里，解放了的人民的创造力在一些庞大的计划中得到了体现。只是由于时间太短，大部分计划在1919年没能实现。这些计划的大部分只能在1945年以后，在第二次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才得以实现。但其趋势毕竟体现了人民国家的建设和创造性。

贝凯什乔包市的例子很能说明这一情况。在那里无产阶级专政只维持了几周，因为4月26日罗马尼亚的军队已经占领了这座城市。在这短短的几周内，除了采取无数其他措施和完成许多紧迫工作以外，州苏维埃还制定了扩建市医院、增设结核病和传染病科的计划，为了给挖土工人提供就业机会，开始建设浴池和准备修建恩德勒德—焦莫—孔多罗什以及欧罗什哈佐—托特科姆洛什—霍德梅泽瓦沙海伊的窄轨铁路。

索尔诺克州苏维埃也开始制定修建索尔诺克市下水道工程的计划，制定了全市电气化计划和蒂萨河人民浴场计划等。还应当提到的是，索尔诺克市自4月底至7月底处在前线，市内枪声几乎昼夜不断。

佐洛州也计划修建帕波—代韦切尔—许迈格铁路并准备整治佐洛河。

几乎每个州都制定了大规模修建住宅的计划。费耶尔州的合作社计划修建一批带有公用浴室的住宅楼，每楼供四户居住。为每个小村修建一所图书馆和一所阅览室，如果某村的学龄儿童超过20人，则可以得到一所学校。“几个小村将合用一所带产科的医院。每个小村都将有电话、电和自来水。”佃户们这样幻想着。他们和他们的祖先过去一直是几家合用一个厨房或几户合住

一间房子。

无产阶级专政从根本上改变了司法制度。

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后暂时中断了案件的审判工作，停止了民事法庭的活动。后来建立了临时法庭以审理紧急案件。开始复查3月21日以前的案件，撤销一些零星案件和已被推翻的剥削制度根据反人民的法律迫害正直劳动人民的案件。

成立了革命法庭以审理违背苏维埃政府和人民委员所颁布的条令的案件。关于革命法庭的机构和活动的政府法令规定：“一切损害和威胁苏维埃共和国的存在和安全的罪行与损害和威胁劳动人民统治的革命秩序的罪行都归革命法庭审理。”

除民事革命法庭以外，还建立了军事革命法庭网。革命法庭的庭长和成员由工人、士兵和农民苏维埃指定，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是工人阶级的成员。

按照无产阶级专政的法规，还可以建立第三类法庭，即特别法庭。这类法庭在必要时由革命苏维埃政府或军队总司令部建立。

各革命法庭在保证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一般来说，在作出判决之前都经过周密研究。毫无疑问，有一部分革命法庭的态度过分宽大，这首先是由于在司法人民委员会和军队总司令部的领导中有人包庇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和存在着妥协思想。

无产阶级专政的每一个真诚的拥护者都清楚，维护和巩固政权的基本条件是消灭已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暴力机构和创建已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自己的革命暴力机构。只有巩固的保安部队和强大的军队才能抵御国内外的反革命进攻并保卫年轻的无产阶级国家。

在匈牙利社会党内，恰好在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暴力机构问题上，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化。

在革命苏维埃政府3月22日的会议上，库恩·贝拉建议迅速



解除警察和宪兵的武装并组建新的保安部队。萨姆埃里和其他人支持库恩的立场。内务人民委员朗德莱尔的意见是在新的保安部队建成以前不能解散警察局和宪兵队。他的态度正适合那些根本不想撤销旧保安部队的人的胃口。库菲和伯姆都发言引证朗德莱尔的话反对解除警察局和宪兵队的武装。苏维埃政府最后作出决定，让内务人民委员和国防人民委员共同在这一问题上提出建议，在此以前保留旧保安部队。

争论持续了多日。共产党人坚持自己的立场。工人和农民们没有忘记警察局和宪兵队的反人民的立场，在不少情况下他们自己采取行动解除了这些人的武装。

部分前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声称警察实际上也是无产者。他们以资产阶级共和国期间警察们就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和工会这一事实来证明他们的论点。当劳动人民反对警察“同志”的情绪日益高涨的时候，维尔特奈尔认为有必要以布达佩斯警察工会和有组织的匈牙利宪兵队的名义在《人民之声报》上发出号召：

“无产阶级兄弟们！当在匈牙利还没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当工人、士兵和贫苦农民的共和国还没有诞生、还在进行选举准备工作的时候，布达佩斯警察工会和宪兵队已经在一周以前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做了准备……无产阶级兄弟们！警察无产者和宪兵无产者是无产阶级专政坚定的战士！”号召书把那些曾经惩罚过旧警察和宪兵的人径直称为反革命分子。

事情已经很明显，警察局和宪兵队已经无法以原有形式继续存在下去，于是警察“同志们”以一个巧妙的花招走到了事件的前面。3月24日，警察全体代表会议宣布解散警察局，同时集体参加红军。

最后虽然把警察局和宪兵队解散了，但是并没有解除他们的武装，而是按原编制把他们编入新的保安部队——红色卫队。

内务人民委员会于3月26日发布了关于建立红色卫队的条

令。它规定，红色卫队的任务是“建立和维护苏维埃共和国的内部秩序”。条令指出，红色卫队是军队的后备力量，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将其成员编入红军。

原有的保安部队——警察局、宪兵队、民族卫队、边防部队、金融卫队和看守队都被编入红色卫队。同时把人民卫队划归红色卫队领导。

布达佩斯红色卫队在成立时共有12 000人，其中旧警察2 800人，防卫队员3 800人，人民卫队员5 400人。

红色卫队所属的部队归内务人民委员会领导，地方常务委员会不得干预其内部事务。对旧警察和旧宪兵的审查工作由高一级的红色卫队司令部负责，而在这些司令部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前的警察局和宪兵队的领导班子基本上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下述事实很能说明问题：3月21日以前的首都警察局局长迭茨，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在红色卫队内主管人事工作，直到他因进行反革命活动而被捕时为止。在外地，红色卫队内部旧警察与武装起来的无产者的比例与布达佩斯相比不够有利。因此，劳动人民以不信任的目光看待涂了一层红色的宪兵队和警察局是合乎情理的。在较大的城市里，凡有可能都以可靠的工人连补充了红色卫队。在较小的地方，常务委员会撤换了旧宪兵队并以可靠的红色卫队代替它。

共产党人认为红色卫队应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可靠柱石。共产党人中，塞德莱尔·埃尔诺、明尼赫·费伦茨、杨启克·费伦茨和桑托·莱热在红色卫队的领导中担负着重要的职务。他们的工作使布达佩斯的红色卫队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在外地，特别在较小的地方，无产阶级专政不掌握相应的武装力量。

大部分编入红色卫队的警察和宪兵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一有机会他们就站到了反革命一边。

匈牙利苏维埃政府清楚，迟早不可避免地要与各资本主义邻

国发生武装冲突。对无产阶级专政来说，建立一支完全可靠的、有战斗力的新军队是关系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波加尼·约瑟夫当了国防人民委员，两位副人民委员桑托·贝拉和萨姆埃里·蒂波尔都是共产党员。

后来成为共产党员的波加尼在3月间还与共产党人发生过尖锐的矛盾。3月21日以前，曾按伯姆的设想在组建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军队。但这一工作在3月21日中断了。而波加尼则想继承这一做法来组建无产阶级专政的军队。萨姆埃里和桑托不同意他的意见，想把军队的组建工作完全置于新的基础之上。共产党人想中止招兵制，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通过这种做法，可以在短期内建立一支相应人数的军队。

为了对国防人民委员会领导人之间的争端作出仲裁，革命苏维埃政府于3月24日派出一个由库恩、伯姆和维尔特奈尔组成的三人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接受了社会民主党的立场。这一事实对军队的组建工作产生了长期的消极影响。

3月25日发布了关于组建红军的条令。

条令强调了红军的阶级性，指出，红军“首先应由从有组织的工人中招募的、现在还在服役的无产士兵所组成”。

条令确定了红军的目的是：“反对一切内外敌人、保卫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和为解放世界无产阶级而斗争是每一个战士平等的职责。”

强调了纪律的必要性：“只有保证革命的纪律性，红军才能起到自己的伟大作用。它使红军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

条令要求，起码下级军官要由忠于工人阶级事业的人员担任：“连队指挥员应尽量由有作战经验的无产阶级分子来担任。”

根据苏维埃俄国的经验，为了领导政治工作和监督旧军官，实行了军事政治委员制度。条令规定，应根据匈牙利社会党的推荐为各营或独立营任命政治代表。

革命苏维埃政府下令要在红军内建立工人后备营。成立这些后备营的目的是建立一支可靠的后备力量，以便在必要时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把它们投入抵御外来侵略和镇压国内反革命的斗争中去。

通过颁布关于建立红军的条令，在匈牙利武装力量史中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我国人民的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一支不是为狭隘的剥削阶层服务的军队，而是解放了的劳动人民为保卫祖国而拿起武器。

自颁布关于建立红军的条令到建立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军队，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道路。招兵工作自2月开始。虽然在3月21日以后其速度有所加快，但是在初期，军队的组建工作进展得很慢。

在革命苏维埃政府4月2日的会议上，国防人民委员报告了军队的组建情况。

波加尼在报告军队的现状时报喜不报忧。他虽然承认遇到了各种困难，但是在报告中他没有说明，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支军队无法完成任何较重大的任务。他对与苏维埃共和国为敌的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的意图估计得过分乐观。他声称，协约国的军队处于守势。

桑托·贝拉在发言中指出，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和罗马尼亚军队企图建立联系，以便把苏维埃匈牙利和苏维埃俄国隔离开来。在谈到红军的情况时，他说：“在前线士气已经完全涣散。部队要求换防，这本来也是必要的。”<sup>①</sup>他认为应当向前线增派大量部队，因为敌方也在增加力量。

萨姆埃里尖锐地指出，在红军的组建工作方面存在着失职现象：

---

<sup>①</sup> 党史研究所档案馆，革命苏维埃政府4月2日会议记录。

“红军的组建工作已接近于失败。在布达佩斯除了国际团以外，我们手中没有任何已经装备起来的部队。在派出政治委员方面也还没有采取措施。没有训练营。外地的形势也不象波加尼所说的那样好。那里的无政府状态比他说的还要严重。”<sup>①</sup>

伯姆和其他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试图把波加尼和萨姆埃里之间的矛盾说成是他们个人之间关系不睦。这样，实际上就是要萨姆埃里和波加尼为在组建红军方面存在的错误承担同等的责任。他们不想承认萨姆埃里和桑托已经指出的事实，即按照波加尼所代表的组建原则，不可能取得相应的成果。

萨姆埃里着重指出，他与波加尼之间的矛盾不是出于个人原因，而是有着原则分歧：“至于波加尼和我不能建立红军，并不是因为存在着个人障碍，而是存在着原则障碍。波加尼把组建红军的工作完全从我手中夺走。”<sup>②</sup>

尽管事情非常清楚，在组建红军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原因首先在于错误的设想和波加尼组织能力低下（在辩论过程中，朗德莱尔曾明确指出，波加尼对组建工作一窍不通）。革命苏维埃政府通过决议，同时撤销波加尼和萨姆埃里所担任的国防人民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决定任命伯姆为国防人民委员，副人民委员为桑托·贝拉和也是共产党人的菲埃德莱尔·莱热。

在国防人民委员会领导人变动之前，就发生了前已提到的布达佩斯城防部队4月3日的倒波加尼的示威游行。

在示威游行之后苏维埃政府召开会议，会上伯姆表示，只有库恩·贝拉也出任国防人民委员会委员，他才肯继续担任国防人民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他想通过这一办法保证其领导工作受到拥护，以防止波加尼的厄运在他身上重演。

库恩参加国防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使国防人民委员会内共产党

---

①② 党史研究所档案馆，革命苏维埃政府4月2日会议记录。

人的比例增大，因此伯姆又坚持要右派社会民主党人、钢铁工会领导人之一豪布里赫也参加国防人民委员会的领导工作。

这样，国防人民委员会改组后，在其领导工作中并没有产生有利的转折。如果考虑到库恩的其他工作很忙，根本无力过问国防工作的具体问题，因此，起用豪布里赫使政治力量对比比波加尼时期更加不利，那时尚有两位共产党副人民委员。

4月3日以后，红军组建工作的速度加快了。应招募的人数迅速增加。从2月到4月初，应招募的人员刚超过20 000人。到了4月16日已达到53 000人。这一事实反映出，劳动人民同祖国的关系起了变化。应招募参军人员的增加并不意味着红军力量的相应增长，因为由于存在着安置和装备困难，只能吸收一小部分应招人员入伍。

建立国际团是国防人民委员会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第一个国际营是在3月建立的，它由前俄国战俘组成。4月初有1 200名奥地利志愿人员到达布达佩斯，以便参加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居住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领土上的斯洛伐克族、喀尔巴阡乌克兰族、波兰族、南斯拉夫族、保加利亚族、罗马尼亚族、意大利族和阿尔巴尼亚族人民中最有觉悟的分子，响应革命苏维埃政府的号召，大批自愿参加红军。这些国际主义战士认识到，保卫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也是他们自己的事业，他们自己人民的命运如何是与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国际斗争的结果分不开的。

工人后备营的组建工作也开始了。4月8日，布达佩斯各大工厂的工人们在热烈的群众大会上决定成立工厂连队。根据会议决议，在各工厂相继成立了连和营。其成员在下班后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

为了加强红军的纪律性，有必要消除部队的双重（国防人民委员会和士兵苏维埃）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各士兵苏维埃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它们的继续存在不仅无助于，而且妨碍军

队的发展和纪律的加强。士兵苏维埃无力动员士兵们去完成对军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对士兵来说却是不很受欢迎的任务，还时常使纪律松散。部队的政治代表制度的职责就是监督军官、保护士兵的利益。在政治上由地方工人、士兵和农民苏维埃来代表士兵。

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人都很清楚，大多数职业军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然而十分明显，如果没有军事专家，组建和在战斗中指挥军队都是无法解决的。革命苏维埃政府指望军官们会愿意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扩张意图而斗争。当号召职业军官们去红军中服役时，多数人果真没有反对。这首先是出于自己生存的考虑，因为除了打仗以外，他们什么也不会。在苏维埃共和国内，他们不能指望获得以前那么多的收入。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钦佩苏维埃政府在办理公务和军务时所表现出来的果敢精神和坚强意志。他们期望在反对敌人的斗争中，苏维埃政府会比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取得更大的战果。此外，毫无疑问，劳动人民对建立苏维埃共和国所表现出的激情对他们也是有影响的。

一般来说，他们的打算是，当苏维埃共和国的意图与他们的民族主义目标相一致时，他们愿意为苏维埃共和国服务，以后他们将利用在军队中担任的职务，推翻无产阶级专政。

虽然在国防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易人之后军队的组建工作比较顺利，但是，在帝国主义进攻开始之前，并没有达到在当时情况下应该达到的速度。其主要原因是，革命苏维埃政府的委员们（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共产党人）没有正确评价国际力量对比，低估了敌人的力量。

4月11日，库恩·贝拉在革命苏维埃政府会议上，在评价当时形势时说：“协约国自己做不了任何事，它也不能使在前奥匈帝国版图上新建立的国家来反对我们。”<sup>①</sup>

---

<sup>①</sup> 党史研究所档案馆，革命苏维埃政府4月11日会议记录。

第二天，即4月12日，在革命苏维埃政府会议上又提到了国家的军事形势。伯姆和朗德莱尔以毫无根据的乐观态度估计了当时的形势。而这恰恰在罗马尼亚封建贵族的军队接近完成战争准备的时候发生的。

自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起到军事行动开始，共有三个多星期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由于错误的扩军方式、存在着物质和组织工作方面的困难以及低估了敌人进攻的危险等原因，国防人民委员会只向军事分界线增派了14.5个营、3个炮兵连、1个骑兵连和1个工兵连。

4月中旬，红军形式上由6个步兵师、塞凯伊师和1个海军旅组成。实际上，各师的组建工作都没有完成，除了塞凯伊师以外几乎不具备有实战能力的部队。

\* \* \*

苏维埃共和国为多少世纪以来与匈牙利人民生活在一起的各族劳动人民保证了完全的自由权利，这在匈牙利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虽然在苏维埃共和国诞生时，居住在匈牙利历史疆土上的各少数民族绝大部分事实上已与自己的祖国合并了或者与一个相近的兄弟民族共同建立了国家，但是这一事实并没有降低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的意义。1919年春，只有喀尔巴阡乌克兰族、斯洛伐克族和德意志族人民的某些部分生活在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土上。其中喀尔巴阡乌克兰族由于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部队的推进已于4月底落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管辖范围之外。

在这种情况下，民族问题在苏维埃政府的实际活动中并不占据重要地位。尽管如此，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机关在任何时候都是按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的原则行事，民族问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文件中也占有与其意义相适应的地位。



《匈牙利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基本原则》肯定了居住在苏维埃共和国领土上的各少数民族的权利。《基本原则》宣布：“居住在匈牙利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内的一切民族有权自由地使用自己的语言，有权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宪法规定，应当为聚居在相互接壤的较大地区的少数民族建立独立地区。几个独立地区可以合并成为民族地区。宪法承认两个这样的民族地区——德意志族和喀尔巴阡乌克兰族民族地区。宪法的下述条款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政策，这一条规定，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将不阻拦“如果其人口数和经济实力允许，解放地区的各民族另建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结成联盟的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这一条所确定的原则，通过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在实践中已经实现了。

居住在苏维埃共和国领土上的各少数民族劳动人民，绝大多数都积极支持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以手中的武器证明了他们把已解放了的工人阶级的国家当作自己的国家。

喀尔巴阡乌克兰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道路上的前进速度很快。它在归属于苏维埃共和国的几周内，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构方面以及在动员人民群众去完成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防任务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果。

苏维埃政府在初期对居住在匈牙利的斯洛文尼亚族重视不够。致使一些冒险分子影响了其中的一部分人并使他们为反革命目的服务。

## 全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

---

经济生活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匈牙利工人阶级的领导人面临着极为艰巨的任务。

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谈到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经济任务问题，但是，直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成立为止，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未能具体解决这一问题。苏联人民、布尔什维克党不得不在完全生疏的道路上，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首先依靠自己的经验教训去完成消灭资本主义、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任务。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之间仅相隔不到一年半的时间。而匈牙利无产阶级已经可以吸取不少苏维埃俄国的经济改造工作所提供的经验（例如由工人监督企业等）。但是，毫无疑问，在1919年3月，这些经验还不可能升华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理论。我们还不应该忘记，有一段几百公里宽的敌占地带把苏维埃俄国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隔离开来，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两国领导人的联系。布尔什维克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倡议，在1919年3月间作出了一系列关于已取得政权的工人阶级的联盟政策的决议。这些起着

决定命运作用的决议在几个月以后匈牙利共产党人才读到。

除了缺乏经验以外，还有几个基本因素对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政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忽略这些因素就不能正确评价所发生的事件。

苏维埃共和国继承的是在战争中完全破了的产的经济。在五年内，无论对工业还是对农业，都是进行最彻底的掠夺经营。生产大幅度下降，库存完全空虚。

奥匈帝国的崩溃，国家大部分领土被占领，使生产的传统体系遭到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不久国家被封锁，这使形势进一步恶化。工农业所需要的基本原料（煤、汽油、生铁等）的进口完全中断。

几乎在整个期间内，匈牙利工人阶级的年轻国家都不得不与比它强大几倍的帝国主义军队进行生死搏斗。在这种形势下。无产阶级专政经济的基本任务是补给正在进行革命卫国战争的红军。

革命苏维埃政府认为，世界革命在短期内必定胜利，这一看法给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政策，也给评价大多数问题打上了明显的烙印。

“我们坚信，世界革命在较短的时间内必定发生……因此，在为夺取政权而进行斗争的阶段中，我们把苏维埃共和国未来的经济政策视为过渡性的。其主要任务就是坚持到世界革命取得进展。这种进展将会减轻那些由战争创伤和帝国主义包围为我们造成的无法估量的困难。我们坚持斗争也会加速世界革命的到来。因此，我们认为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充分估计国家可用于生产和消费的储备，按严格的计划节约使用这些储备，把工农业生产严格控制在生产最急需的生活必需品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帮助群众减轻贫困，在捍卫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权的斗争中坚持到我们所期望的世界革命的到来。”苏维埃共和国经济生活领导人之一海维希·久洛在题为《社会主义生产》一书中这样写道。

接管政权时，国家的经济生活由于完全遭到破坏而呈现出一片荒凉悲惨的景象，但是劳动人民（大多数领导人也这样）总感到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完成几十年来的经济要求的一切障碍都已经排除。因此，不顾当时严重的经济形势，采取了许多在1919年条件还不成熟的措施。这种乌托邦思想是伴随一切真正的、伟大的人民革命的不可避免的产物，它反映了群众以及和他们有同感的领导人力求建立起一个新的经济、政治和道德制度的那种健康的迫不及待的心情。

\* \* \*

自从法国资产阶级利用巴黎公社没有触动的银行里的钱款推翻巴黎工人的革命政权以来，社会主义革命的拥护者认为，封闭银行然后将它收归社会所有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最首要的任务之一。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萨姆埃里已经在3月21日就采取了封闭银行的措施。

3月27日，革命苏维埃政府就金融机构收归社会所有颁布法令。

法令规定：“第一条：革命苏维埃政府决定将金融机构收归社会所有。在此工作开始前，授权财政人民委员接管和监督那些应收归社会所有的金融机构的领导权。

由财政人民委员任命的监督代表根据财政人民委员的指示，负责领导受苏维埃共和国领导和监督的金融机构的工作。”

根据法令，在银行有存款的人每月只能提取百分之十的存款，但是最多不得超过2000克郎。如果将银行存款用于支付工资或购买生产所需的原料不在此限。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法令没有规定将所有金融机构立即收归国有。鉴于大部分银行属于外国人所有，在其他金融机构里，西方国家（主要是奥地利、德国、瑞士等）的股份也较多，革命苏

维埃政府为了避免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过分紧张，暂时满足于对他们实行监督。

法令公布之日有34家布达佩斯金融机构收归社会所有或被监督。革命苏维埃政府将奥匈银行驻布达佩斯的主要分行和金融中心收归国有。

4月初，革命苏维埃政府还公布了把保险机构和退休金管理机构收归社会所有的法令。

截至6月中旬，苏维埃政府的监督权已扩大到近800个财政金融单位。

政府派出由有组织的工人和可靠的专家组成的委员会负责领导这些被监督的财政金融机构。未经他们同意不得支付和转移大笔款项。

瓦尔加·耶诺在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说：“随着财政金融机构的收归社会所有或被监督，无产阶级专政首先使资产阶级不可能将亿万钱财用于反革命的目的，使他们不可能继续过奢侈的生活。”

革命苏维埃政府关于上交价值在2000克郎以上的贵重首饰的法令也有同样的目的。

除了使原统治阶级不能在物质上支持反革命外，金融机构的收归社会所有和被监督是集中和有计划地管理国家经济生活的重要条件。没有这一措施，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保证国防、社会福利和文化活动所需要的开支。

当然，由国家领导银行本身不可能解决苏维埃共和国的财政问题。

在财政方面，无产阶级专政从资产阶级共和国那里继承下来的只是个灾难深重的烂摊子。

全国通货膨胀剧烈。在世界大战的四年中货币流通量增加了10倍：从30多亿克郎上升到310多亿，与此同时，克郎的黄金储

备从14亿下降到3.42亿。也就是说，克郎的储备率从45.2%下降到1.1%！<sup>①</sup>

10月资产阶级革命后，通货继续膨胀。为应付卡罗伊政府的开支又增发了54亿克郎。

奥匈帝国崩溃前纸币是在维也纳印的。1918年10月以后，奥匈银行驻维也纳分行拒绝将印纸币的版交给匈牙利政府使用。只转让了票面为200克郎和25克郎单面印版。匈牙利财政部不得不发放临时性的纸币，只在一面印上图案和文字，另一面是空白的。同时在这些货币上标明，它们只能用到1919年6月30日为止。居民对这种钱币不信任，在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旧的所谓蓝币和新的白币的价值就已经有很大差别。

战时，城乡之间的价值交换破产了。农民拿出卖农产品的钱买不到工业品，因此积累了大量的货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愿意把商品拿到市场上去卖，如果想卖，也只接受“蓝币”。

票面值较小的纸币和硬币的缺乏也造成严重的困难。

财政人民委员兰捷尔·久洛3月21日接管奥匈银行布达佩斯分行时，在那里总共才得到19.73亿克郎的现金。

其中近三分之二即12.1亿克郎是票面为200克郎和25克郎的“白币”。

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共和国一诞生就不仅要应付严重的财政危机，而且还要应付货币危机，这一危机尤其使那些靠工资度日的劳动者的生活更加困难。

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制度和财政政策的巨大功绩在于，它能够有这样严重的情况下，在战争的非常时期，使通货膨胀的速度和货币的黄金储备率的下降减慢下来。

---

<sup>①</sup> 胡斯蒂·埃尔诺博士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银行制度和货币流通》一文中，详细谈到苏维埃共和国的货币流通问题。

工业的收归社会所有要追溯到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时期，那时，主要在首都，大多数企业都由工人担任领导或者实现了某种监督形式。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进步工程技术人员的最优秀分子在1918年12月已经开始就生产的社会化问题进行辩论。社会民主党左翼领导人瓦尔加·耶诺和其他人也参加了讨论。这一切都有助于社会民主党左派和进步的工程技术人员还在苏维埃共和国宣布成立前就在一些最实质性问题上与共产党人的观点相一致，并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领导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共产党人或同情共产党的专家的集体。

3月21日以后革命苏维埃政府内关于工业收归社会所有问题的主要争论是企业国有化的下限是什么。

司法人民委员罗奈伊建议将拥有100名工人以上的企业收归社会所有。伯姆则建议将那些有50名工人以上的企业收归社会所有。瓦尔加·耶诺还希望把收归社会所有的界限放低。革命苏维埃政府在3月22日的会上赞成将超过15人的企业国有化。一部分共产党员人民委员希望把下限规定为雇佣10个人的企业。最后采取了折衷办法。革命苏维埃政府3月27日公布的关于工、矿、交通等企业收归社会所有的第9号法令就反映了这一点。法令说：

“第一条：苏维埃共和国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将生产资料收归劳动者社会所有，组织并提高生产。

因此，苏维埃共和国将超过小工业范围的工矿交通等企业收归社会所有，并将其置于整个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和该企业工人的监督之下。

因此，凡工人数在1919年3月22日超过20人的工矿交通等企业都要受社会的领导和工人的监督。”

社会生产人民委员会为收归国有的企业任命生产委员。法令强调说：“生产委员是全体无产者驻该企业的代表。”

根据法令，为了监督企业领导，按工人数选举出由3人、

5人或7人组成的工人监督委员会。“工人监督委员会的任务是建立无产阶级的劳动纪律，保护劳动者所有制和监督生产劳动。”

法令的贯彻雷厉风行。4月18日，伯姆自豪地说：“同俄国比起来，我们的优点是能够立即着手重建工作，能够在四个星期内将1000多家企业收归国有，而俄国人用了一年的时间才将513家企业收归国有。”伯姆掌握的材料并不准确。截至1918年6月1日止，苏维埃俄国国有化的企业确实只有500多家，但是1918年6月28日人民委员会就整个大工业国有化问题颁布法令，根据这一法令，截至1918年9月共有3000多家工业企业被国有化了。

同一天，海维希·久洛向报界详细介绍了在工业收归社会所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他说：“我们可以断言，第一个任务——将生产资料从资本家手中转为无产阶级所有的工作已经顺利完成。工厂的工人苏维埃接替了股东和董事会的位置，由他们负责保证企业不间断地继续生产。”

虽然按规定拥有20人以上的企业才可以收归国有，但是无产阶级国家在特定的条件下也有难以解决的困难。实际上，国有化工作并没有按革命苏维埃政府的法律规定进行。一些小得多的企业和作坊的工人们也想尽一切办法要摆脱他们的主人，尽管国家中央机构坚决反对，许多地方还是国有化了。因此，有些很小的，仅仅只有几个人工作的木工、钳工和皮鞋作坊也被收归社会所有。瓦尔加·耶诺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说，为阻止将理发业收归国有，真可以说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因为布达佩斯的理发工人坚持要这样做。后来，瓦尔加在第三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还说：理发业工会怀疑他，认为他之所以反对国有化，是因为他家中有人在当理发店的老板。

在苏维埃俄国，革命胜利后的前半年被国有化的企业总共才



有500多家,也就是说,工业收归社会所有的速度远比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慢。诚然,俄国的工业结构也同匈牙利的不一样。那里,除非常落后的家庭工业和小工业外,还有现代化的大工业(主要是利用外资建立的)。在匈牙利,大批大小不等的中等企业将大小工业联结了起来,这些中等企业在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不小。这一因素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匈牙利工业国有化范围较广的原因。

无疑,在1918年将工业这么迅速和这么全面地收归国有的条件还不成熟。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机构不能相应地团结和领导所有国有化的企业,不能为他们保证继续工作所需要的条件以及原料和半成品的供应等等。

大部分急于国有化的小企业不能继续进行生产,先后都停工了。其结果是导致本来就紧缺的消费品数量的继续下降和失业人数的增长。

组织国有化的企业协调一致、有计划地生产,保证满足社会需要和最合理地利用现有储备,比工业收归社会所有要复杂得多。苏维埃共和国短期内在这方面也取得了好成绩。

刚开始的几个星期,社会生产人民委员会直接管理国有化的企业,4月22日,建立了地方和区工业生产苏维埃。除几个大企业外,由他们来直接领导收归国有的企业。在至少有三个国有化企业的地方都要成立地方工业生产苏维埃。区工业生产苏维埃的任务是协调一个或几个州的工业生产。工业生产苏维埃的任务是保证贯彻执行中央的措施,保护公共财产和保证生产的连续性。这些苏维埃要保证本区各企业的良好协作。

为了使生产更加合理、最经济地使用现有力量,把同一行业的企业划归统一领导。

那些曾属于不同利益集团但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已经开始合并。这一措施在一开始就收到较大效益。例如将以前分属于不同

股份公司的电网联合起来，每日就节约14车皮的煤。合并磨坊业好处也很大。把布达佩斯较小的磨坊停了工，两家大磨坊实行三班制劳动也达到了节约的目的。几乎所有的工业部门都开始了类似的合理化改革。

苏维埃共和国取消了专利垄断权、厂与厂之间的技术封锁，因而有可能使最先进的方法在整个工业部门推广。设计室和实验室的统一为较小企业利用最高水平的设计和生产流程完成自己的工作创造了条件。赞成把工业收归社会所有的工程技术人员提出许多有益的想法、革新和合理化建议，这对于组织社会主义生产起了促进作用。

为了最合理地利用紧缺的原料储备成立了中央物资局。只有通过他们才能使现有的原料和产品真正用于满足最重要的社会需要。

无产阶级专政政府在调整产业工人工资和工时问题上也抱着最良好的愿望，以满足工人阶级几十年来的要求。

4月19日公布了革命苏维埃政府的法令，规定产业工人的工时为每日8小时，每周48小时，并临时调整了他们的工资。

法令取消了计件工资制，规定了统一的计时工资级别。

企业的生产委员在征得工人监督委员会的同意，并吸收企业工会代表参加的情况下，根据法令规定的范围确定工资。

不久，政府官职人员的工资也得到了调整。取消了工人和官职人员之间的工资差别。

革命苏维埃政府5月4日的法令强调说：“革命苏维埃政府认为，凡是靠劳动为生的人都是工人，取消以前官职人员和其他职员之间的差别。也就是说，官职人员和工人工资差别消除了，工资的多少主要取决于专业水平和是否能胜任领导工作等因素。此外，也考虑工龄的长短。”

用这种办法调整工资开始时大家普遍感到满意，但是很快就

发现，在工业部门取消按产量计算工资的做法是操之过急了，因为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道义上条件都还没有成熟。这一措施使工厂劳动纪律涣散，生产率下降。不久，工人自己也表示，在工业各领域普遍实行计时工资是不对的。许多人滥用了这一新的工资制度，生产成绩比以前按产量付给工资时下降了，这一事实伤害了工人阶级的积极性。

同金融业和工业一样，革命苏维埃政府将商业也置于国家的管理和监督之下。

为了防止把商店的工业品和食品隐藏起来，社会所有制人民委员会于3月24日发布命令，除食品店、卫生用品店、书店、纸店、燃料店、烟店，也就是销售劳动者日常必需品的商店外，必须关闭所有的商店，不许从这些商店运走任何商品，也不许出售。为了同一目的，还颁布了关于对商店库存商品进行盘点的法令。

4月3日公布了革命苏维埃政府关于把大商业收归社会所有的法令。根据法令，凡是批发商店或雇有10个以上工人的商店都收归公有。同工业企业一样，这些国有化的商店也由上面任命代表担任领导，他必须同劳动者选举的工人监督委员会一起保证商店的活动符合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

虽然4月2日已经允许零售商店营业，但是在苏维埃共和国存在的整个时期，合法的私营商业实际上停止了营业。小商贩不能从国营大商店得到商品。他们不愿意将商店库存的产品按官价出售，因为商品普遍匮乏，黑市价格远远高于官价。因此，绝大多数商店4月2日以后也没有开门。

生产的普遍下降、工农业产品的缺乏使苏维埃政府有理由将商品交换、产品的分配置于最严格的国家监督之下。象苏维埃俄国一样，只有国家对分配进行垄断才能在特定的条件下保证对城

市工人的供应和满足红军的需求。

苏维埃共和国发出口号：不劳动者不得食！对基本食品实行凭票供应，票证只发给劳动者和他们的家属。

为了首先让急需的人得到库存物资，革命苏维埃政府规定，国营商店只卖给那些有房屋委员会正式证明确实需要内衣、床单、衣鞋等的人。

由于存在有地农民积累金钱、通货膨胀和“白币”等问题，农产品的收购范围非常狭窄。产品的直接交换开始成为城乡经济关系的主要形式。

为了做好对工人的供应工作，建立了采购队，拿工业品和钱去农村换取食品。由于这样做不仅给营私舞弊提供了机会，而且未能保证分配的合理和平均，于是后来改为集中组织城乡之间的产品交换。

工业品的缺乏自然也使交换的这种形式受到限制。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严重的情况下有时不得不采取征用食品的方法。

苏维埃共和国也将交通运输业和公寓等收归国有。

在封建资本主义的匈牙利，不劳而获的一个主要来源、剥削劳动人民的一个手段是公寓的私有制。即使是最坏的公寓，房租也很高：劳动者收入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必须用来支付房租。

共产党早在1919年初就对房租高利贷者进行了猛烈的进攻。它号召劳动者拒绝付房租，由于房东经常提高房租和把付不起房租的人无情地赶到大街上，工人们对他们早已恨之入骨。

革命苏维埃政府在颁布关于将工业企业和银行收归社会所有的法令的同一天，宣布将住宅收归社会所有。除工人（劳动农民、职员）自家住宅外，由国家来接管住宅。新主人——劳动人民的国家在住宅收归社会所有的第二天已经大大降低了房租，从而减轻了劳动者的负担。

## 四

# 将大地产收归 社会所有

---

革命苏维埃政府在生产资料归公的措施中，最后公布的是将大地产收归社会所有的法令。

一部分人民委员——首先是库恩·贝拉——很清楚，匈牙利以农业为生的劳动者占的比例最大，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关于消灭大地产的法令不能推迟颁布。库恩·贝拉在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多次催促制定农业法令。

苏维埃俄国的领导人担心地注视着年轻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每一个步骤，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他们也认为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政府尽快在没收地主的大地产问题上，即对农民说来最重要的问题上作出决定，有着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库恩·贝拉在俄国逗留期间，列宁就曾多次提醒他注意，象匈牙利那样的农业性质的国家，如果工人阶级在斗争中不能团结百万劳动农民，无产阶级革命就不可能胜利。3月21日以后，列宁又提醒库恩记住这一点。

3月23日，列宁通过无线电报与库恩·贝拉取得了联系。关于这次谈话，列宁说：“在收到关于匈牙利革命的第一个通报的第二天，我就拍电报到布达佩斯，请库恩·贝拉亲自答话，我向

他提出了一些问题，以证实是不是他本人。”<sup>①</sup> 奥尔巴里·久洛在谈话时一直站在库恩·贝拉的身旁，后来他讲述了列宁为断定是不是库恩·贝拉本人所提的问题：

“列宁：库恩同志，请告诉我，我们最后一次谈论的是什么？

库恩：我们谈了许多次，列宁同志指的是哪一次？

列宁：请告诉我，我们最后一次谈论的是什么。

库恩：现在我记不确切了。

列宁：请您想一想，在您去匈牙利前，在我这儿——克里姆林宫谈的什么。

库恩：是的，现在我记起来了，列宁同志，您谈了农民问题。”<sup>②</sup>

也就是说，列宁也利用这种方式提醒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人注意正确解决农民问题的重要性。

除列宁外，其他人也提醒过匈牙利苏维埃政府，颁布土地法不能再拖延了。虽然文件没有保存下来，但是我们知道，当时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在3月也给革命苏维埃政府拍来同样内容的电报。

革命苏维埃政府开会时曾多次谈到将大地产收归社会所有的问题。关于把银行和企业收归社会所有的法令没有引起多大争论，而在起草农业法令时人民委员们在苏维埃政府多次会议上则争论得很热烈。

然而争论的中心不是应否将大地产分配给农村无地的农民，而是通过什么方式将大地产收归公有。革命苏维埃政府内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和共产党员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都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政府所宣布的土改法的贯彻执行已无对象。匈牙利社会党

---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第212页。

② 兰捷尔·约瑟夫：《维谢格拉德街》，第210页。

领导人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同意马札尔·拉约什的观点。马札尔于3月25日在《人》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生产合作社还是十霍尔特？》的文章。文章说：“匈牙利革命的一个最致命的错误是容忍利用土地问题进行反动的蛊惑人心的煽动，容忍发表那种荒唐的、不可能的、病态的和反社会主义的口号，即土地改革等于土地分配。”

革命苏维埃政府如此坚定地否定分配土地，该作何解释呢？

如同每个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人也意识到，大地产的瓜分、进行小商品生产的农民人数的增长既不能持久地保证社会的发展，也不能使农民富裕。

基于这种考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于1919年3月发表了共同纲领，坚决表示：

“无产阶级专政无论如何也不应容许以任何形式瓜分生产资料和交通工具，相反，它的目的是使生产服从唯一的统一的计划。

引导整个经济社会化的最初步骤是：将现在主导生产的大银行机构收归社会所有；以由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接管的方式，征服每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机构；接管每个乡镇企业；将统一在辛迪加和托拉斯内的生产部门收归社会所有；如果资本的集中在技术上允许的话，也将生产专业社会化；将农业大地产收归国有并使它变为由社会领导的农业企业。”（着重点是作者加的）

革命苏维埃政府关于大地产社会化的法令符合共产国际的纲领。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这些方针是错误的，因为没有注意到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在各个不同国家是不一样的。农业革命在较落后的、充满封建残余的农业国不可能同那些对农业不断进行资本主义改造的国家走同一条道路。

共产国际的方针同革命苏维埃政府的法令一样，反映了国际工人运动中普遍的观点，即认为农民的土地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础。这种观点首先把瓜分大地产看成是使农村无产

者成为私有者和商品生产者，这样就把他们同工人阶级对立起来。这种观点没有把中农和农村的资产阶级加以区别，没有考虑到如果领导无产阶级的政党执行的是正确的政策，千百万中农在为建成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中可以成为工人阶级的支柱。

1919年3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多数领导人还不清楚这些观点是不正确的，匈牙利共产党人也是如此。促使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个问题上修改以前的观点恰巧也有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

布尔什维克在农民面前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即认为农民的小块土地不可能保证国家和农民的繁荣昌盛。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和以后列宁曾反复提醒俄国农民注意这一点。列宁在1917年6月说：“除非在具有科学知识的农艺师的指导下，由农业工人用最好的机器来共同耕种，否则就无法摆脱资本主义的压迫。……在小块土地上从事经营，即使是‘自由土地上的自由劳动’，也不能摆脱可怕的危机和普遍的破坏，也不能拯救自己。”<sup>①</sup>

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国际工人运动的许多领导人（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人也和他们一样）把布尔什维克党接受社会革命党人平均分配土地的纲领仅仅看作是倒退，是对小资产阶级的主张所作的让步，他们不懂得列宁策略的深刻的民主主义和灵活性。

列宁是这样评价布尔什维克党关于分配土地的立场的：“我们布尔什维克曾是反对土地社会化法令的。但我们还是签署了这个法令，因为我们不愿违背大多数农民的意志。对我们来说，大多数人的意志永远是必须执行的，违背这种意志就等于叛变革命。”<sup>②</sup>

---

① 《列宁全集》第24卷，第463—464页。

② 《列宁全集》第28卷，第157页。



历史证实了布尔什维克党政策的正确。不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没有列宁英明的农民政策，俄国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内战争中取得胜利。

匈牙利革命苏维埃政府所作的决定，除了一般的原则考虑外，无疑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由于国家的经济形势极其严重，他们认为瓜分大地产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生产的下降，会使城市劳动者和军队的供应更加困难，好象收集农产品只能依靠国家领导的农业大企业。到过俄国的共产党人体会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的一段时期，苏维埃国家需要克服多少闻所未闻的困难。从1917年8月1日到1918年8月1日，俄国由国家收购的粮食约为3 000万普特（480万公担）。

（尽管情况完全不一样，为了对比起见，我们说，这个数字比1919年1月1日后的六个半月运到布达佩斯的粮食多4.5倍。1919年1月1日至6月19日共运到布达佩斯1 071 356公担粮食。）

1919年初一部分农业无产者开展的旨在使大地产归合作社所有的运动，无疑也影响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人在土地问题上的立场。有些人认为这一运动证明农业无产者想建立社会主义农业大企业而不是想分地。农业工人们的下列表现更使他们深信这一点，例如森特什一带的农业工人捎信到布达佩斯，说不要分地，而是应该开始多瑙—蒂萨运河工程。

除其他因素外，上述情况使人们更能理解苏维埃政府的立场。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它犯了严重错误的事实，它对理论抱教条主义的态度，在制定土地法时未能考虑绝大多数农民的情绪。

有两种可能性可供革命苏维埃政府选择，或者继续进行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开始的土地改革，或者在每一块大地产上都建立生产合作社。象绍莫吉和其他地方，大多数农民（首先是雇农）都赞成办生产合作社，把大地产办成集体农场当然是对的。而在另一些地方，可以将一部分大地产建成示范集体农场，把其余的大部

分土地分给广大的贫农，这样，可以使他们更加感到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是自己的利益所在。

这一措施也会使中农感到放心，感到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想夺走他们的土地。

农业人民委员会领导人汉布尔格尔在苏维埃政府3月27日会议上介绍了关于把大地产收归公有法令的第一个草案。草案全文如下：

“一、匈牙利的土地属于劳动人民社会所有，不劳动者与土地无关。

二、一切大、中地产连同其所有附属物与各种装备和农业工厂，一律无偿收归无产阶级国家所有。装备还包括可供一年使用的流动资本。

三、无产阶级国家不触动小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他们可以象以前一样支配自己的土地。

四、公用的土地或装备不得分配。

五、收归公有的大中地产由种地的农业无产者组织生产合作社耕种。

六、此法令由农业人民委员会执行。”

大家对这一草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致同意无偿地将大地产收归公有。争论实质上围绕两个问题：苏维埃政府什么时候公布土地法和土地的所有权怎么办。

瓦图什反对马上公布土地法，因为如他所说的，这样是拿收成冒险。他建议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后再公布土地法。

库恩则敦促立即公布这一法令。他说：“在农业领域也要彻底进行革命。”他要求苏维埃政府第二天就讨论最后的法令草案。大多数人民委员也赞成对这一问题尽快作出决定。

较大的问题是对土地所有权问题应持什么立场。苏维埃政府的每一个成员原则上都认为有必要取消土地私有制。这是马克思

主义纲领的一个基本要求。列宁的土地法也规定，土地私有制永远取消了，所有的土地——也包括农民的土地——**成为全民所有，供种地的劳动者使用。**

库恩主张苏维埃政府也宣布把土地收归公有，关于土地的所有权以后再采取调整措施。瓦尔加也认为有必要取消土地私有制，但是为了使中农放心起见，他认为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土地仍属原来的主人所有较为理想。其他许多人不同意他们的观点，认为如果把所有的土地都收归公有，就会使广大农民群众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

库恩在辩论时强调：要农民不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或采取中立态度是不够的，应该让他们站到革命一边来。但是库恩也没有说出，怎样才能使这一法令为这种革命化服务。

最后，农业人民委员会3月28日向苏维埃政府提交新的建议，从而把草案从议程上撤消了。

尽管有些人民委员认为公布土地法非常紧迫，但是在3月28日的苏维埃政府会议上仍然未能把条文最后确定下来。由于委员们对新的草案还有意见，苏维埃政府委托司法人民委员罗奈伊·佐尔坦和汉布尔格尔·耶诺制定最后的法令。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农民越来越感到不安。某些地区的有地农民中流传着无产阶级专政想拿走他们的土地的谣言。心里不踏实也影响了种地：许多地方的农民不进行春耕春播了，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种的地以后归谁所有。有些乡的农民不安到了极点，以至中央机构必须打电报给农民，保证不触动他们的土地。例如在瑙吉库劳奇，当农民们知道令人放心的电文后，成群地聚集在大街上，满意地议论着这一事情。

解决土地问题的拖延也使那些少地地区的农民感到极大的不安。这些地区的男人为了家庭糊口每年都要到远处的大地主庄园去劳动。苏维埃政府驻埃格尔的新闻代表于3月26日报告说：

“马特劳地区的气氛很紧张。几万人没有工作，他们都是短工，以前这种时候他们已到匈牙利大平原找工作去了。现在他们唯一的希望是尽早得到土地。”

这一情况促使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人在土地法批准以前公布一个秘密法令，根据这一法令，凡是贫农有强烈要求的地方，可以实行有限的分地。

法令强调说：“一小部分有剩余劳动力的人想要土地，如果用别的办法不能保证收成和使农业工人放心，在下列情况下可以破例给予土地：即此人要有耕种所得土地的适当装备和种子。

但是要注意分配的土地同家庭原有的土地一起不能超过5匈牙利霍尔特，草地不能超过1匈牙利霍尔特……。

没有房基地的农业工人家庭，可以在乡或乡附近分给不超过1匈牙利霍尔特的房基地和园地。产业工人、官职人员和不从事农业劳动的其他人员，如果其主要职业允许他同家属生产家里所需要的农产品，每家最多可给予400匈牙利平方弓<sup>①</sup>的土地。”

根据这一法令，许多乡分了地，或核准了以前根据地方的倡议所分的土地。特别是贝凯什州、豪伊杜州和赫维什州给了一部分贫农土地。

4月4日终于发表了关于把大、中地产收归社会所有的法令：

“一、匈牙利的土地属于劳动人民社会所有，不劳动者不得占有土地。

二、一切大、中地产连同其所有附属物与各种装备以及农业工厂，一律无偿收归无产阶级国家所有。

三、小块地产房屋和附属建筑仍为私有财产。至于什么样的地块算作小地产或中等地产，由农业人民委员会视当地具体情况

---

<sup>①</sup> 地积单位，1“匈牙利平方弓”等于3.7平方米。——译者

决定。

四、收归公有的土地及其装备不能分给个人或小组。

五、收归公有的土地可以交给种地的农业无产者以生产合作社形式耕种。凡是16岁以上的男女都可成为生产合作社社员，他们要完成一定数量的劳动日。每人根据所完成的工作量取得报酬。

六、关于生产合作社，以后再颁布法令。

七、大、小农场生产的指挥者是农业人民委员会，监督者是地方苏维埃。

八、此法令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工人阶级的国家将大地产收归社会所有是为了一场千年的官司申张了正义。剥夺了那些从来没有用汗水浇灌过土地的人的土地，他们的悠闲富裕生活是基于对千百万人的非人的剥削，基于千百万人的贫困。号称自己是“民族的供养者”的大地主阶级，由于他们极端自私和目光短浅，几百年来就是国家发展的最大障碍。地主们认为他们之所以拥有特权，是因为他们卫护了国家的自由。这种时代早已过去了。大部分大地主老爷正是因为他们出卖国家的自由和不顾匈牙利人民，一心一意地为奥地利征服者效劳，才得到了土地。苏维埃共和国使那些过去受苦的人成为土地的主人。在过去对他们来说，土地一词仅仅意味着从早到晚残酷的劳动，被奴役和没有希望的贫穷。同莫里兹一样，克鲁迪·久洛也被农村大地发生的革命变革所吸引，他这样写道：“在此以前，这些土地只教会人们弯腰。在这块土地上劳动过的人都累弯了腰，然而侮辱、奴役、自卑和阴险的罪恶也都丧失了元气。今后，土地也将教育劳动者们如何挺起腰杆。土地把自己的孩子教育成自觉的、知足的、勇敢的人。”

革命苏维埃政府的法令在解决有争议的土地所有权问题上，态度模棱两可，前后矛盾。在第一条里规定土地收归社会所有，条

文上写着国家的土地“属于劳动人民社会所有”，后面又承认中、小土地私有制。尽管在原则上不是始终如一，但是将劳动农民的土地留归私有无疑是正确的。如果法令在这一问题上采取别的态度，则反革命宣传——它的最主要手段之一恰巧是强调苏维埃政府拿走农民的土地——就会找到借口来煽动广大的农民群众积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法令的公布使农民放心了。大部分拥有中、小地产的农民满意地得知，今后土地仍属他们所有。

但是大多数中农的心情还很紧张。因为法令没有确定中等地产的最高限度，他们不能肯定土地以后是否还属他们所有。4月6日，德布勒森的土地所有者在大会上热烈讨论将为他们留下多少土地。最后通过向他们说明，凡是自己的土地由自己亲自耕种的人都用不着担心。这样才艰难地使农民们安静下来，消除了他们的紧张心理。全国其他地区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根据来自西部的报告，农民们“担心无产阶级专政将夺走他们小小的财产”。革命苏维埃政府、各人民委员会、工人苏维埃常务委员会为安慰有地农民做了大量工作。他们通过口头和传单竭力说服农民用不着担忧。通过宣传，也取得了暂时的效果。但是由于反革命进行破坏，中农仍然感到不安，这在苏维埃共和国存在期间造成了严重问题。

农业无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在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就已开始将大地产改为集体农场，苏维埃政府在收归社会所有的大地产上建立生产合作社，在他们看来是很自然的事。

特大地产的雇农们已经习惯于细致的劳动分工，并能够适应那些代代相传的、需要知识和经验的工种。绝大多数牧民并不渴望得到土地，因为他们缺少耕畜、农具、种子和专业知识，很难种好土地。他们渴望通过劳动得到能保证过象样生活的公正的工资。苏维埃共和国的措施保障了这一点。

较早成立的生产合作社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干劲更大。莫里兹·日格蒙德<sup>①</sup>于4月中旬参观了绍莫吉州生产合作社，热情地谈了自己的体会：

“不能指望有比这更理想、更合乎社会利益的做法了。

把全州所有的农场都吸收到一个组织中去，每五个霍尔特设一个管理处；而各管理处要向县级和州级管理中心进行核算并在那里得到统一的生产计划。我们看到这些之后完全情不自禁地高呼乌托邦已经实现了。

人们多么兴奋、热烈、幸福。

看青者、雇工、管家、总管家、办公室的文书和经理，个个都很幸福、兴高采烈和心满意足，因此工作热火朝天。

谁能相信，经过了战争恐怖和艰难岁月之后，生活会如此迅速地沸腾起来！快得使人惊讶！

见到绍莫吉州的情况之后，我对他们强烈的自尊心就丝毫不感到奇怪了，是绍莫吉州推动了世界新制度的建立。全国每个州都会向着实现新生产制度的方向迅跑，对这一点我丝毫不怀疑。

匈牙利终于在幸福的和平大道上前进……我信心百倍地证明这一点。”

然而无地和少地农民的大部分无疑是失望了，因为苏维埃共和国没有分给他们土地。连那些在资产阶级共和国存在期间生产合作社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的地区，也出现农民反对集体经营的事情。例如包尔毛兹新城，正如同我们所看到的，那里的农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想在被没收的大地产上建立生产合作社，但是到了4月仍旧没有分配土地，使他们感到失望。几个月前他们曾经认为以生产合作社形式占有大地产是最现实的途径。

随着4月4日法令的公布，土地和生产委员会也开始工作，

---

<sup>①</sup> 匈牙利最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译者

革命苏维埃政府将收归大地产为社会所有的工作交给这个委员会去做。它在各乡、县、州和全国都建立了组织机构。乡、县、州的委员会由相应的苏维埃选举产生，全国委员会由农业人民委员会和全国农业工人协会的代表组成。委员会在解决土地和保证生产的连续性方面完全有自主权——同俄国的贫农委员会一样，他们的使命是根据全体劳动人民和地方农业无产阶级的利益进行农业改革。

委员会将 700 多万霍尔特土地收归社会所有，并在近 11 000 个地产上建立了生产合作社。

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生产合作社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我们今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领导上中央国家机构起决定性的作用，合作社的民主也不象今天合作社的民主那样广泛。为了生产的顺利进行，旧农场的管理人员在直接领导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同样为了保证生产的连续性，一般说来都任命过去的管家去承担这一工作，任命过去的土地所有者的情况也不少。只有当劳动者们认为前农场领导人表现不好，不适合担任合作社的领导工作，才构成例外。合作社劳动者选举产生的企业苏维埃的作用一般仅限于监督管家的工作。

农业人民委员会在领导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中主张高度的集中。一部分是由下列情况决定的：要维护对居民供应的利益，要监督不十分可靠的领导人以及要为农场统一提供资金和必要的燃料等等。但是这种集中的背后也隐藏着不正确的极端的观点，他们认为应该将生产合作社改造成为国营农场。

生产合作社社员原则上根据他们参加集体劳动的多少从合作社收入中得到相应报酬。但是实际上没有这么做，因为在收成还没有下来之前也要保证新成立的集体农场的工人的生活。因此，暂时从中央预算中拨款给这些社员支付工资（根据集体合同上的规定，工资多少稍有差别）。



## 五

# 为了改善劳动 人民的生活

---

地主—资本家的匈牙利在关心劳动人民的社会福利方面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劳动群众（首先是工人阶级）为了改善生活条件同厂主、地主和国家政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但成效甚微。

革命前，匈牙利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如果谈得上的话——基本上是消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国家在人民福利方面的开支每年只有2600万克郎，而国家用来支持教会的钱每年超过2800万克郎。革命前的社会福利支出还不到国家预算的3%。

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认为，自己首要的任务是利用国家政权提高劳动阶级的生活水平。

战争爆发后，由于通货急剧膨胀，劳动人民的实际工资大大下降。因此，革命苏维埃政府在不产阶级专政建立后的最初一段时期注意大力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和各种补贴。

革命苏维埃政府第114号法令彻底改善了产业工人的工资。法令根据专业水平和工龄将工人分成四个级别，每一级别的工资规定如下：

受过训练的技术工人和有10年以上实践的熟练工人的每小时工资为4—8.50克郎；

实践不到10年的熟练工人和有10年以上实践的壮工每小时工资为3—6.50克郎；

专业实践不到10年的壮工每小时工资为2.50—5.50克郎。

青年工人（徒工）每小时工资为1.50—2.50克郎。

法令还大大提高了加班费，加班的头两小时，加班费为小时工资的50%，两小时以后，加班费为小时工资的100%。

法令上规定的时工资与1919年的情况相比，保证产业工人的工资提高30%至100%。例如锻工的工资提高38%，有20多年实践经验的壮工的工资提高52%，铸造工的工资提高53%。

由于通货膨胀，工资的提高不可能使工人的生活水平相应地提高。尽管这样，工资的提高为工人保证了比苏维埃共和国以前较高的实际工资。最低的生活水平以100计算，冶金工人的工资1918年底为63.5%，1919年夏则为78.6%。

官职人员和教育工作者的工资都很微薄，革命苏维埃政府也改善了这一阶层的状况。官职人员的工资1919年夏比1918年12月平均高84%。

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在艰难的情况下也大力提高了知识分子中最贫穷的级层——教员的工资。教员的最低工资（开始工作的头两年）每月为1 200克郎，工龄在20年以上的每月工资为2 200克郎。作为比较，值得指出，只有人民委员会的领导干部、较大企业的领导人和具有特殊专业知识的专家的工资才比他们高：每月2 600克郎。大专院校的教师也作为专家，根据这一标准发给工资。

无产阶级专政取得胜利前，农业无产者的工资比产业工人最低的工资还要低。产业工人在本世纪初通过一系列的工资运动处境有所改善，而被社会民主党遗弃的农业工人的孤立的工资运动却被急于帮大地主忙的国家政权粗暴地镇压下去。

世界大战后期，农业短工的日工资平均在5克郎左右。在苏

维埃共和国时期，首都以及同它联合的地区刚开始的日工资男的是30克郎，女的是25克郎，外地男的为25克郎，女的为20克郎。后来，到了夏天农忙季节，男的日工资增加10克郎，女的增加5克郎。

签订年度合同的农业工人（雇工）的工资一般由州的集体合同决定。每个州的合同都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一致的：同以前的状况相比都有飞跃的提高。

雇农在世界大战前每年平均得到250克郎现金，14公担粮食，1200平方弓玉米地，200平方弓菜地，24公斤盐，并且能够养一头母猪。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农业工人的收入平均提高到1000—1200克郎，23公担粮食，2200平方弓的玉米地，300平方弓菜地，36公斤盐。此外，还保证他们能养两头母猪，并付给他们200克郎供买一头小牛。一般说来农业工人们除此以外还得到其他待遇，如32—52公斤的咸肉、26—36公升煤油、燃料、靴子、麦秆和干草等。

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的报酬暂时同为农业工人确定的工资一致。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人民福利政策的一个最大成就是对全体劳动者实行疾病和工伤保险。

旧匈牙利只有百分之几的劳动者能够享受到社会保险的优越性。例如1915年全国近1800万居民中享受疾病保险的只有866598人。绝大多数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者一旦得了重病就要倾家荡产。对农业工人来说疾病是更严重的打击，因为他们工资少得可怜，连最起码的积蓄也不可能。劳动者中间，农业工人享受疾病和工伤保险的最少。在讨论1907年的保险法时，蒂萨·伊斯特万认为之所以应把农业工人排除在保险之外，是因为在夏收时节农业工人的病假工资反正不够用，而冬闲季节他们会把保险当作

生意。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通过把工业、商业和农业等收归社会所有成了百万劳动者的雇主，它把改变这种悲惨局面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3月30日，革命苏维埃政府公布了关于劳动者疾病和工伤保险的第21号法令。法令第一条规定：“每个工人（也包括农业工人）都有权进行疾病和工伤保险。

凡在国营或私营单位工作并领取工资的人都是工人。”

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参加保险的人只能领到20至26个星期的病假工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把它提高了一倍：苏维埃共和国的劳动者患病时可以得到一年的病假工资。

以前病人的病假工资只为工资的50%，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劳动者在患病的头四个星期得到相当于工资的60%的病假工资，以后拿工资的75%。如果患者是养家的人，病假超过了半年，他的病假工资可以增加相当于日平均工资的总和！

苏维埃共和国特别关怀母亲。孕妇在妊娠期的最后四星期已经可以享受病假工资。产后八星期内可以享受相当于日平均工资总和的产后补助金。满八星期后母亲可以得到十二个星期的哺乳补助金。连没有参加保险的劳动者的女家属也得到产后补助金。过去孕妇根本享受不到产后补助金，因此，经常怀了孕不得不劳动到最后一天。看看现在，比比过去，才能对苏维埃共和国这项规定作出真正评价。过去的作法严重影响了母亲的健康，也是造成婴儿死亡率很高的原因之一。

保险法令把因工伤而部分或完全丧失劳动力的劳动者的补助金提高了一倍。

在苏维埃共和国以前，如果一个学徒工因工厂事故丧失劳动力，这就意味着要当一辈子乞丐，因为工伤补助金是根据学徒工的工资付给他的。革命苏维埃政府在这方面作了很大变动。在学徒期间丧失劳动力的人的工伤补助金要不断增加，并不得少于同龄工人平均工资的最低数字。

保险还扩大到失业者，这是苏维埃共和国的一项非常关键的措施。

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也为在自己土地上从事经营的农民参加疾病保险提供了可能性。那些没有雇工的农民可以自愿参加疾病保险。

革命苏维埃政府3月26日的第11号法令规定：“在无产阶级的国家里，只有劳动者才有生存的权利。”与此同时，以法律形式保证人民有劳动的权利：“国家有义务赡养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以及愿意工作、但国家一时还无法给予工作的人。”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还就实行普遍的强制劳动和劳动权作了规定。

据此，苏维埃政府也开始筹备对劳动者实行老、残保险。这一法令虽然没有公布，但是保存下来的法令草案证明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对实行普遍强制劳动和劳动权是非常重要的。

草案写道：“凡是因疾病、工伤、残废或年老而丧失劳动能力、生活不能自给、还要养家的人由苏维埃共和国负责供养。”

革命前，匈牙利的公共卫生条件远远落后于较发达的欧洲国家的水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匈牙利几乎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是因得不到医生的诊治而死亡的。

医生少，医院更少。战前，匈牙利有680个修道院，但是医院只有427家，其中近半数是为有钱的特权阶层办的疗养院。劳动人民连普通医院的护理费都难以支付。例如，1910年，大学附属医院和罗库什医院每天的护理费为3克郎，大大超过了农业短工的工资。

由于卫生条件差，劳动人民的平均寿命远远低于有产阶级的成员。世界大战期间，由于生活日益贫困，工人的平均寿命下降到惊人的程度。1913年在布达佩斯，平均寿命是46岁3个月。到1918年下降为37岁9个月。首都进步医生的调查表明，布达佩斯工人的生活极端贫困和不讲卫生。布达佩斯内城的平均寿命为44

岁8个月，而工人居住区的平均寿命只有21岁8个月。

随着疾病保险的普及，苏维埃共和国对绝大多数城乡劳动者实行了免费医疗。

革命苏维埃政府4月底将所有的医院和医疗单位都收归国有，并且从5月1日开始每个病人都享受免费医疗。通过在有钱人的专用病房内多安放病人和把新建的房子拨给医院等办法，在苏维埃共和国期间，医院的床位明显增加了。

革命苏维埃政府把有治疗作用的温泉浴池及其附属的旅馆都收归国有，并用它们来医治有病的劳动者。过去，穷人不可能享受到这些待遇。

无产阶级专政的卫生政策的中心是与所谓的“人民疾疫”进行斗争。苏维埃共和国的卫生机构为防治肺病、性病和酗酒等“人民疾病”，制定了精心的计划，城乡无产者死于这些疾病的人最多。除了对病人进行登记和治疗外，把预防疾病作为基本任务。为此，他们大力开展卫生常识的宣传工作。1919年在133天内进行的大量卫生宣传工作，使那些对今天普及科学知识的规模和声势感到习以为常的人也被迷住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卫生宣传队伍是由成千上万的医生、教员和大中学生组成的。他们用文字和口头，通过各种讲座、报刊、传单、宣传画和电影等普及卫生知识。

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为改善广大无产阶级无法容忍的住房条件作了巨大的努力。

据苏维埃共和国负责住宅事务的机构估计，1919年在布达佩斯，有20多万人是6—8口人住一间房间，15—20人挤在一间屋里的情况也不少见。

工人居住区和有钱人住宅区的住房条件差别极大，下列材料很能说明问题：第三区18 500间房间住65 000人，而第四区住房少

不了多少（17 400间），只住（27 000）人。

虽然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关机构在首都和外地都制定了大规模的建房计划并已开始执行这些计划，但为了改变这种无法维持的局面，首先必须对现有住房进行合理的分配。

革命苏维埃政府在3月30日的法令中规定了住房标准。根据这一法令，每个成年人应有一间住房，但是每一家最多可以有三间住房。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科学家、艺术家和医生等应该有专门的工作室。

为了统一管理住房，革命苏维埃政府成立了中央住宅委员会（后来改为全国住宅委员会）。两个共产党员人民委员——萨姆埃里·蒂波尔和瓦戈·贝拉孜孜不倦地领导这一委员会的工作。到7月初，有32 410户得到了比以前好的、较健康的和象样的住房。这大部分应该归功于他们的果断精神和有计划的领导工作。这样，仅首都一地，就有10万多人迁进了新居。这32 000多套住宅主要是通过征用一部分特大住宅的方法得到的。相当多的家庭被安排在新建的住宅内居住，或安排在由以前用于战争目的的建筑物改建成的住宅内居住。也有住在仓库、旅馆、俱乐部和娱乐厅的。

几个大住宅区建设的准备工作也开始了。在蓬格拉茨路开始修建有650套房子的住宅区，在尤劳尼奇路修建有400套房子的住宅区，在马道劳什路修建有500套房子的住宅区。四幢学生宿舍楼（每幢容纳500名学生）的建筑也已列入了计划。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外地的工人苏维埃常务委员会也充满干劲地着手改善劳动人民的住房条件，实现这方面的计划。首先他们迅速采取措施改善农场雇工的居住条件。许多过去根本不让进地主庄园的雇工，现在就在那里得到了住房。

革命苏维埃政府把房租降低了20%，这一措施涉及广大的劳动人民，并且取消了从前线回来的士兵所欠的房租。

虽然许多因素对生产都有不利的影晌，然而无产阶级专政在四个半月内仅在布达佩斯一地就为近5 000户人家提供了家具。他们想把家具的生产建立在新的基础上。在艺术家的参加下制定了最符合现代要求的家具计划。在讨论、座谈时大家提到如下想法：

“应该生产美观大方、做工精细、结实耐用的家具，使用这些家具能发展无产阶级的审美观、陶冶他们的心灵。有的人乐意把多余的钱用来添置较贵、较好和做得比较艺术的家具，这就为生产高档产品提供了可能性，满足这方面的需要也是正当的。”

革命苏维埃政府1919年4月16日公布的保卫儿童法令强调：“苏维埃共和国认为保卫儿童的身心是自己的最重要任务。”多方面地关怀儿童，充满责任感地爱护年轻的一代，是苏维埃共和国社会福利政策的最伟大的组成部分之一。

学校是保卫儿童的基础。为了保护儿童的健康和道德品质，防止发生问题，在学校建立了监护人制度，其任务是配合教育工作者、校医和家长们注意儿童的发育，一旦发现他们生病或在道德方面受到危害，则负责采取必要的措施。

政府组织了校医网，对6至14岁的儿童进行体格检查。

口腔科大夫每天必须有两小时为儿童补牙。为此，国家每月另给他们1 000克郎的报酬。

政府还为爱生病的和健康受威胁的儿童在森林里或花园里建立托儿所、幼儿园和学校。处在什瓦白山上的学生疗养院在5月内就为肺功能较弱的儿童敞开了大门。这所疗养院是用乔林男爵的豪华别墅和大旅馆的房子改建成的。

政府还组织那些没有卫生条件的儿童洗澡。每星期有30 000—39 000人在公共浴池洗澡。有时也可以使用私人的洗澡间洗澡。一些无产者孩子因为整日在拥挤不堪的、空气不新鲜房子里，或在 unhealthy 的公寓的黑暗院子里和缺乏阳光与新鲜空气的小巷内度



日而面黄肌瘦。政府打开了私人花园的大门供他们享用。政府还把首都最美的花园——玛尔基特岛收归国有，取消了门票。1919年夏天，许多花园都响彻了穷苦孩子们欣喜的喧哗声，过去他们想看一眼这些花园都不那么容易。

作家克鲁迪作为这个岛上的居民，是孩子们在这儿愉快“定居”的见证人。他写道：“穷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充满了全岛，就象5月的风给世界带来了颜色和芳香一样。婉啾啼鸣的鸟群，千姿百态的花坛，情趣万千的生活代替了沉寂却又不时响起乌鸦叫声的、悄然离去的往昔。过去，蝙蝠在黄昏之前就大胆离巢觅食，而现在则等待夜幕的降临。以往按时来到这座孤岛的岛病——忧郁症，而今却如挨了打的狗一样溜边而行。当一群小姑娘在昔日庭院的草坪上如燕子一样来往穿梭和欢快嬉戏时，寺院般的寂静、消沉的黄昏和沉浸在悲伤中的孤独连同蟋蟀的叫声一起消失了。”

苏维埃共和国的保卫儿童机构开展了大规模的活动，他们想让布达佩斯的1万名儿童到巴拉顿湖畔和其他地区的休养所避暑。有1 000多个孩子已经开始避暑，但是由于无产阶级专政被推翻，其他人没有能得到这个机会。

革命前的匈牙利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让成千上万的儿童做有损健康的工作。在战争年代，雇用的童工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苏维埃共和国消除了这种状况。

党的纲领的目标之一是禁止使用童工。有专门的法律保护学徒工。规定禁止使用学徒工干家务劳动和与专业无关的工作，使用时每天不能超过6小时（包括理论教育在内），7月9日以后改为每天不超过8小时。

## 六

# 无产阶级专政国家 的文化政策

---

苏维埃共和国在文化领域也开始大规模的建设工作。

这方面要做的事太多了。在资本家地主的匈牙利，百万劳动群众被排除在文化的大门之外，就象国家的社会福利丝毫没有他们的份一样。战前的匈牙利，国家在文化方面的支出占预算的2.5%左右。根据1910年的人口普查材料，6岁以上居民中有三分之一是不识字的。有些地区文盲人数远远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数：例如贝凯什州不识字的占48.5%，索尔诺克—多博卡州不识字的占71.4%。全国大部分人活了一辈子连一本书也没有读过，没有到过剧院，没有听过音乐会，没有参观过博物馆等等。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百万工农打开了通往文化的大道。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规定：“苏维埃共和国取消资产阶级的文化特权，为劳动人民汲取真正的知识提供可能性。因此保证工农免费受教育和得到较高的文化素养。”

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人很清楚，仅仅享有较高的文化还不够，还应该想方设法使已经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获得管理社会主义国家和领导其他劳动阶级所必需的知识。莫里兹也提醒新掌握政权的人注意这一点：“每一个穷苦人都要好好想一想，有

钱人借助于科学统治了你们千百年。现在，你们从他们那里夺得了财富，还应该夺取科学才是。”

1919年3月21日以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大规模地展开。苏维埃共和国的文化机构按照经过深思熟虑和有远见的构想，开始在教育、普及知识、艺术生活和文化的其他领域进行革命的变革。

苏维埃共和国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都进行了教育改革。

他们把幼儿园改组为游戏学校。这个新名称也反映了这样的意图，即在这里除照顾好孩子外，还想教育他们适应集体生活，做好学前准备，使他们热爱劳动。教育人民委员会计划扩大游戏学校网，以便协助更多的劳动妇女教育孩子。保育员的人数也大大增加了。流动故事员巡回到幼儿园给孩子们讲故事，还演出木偶戏、放映电影，使孩子们得到娱乐。

苏维埃国家认为建立统一的学校体系是自己在文化方面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前，有近70%的学校掌握在教会手中。每个教会学校按不同的课表教学，使用的课本也各不相同。为把教会学校收归国有，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时期，教育界就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运动。然而在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后才实现了这一点。

革命苏维埃政府第24号法令规定：“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认为教育事业是国家的任务。苏维埃共和国必须接管所有非国家的教育机构。依据本法令这些机构的一切不动产和动产都将成为公有财产。”

国家和教会分离已成为紧迫的任务。在处在资产阶级进步前列的西欧国家里，这项任务早已实现了。这一措施并不意味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要限制公民的信教自由。苏维埃共和国允许教会教育存在，就象允许参加宗教仪式一样。

教会教育机构的国有化不仅有助于建立统一的学校体系，而且也为消灭十分影响教学质量的不分班级的学校体系创造了有利

的条件。有些乡有三、四个教员，但是6—14岁的孩子仍在一起学习，因为教员都分别在不同的教会学校教书。地方的学校由国家统一领导，就有可能更好地使用教学力量，更合理地组织教学。

教育人民委员会把从敌占区逃出来的近1200名教员安排在学校里任教，也促进了取消不分班级学校的工作。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有些知识分子的专业已成多余，政府想把他们培训成为教员，以缓和教员缺乏现象。

无产阶级专政的教育机构不等1919—1920新学年的来到，就在有条件的地方实行了分班级教学。

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学校的教育工作自然不可能立即改进新的、社会主义的内容。这样做需要新的课本，还需要本着社会主义精神重新培训教员。教育人民委员会立即着手解决两项任务：委托最优秀的专家编写新的学校教科书和为教育工作者举办进修班。在1919—1920新学年内，他们就想开办全新的、八年制的、统一的人民学校并使用新的教科书。需要体现阶级观点的课程，已经根据新的计划在1919年夏开始教了。《人民教师报》副刊上经常刊登关于世界史和匈牙利史的体现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指导性材料。

对中学也进行了改革。大大缩减了已废弃的语言的教学时间，增加了作文、历史、自然科学和地理等的课时。中学还开设了新课程：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和优秀的共产主义文学作品。

除了提供一般知识的中学外，政府还让技术工人学校发挥重要作用。根据计划，他们想设立与普通中学平行的三种类型的技术工人学校：工业、农业和产品调配技术工人学校。八年制小学毕业后才能报考这三种学校。这些学校的重点主要放在实践知识上。

为了加强孩子们的实际能力，扩大技术知识，教育他们尊重

体力劳动，在中小学都开始准备进行劳动技术教育。布达佩斯工人士兵苏维埃教育科已经在5月开办了第一批训练班，培养校办工厂的教员。

无产阶级专政也使大专院校的生活出现了根本的变化。

旧匈牙利大学的领导权掌握在守旧的、面向大地主贵族的、在专业上往往是水平不高的教授们手中。他们竭力排斥进步思想和进步人士。连资产阶级民主政府都被迫停止了大学的自治。苏维埃共和国为改革大专院校采取了果断措施。他们把那些不是因为科学成就，而是因为为贵族阶级效劳而走上讲台的教员们清除了出去，代之以过去受排挤的杰出专家。任命鲍比奇·米哈伊、波尔加尔·埃莱克、塞克菲·久洛、菲莱普·拉约什、雷瓦伊·约瑟夫和瓦达斯·埃莱梅尔去科学大学文学院任教；任命拜奈代克·毛尔采尔、图罗齐-特罗什特莱尔·约瑟夫去师范学院任教；任命波姚·耶诺、费伦茨·山道尔去医学院任教；任命埃拜尔·拉斯洛、科兹毛·拉约什去工业大学任教；任命拜克·厄·菲勒普、韦德莱什·马尔克、波尔·贝尔陶兰、费伦茨·贝尼、乔克·伊斯特万等人去美术学院任教。

法律系和法学院暂时停止教学，原因有二：一是法学所带的剥削阶级利益和观点的烙印最深，二是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中，律师的比例太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不需要这么多律师。

神学院也停止了活动，但是如果教会自己出钱，不需要国家的支持，可以继续办下去。

大学的教学改革还只有个轮廓。趋向是要把培养实践专业人员和培养科学家互相分开，并根据他们独特的要求进行培养。

无产阶级专政以莫斯科劳动大学为榜样办起了马克思—恩格斯工人大学，5月初在法学院大楼里开学。关于这个大学的作用《红色报》写道：

“工人大学将进行系统的、经常性的科学工作，学生完全来

自劳动无产阶级，在夺取了政权以后，现在他们将掌握知识，以便将来亲自领导生产、行政管理工作和文化工作。”

工人大学的学生由各级苏维埃、党和工会组织推荐，从那些在1918年10月21日以前就是有组织的工人中招收。免去这些学生下午的劳动。

他们还想在大学开办行政管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训练班。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训练班有200左右学员，已经开课了。讲课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进去听。

除了在中小学和大学进行正式的、经常性的培训外，苏维埃共和国的文化机构还通过多种文化手段把广大群众吸引到教育和知识普及方面来。几星期内，首都和外地办起了许多成人教育训练班。为文盲开办了识字班。那些虽然识字，但在基础知识方面需要进一步提高的，可以参加初级班学习。工人进修班是为报考工人大学做准备的。还办了许多工业、工厂管理、语言、数学、速记、打字等训练班。无产阶级专政的头两个月中，仅布达佩斯一地就办起了231个各种不同的训练班，共有6 500多名学生。

为了给普及文化知识提供直观教具，成立了直观教具和幻灯片中心，它收集的资料是欧洲最丰富的资料之一：到5月底已有近4万部幻灯片。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通过举办文学和音乐知识普及讲座与演出，使成千上万的人了解了过去不了解的文学和音乐的美。截至5月底，有6万多人参加了这类活动。艺术创作从来也没有象在苏维埃共和国时期那样受到尊重。

如果一个艺术家的创作意图是正直的，且其作品受到了社会的关注，不论其艺术风格和世界观如何，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都将给予支持。

少数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由于缺乏理论素养，容易搞左的东

西，他们带着宗派情绪，想把资产阶级艺术家从无产阶级专政的文化生活中排挤出去，而不考虑他们本人的表现如何。乌伊茨·贝拉在4月10日《红色报》上写道：“无产阶级专政只需要表达社会主义世界观的艺术。在专政期间，其余的都要靠边站，即使他们好心地想要帮忙，而实际上也只能有损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纯结的艺术。”4月11日，《红色报》以《当心！》为题发表的文章中也表现出源于思想认识不清楚的过分的激进主义。文章强调说：“应该不仅通过政治检查，而且通过伦理检查无情地摧毁一切资产阶级思想和孕育这种思想的人——艺术家。即使只剩下1个或5个、10个，或30个（我们不想说出数字）老艺术家也没有关系。无情是完美地达到目的的条件。”文章还对托特·阿尔帕德发起了恶意的抨击。

这些观点既不同共产党领导人的观点一致，也不同无产阶级专政政府有关文化机构的观点一致。

鲁卡奇·久尔吉在1919年4月19日的《红色报》上这样总结了大多数共产党员的立场：“共产党的文化政策只区分文学的好与坏，不愿意以不是社会主义作家为名而抛弃莎士比亚或歌德。但是也不愿以社会主义名义对艺术进行浅薄的涉猎……教育人民委员会并不追求官方艺术，也不要党的艺术专政。政治观点在长时期内仍然是选择的观点，它不能规定文学创作的方向，它只起过滤作用，不应是唯一的源泉。”苏维埃共和国的文化政策在实践中驳斥了宗派主义观点，尽管那些人是出于好心和出于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担心，但是给工作带来了损失。可以说在文化生活的一切领域内，苏维埃共和国的文化机构都把正直的、乐于助人的资产阶级艺术家和专家吸收到领导工作中去，这些人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文化成就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

在无产阶级专政存在的133天中，当然只能在几个艺术部门有新作品问世，它们反映了由于社会主义革命而变化了的社会的

新生力量，以及创作者同这个变化了的世界的关系。首先在抒情诗、报告文学和素描中出现了一些不朽的作品，其源泉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感受。这些作品的高超水平和真诚的激情把社会主义文化初期的作品上升到我国文化遗产最杰出的传统中去。

匈牙利文学界最杰出的代表极其热烈地祝贺无产阶级政权的诞生。对这一新生的新型国家的真诚肯定把文学界各种不同流派——从科姆雅特·奥劳达尔到托特·阿尔帕德——的代表都团结到一起。鲍尔道·拉约什、考沙克·拉约什、克鲁迪·久洛、尤哈斯·久洛、马拉伊·山陀尔、莫里兹·日格蒙德、莫拉·费伦茨和托特·阿尔帕德等在许多诗篇和文章中都表示拥护无产阶级专政。

尤哈斯·久洛在《韵律》一诗中表达了自己对解放了的劳动人民的祖国的感情：

“我的母亲，尽管你很贫穷，  
已经沦为半死的乞丐，  
然而我是属于你的，  
我从未感到这样强烈，  
未来的太阳把你的面庞照得通红，  
自由的国家，  
我永远做你的诗人！”

可以说，主要作家和诗人的作品都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每个事件紧密相连，他们在作品中表示赞同无产阶级的事业，衷心祝贺所取得的成就，对争取到的自由和社会主义未来感到担忧。

如果没有莫里兹介绍莫吉州雇农们变化了的生活的文章，我们对苏维埃共和国农业政策的了解就会更有限和更片面。

说话声音柔和的莫拉·费伦茨4月初在被法国人占领的塞格德市，以惊人的勇气坚决反对策划反革命阴谋活动的塞格德资产



阶级。他在4月1日的《塞格德日记》上写道：

“取得了胜利的无产阶级不仅会发出威胁，而且也会作出承诺：它毫不留情地把那些胆敢反对新的世界制度的人处以死刑；让每个人都过上象样的生活，只要他们满足于自己正直的劳动所得，而不是靠别人的汗水生活。无产阶级并不要流血，而是渴望幸福，它想给予每个人应享的幸福。在这座工人城市里，谁还会反对这样做？被剥削者、有觉悟的体力劳动无产者和没有觉悟的脑力劳动无产者使这座城市变得强大起来。因失去财产、地位而哭泣的人不会很多，不会有许多人咬牙切齿地攻击夺走他们猎物的新制度，不会有许多人在秘密集会上磨刀霍霍地反对专政，这个专政也将迫使他们满足于得到与他们的同伴们同样多的东西。”

当反革命在法国占领军的帮助下在塞格德掌权后，莫拉宁可辞去《塞格德日记》编辑部的职务，也不放弃自己的观点。莫拉和尤哈斯在反革命的塞格德一直支持无产阶级专政，承担着自己的态度造成的一切后果。“塞格德的工人之家”被法国人占领了，后来由于塞格德工人的坚决斗争他们才交出来。当“工人之家”重新开放时，尤哈斯·久洛写了一首最美的诗，题为《写在工人之家的门楣上》。

苏维埃共和国的文学生活由教育人民委员会监督下的作家苏维埃常务委员会领导，其成员有：鲍比奇·米哈伊、鲍拉日·贝拉、鲍尔道·拉约什、比罗·拉约什、考沙克·拉约什、科姆雅特·奥劳达尔、鲁卡奇·久尔吉、莫里兹·日格蒙德、欧什瓦特·埃尔诺、雷韦斯·贝拉和西尼·久洛等。常务委员会在其工作中依靠作家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中有我国文学界的杰出人士，如加尔多尼·盖绍、海尔陶伊·耶诺、考林蒂·弗里杰什、科斯托拉尼·德热、纳吉·拉约什、托特·阿尔帕德等。

作家苏维埃常务委员会和作家委员会认为自己的一项最基本的任务是解决作家物质上的困难，消灭经济上任人摆布的情况。

他们想每月给作家预支一定数量的钱，待作品出版后再扣回。通过这种办法为文学创作提供安定的条件。当然，这笔钱只能预支给那些已被证实有写作才能的人。作家苏维埃常务委员会和作家委员会将文学界人士登记造册，以便决定支持哪些人从事创作活动。

教育人民委员会的报告说：“我们期待着文学生活的新生。对一个作家来说，哗众取宠、搞大量粗制滥造的东西已不是他的利益所在。谁也不会听任出版社和读者的摆布。另一方面，可以指望那些被资本主义埋没了的、有才华的人将按照与国家签订的合同进行工作。这样，许多有才华的作家会得以拯救，并崭露头角。”

教育人民委员会建立了全国精神产品委员会来领导书籍出版和发行工作。这一机构从4月底到7月底的三个月中出版了334种书籍和宣传品，共3571万册。出版物的发行工作组织得很好。除在书店销售外，还设流动书摊，使劳动人民在企业、兵营、学校和家里也能买到感兴趣的书籍。

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时，只禁止了4种日报的出版，除社会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机关报以外，还出版了近20种报刊。但是后来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停止出版各资产阶级日报，采取这一措施的最主要原因是纸张缺乏。连党中央刊物的出版都受到威胁。促使政府作出这一决定的另一个因素是，在武装干涉开始后，那些起初曾经声明自己忠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记者，看到苏维埃共和国内外交困，于是开始大量写反革命文章。

接近社会民主党右派首脑的杂志《人》上登载的反共文章，为那些带反革命倾向的报刊的言论定调。《人》的编辑根德尔·费伦茨是《人民之声报》的记者。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根德尔在领导报刊的工作中取得很有影响的地位。他成了报刊苏维埃常务委员会主席和新闻记者工会主席。社会民主党右派不管愿不

愿意，都要迁就党的统一，所以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的头几个星期内，他们不能冒险公开在党报上攻击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然而，根德尔和他的杂志却充当了这一角色。

《人》从两个方面对共产党发起攻击（打着文学政策的旗号）。文章攻击教育人民委员会内领导苏维埃共和国文学艺术政策的共产党人，说他们在文学创作中发表了低水平的作品，因而对他们所执行的文学政策的正确性表示怀疑。《人》对杂志《今天》及其周围的作家、艺术家的攻击与此有关。

《今天》是考沙克·拉约什于1916年创刊的。他的同事大部分是年青人，他们对本世纪初资产阶级艺术内容和形式的单调和无出路感到厌倦。他们认为，要寻找艺术继续发展的出路，首先要完全抛弃传统的形式和否定以前受到普遍尊重和接受的规则。

《今天》的艺术家反对文学的保守性；他们谴责社会的不公正、谴责帝国主义战争、谴责肆无忌惮地煽动民族主义。但大多数人在这一时期没有再继续向前迈进，认为社会革命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任务是艺术表现手法的“革命化”。在1917年俄国革命的影响下，一部分人——科姆雅特·奥劳达尔、雷瓦伊·约瑟夫和兰捷尔·约瑟夫分离出来了，他们不满足于《今天》杂志的主观、抽象的革命性，走上了积极革命的道路，投奔了反军国主义组织，和他们一起参加了共产党。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考沙克及其一伙也开始较积极地进行政治活动。他们站在年轻的共产党一边，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卫道士，但是他们一刻也没有停止声称，他们不愿意受任何党派的领导，他们的纲领不同于共产党的纲领。他们认为与共产党同盟仅仅是暂时的。

《今天》杂志的积极分子的思想（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主观的革命性和表现主义的艺术手法的一种特殊的结合）是动荡的欧洲精神生活的典型现象。无论东方或西方，探索道路的知识分

子在开始时所走的路都差不多。毫无疑问，这些积极分子在文学和造型艺术中以新的、不朽的作品丰富了艺术的表现手法。

但是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或迟或早都放弃了站在党外、不愿意受约束的作法。许多人惊异地发现，离开了社会的真正革命力量就不可能实现革命的原则。

无产阶级专政胜利后，考沙克和大部分“积极分子”都积极地参加了苏维埃共和国的文化生活。过去几乎不容许存在的《今天》杂志现在已经成为文学生活的重要因素之一。

他们那种抛弃传统形式的主张是与读者格格不入的，这为对它发动批判提供了口实。但是，根德尔的杂志不是站在社会主义思想较高的立场上去批判《今天》，而是从保守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观点出发去批判它，并且对《今天》的艺术家粗暴地进行人身攻击。

《人》认为教育人民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工作人员想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手段把考沙克等人的流派强加给匈牙利文学。虽然这时一部分青年共产党员认为革命艺术发展的道路无疑是先锋主义，但是大多数共产党员——正如领导人公开表示的——持另一种观点。

共产党人禁止了《人》的出版以回答它那涣散人心的攻击，这一事实说明了无产阶级专政初期的内部力量对比。但这只是暂时的胜利，因为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局势转向危急，在文学战线上，对共产党又开始了攻击甚至一个有威望的人——库菲担任了他们的领导。

由于局势发生了变化，那些在4月被迫同意禁止出版《人》的人，在5月底又要求复刊。《人民之声报》5月29日“胜利地”报导了这一事件：“我们根德尔·费伦茨同志的战斗的、英勇的周刊《人》停刊数星期后又复刊了。”

《人》继续进行以前的活动，区别是批评无产阶级专政的领

导和工作方法的反共文章不仅仅局限于艺术和文学问题，而是愈益成为一个全面政治反对派的传声筒。

在筹备党代会期间，库菲和维尔特奈尔在这一周刊上为党代会上反共言论“定调”。

在6月的党代会上，库菲表达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工作方法的右派和中派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意见，他指控苏维埃共和国，说自它成立后，“一切精神生活和科学生活都绝对停滞不前。”他强调说，文化生活“瘫痪”的原因是对脑力劳动者自由的限制。

库恩·贝拉反对这种观点，他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只是那种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被称为资产阶级文学的、害人的精神生活衰落了。无产阶级必须建立新的精神生活和新文化。我相信无产阶级的生产力，相信那个曾经建立了各种机构的生产力也能在精神生活领域开花、结果。当然，这不是《今天》这样的文学，它是资产阶级颓废的产物。新的精神将在无产阶级的精神生活领域中出现，无产阶级的阶级精神将从中发扬光大。”

有一种观点认为，资产阶级文学界的某些人士多多少少地被迫保持沉默是精神生活衰退的证据，库恩拒绝了这种观点，他自己和其他共产党人一起同《今天》的艺术观点划清了界线。

很明显，库恩·贝拉的立场伤害了集结在《今天》周围的作家和诗人，使他们感到委屈，并拒绝了这种批评，后来，他们的先锋派贵族主义更加走向极端了。

此后，考沙克和他的一部分追随者渐渐远离了共产党人。

苏维埃共和国存在时期，文学界人士开始时的一致热情无疑是减退了。但这无论如何不能归咎于——象库菲所说的——“对精神自由的限制”，而是有别的因素。作家、诗人、艺术家情绪所受的影响同其他劳动阶层所受的影响是一样的。帝国主义的进攻、无产阶级专政内外困难的增长、联合党中不一致现象的

日趋严重，使那些在苏维埃共和国胜利时期怀着真挚的热情对它表示祝贺的人们动摇不定，那时他们以为革命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的胜利必能扫除一切障碍。此外，由于纸张缺乏，大部分报刊被迫停刊，作品的出版也日趋困难等等，都加剧了这一情况。但是这一切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无关，绝不意味着文学界杰出人士对工人阶级的政权丧失了信心从而变为反革命复辟的信徒。

苏维埃共和国的造型艺术生活由艺术和博物馆苏维埃常务委员会领导。负责人是波加尼·卡尔曼，成员有：贝雷尼·罗伯特、科兹毛·拉约什、费伦茨·贝尼、建筑师莱什奈尔·毛诺和艺术史学家安道尔·弗里杰什、维尔代·雅诺什。艺术和博物馆苏维埃常务委员会也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之一是使美术家经常有工作可做。为保证他们的生活，同对待作家一样，每个月给他们预支一定数量的钱，然后用他们的作品来偿还。如果按照计划已还清了预支款，艺术家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作品，但是国家对他们的作品有优先购买权。

自然，这一计划只有经过相应的准备才能实行。在此以前，常务委员会也在想方设法帮助艺术家。革命苏维埃政府在不产阶级专政建立不久就给美术馆拨款25万克郎，让他们买经济拮据的艺术家们的作品，以减少他们的物质困难。许多艺术家接受了艺术家苏维埃常务委员会委托的创作任务。许多人参加制作首都五一节的装饰物，由于艺术家们的协助，它成了宣传性的、大型装饰艺术的杰出典范。仅仅全国精神产品苏维埃宣传科就出版了84种大型宣传画，近50万张。这些宣传画是匈牙利素描、宣传画艺术发展的一个顶点。

教育人民委员会注意提高造型艺术的教学水平。通过改组工艺美术学院和安排新的教学力量，使培养艺术后备力量的工作有新的起色。在安德拉希·久洛宫殿里为有才华的无产者青年设立

了造型艺术教学车间，乌伊茨·贝拉是负责人，内梅什·洛姆佩尔特·约瑟夫被任命为绘画科主任，梅杰西·费伦茨被任命为雕塑科主任。为使成年艺术家得到进一步的深造，在圣安德烈和巴拉顿菲赖德举办了夏季训练班。为使学院毕业的艺术家进一步深造，开办了大师学校。

除了关心创作艺术家的生活、工作和进修外，艺术和博物馆苏维埃常务委员会的活动中心自然是提高群众对艺术的鉴赏力。

文化机构想尽一切办法使全体劳动人民都能观看国内保存的珍贵文物。革命苏维埃政府于3月22日作出决议，把私人收藏的可供博物馆展出的文物收归国有。几星期内，通过这种办法收集了1000多件美术作品、素描和工艺品。被收归国有的有如下画家的作品：伦勃朗、勃鲁盖尔、哈尔斯、埃尔·格列柯、丁托雷托、戈雅、安格尔、德拉克洛瓦、柯罗、库尔贝、马奈、雷诺阿等等。

6月15日举办了被收归国有的文物的展览会，共展出715幅画，这是取得巨大成功的首次展览会。世界和匈牙利艺术史上的杰作现在第一次展现在渴望得到美的享受的群众眼前。

对学生和青年工人的美术教育也很重视。例如组织青年工人每30人一组，每星期去一次美术馆，根据精心制订的计划给他们讲解艺术作品，共十个星期。然后再为他们举办进行艺术史教育的较高级的训练班。青年工人们很乐意参加这项活动，它向他们展现了过去不了解的美的世界。1919年5月8日《火炬》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写道：“因重体力劳动而疲惫的青年工人们兴致勃勃地参加这些讲座是令人惊奇的。”

与文物收归社会所有的同时，革命苏维埃政府还决定将剧院收归社会所有。

为了便于观众看戏，通过工会以优待价出售三分之二的票，

后来改为五分之四的票。剩下的部分在剧院售票处出售。这是许多匈牙利工人平生第一次上剧院看戏。

在民主的基础上吸收了最优秀的艺术家参加戏剧的领导工作。成立了艺术咨询委员会，作为教育人民委员会的咨询机构，成员中有优秀演员，如乔尔托什·久洛、肖姆洛伊·奥尔图尔、欧德里·阿尔帕德、特尔日·耶诺、拉特考伊·马尔通等等。

在无产阶级专政期间，演员们不用担心失业，他们为近郊和外地组织了一个有几百人的剧团。

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前，没有大专水平的、统一的表演和导演教育机构。无产阶级专政期间决定取消以前公开存在的私立戏剧学校，设立戏剧学院。学院应该于1919年9月1日开学。

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剧院节目的水平也提高了。取消了那些有反动倾向的、艺术性差的节目。新的、具有社会主义内容的戏剧还没有诞生，因此，剧院首先演著名作家的作品，如莎士比亚、斯特林堡、高尔基、肖伯纳、莱奥尼德·安德烈耶夫、霍普特曼的作品。除了高尔基的作品以外，剧院节目中总共只有一个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品，即荷兰社会民主党人赫尔曼·海尔曼斯的剧《希望》。

剧院的新观众、工厂企业的无产者们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新的感受。演员们从来也没有为这样通情达理的观众演过戏。莫里兹·日格蒙德在一篇文章中生动描述了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剧院晚场演出的情景：

“今天晚上我在民族剧院，我周围坐着新观众。

当我见到塞切尼·贝拉伯爵的包厢里坐着烟厂的三个小姐和一个带黑头巾的老太太时，很受感动，被迷住了……。

是的，这就是观众。

对他们说来，舞台和生活不是游戏。他们把真理铭记在心



里，而且永不遗忘。这样的观众是值得崇敬的，有意义的话值得对他们说：他们是艺术真理的庇护所。他们不是对文化感到厌恶的剧院油子，他们不需要廉价的工艺品。这些观众是人，他们活着，他们是热爱真理的人。

这天晚上，我完全新生了。对艺术的任务我有某种高尚的、纯洁的感觉。”

苏维埃共和国的音乐生活由教育人民委员会的雷伊尼茨·贝拉领导，在音乐苏维埃常务委员会工作的有巴尔托克·贝拉、柯达伊·佐尔坦、多哈纳尼·埃尔诺。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音乐教育也是免费的。同剧院和博物馆一样，歌剧院的观众和音乐会的听众都是劳动人民。

20世纪初，匈牙利已经有电影工业和电影院网。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前已有内容进步的电影，主要是反对战争片子。

苏维埃共和国将电影制片厂、电影发行公司和电影院收归国有。

电影制片厂大力开展工作，克服了初期组织工作的困难以后，连续拍摄影片。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四个半月里，完成或大致完成了35部故事片的摄制工作。新闻片纪录了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件和革命战争的一些场面。

为了使电影生产为教育服务，苏维埃共和国电影工业的领导人制订了长远的计划。除故事片外，他们计划拍摄许多科教片、知识普及片和为工农业专业教育服务的影片。

指定了专门的儿童影院，放映为青少年拍摄的片子。还计划把儿童影院的前几排座位撤掉，以免孩子们在看电影时因角度不好而感到不舒服。这也体现了对孩子们的关怀和保护。

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关于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也有大型计划和倡议。

为了加强图书馆领导工作、合理分配库存的图书和组织图书

馆员进修，成立了全国图书馆业苏维埃，根据计划，它将依靠图书馆学和文献学研究所领导图书馆网的工作。

把大机关图书馆和私人图书馆国有化，将为按照最现代化的原则并考虑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需要改组图书馆网提供了可能。

除了可以满足一切科学要求的科学专业图书馆网以外，一个机构健全的公共教育图书馆体系的奠基工作也开始了。他们想在布达佩斯每个区都成立几个藏书15 000至20 000册的公共图书馆。这种图书馆在大布达佩斯将有30多个。在其他城市和较大的工厂企业设置类似的机构也在计划之中。还计划建立流动图书馆，为农村劳动者提供娱乐和普及知识最重要的工具——书籍。他们还想为青年工人们成立专门的图书馆。

为了普及现代化的图书管理知识，举办了图书管理员进修班，后来想把它改为学制一年半的学院。

前面我们曾经谈到，无产阶级专政努力使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青年都能看到保存在博物馆的文物。还值得一提的是苏维埃政府决定建立几个新博物馆，其中有收藏工人运动革命传统的实物的无产者博物馆。

对保护古迹也采取了措施。

他们还为了建立统一的档案馆奠定了基础。较重要的教会和私人档案馆由国家掌管。责成全国档案业苏维埃领导档案工作。

在苏维埃共和国期间要在文化领域完成已经开始的巨大任务，四个半月的时间自然是不够的。文化革命的任务远比那些几个月内就能解决的任务复杂得多，困难得多（即使是想法和法令都是最好的，也是这样）。但是连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都无法否认，他们百般进行诬蔑的工人政权不仅不轻视和摧毁文化，而且非常重视，把它提到过去从未有过的高度。

## 七

# 策划对苏维埃共和国进行反革命的军事干涉

---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触动了帝国主义列强。

无产阶级革命在匈牙利获胜有力地驳斥了那种论调，即无产阶级专政是俄国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对欧洲其他国家来说这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也打乱了社会主义敌人的军事部署。帝国主义列强想通过那些控制在帝国主义大国手中的反革命当权的国家之间的链条（从芬兰到黑海）把革命的俄国在欧洲孤立起来。以前他们想要匈牙利也成为这条“防疫线”上的一环。

从3月21日起这条“防疫线”断了，在策动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或者已经参预这种武装干涉的国家的边界上出现了新的、革命的军队——苏俄红军的同盟军，帝国主义必须考虑这一事实。

无产阶级专政在匈牙利获胜的消息使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和与匈牙利毗邻的资产阶级国家的统治者感到震惊、手足无措和恐慌。第一个反应几乎到处都一样：资本主义的欧洲不能容忍布尔

什维主义的策源地在欧洲中部自由存在，不能容忍革命继续蔓延威胁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皮雄外长在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没有几天就在法国国会上说，“各国应该联合起来，封锁布尔什维主义道路。”美国驻维也纳外交使团的负责人赫尔斯梯德说：“如果我们在匈牙利不扼杀布尔什维主义，它将会继续蔓延……我们不能小看欧洲面临的危险。最大的危险在威胁着匈牙利周围的各国，但是意大利、法国和大不列颠也处在危险中。”

1919年春天，资本主义战胜国召开巴黎和会，旨在根据各战胜国的利益重新瓜分世界。在这次会上，首先是在会议的领导机构——四人会议上，决定了对革命的匈牙利将采取的措施。

刚开始的几天里，他们对苏维埃共和国没有进行制裁，甚至允许把匈牙利资产阶级民主时期预订的食品运往匈牙利，可见这一突然事件在他们中间引起的惊慌失措的程度。但是几天以后他们封闭了匈牙利的边界，对无产阶级专政严加封锁。为了反对匈牙利无产阶级，帝国主义者一致同意并迅速拿起的第一个武器就是饥饿。

所有的帝国主义头子都认为，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继续存在下去。而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上，他们的意见有分歧。我们应该从这些国家的特殊利益中寻找意见分歧的原因，不同的利益使帝国主义各国相互勾心斗角。

法国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坚持武装干涉。法国人在中欧和东欧有大批军队。有数十万法国与希腊混合军队——东方远征军驻扎在巴尔干。法国驻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军事使团控制着这些国家的军队。利用这些国家的军队进行武装干涉无疑会加强法国在中欧的影响。

法国人的想法同匈牙利周围的资产阶级国家（首先是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统治集团的利益和愿望是相吻合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存在首先威胁着这些邻国的社会制度。他们认

为通过武装进攻可以最迅速和最有把握地保证满足他们对领土的要求。

塞尔维亚—霍尔瓦特—斯洛文尼亚王国早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就占领了一些地区，它指望巴黎和会能将这些地区转让给它。这一时期它的精力完全花费在对付别的国家上了。因为在阜姆和达尔马提亚沿海地区它和意大利发生了冲突。它同保加利亚、奥地利有领土争端，甚至因巴纳特地区问题同罗马尼亚也有争端。因而派遣重兵参加大规模行动镇压苏维埃共和国不是塞尔维亚的直接利益所在。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王国统治集团也认为有必要从军事上打败这个对它来说意味着巨大政治威胁的邻国。

3月21日以后，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政界人士向全世界大声疾呼，说来自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方面的进攻威胁着他们的国家。他们以受到威胁为借口，想尽量多从协约国那里要到一些武器装备和食物。

捷克斯洛伐克国防部长科罗法奇3月22日给巴黎发电报说：“为了粉碎布尔什维主义，我请求运武器来，特别是机关枪、手枪和必需的弹药，如有可能，用专列取道德国运来。”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机构向意大利人也提出同样的要求。他们的理由是：他们“感到自己受到匈牙利布尔什维革命的威胁，因此不得不进行干涉。”

罗马尼亚总理布拉蒂亚努的做法也和他们差不多，他在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不久要求劳埃德·乔治给予10万套英国士兵的装备并且得到了。

3月21日以后，匈牙利的邻国实行了多项紧急军事措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霍尔瓦特—斯洛文尼亚王国严密封锁边界，加强了军事分界线上的部队。几乎与此同时，为策动反对苏维埃匈牙利的军事行动迈出了第一步。

法国将军团，首先是法希东方远征军司令弗朗歇·德斯佩里和驻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使团团团长最先建议组织武装干涉。

“法国人要求罗马尼亚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匈牙利人同乌克兰人取得联系。协约国已经采取措施将匈牙利同欧洲其他地区隔离开来。他们想建立一支强大的国际军队，以便从东海到黑海，在俄罗斯和中欧布尔什维主义之间设置一道巨大的壁垒，因为他们认为占领布达佩斯还不足以保障欧洲的和平。”在弗朗歇·德斯佩里总司令部担任联络官的迪米特鲁上校3月25日向布加勒斯特这样报告说。

科罗法奇在3月29日的作战安排中已表明了要孤立匈牙利和乌克兰的意图，他指示由法国将军埃诺克指挥的捷克斯洛伐克第3师去攻占喀尔巴阡—乌克兰。

虽然开始时意大利人也提出由他们出兵去占领匈牙利，但是法国人竭尽全力加以阻挠。

原则上，英国人也有武装干涉的想法（例如温斯顿·邱吉尔曾竭力促成武装干涉），但是，如果军事干涉将导致他们的竞争对手在欧洲权势的巩固，他们自然是反对的。他们自己没有匈牙利边界附近驻扎大量的军队，因此他们认为其他强国的行动对他们不利，并竭力把自己的立场美化为关注欧洲和平的利益。他们也以这种姿态批评法国同盟者：“民族主义法国首先感兴趣的不是欧洲的和平与繁荣……它最关心的是在欧洲大陆取得权势。”有影响的英国《民族》周报4月初这样强调说。

3月底和4月初，美国驻巴黎的代表们也想通过“和平方式”——使用外交手腕和利用右派和中间派的社会民主党人——消灭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美国还没有公开要求在欧洲取得直接的权势，它更多的是唱唱“人民的自由”、“自决权”和“主张正义”等高调。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是在和平

环境中产生的，它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不能把反对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的战役当作简单的警察行动。

“如果我们参预其他大国的尝试，即用武力迫使受俄国支持的匈牙利接受我们的要求，我们就将卷入一场大规模的、无限期的战争中去。”美国和平代表团成员塔斯克·H·布利斯将军在给威尔逊总统的备忘录中这样写道。他的主张也表达了代表团其他一些成员的意见。美国人（英国人也同样）估计武装进攻苏维埃共和国必将激起工人阶级的愤慨和士兵的不满，更严重的是损坏了美国作为民主和自由的卫士的声誉，而这个声誉是威尔逊等人花费了很大力气才建立起来的。

苏维埃政府一再重申：它并不主张领土完整，没有战争意图，愿意在谈判桌上解决一切问题。库恩·贝拉在对《汉堡和平报》记者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指望同协约国最和平地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一切也使协约国难于公开进行武装干涉。

4月24日，库恩·贝拉代表革命苏维埃政府照会巴黎和会，强调指出，革命苏维埃政府认为卡罗伊等人签订的停战协定仍然有效。苏维埃共和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希望同所有其他民族和平相处，匈牙利和苏俄缔结的同盟是非侵略性质的。照会重申，匈牙利苏维埃政府愿意就一切有关领土的问题进行谈判，为此欢迎协约国派代表团到匈牙利来。

基本上由于上述因素的影响，“四人会议”根据英国总理劳埃德·乔治建议，于3月30日决定派遣以英国将军史末资为首的代表团去匈牙利深入了解情况，和匈牙利苏维埃政府进行谈判。

以史末资为首的代表团4月4日抵达匈牙利首都。史末资将军先向协约国驻布达佩斯使团的领导人了解情况，然后向苏维埃政府代表递交一份照会，提出和会的要求。

照会的语气比3月20日维克斯递交给卡罗伊的照会缓和一些。它规定把匈牙利军队后撤线平均向东移25公里，把罗马尼亚军队推进线向东移七、八十公里。照会答应：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军队的军事分界线上建立中立地带，由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军队驻扎。如果接受了这些要求，协约国答应撤销封锁，并邀请苏维埃政府的代表参加筹备和约的会议。

根据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协约国的要求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是事实上，以史末资将军为首的代表团向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提出的条件不象对卡罗伊等人提出的条件那样苛刻。这证明在协约国眼里，无产阶级专政提高了匈牙利的威望。

革命苏维埃政府于次日，4月5日，向史末资将军递交了回照，坚持要罗马尼亚军队撤回到1918年贝尔格莱德停战协定中规定的线上，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法律在中立地带也应该有效。此外，照会还提到若干（不十分重要的）外交和经济性质的条件。

后来发生的事件表明，革命苏维埃政府在同史末资谈判的过程中不够小心谨慎和策略，过分夸大了协约国让步的意义，低估了帝国主义势力发动武装干涉的可能性。用拖延谈判的办法——即便谈判不成功——也许会推迟武装干涉，为准备自卫赢得更多的时间。

史末资收到匈牙利照会后离布达佩斯去布拉格，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马萨里克进行谈判。马萨里克所作的会谈记录证明，尽管苏维埃政府提出了一些条件，但是史末资是赞成通过“和平”的、谈判的途径解决匈牙利问题的。

“匈牙利的情况是：政府没有权力；有两个党：社会党和共产党。”根据马萨里克的记录，史末资在谈到匈牙利的情况时是这么说的。他对匈牙利政府所作的论断显然是同4月3日他抵布达佩斯前一天发生的倒波加尼示威有关。他从这一事件中得出结



论，认为政府控制不了局势。

史末资对两个党所作的论断无疑是触到了本质。这一看法可能是同协约国驻布达佩斯使团的成员进行谈判后形成的。他们显然向史末资作了详细介绍，说社会民主党的大多数领导人是迫不得已，违背自己的意愿同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担任领导职务。这些情况更使他们想依靠无产阶级专政内部的反对派，不需要武装干涉而在匈牙利出现有利于帝国主义的转折。美国驻布达佩斯的代表布朗教授也有类似的体会。他在3月21日后的几天曾强调有必要进行武装干涉，但是当他进一步了解了情况以及同库菲谈判后改变了自己的主张。他指出，应该利用外交手腕和内部反对派消灭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通过武装干涉。

史末资4月6日在给他的委派人的报告中综述了如下意见：

“如果我们办事高明一些，我不信协约国会失去匈牙利。经过反复权衡利弊，我认为最聪明的作法是：我们不要因为停战协定的某些非本质的条款而迫使双方交战，而是在听取了匈牙利人的意见之后在巴黎或其他地方最后解决政治边界。”

根据史末资的报告，“四人会议”向匈牙利政府发出参加和会谈判的邀请信，但是这封信未能到达布达佩斯，因为罗马尼亚军队在4月16日发起的进攻从根本上改变了局势。

当“四人会议”作出决定派史末资去布达佩斯时，法国总参谋部不得不放弃自己所扮演的武装干涉组织者的角色。如果在协约国代表于布达佩斯谈判期间，某一军队在法国指挥下向苏维埃共和国发动进攻，就会使法国人处境尴尬。因此，他们被迫暂时放弃了作战的计划。

“法国司令部获悉，明天，4月3日，驻埃尔代伊的罗马尼亚军队为了占领新的军事分界线将开始向前推进。但是匈牙利军队的司令罗比特将军请求我们不要动，以免激起匈牙利的民族情绪。处理匈牙利人的事情要尽量不露声色，目的是为了把全部注

意力转向俄国，那里的危险远比匈牙利的大和直接。但是罗比特将军要求赶紧告诉他，向前推进的命令是否已经发出，如果命令已经下达，是否涉及到埃尔代伊，如果情况果真如此，要求我们收回命令。”迪米特鲁4月2日报告说。

虽然武装干涉的计划从议事日程中正式撤销了，但是主张侵略的人并没有死心。由于不便公开反对巴黎和会的决定，法国将军们就开始耍两面派。法国总司令部4月8日正式通知捷克斯洛伐克国防部，弗朗歇·德斯佩里的军队暂时还没有开始任何行动，要求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领导采取同样的态度。同一天，弗朗歇·德斯佩里前往布加勒斯特，建议罗马尼亚政府继续做进攻的准备和开始武装干涉。“在布加勒斯特，人们已经听说弗朗歇·德斯佩里建议我们刻不容缓地占领布达佩斯。”后来布拉蒂亚努在关于1919年事件一书中这样写道。

法国人以及与他们意见一致的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政治家的意图是：迅速进攻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以迫使巴黎和会承认这一既成事实。

国防部长科罗法奇已在4月7日下令准备进攻。命令说：捷克斯洛伐克部队最近这几天就要开始向原匈牙利地区挺进。命令还说：“与捷克斯洛伐克部队推进的同时，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的部队也将开始挺进。”法国总司令部4月8日的通知对布拉格国防部的态度所起的作用只是使它在4月10日提醒军队，对进攻的准备工作要严守秘密。

4月10日罗马尼亚宫廷会议开会决定向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发起进攻。次日，罗马尼亚军队总参谋长普雷桑将军把作战计划告知驻埃尔代伊的罗马尼亚军队总司令马尔达雷斯库，委托他做好准备，执行进攻计划。

无论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军政领导，还是罗马尼亚的军政领导都竭力掩盖侵略的事实，并且把它说成是合法的、正义的行动。

尽管巴黎和会在4月还没有承认任何边界，科罗法奇4月7日的命令给人的印象是，这次发动进攻是向“捷克斯洛伐克所承认的新的临时边界”挺进。普雷桑将军的进攻命令把他们的军事行动说成是自卫措施：“鉴于匈牙利人对我军不断袭击，破坏了停战协定的条款……并想通过宣传布尔什维主义散布无政府主义，驱使我军和干部布尔什维克化，鉴于他们对未占领的地区居民进行白色恐怖，兹命令：

……埃尔代伊部队司令部命令部队越过西部山区占领克勒什河地区和马劳毛罗什。

……战役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出其不意地和尽可能以最大的力量来完成。”

## 发动武装干涉战争

---

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人一点也不知道扼杀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作即将准备就绪。

无疑，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短短的时间里，即使用最大的精力也不可能在苏维埃共和国边界建设巩固的防线。由于革命苏维埃政府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军事侦察工作薄弱以及对协约国的态度抱有幻想，在加强边防上所做的工作与真实形势相比，要少得多。

朗德莱尔于4月14日，即发动武装干涉的前两天，在革命苏维埃政府会议上过分乐观地说：“协约国在军事上和我们所处的情况一样。”

4月中旬，在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战争开始时，驻扎在军事分界线上的红军部队在数量、装备和组织性方面都远远落在敌军后面。

部队的整编工作还没有结束。征兵工作成绩固然不小，但是报名者中间只有一部分得到装备、编进连队。例如：4月中旬第6师的人数是7 986名，其中有3 700人还没有武器。

按照计划，要组织6个步兵师、塞凯伊军团和海军旅。但是其中唯独塞凯伊军团多多少少有些战斗力，其余部队还差得很远。

这支军队还不是无产阶级自己的军队，而是资产阶级民主制

度的产物，在它身上有许多这方面的烙印。

从下列事实中就可以明显看出双方力量的对比：

在北部，红军有 3 个师（28 个营和 14 个炮兵连），而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则有 4 个师、4 个旅（约 85 个营和 24 个炮兵连）。

在东部，红军的 2 个师和 1 个独立旅（34 个营和 16 个炮兵连），对着罗马尼亚的 6 个步兵师、1 个骑兵师和 1 个加强支队（64 个步兵营，28 个骑兵连和 48 个炮兵连）。

在南部，红军总共只有 11 个有战斗力的营和 4 个炮兵连，对着法国和南斯拉夫处于第一线的 3 个步兵师、1 个骑兵师和 1 个骑兵旅。

最精锐的师——塞凯伊军团的指挥部是无产阶级专政不共戴天的敌人，这就从根本上削弱了红军在争端最多的东线上的防御力量。

纳吉瓦劳德工人苏维埃常务委员会主席 4 月 3 日已经报告说，塞凯伊军团有些不正常，士兵们“可能受军官的影响，开始对苏维埃共和国表现出极大的不信任。”军团司令克拉托奇维尔上校派代表到法国将军贡德勒库尔和马纽·久洛那里，告诉他们：“塞凯伊部队不是共产党人，甚至……愿意同罗马尼亚军队一起反对布尔什维克。”

军事人民委员会为了弄清情况，虽然派出一个委员会去塞凯伊军团，但是他们对上述事实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只满足于用国际红色团的士兵撤换了军团的两个营。

东线的红军大部分由卖国的反革命分子把持着，在这种情况下，敌人的进攻必然会带来严重的灾难。

4 月 16 日凌晨，罗马尼亚军队向红军的防线发起进攻。

由于克拉托奇维尔曾经希望罗马尼亚司令部会吸收他参加这一行动，所以进攻在一定程度上出乎他的意料。突然的进攻使他进退两难，后来他在书中这样写道：

“罗马尼亚人进攻了！这时，我面临着新的困难的、责任重大的抉择：塞凯伊师中的埃尔代伊支队既不是布尔什维克部队，也不是红军部队，我想让他们掉转枪口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但是现在已经做不到了，因为罗马尼亚人向我们进攻了。如果象过去那样，在丘乔—马劳毛罗什一线击退罗马尼亚的进攻，那末塞凯伊师和埃尔代伊支队……就保卫了无产阶级专政。糟蹋塞凯伊和埃尔代伊的匈牙利人的每一滴血都是可惜的，因此，我感到自己的责任极为重大，就决定慢慢收缩塞凯伊师和埃尔代伊支队的阵线，我下了命令，要他们避免无谓的流血，不进攻也不反击，在罗马尼亚力量过于强大的地方我们应该让步。

4月16日和以后的几天，根据我本人的决定收缩了阵地，为的是：赢得时间，同罗马尼亚人重新开始谈判，把分散在150公里的广阔战线上的部队集中到较小的地带，把它作为精锐部队供我使用。”

虽然军团的有些部队早晨在顽强地防守，但是上午10时克拉托奇维尔发布了全线撤退的命令。此后，塞凯伊部队对进攻者没有进行认真的抵抗。

东线的另外两支部队：第39旅和第6师也遭到了进攻，在优势兵方面他们也不得不撤退。

军事人民委员会在以后几天内未能阻挡住部队的后撤，有的部队惊惶失措地逃跑。由于东线塞凯伊军团的撤退，使39旅的左翼得不到增援，为了避免敌人的包围，他们自己也不得不撤退。

军事人民委员会计划在后方把来自全国各地的部队编成一支强大的后备军，利用它向罗马尼亚军队进行反击，杀他们的威风，并为更好地组织防御赢得时间。然而，由于克拉托奇维尔的迅速后撤使原来计划集中部队的地区（埃尔米哈伊村和瑙吉卡洛伊附近）在援兵没有来到以前就落到敌人的手里。

塞凯伊军团为了欺骗军事人民委员会，说战斗激烈，损失

重大。他们于4月17日晚报告说：“我们的损失极大，估计近60%”。他们的目的是想以此来解释为什么撤退得那么快。他们的目的也达到了，因为在放下武器以前，他们的面目没有被苏维埃共和国的军政领导所识破。伯姆在4月22日的一次谈话中还说：“苏维埃共和国十分钦佩好样的塞凯伊无产阶级士兵及其真心实意为革命工作的领导。”

由于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面临着严重的威胁，革命苏维埃政府在4月18日会议上决定把能从其他战线抽调出来的全部力量都调到东线，决定向全国无产阶级呼吁，加快征兵，组织工人兵团以加强红军的力量。

4月19日召开布达佩斯工人和士兵苏维埃会议，向工人阶级的代表们介绍情况，以便通过他们动员无产阶级起来捍卫自己的祖国。

库恩·贝拉在会上谈了军事形势，简单介绍了东线形势的严重性，也谈到敌人有可能从北线和南线向无产阶级专政发动攻势。他指出，匈牙利无产阶级首先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他提出下面的口号：“只要不是必需留在布达佩斯，不是必需留在中央行政管理部门，每一个人，每一个无产者，无产阶级的所有代表：上前线去！”

库恩·贝拉特别强调在苏维埃共和国处境严峻的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机构内部团结的重要性。他说：“我们需要钢铁般的团结，需要世界上任何力量都破坏不了的团结。”

“当周围各国的无产阶级来援助我们之前，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匈牙利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唤醒这支革命力量是你们的任务。组织和使用这支革命力量，发挥他们的作用，也是你们的任务。”库恩·贝拉以此结束了他的讲话。

会议决定革命苏维埃政府和工人苏维埃成员的一半以及全体工人的一半上前线去。由革命苏维埃政府负责执行这项决定。

接着，各报和宣传画刊登了匈牙利社会党、革命苏维埃政府以及布达佩斯工人和士兵苏维埃致全国工人的联合呼吁书。呼吁书强调说：

“革命危在旦夕！……

工人们！男女同志们！

革命号召你们，工人、农民和士兵的胜利革命号召你们：武装起来！你们要准备好捍卫、继续发展和完成这个受到进攻的无产阶级革命，使这一革命能够提供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彻底巩固无产者政权所需要的一切！”

4月20日是复活节，星期日。在这一天，大部分人民委员和党书记处的成员都到外地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劳动者参加红军。

萨姆埃里·久尔吉在杰尔市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他说：“危险威胁着匈牙利无产阶级。帝国主义罗马尼亚的封建贵族向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宣战。前线有一部分军队没有尽到无产阶级的职责，我们不能美化这种情况，也不能对此表示缄默。应该把他们清除出去，应该派组织性强的工人去替换他们。我们应该打破反革命，以免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和让我们再受压迫。这种压迫将比以前重千倍。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我们，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取决于我们的胜利。”

为了响应号召，首都和外地最有觉悟的劳动群众成批地要求加入红军。

切佩尔弹药厂的小组长联席会议“一致以极大的热忱宣布，切佩尔厂不生产军火而生产别的产品的车间都停止工作。弹药生产车间也只剩下最必需的人，所有能腾出手来的同志都必须参加红军。由于军火的需要量大，取消原来规定的八小时工作制，以较少的人员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完成一定数量的军火生产任务。”

学生、青年工人和老工人们都热烈地集合在红军的旗帜下。伽



利略小组的青年们集体参加了红军。新佩斯社会主义学生和青年工人组织的青年们也集体参加了红军。

4月23日已经有24个新组织起来的工人营接受了革命苏维埃政府成员们的检阅。切佩尔区、小佩斯区、新佩斯区、老布达区、马加什福尔达区和首都其他各区工厂的工人都参加了游行，检阅自己的力量。《红色报》于1919年4月24日写道：“经受过工人斗争锻炼的、有组织有纪律的同志们走过来了，他们在过去资产阶级散步的场所表示自己保卫劳动世界、真正的人道和世界革命的决心。”工人营的盛大游行使那些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担忧的人们充满了信心。工人营游行所到之处，都受到首都劳动人民的热烈欢迎。

根据革命苏维埃政府的指示，军事人民委员会决定把其他战线可以抽调出来的部队集中在尼赖吉哈佐和德布勒森地区。

军事人民委员会在4月19日的指示里说：“由于罗马尼亚战线出现的事件，军事人民委员会决定把其他战线的全部后备力量和绝大部分炮兵调到外蒂萨、尼赖吉哈佐—德布勒森和其后一带。捷克和南斯拉夫战线只留下保证安全和做侦察工作所必需的力量。”

从罗马尼亚封建贵族军发动进攻以来这些日子的经验表明，军事人民委员会在远离部队的布达城堡里是无法指挥战斗的。他们跟不上形势，情报常常不准确，因此不能发布果断的命令，发出的指示也一般化。

革命苏维埃政府根据库恩·贝拉的建议决定建立军队司令部，直接指挥在外蒂萨作战的部队。

究竟任命谁担任军队司令部领导职务，革命苏维埃政府为此展开了一场争论。共产党人的大部分都希望委派萨姆埃里·蒂波尔担任领导，而前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则建议伯姆担任。争论相当激烈，有些人要挟地说，如果萨姆埃里当选，他就辞职。

库恩·贝拉很清楚，如果在无产阶级专政处于危急时刻革命苏维埃政府的委员之间再闹分裂就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他本人最后也支持任命伯姆担任领导。

伯姆这些日子不在首都，起初他不想担任这支军心涣散、士气沮丧、经常撤退的部队的司令，只是当库菲告诉他，如果他拒绝了，萨姆埃里就将上任，他才同意了。

这样，伯姆·维尔莫什就成为外蒂萨军队的司令，萨姆埃里则被任命为防止反革命活动的后方委员会主席。

伯姆缺乏军事素养，身边要有个熟悉军事的好参谋长指挥作战，他才能担任司令这一职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他在国防部工作，同参谋部一个很有才能的军官——斯特罗姆菲尔德·奥勒尔关系密切，伯姆很钦佩他的卓越才能。因此，斯特罗姆菲尔德·奥勒尔被任命为东部外蒂萨军队的总参谋长。

斯特罗姆菲尔德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不久就不担任职务，到杰尔市过隐居生活。虽然军事人民委员会想安排他做负责的工作，但是他拒绝了。当国家处于危急时刻，他认为把自己的军事知识贡献给军队是爱国主义者应尽的义务。因此，当他被任命为东线部队总参谋长时，立即服从命令。斯特罗姆菲尔德和当时正在杰尔市的萨姆埃里一起前往布达佩斯，军事人民委员会向他简单介绍了情况，他就继续上路去索尔诺克市，在民族饭店着手组织东线军队司令部。

他深入了解了外蒂萨战线的情况和部队的状况后，当即认为暂时放弃外蒂萨势在必行。

敌人于4月20日开进纳吉瓦劳德，4月23日德布勒森也沦陷了。

从全国各地调到东线的增援部队未能一下子全投入战斗，他们面对着处于优势的进攻者，还没能对战斗的结局起实质性的影响就被歼灭了。前线部队的士兵涣散对新来的部队也有影响，而

这支部队在另一种情况下作为比较集中的力量的一部分无疑是会坚守岗位的。

以自我牺牲精神奋力阻击敌人的部队也不少。德布勒森工人的英勇已名扬全国。国际营的战士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树立了光辉的榜样。那些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国际主义者的名字将永远为匈牙利工人阶级所称颂，如奥地利青年共产主义战士们的领导人莱奥·罗特齐格尔也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他在牺牲前不久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封建贵族们的帝国主义部队已经逼近。明天我们就将和他们交火。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即使走向死亡，我也感到幸福和自豪。我把苏维埃匈牙利看成国际无产阶级的祖国，为它流血我感到高兴。”

尽管有这样的自我牺牲的光辉榜样，大多数部队没有对敌人进行条件所允许的抵抗（虽然装备还有些问题）。由于塞凯伊师的迅速逃跑，大部分在东线作战的部队随时都可能被包围，这对事件的结局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4月20日以后的几天里，萨姆埃里去了外蒂萨。4月25日，他在布达佩斯中央工人和士兵苏维埃会议上发表意见时说：“部队被迫后撤的原因不是缺乏装备，而首先是缺乏纪律和领导人。”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萨姆埃里认为首先必须改进部队的领导，尤其是部队的政治领导。他强调说，无论前线还是后方，都必须派遣称职的政治工作人员。只有不惜以强制手段把懂军事的专家安排到司令部工作，军队的领导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他说：“我们将强迫……军队的旧军官为无产阶级的国家服务。检查他们的工作是政治代表的任务。士兵们不守纪律主要是因为前线没有合适的指挥官。”

要整顿部队、加强纪律性、安排新的指挥官和政治代表，部队要有喘息的机会。因此，苏维埃共和国的军政领导人决定把部队撤到蒂萨战线后面，并在蒂萨河东岸保留三个桥头堡（如果以

后反攻，将把它们作为起点）。决定作出以后，东线军队司令部发布命令：保证部队有组织的撤退，使有生力量和装备尽可能安全地撤到蒂萨河以西。

罗马尼亚军队北翼的进逼有可能切断红军向托考伊撤退的通道，斯特罗姆菲尔德于4月25日命令不久前作为后备力量调到尼赖吉哈佐的第1师进行反击，以减慢敌人前进的速度。

第1师于次日开始进攻，战斗持续到傍晚，迫使敌人往大卡洛方向撤退。

人民委员波加尼·约瑟夫对这次战斗的成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在几天之内把第1师锻炼成为有战斗力的部队，本人也亲自参加作战，他的英勇为大家树立了榜样。

这是红军4月16日以来在防御战中取得的第一个较大的胜利。第1师的榜样表明：如果力量强大得多的塞凯伊兵团也能履行自己的职责，就会是另一种局面。

第1师的胜利果实并没有能保持住，因为同一天，克拉托奇维尔上校在敌人面前放下了武器。在这以前，他曾向士兵发出呼吁书，试图解释投降的必要性。他认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形势毫无希望，敌人在各个战线上都向苏维埃共和国发动了攻势，因此继续抵抗已经没有意义。

克拉托奇维尔关于这一事件这样回忆道：“我们把武器装上车，送给罗马尼亚司令部，他们在马泰索尔考接收了武器。5月初，他们取道德布勒森把我们送到布劳肖。”但是，叛徒并没能使塞凯伊军团的所有部队都无耻地投降敌人。军团的其他部队同红军一起继续撤退，并且在以后的战斗中他们都能忠于职守。



## 九

# 无产阶级专政 危在旦夕

---

无产阶级专政的军事危机使工人政权以前潜伏着的、但始终伴随它的严重病症明朗化了：通过联合产生的新党不可能充当革命先锋队的角色。

由于共产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共产党在组织上的弱点 3 月 21 日以前未能对事态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随着两党的联合，这一弱点便成了决定命运的因素。

从 1918 年 11 月到 1919 年 3 月，虽然共产党的口号把匈牙利工人、士兵和农民的大多数争取了过来，但是党在组织上的发展并没有能象它的群众影响增长得那样快。实际上，建立党组织的工作只在 2 月初形成了高潮，但是 2 月 20 日事件使这一过程停顿了。虽然首都和绝大多数外地城市都建立了党的组织，但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可能建设得很好。两党联合时期，匈牙利共产党在组织上与其说是个严密的群众性的政党，不如说是个宣传机器。

随着联合，共产党消失了，融合到党组织遍及全国、党员人数众多的社会民主党中去了。在许多地方，联合实际上就是共产党人到前社会民主党的各组织去登记，然后这些组织就成了匈牙利社会党的组织。社会民主党右翼多次利用这一事实制造假象，

犹如共产党人“回到了”社会民主党里。例如《埃格尔报》于3月27日刊登了一则简讯，向读者介绍联合的情况。消息说：“前共产党的领导机构昨天开会宣布解散，合并到社会民主党中去。”

在没有共产党组织的地方（大多数乡和许多城市）只是社会民主党简单地换个名称，就成了社会党。

3月21日以后，共产党人相互之间已经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他们分散在联合党的近百万群众中。

由于联合，揭露社会民主党右派的宣传工作也停止了，也不再使他们孤立于工人阶级革命群众之外，他们接受共产党的纲领和“融入”无产阶级专政也蒙蔽了群众。联合使他们有可能在党内和国家机构以及工会内隐蔽地从内部挖无产阶级专政的墙脚。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左派领导人由于错误地理解了维护党的团结，与无产阶级内部的这个敌人斗争不力，没有向群众揭露他们的破坏活动，这样就有意无意地帮助他们欺骗劳动群众。

那些因受3月21日以后群众情绪的影响而不敢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右派头目，在军事形势日趋严重的情况下越来越大胆，他们声称原来接管政权和与共产党人联合都是错误的，应该恢复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有些工会活动中心已经成了传播失败主义情绪的温床。没有在联合党和苏维埃政府中任职的右派头目都跑到这里来了。

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左派在报刊上严厉批评工会接纳资产阶级分子，因为这样会冲淡和削弱党的阶级性，使那些非无产阶级分子有可能保住他们的领导地位。《红色报》4月4日刊登了雷瓦伊·约瑟夫的题为《我们要纯洁的无产阶级政策！》的文章，引起强烈的反响。

一个参加辩论的人在4月5日的《红色报》上写道：

“我认为雷瓦伊同志的文章表达了共产党员同志们的普遍情绪，文章写得很及时，正是该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认为把工会和党的组织搞成被撵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避难所是错误的，应受到谴责。如果我们不结束这种局面，就会出现那种情况：三个月以后，列宁战斗的地图就会因画满岔路而面貌全非。”

共产党人要求党和工会组织把这些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去，他们愈来愈坚决地敦促把这两个组织分开。

工会大多数领导人认为共产党人的这种行动是向工会——匈牙利工人阶级的老的战斗组织——发起进攻。

过去，工会在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经济斗争中都曾起过领导作用，苏维埃共和国时期，这一作用已转到工人苏维埃的手里。工会领导人不知道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工会应处于何种地位，他们认为共产党人想削弱他们的力量，只想让他们做些次要的工作。

无产阶级专政的局势日趋严重使那些不甘心共产党人3月21日胜利的人活跃起来。在工会办公大楼和党的俱乐部里（联合党右翼反对派喜欢聚会的场所），他们要求把共产党人从政府中清除出去，要求经过某种过渡之后恢复3月21日以前状态的呼声越来越高。

革命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多乌洽克·安托尔4月26日在苏维埃政府的会议上已经隐蔽地表示了这种看法。他说：“群众当中没有继续战争的情绪。”后来，他认为工人营不愿意上前线。“如果我们不能组建相应的军队，就应该找别的妥协办法。”一个新社会制度的诞生不可避免地会有缺点、错误和过头的地方，而他却小题大作，对这些进行了攻击。

会上，多数人批评一部分工人领袖无所作为的消极情绪。

库恩说：“情况是：在党的俱乐部里，一些人站在布清格尔周围制造失败主义气氛。许多人没有真正地站在无产阶级专政立场上。”



军事人民委员菲埃德莱尔·莱热说：“现在我发现苏维埃政府内有些人开始动摇。应该消除这种动摇和怀疑情绪，一旦让它占了上风，我们就完了……在领导人中，如有人持怀疑态度，就会影响群众……，谁怀疑，谁害怕，谁就滚开，不然是会传染的。”

朗德莱尔·耶诺也非常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观点：

“即使大家都愿意辞职，我也不愿意辞职（我也不愿意！——库恩插话说）。只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我们提出的目标。匈牙利工人群众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真诚拥护者。问题不在于群众，而在于领导人，也在于现在在座的领导人。他们是在为自己办丧事，在这里确可以看到这种情景。应该仔细想一想，现在是革命家在开会，还是老太婆在闲扯。”

中间派在这次会上还没有站到右派投降主义一边。虽然军事上的失败越来越使他们感到失望——他们也提了一些批评意见——但是他们这时仍主张保持政权，继续战斗。

库菲说：“不经过流血的国内战争，要在匈牙利恢复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能的。世界上还没有过比我们这里更明确的阶级斗争……工人阶级的压力使那些本来有原则性意见和其他意见的人站到了专政一边。我们是否回到改良社会主义的立场上，今天还不能作出选择。应该恢复工人和士兵的道德，这里进行的不是战争，而是阶级斗争。有宣传鼓动才能的人的岗位不在这里，而应把他们派出去，我本人也将参加这一工作。除个别人外，我们这里对专政一些基本问题的意见是绝对一致的……一些小的营私舞弊行为不应该使人们情绪低落。不能因为这些小事而忽略了大事并使大家感到灰心丧气。”但是，很遗憾，几星期以后，库菲本人的行动否定了他自己的这些话。

随着苏维埃共和国内外困难的不断增长，中间派的情绪和立场也改变了。与协约国代表进行的谈判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

的态度。协约国答应，一旦消灭无产阶级专政，把共产党人清除出政府，就给予社会民主党政府政治和经济的援助，这使中间派的妥协思想占了上风。

这些日子布朗教授在布达佩斯的活动相当积极。他认为社会民主党政府是一个能够保证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政府，现在是成立这个政府的适当时机。他同社会民主党的多数首脑就此事进行过谈判，他们都表示愿意接受这一想法。在革命苏维埃政府内部，人民委员阿戈什通·彼得是他最可靠的人。阿戈什通和布朗清楚地看到：库恩受到工人们的极大信任，没有他一时还不可能实行任何变革。奥斯本中尉受布朗的委托于4月25日向维也纳的美国驻中欧“首席代表”库利奇报告说：“布达佩斯已经为成立一个有温和社会主义倾向的过渡政府做好了准备。但他们认为，如果库恩·贝拉不参加这个政府，要想不经过较大的流血取代目前的政府是不可能的。”

布朗等人的计划是首先让那些他们认为危险的共产党人：萨姆埃里、瓦戈等靠边站，然后借口和平谈判把库恩·贝拉诱骗到日内瓦，乘他不在时来一个反共的转折。这并不是阿戈什通一个人的想法。在苏维埃政府内和党的领导人中间，不止一个人同他们的意图不谋而合。

库利奇将布朗的报告转到巴黎，并附上了自己的意见。他同意布朗的许多论点，但不太相信那些愿意跟他们一起实现转折的人能够不顾群众的意愿把无产阶级专政消灭掉。他认为最好的办法，——与他以前的意见相反——是立即进行武装干涉：

“武装干涉意味着流血，甚至意味着大屠杀。但是，如果要在世界的这一地区最终阻止布尔什维主义的蔓延，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即粉碎匈牙利，为此必须立即行动起来。”

库利奇这时建议把军事干涉和承诺提供粮食与货物结合起来。这一办法后来被巴黎和会采纳了。

布朗同库恩·贝拉也取得了联系。他希望利用这位深孚众望和最有影响的人民委员实现自己的计划。

库恩认为布朗是个合适的人选，可以通过他和巴黎和会接触，达成一项协议，至少可以为无产阶级专政争取到一个暂时的喘息时机。关于谈判的情况，库恩都及时地报告了革命苏维埃政府。在4月26日的会议上他还谈到，只有让萨姆埃里、波加尼和瓦戈等人回避开，停止抓人质和放弃对国外的革命宣传工作，美国人才愿意同苏维埃政府开始正式谈判。在4月底，由于苏维埃政府没有可靠的军事力量，喘息机会对无产阶级专政来说是性命攸关的。库恩主张可以履行协约国提出的要求。4月26日，他在苏维埃政府会议上说：“这将为我们提供喘息的机会。然而谁也别想让我从社会主义角度作出让步，哪怕是最微小的让步。我们应该为革命，为阶级斗争，也为国际宣传利用这段时间，正如列宁所做的那样。”

库恩自然不可能知道，邀请他去日内瓦是为了促进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

几天以后，协约国驻巴黎的领导人就给库恩·贝拉发来邀请信，让他参加谈判，这说明他们何等地同意布朗关于在匈牙利搞反革命政变的想法。但是，这封邀请信并没有到达布达佩斯，库利奇等人以为无产阶级专政会很快瓦解，因此认为它已经没有现实意义，便在维也纳搁下了。

\* \* \*

匈牙利工人阶级从来没有庆祝过象第一个自由的5月1日那样的盛大节日。

苏维埃政府把节日的组织工作交给萨姆埃里·蒂波尔去做。负责指挥装饰布达佩斯的人是比罗·米哈伊，他创作了《拿锤子的人》。

5月1日，整个首都披上了象征革命的红色盛装。主要的街道

都饰满彩旗、凯旋门、国际和匈牙利革命运动杰出人物的巨幅画像和雕像，以及有寓意的画和雕像。这些雕像和画的作者中有全国最优秀的造型艺术家。

上午，首都近6万劳动者的异常壮观的队伍穿过安德拉希大街向英雄广场行进。游行群众在城市公园参加各种愉快的娱乐活动和体育比赛。苏维埃政府和匈牙利社会党的领导人在公园的各个点举行了群众大会。首都其他各公园的情况也一样。

从格列尔特山上升起的壮丽的节日焰火照亮了整个布达佩斯，节日以此宣告结束。

外地的城市和乡村在国际工人运动的这一伟大节日里也都举行了庆祝活动，气氛之热烈并不亚于首都。

但是光辉的五一节的天空却被威胁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危险的乌云所笼罩。

4月底，无产阶级专政的军事危机进一步加深。27日，捷克斯洛伐克的资产阶级军队也开始进逼。4月30日，捷克斯洛伐克部队已经进驻蒙卡奇、沙托劳尔姚新地，逼近米什科尔茨和埃格尔。

南斯拉夫部队也发起进攻，占领了毛科、瑙吉劳克，并和法国人一起占领了霍德梅泽瓦沙海伊。

东线军队没有能守住蒂萨河左岸的桥头堡，并凌乱地往蒂萨河战线的后面撤退，军队司令部由索尔诺克市迁到格德勒，失去了同部队的联系。有消息说，敌人已经占领了索尔诺克市。

5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部队攻进了米什科尔茨，并且以占领全国最重要的煤炭基地之一——绍尔戈陶尔扬相威胁。

5月5日凌晨，革命苏维埃政府政治委员会召开非常会议。工会的几个领导人也参加了会议。他们在苏维埃政府右翼的支持下要求苏维埃政府辞职。

伯姆向政治委员会报告说，已渡过蒂萨河的罗马尼亚军队在向布达佩斯方向推进。他声称要保住首都是不可能的。他建议派代表去敌军指挥部缔结紧急停战协定。

在座的共产党领导人也同意派代表去，但是他们建议与此同时，革命苏维埃政府要动员工人阶级起来武装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伯姆借口工人不愿意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指控共产党人是“革命的浪漫主义者”。

最后，政治委员会决定征求布达佩斯工人营领导人的意见，根据他们的主张再作决定。

伯姆发布派代表到捷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司令部的命令。由于伯姆在命令中丝毫没有谈到红军部队今后的态度，各师指挥部都以为这就是停战命令。

共产党人不甘心于投降的想法。政治委员会会议后，“共产党人自己决定不顾社会民主党人的意愿，当夜就在所有的工厂号召无产阶级起来保卫专政。”朗德莱尔·耶诺在题为《红军的胜利道路和它的瓦解》一文中这样写道。

# 十

## 工人阶级拿起武器

---

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了革命苏维埃政府在5月2日下午召开的会议，他们深信这次会议将是无产阶级专政领导机构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共产党人和忠于工人阶级政权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虽然知道苏维埃共和国危在旦夕，但是并不认为它注定要失败。他们竭尽全力动员首都工人阶级起来参加战斗。

上午，当库恩·贝拉得知大部分部队由于伯姆的指示已经停止了战斗，就取得桑托·贝拉和朗德莱尔·耶诺的同意命令他们继续作战。

库恩在苏维埃政府会议上作了简短的报告，介绍了军事形势。他向苏维埃政府委员们谈了政治委员会凌晨召开的会上的一些观点：

“红军没有战斗就放弃了索尔诺克。捷克人开进了米什科尔茨。没有军事力量。部队的战斗力等于零。总参谋部设在格德勒。伯姆停止了一切战役。根据谣传的消息，他向三个敌对国家都提了停战的建议。他还把停战的建议寄给威尔逊，并根据保加利亚公使的提议，在夜里寄给坎宁安。他说，苏维埃政府夜里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有人提出要政府辞职，把权力转交给由12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而有的意见则认为应该召集工人团开会，把

情况的严重性告诉他们，并提醒他们注意，如果工人们不坚持到最后一个人，一切斗争都会没有希望，布达佩斯就会沦陷。”革命苏维埃政府5月2日的会议纪录这样写着。

库恩告诉苏维埃政府成员，他已让人在下午3时召集工人团的代表会议，晚上6时则召开革命工人和士兵中央苏维埃会议，由他们来决定战斗是否继续的问题。

这时，库菲·西格蒙德已经主张苏维埃政府辞职和放弃无产阶级专政。

他说：“诚然，无产阶级专政是建立在俄国援助和世界革命之上的，但是它得由匈牙利工人阶级来保卫。需要澄清的是，无产阶级是否愿意和能够为维持这个专政而斗争？军队目前的表现正好相反。真正的无产阶级军队还没有成长起来，这是肯定的。今天的军队主要是由游民无产者组成的。由于革命是在布达佩斯和它的郊区搞起来的，布达佩斯及其郊区人民是否愿意为它而战斗还需要澄清。迹象表明，这时在工人中间没有战斗所需要的力量和能力。”他的意见“是从有组织的武装工人中成立一个机构接管政权，因为协约国同革命苏维埃政府谈判。但是，要指示或建议接管政权的机构特别是在下列问题上作出决定：宣布自己支持无产阶级专政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释放人质；取消书报检查制度；发表关于临时纲领的声明和请奥地利政府在匈牙利与协约国之间进行斡旋。”

维尔特奈尔也本着同样的精神发了言。他说：“由于没有武装力量，必然会被武装占领。”这证明他认为失败已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接着发言的是萨姆埃里。他拒绝了这种投降主义的想法。他认为即便首府迁往多瑙河西部，苏维埃政府也必须保持政权。

桑托·贝拉阐明自己的观点，他说：“我认为交出政权是怯懦的表现，是抛弃工人阶级。只要工人阶级不把苏维埃政府撵

走，每个人都应该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朗德莱尔·耶诺坚决主张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真不愧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战士。正象他所说的：

“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这一真诚的信念使我站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一边。我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是匈牙利工人阶级，而且也是全世界无产者的利益所在，正因为这样，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革命苏维埃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守岗位。对事业危害最大的莫过于苏维埃政府把工人交给白色恐怖。”

最后，革命的观点在争论中占了上风，苏维埃政府坚守岗位准备保卫首都，并在下午向工人营的代表、工人苏维埃成员和钢铁工人的代表了解工人阶级的态度。

下午的会谈证实，右派头目说首都劳动人民缺乏战斗意志完全是假的。缺乏信念的人们过早地为无产阶级专政奏起哀乐。

人民委员豪布里赫·约瑟夫向工厂的工人营代表介绍了情况，他的讲话远远不能鼓起听众的热情。一部分原因是：工人营的领导人在继续斗争问题上意见不一致。

朗德莱尔·耶诺在钢铁工人代表机构的大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与会者听后一致主张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然后召开了布达佩斯工人和士兵中央苏维埃会议，库恩·贝拉在这里发表了讲话。他毫不掩饰地谈了局势的严重性，向工人苏维埃的成员们介绍了革命苏维埃政府内部在保卫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的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我可以说几乎是多数人的观点（是在今天的一次会上，从同工人营谈判中得知的），主张我们不要保卫布达佩斯，我们不要出去。因为他们认为局势已经没有希望，不愿意作无谓的牺牲。

另一种观点是少数人的观点。同志们，这是建立在统一原则



基础上的统一工人运动的少数人的观点。我可以这样说，这是在军事上微不足道的少数人的观点：我们要保卫布达佩斯，要在布达佩斯前方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即使要退到包科尼山脉甚至退到维也纳新城也要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库恩坚决表示，应该不惜任何代价保住布达佩斯。他说：“只要有可能，就应该用全力保住无产阶级专政，只要还有可能再放一枪，就要战斗下去。”

库恩讲话后，工人苏维埃的大多数成员都投票赞成保卫苏维埃共和国。他们愤慨地打断了那些缺乏信念和胆小的人的发言。很能说明当时气氛的是，在场的工会领导人（他们大多数主张投降）根本就没有敢起来发言。

许多人的发言都很有气魄和带有战斗性。接着，工人苏维埃一致热烈地通过决议：应该立即颁布总动员令，动员工人阶级挺身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当天夜里，革命苏维埃政府又召开会议。次日（5月3日）各报都刊登了苏维埃政府的决定：

“为了拯救无产阶级革命，我们颁布无产阶级总动员令。每一个受过军训的无产者都必须立即上前线。每一个未受过军训的工人必须去训练营接受训练，或者去修筑防御工事。

从今天开始宣布布达佩斯为作战区。

我们号召无产阶级尽到自己的职责，直到最后！”

次日清晨，人民委员们根据苏维埃政府的决议，走访了首都各个工厂和企业，召开紧急会议，动员工人参加红军。

第二天，《红色报》是这样报导工人的情绪的：“清晨，到工厂上班的工人们的情绪超出了一切意料和想象。他们以无比的热忱表示，愿意立即上前线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泰乌德洛夫和迪特里奇厂的工人们不愿意再听取来厂作报告的人的讲话，“他们说，他们要的不再是讲话，而是行动，于

是，他们开进了兵营。”

佩斯铁路机车北库半数以上工人，共1 800人编成连队于3日早晨直接从工厂开赴兵营。国家铁路机械厂、伊斯特万泰尔克机车库、农业机械厂、利泊塔克厂和首都许多其他工厂的工人们也都这样做了。

虽然革命苏维埃政府只号召18至45岁的工人拿起武器，但许多企业自行决定把应征年龄延长到50岁。许多老工人因为超过了年龄而不能入伍，他们都愤慨地提出抗议。这说明了气氛之热烈。

佩斯铁路机车北库有位老工人对《人民之声报》记者说：“请给我穿上军装，派我上前线，因为只有受觉悟的召唤而上战场的人才知道现在应该拯救什么。这样的老战士干起来能顶上十个年青人。我曾经当过骑兵，我申请参加炮兵。他们突然发现我已上了年纪，让我回家。我觉得好象挨了一记耳光一样。我坚持要他们送我去炮兵部队，请接收自愿报名者，尽管他们超过了50岁。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而战，不象1914年那样。”

外地的工人们也都响应革命苏维埃政府的号召准备参加战斗。杰尔车辆厂、火炮厂、榨油厂以及松博特海伊、佐洛埃格塞格、塞克什白堡、考波什堡等城市的劳动者们都热烈地学习布达佩斯工人榜样的。从工厂生产的利益考虑，杰尔榨油厂部分工人的参军义务被免除，然而他们坚持要入伍。

布达佩斯工人阶级保卫祖国的一致革命行动，深深地打动了那些由于自己阶级地位和思想认识的不同，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自己的事业、但出于爱国主义的情感却愿意为保卫祖国而战的人。

桑托·贝拉在回忆录里写道，5月的头几天，红军的炮兵负责人什雷伊奈尔·卡罗伊（他原是奥匈帝国皇家军队的一个上校）说道：

“从我所受的教育和我过去的经历看，我不是一个革命者。

以前的革命进程也没有使我受到鼓舞。没有军队的政权和没有军队的国家是要灭亡的。卡罗伊政府出于和平主义考虑不仅驱散了旧军队，也排除了建立新军队的可能性。5月2日以前，苏维埃政府执行的也是这种……军事政策。但是，我现在看到了真正的转折，我看到共产党人在苏维埃政府内占了上风。我看到共产党人能够动员群众保卫祖国，能够创建军队。我对共产党人表示折服。我不是共产党人，但我是军人！我愿意将我的专业知识和一切其他学识贡献出来。我将认真地工作并执行人民委员先生的命令。”这位上校说到做到：他使红军在短短的时间里拥有一支出色的炮兵部队，它在质量上大大超过了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等敌人的炮兵。

什雷伊奈尔上校的例子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旧军队的许多军官持与他相同的想法。当然，也有不少人在想，等外来进攻的威胁过去以后就不再为红军服务，并想抓住有利的时机，利用他们在军队中的地位，把枪口转向无产阶级专政。

对于无产阶级参加战斗并不是每个人都感到高兴和乐观。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大多数首脑都不同意这一转折，他们的破坏活动给无产阶级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陶陶巴尼奥市党委书记在5月初，亲眼看到有人在矿工协会内进行破坏活动，他在信中写道：

“5月5日至7日我在佩斯。我去了协会……谈话间进来三个矿工同志，他们从离军事分界线不远的—一个南方煤矿来（很遗憾，我忘记了煤矿的地点）。他们说，他们从军事人民委员会那儿来，他们接到武装起来的命令，他们来这儿征求意见。〔佩耶尔〕对他们说，让自己去送死，简直是发疯，只是为了让罗马尼亚人晚进来两天而去打仗是毫无意义的。佩耶尔同工人阶级最仇恨的敌人接触，眉来眼去，发命令，出主意。我在钢铁工人协会内——很遗憾——我看到佩耶尔的朋友们表现得非常悲观。我本

来是在那个组织中成长起来的，但是现在我在那里很不自在，便赶紧离开了。”

写信人还向伯姆·维尔莫什报告了工会里有人进行破坏活动的情况。他不知道，伯姆的想法也同佩耶尔等人的一样。5月3日，伯姆向布朗供认，他不同意布达佩斯发生的事情。

布朗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在我们谈话时，伯姆表示他无论如何不支持这种孤注一掷的政策，同情我的观点。”

伯姆忠于自己的立场，5月5日推托有病请求辞去军队总司令和军事人民委员的职务，但是革命苏维埃政府没有批准他的申请。

匈牙利工人阶级的决定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和军事领导成功地解决两个最迫切的任务创造了条件：巩固前线 and 重新组织军队。

苏维埃政权大力着手实现这些任务，并且很有成效，这在历次革命的历史上是罕见的。

5月头几天，对无产阶级专政威胁最大的地方是索尔诺克和绍尔戈陶尔扬。

关于罗马尼亚军队占领了索尔诺克并继续向奥博尼方向进逼的消息并没有得到证实。然而，小股敌人确曾侵入索尔诺克，但是他们很快就退回到蒂萨河左岸去了。盎格鲁撒克逊列强的代表在巴黎严厉抨击罗马尼亚政府擅自行动。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尼亚总参谋部认为继续进攻是不适宜的，因为他们计划中的最高目标就是暂时推进到蒂萨河一线。

索尔诺克市被白卫军控制了，他们把反革命分子武装起来，并开始把有左倾思想的劳动者集中起来。

被提名为城市指挥官的一个旧宪兵大尉在告示中宣称：“我们夺取政权使协约国军感到非常满意。谁的和目前出现的情

况不一致，就用武力消灭之。”

索尔诺克反革命分子的好景不常。5月3日，集中在采格莱德红军部队在萨姆埃里率领下开进城市，经过激烈的巷战，驱散了白卫军。索尔诺克的工人听说红军快来了，就拿出埋藏的武器，为消灭反革命分子提供了很大的援助。

绍尔戈陶尔扬地区的局势要严重得多。罗马尼亚军队到达蒂萨河一线以后就停止了前进，而捷克斯洛伐克的资产阶级军队在5月的头几天还继续进攻，并逼近绍尔戈陶尔扬。

这一带近70公里的战线由红军第80旅负责保卫。这支部队本来就不能胜任这一任务，加上4月下半月把最精锐的营抽到东线去，更削弱了它的力量。第80旅指挥部感到保卫绍尔戈陶尔扬力不从心，于是想放弃城市。伯姆也有同样的看法，他在4月5日致库恩·贝拉的信中借口保卫该市的战斗将进一步消耗红军的力量，因此他建议撤兵。库恩·贝拉和桑托·贝拉不同意伯姆的意见。库恩在复信中说：“如果有可能，应把保卫绍尔戈陶尔扬和执行总攻计划结合起来，我非常希望这样做。这样做首先在道义上和政治上有重大意义。”

捷克斯洛伐克部队的向前推进有可能导致在红军增援部队到达之前他们就占领绍尔戈陶尔扬。革命苏维埃政府派遣了两名共产党人民委员——海维希·久洛和拉科西·马加什去绍尔戈陶尔扬以加强第80旅和动员当地工人保卫城市。

绍尔戈陶尔扬和附近厂矿的无产阶级尽到了自己的职责。他们在最紧急的关头占领了城市北部的一些高地，并在援兵到来之前守住了这些阵地。武装起来的工人队伍的反抗给敌人造成了许多麻烦。

捷克斯洛伐克第7团的一个营于5月8日报告说：“劳普伊特市的工人们已经武装起来并拥有硝化甘油炸药……，绍尔戈陶尔扬的工人也武装起来了，他们在城市前面修筑工事。劳普伊特和

绍尔戈陶尔扬的工人都表示要战斗到流出最后一滴血。到处都成立了小分队，其任务是在我们部队的后方破坏铁路线和切断电话线。”

集中在豪特万的第6师接到击退威胁绍尔戈陶尔扬的敌军的任务。不久前第6师没有进行大的抵抗就撤出东线，现在又新生了，在几天内就重创了敌军。第6师指挥部于5月8日开始将部队调到绍尔戈陶尔扬前线，5月9日，捷克斯洛伐克第2旅已经开始撤退，越来越乱地往菲莱克—洛松茨方向逃跑。捷克斯洛伐克第2旅旅长5月12日给西斯洛伐克军总司令皮乔内将军发的电报说明了第6师的反攻对他们的影响。电文说：“我相信调到我这儿来的部队目前的身体情况和精神状态今后不一定对付得了匈牙利军队的有力进攻。因此，我请求撤换参加这次行动的部队，让他们作为后备力量。”

如果第6师继续追击腐败的敌人，如果军队司令部乘胜增派援兵，无疑会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军队司令部甚至命令第6师撤退到凯奇凯梅特去。

这个决定是军队司令部在5月11日的会议上作出的。理由是根据侦察情报，预计在5月下半月法国—南斯拉夫军队会在多瑙—蒂萨河间地发动大规模的攻势。

军队司令部的决定强调：“协约国可能发动全面进攻，那时必须根据下列指导原则指挥战役：

在国家军事分界线上只留最必需的力量，其任务是观察和尽量阻止敌人的推进。

要把所有腾出来的力量用于攻击多瑙—蒂萨河间地的敌人。”

重新组织红军是与排除威胁索尔诺克和绍尔戈陶尔扬的危险同时进行的。

“部队衣衫褴褛，士气低落，有反战情绪。接受一个防御阵地时，估计部队只有五分之一的人留在那里，其余的都散了。”

“这个师的士兵（他们大部分是米什科尔茨和埃格尔附近的人）完全跑光了，回家了。炮兵把炮也扔了……师的整个战线完全崩溃了。连最起码的抵抗也谈不上。”

“第60旅的部队完全瓦解了，他们只有几支枪。”

这些就是5月头几天各指挥部在报告中所描绘的关于红军部队状况的图画。这些士气涣散的部队必须重新整编，使它具有战斗力。匈牙利工人阶级最优秀的战士团结在红军旗帜之下，使这个看上去难以解决的问题有可能得到解决。5月中旬，红军已经拥有3个军、8个新编师，营的数目增加到了113个。

东线军队指挥部接管了所有战斗部队的指挥权并改组为军队总司令部。

为了指挥灵活起见，把各师都编入军，由人民委员担任领导。第1军的指挥是瓦戈，第2军的指挥是波加尼，第3军的指挥是朗德莱尔。

把布达佩斯保安部队、工厂的工人团和布达佩斯红色卫队都划归重新组建的布达佩斯军事司令部指挥，任命豪布里赫·约瑟夫为指挥。军事司令部的任务是消灭布达佩斯和外地的反革命活动。布达佩斯军事司令部后来改名为第4军。

军队总司令部参谋长斯特罗姆菲尔德·奥勒尔的杰出的组织才能和充沛的精力在改编军队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预计来自南边的协约国进攻毫无迹象，而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威胁越来越大。这里的敌人在挡住第6师的进逼后重整旗鼓，对埃格尔和绍尔戈陶尔扬北部的红军部队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红军司令部很清楚，仅仅以消极的防御不能排除威胁北部的危险，因而决定掌握主动权。5月15日作出决定：第3军发动攻

势收复米什科尔茨。

由第3军所辖的经过整编的补进工人部队的第1师，承担解放米什科尔茨的任务。这对工人团的实力是个巨大的考验，它使无产阶级战士充满了责任感。斗争的成败在道义上和政治上无论如何都会对全国人民和红军所有的战斗部队产生很大的影响。

5月20日晨，第1师对占领米什科尔茨的敌军发起进攻。进攻成功了。晚上，捷克斯洛伐克部队被迫放弃城市。米什科尔茨和迪欧什杰尔工人的武装小分队向撤退的敌人发起进攻，他们抓到了许多俘虏和一支部队的列车。为了阻止敌人从铁路撤退，许多地方都炸毁了铁轨。由于工人们的突然袭击，使敌军许多部队惊惶失措，因此撤退变成了丧魂落魄的溃逃。

被派去观察米什科尔茨事态的军官考帕尔少校向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总观察员报告说：“我们最后撤退的部队遭到了地方居民的袭击，因为城里有许多武器，原因是津科内将军收缴居民武器的工作做得晚了……如果匈牙利人组织得更好一些，还能占领考绍、罗日纽。这样，考绍—若尔瑙铁路线就危险了，撤退的情况就是这样。”

敌人不甘心丢失米什科尔茨。5月23日，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部队从多方面向城市发起联合进攻。虽然由于敌人的优势兵力使第1师处境危急（第3军参谋长久里埃尔·费伦茨已经向军队总司令部建议放弃城市），但是，受到米什科尔茨和迪欧什杰尔无产者紧急支援的工人团守住了阵地，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米什科尔茨的保卫者得到了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工人的不可估量的援助，他们在战斗时期在捷克斯洛伐克反革命部队的后方举行武装起义，在欧兹德、罗日纽和鲁多巴尼奥袭击城防部队，在派尔库保炸毁了经过博德沃的桥梁，以阻止敌人往米什科尔茨方向输送部队。皮乔内将军被迫把大部分后备部队用于镇压工人武装起义。



皮乔内在寄给国防部长的报告中说：“同情匈牙利人的居民……都支持匈牙利人，他们手中拿着武器，不止一次地参加反对我们的战斗……他们切断电话线使我们战役的进程成了问题。”

第1师在米什科尔茨取得的胜利也鼓舞了北线红军的另外两个师——第5师和第3师的战士们。他们在以后的几天里都迫使敌军后退，排除了威胁绍尔戈陶尔扬和埃格尔的危险。

在所取得的成就中，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士兵也有不小的功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认识到战争的目的和本国人民的利益是不一致的，他们感到不是在为自己战斗。

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师的指挥部寄给皮乔内的报告中说：“占领米什科尔茨的志愿军的冷漠态度蔓延到整个部队……完全缺乏士气，缺乏进攻精神。”另一份报告说，进攻绍尔戈陶尔扬的士兵“不愿意向前推进，当敌人进攻时，他们干脆逃跑了。军官们也影响不了士兵……他们还发现有些士兵身上有布尔什维克的红带子。”

从5月2日以来，尽管在改编军队和巩固前线方面取得一些成绩，但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局势仍很严重。大部分边界上都驻扎着几倍于我军的敌军，离首都只有一两天路程。

革命苏维埃政府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国际工人阶级的积极援助，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无法持久地进行下去。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期待俄国苏维埃政权给予最直接的援助，也得到了这种援助。

处于武装干涉者和内部反革命分子重重包围中的苏维埃俄国领导人，为了向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提供军事援助竭尽了一切努力。

列宁在4月把军事上援助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作为一项最主要的任务交给了乌克兰红军指挥部。

列宁在一项指示里说：“向加里西亚和布科维纳部分地区推进是同苏维埃匈牙利建立联系的需要。此项任务必须更快更稳妥地加以解决，而在此项任务之外，占领加里西亚和布科维纳任何地方都毫无必要，因为乌克兰军队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能离开其两个主要任务：第一个最重要和最紧急的任务——增援顿巴斯。这种增援必须是迅速的而且是大规模的。第二个任务——要建立同苏维埃匈牙利的巩固的铁路联系。”<sup>①</sup>

乌克兰红军的援助很快被察觉出来。罗马尼亚军队总司令部不得不于5月将大部分力量从外蒂萨转移到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一线。

5月11日，在格德勒召开的会议上斯特罗姆菲尔德请求库恩·贝拉向苏维埃俄国的领导人提出，请苏联的乌克兰军队以果断的行动牵制住罗马尼亚军队。

斯特罗姆菲尔德在给库恩·贝拉准备的战况总结报告里这样写道：“看来，我们正面临着协约国的全面进攻。俄国军队从科洛梅亚经斯特雷往乔普方向推进关系到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生死存亡，这样做至少可以在罗马尼亚战线上消除对匈牙利军队的威胁。”

库恩将这一请求转告莫斯科。几天后，列宁在致库恩·贝拉的电报中说，乌克兰红军已对驻在比萨拉比亚的罗马尼亚军队采取行动。电文说：

“向日益壮大的匈牙利工农红军致敬。协约国的兽性的和约将促进各地对苏维埃政权的同情。昨天乌克兰军队战胜了罗马尼亚人，越过了德涅斯特河。向您和全体匈牙利同志致最崇高的敬礼。

列宁”<sup>②</sup>

---

① 《列宁文稿》第7卷，第377页。

② 《列宁全集》第36卷，第532页。

乌克兰红军的进攻使人抱有很大希望，但是它的规模并没有象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人所希望的那样。原因之一是乌克兰红军最重要的一个师的哥萨克族师长格里戈利耶夫在5月上半月叛变了，并从背后袭击了苏维埃政权。由于格里戈利耶夫的叛变，使乌克兰红军向西和西南方向的推进受到影响。虽然伏罗希洛夫和帕尔霍缅科在短时间内打败了叛匪，但是这一行动牵制了不小的力量。

邓尼金的进攻对苏维埃政权的威胁远比格里戈利耶夫的叛变要大。邓尼金带着40多万人的军队在顿巴斯大力向前推进。他的进攻使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不得不从西线将可以抽出来的力量调到顿巴斯。

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红军只能在加里西亚、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留下足以牵制罗马尼亚军队但不能举行较大规模进攻的力量。

5月下半月，革命苏维埃政府派萨姆埃里乘飞机去莫斯科，亲自向列宁介绍匈牙利的局势，并就能否向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提供军事援助问题进行谈判。一路上，萨姆埃里历尽艰险，但终于安全归来。他向革命苏维埃政府报告说，由于邓尼金的袭击，苏俄局势严重，在短期内难以指望乌克兰红军向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方向推进。库恩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萨姆埃里报告的“实质是我们不可能指望很快通过东加里西亚同俄国的红军联合起来，乌克兰苏维埃政府通过反对比萨拉比亚的军事示威可能把罗马尼亚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他们的东部边界，但是苏维埃俄国的军事形势比我国还要严重。”

萨姆埃里从莫斯科带回了列宁给匈牙利工人的贺信。

这封贺信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伟大总结，是给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提供的理论援助的杰出文献。

列宁强调说：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在于“使盲人也重

见光明”<sup>①</sup>，他证明，除了无产阶级专政外，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得到以无产阶级为首的劳动群众拥护的其他政权。

列宁提醒匈牙利工人阶级注意，要创建社会主义、消灭阶级，必须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阶级斗争。在斗争中工人阶级必须团结农民和一切小资产者阶层，同资产阶级的反抗、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僵化和动摇进行顽强的斗争，“希望你们坚定不移。如果在昨天加入你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者中间或在小资产阶级中间有人表现动摇，你们就要无情地镇压。枪毙，这是胆怯者在战争中应享的命运。

你们进行着唯一合理的、正义的和真正革命的战争，这是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战争，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战争，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战争。全世界工人阶级中的一切忠实的人都是站在你们一边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月比一月地接近了。

希望你们坚定不移！胜利是属于你们的！”<sup>②</sup>国际工人阶级的伟大领袖结束了他的贺信。

当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匈牙利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不论是共产党人，还是社会民主党人），都曾深信，欧洲其他国家，首先是奥地利的工人阶级，在短时间内也会学习匈牙利工人阶级的榜样。但是统治阶级在社会民主党右派政客的帮助下，逐渐巩固了统治。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战争结束后，在国家生活和军队中都取得了领导地位，如果那里也宣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对欧洲的革命运动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有巨大的意义。奥地利工人阶级的最优秀战士对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表示声援，并且为使社会主义革命在奥地利也取得胜利进行了忘我的斗争。但

---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857页。

② 同上书，第859—860页。

是，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越来越公开地反对苏维埃共和国。起初，他们对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是忠诚的，后来借口说，如果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协约国就会停止提供食品，奥地利将出现饥荒，因此他们抛弃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念头。开始时，奥地利和匈牙利两国关系良好，可是后来逐渐恶化。虽然年轻的奥地利共产党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是事实很明显，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不能指望从奥地利方面获得真正的援助。

对欧洲的命运来说，德国发生的事情比奥地利事件具有更大的意义。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诞生后不久，从表面看，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也会很快获胜。4月13日，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了。苏维埃俄国和匈牙利的劳动人民极其热烈地祝贺欧洲革命的又一个胜利。但是巴伐利亚工人阶级的政权抵抗不了德国中央政府的反革命进攻，5月1日，慕尼黑工人阶级的统治就被推翻了。

国际局势的演变没有证实匈牙利工人阶级领导人的希望。欧洲资产阶级的阵地逐渐得到了巩固。

## 北线战役的胜利

---

4月底5月初，在以什么方式推翻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问题上，盎格鲁撒克逊列强首领们的立场转变了。布达佩斯的事件使他们信服，不能指望从内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5月7日，布朗教授也急于要求全力进行武装干涉。他说：

“由捷克人、罗马尼亚人或最好由法国或英国军队进行一次强有力的武装干涉，可以不费力地取得很好的效果。”

5月19日，在巴黎又把对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进行武装干涉问题提上日程。威尔逊和劳合·乔治建议由法国人进行武装干涉。但是法国人并不十分情愿，因为很清楚，在匈牙利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以后管辖权就会落到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首的协约国委员会手中。法国人民群众的和平愿望对法国政治家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德国人不愿意签订和约也使他们伤透脑筋。克雷蒙梭等人不清楚，是否还需要对德国使用武器。

外交人民委员会比较准确地得知，协约国暂时还不会发动全面进攻。

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人很清楚，进攻虽然推迟了，但它是不可避免的，迟早要到来。

很明显，如果帝国主义同时从各方面协调一致地发动进攻，要保住苏维埃共和国是不可能的。只有逐个地同敌人展开斗争，

红军才有打赢的希望。

5月底，朗德莱尔·耶诺在寄给红军司令部的备忘录里对军事形势作了分析。

他写道：“毫无疑问，目前我们的军事形势是严重的，然而，如果我们所有处于优势的敌人（法国人、捷克人、罗马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同时向我们发动进攻，局势将会变得十分危急。在这样的情况下，除投降外，没有别的选择。”

接着，他认为，罗马尼亚和捷克军队的战斗力不如红军的工人团，但红军抵挡不住战斗力强的法国部队的进攻，何况他们的进攻必将导致他们同盟者的向前推进。

他假设，如果不发生挑衅事件，法国人不会发动进攻，因此，他建议：红军部队把大部分兵力投放到北部，向若尔瑙或考绍方向发起总攻，击退捷克斯洛伐克的资产阶级军队。朗德莱尔认为向考绍方向进攻比较适宜。他说：“向考绍方向进攻的好处在于：可以及早恢复我们同俄国红军的联系，一旦发动攻势，也能比较容易地在乔普附近重新部署部队解放外蒂萨。”

虽然还有其他设想，革命苏维埃政府还是接受了他的建议。5月27日，军队司令部已经拟定了发动北部攻势的基本目标：

“由于政治和经济原因，军队司令部决定：突破捷克—罗马尼亚军队的侧翼，首先打败捷克人，然后强渡蒂萨河，向罗马尼亚军队发起反攻。”

司令部指定朗德莱尔领导的第3军执行这一任务。与在主攻方向上发起进攻的同时，驻扎在第3军西部战线上的第5师和第3师以及驻在北线最西部的第1旅也开始向前推进。

这时，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军队在斯洛伐克和喀尔巴阡—乌克兰拥有90个营和32个炮兵连队。

红军司令部为了发动北部攻势，在从伊波伊河口到绍约河口的战线上部署了73个营和46个炮兵连队，但是大部分力量集中在

四分之一的战线上——考绍方向。

5月30日，红军在整个北部战线上发动了进攻。

敌人在战线的右翼顽固抵抗第3军的进攻，然而在左翼，第3师第一天就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占领了洛松茨。在夺取洛松茨的战斗中，第一国际红色团表现得尤为突出。第80旅指挥部报告说：“布达佩斯第一国际红色团、第2、第3、第5营在同顽固守卫洛松茨的敌人作战中展开了竞赛。尤其值得赞扬的是，对劳坡桥发起冲锋的第2连和第1营（俄国营）在敌人的炮火下对维尔凯和保尼道罗茨发动了大胆的进攻。”

解放区的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劳动人民热烈地欢迎红军战士。

第3师的一位战士是这样回忆洛松茨战役的：“我们在北部高地向前推进时到处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当先头部队到达洛松茨时，当地的无产阶级、所有劳动者都向进驻的红军热烈欢呼，一路上给我们撒花。我在这里所见到的欢乐和热情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它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第5师在战斗中也表现得非常顽强。该师所属的第39旅于5月31日开进了里马松博特。

“部队的士气大大提高，气氛极好，纪律性强，士兵体力尚佳，虽然有些部队经受不住较长期的战斗和行军（特别是来自多瑙河以西的部队），他们感到疲劳……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工矿地区的群众尤为热烈，农民对解放也很高兴。”

红军强大的攻势使敌人感到震惊。一些捷克斯洛伐克部队的纪律立即涣散，战斗力下降。红军发动攻势后不久皮乔内接到这样的报告：“第3旅旅长报告说，他的队伍士气完全涣散，由于缺乏装备和其他物资，他们已经丧失了战斗力。”

红军战士士气高昂，接连打了许多胜仗，他们先后占领了许多城市和乡村：蒂萨卢茨、森德勒、托尔瑙奥姚、帕尔卡尼瑙瑙、莱沃、沙罗什保陶克、沙托劳尔姚新地、谢尔迈茨巴尼奥和



科尔波瑞。

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领导处境越来越困难，他们指望罗马尼亚军队参战以阻挡红军迅速向前推进。埃诺克将军打电报向罗马尼亚总参谋部求援，但是遭到拒绝。回电说：“我们的部队于3日凌晨已经完全撤到蒂萨河左岸，我们炸毁了托考伊的（铁路和公路）桥。我们的任务是顽强地进行抵抗，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敌人渡过蒂萨河。”

头几天，第3军的部队在主攻方向上的攻势进展很慢。埃诺克将军把最精锐的部队都集中到考绍以南。

6月6日拂晓，保卫考绍的指挥官夏波尔为了挽救城市作了最后一次尝试：他用两个营和一个炮连的兵力向在璫吉伊达村宿夜的红军部队发动突然袭击。

突然袭击成功了：当敌人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村上，第46旅的战士才察觉到。红军的报纸——《无产阶级红军报》的记者这样报道后来发生的情况：

“刹那间，每个红军战士都跑到屋外。他们就象刚躺下睡觉时那样，没有穿上衣和皮鞋。他们很有纪律地自动摆好进攻的阵势，以空前的气势扑向优势的捷克部队，经过短时间的巷战，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的捷克部队丢弃了村庄，慌乱地、绝望地向北逃窜。

而红军战士则乘胜追击。”

早晨6时，执行反攻任务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司令向上级报告说，他的弹药和后备力量已消耗殆尽，而红军在不断壮大并继续进攻。夏波尔将军自甘失败，他命令部队撤退。经过数天激战后，6月6日，第6师的战士开进了考绍。

红军在北线取得的胜利使全国人民感到欢欣鼓舞。

6月7日，星期六，是个喜庆的日子。清晨，首都劳动人民在卫戍部队军乐队的乐声中醒来。《人民之声报》写道：“工人们

# 图例

红军队推进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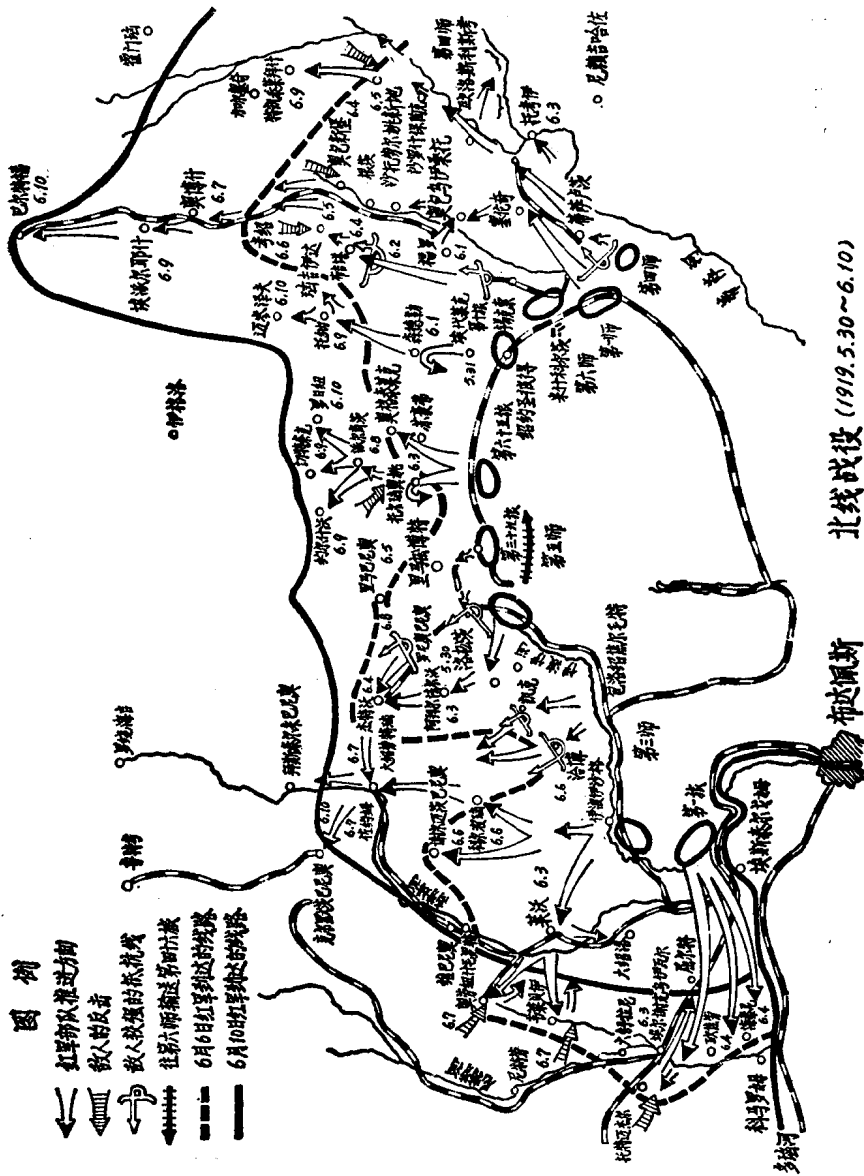
敌人的反击

敌人较强的抵抗

往第六师输送第四师旅

6月6日红军到达的村庄

6月10日红军到达的线路



## 北线战役 (1919.5.30~6.10)

### 布达佩斯

都感到这一伟大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们红光满面地走进了工厂、车间……。”下午，在国家大厦前的广场上举行盛大的群众集会，库恩·贝拉、波加尼·约瑟夫、桑托·贝拉、波卡尼·德热、高尔保伊·山道尔、拉科西·马加什和鲁道什·拉斯洛向与会的劳动人民讲了话。

库恩·贝拉说：“从5月2日以来，那些缺乏信心的人以为匈牙利工人阶级没有力量维持自己的统治。时间仅仅过去了一个月，今天我们看到工人阶级不仅巩固了苏维埃共和国，而且扩大了它的疆土……红军是国际革命的种子，它将萌发成为世界无产阶级更加美好、更加幸福的国家。”

7日晚，在城市剧院举行庆祝大会。库恩·贝拉的讲话并不单纯是节日演说，而且是对全国政局的深刻分析，确定无产阶级最主要的任务。讲话的中心是反对缺乏信心、动摇和妥协。他指出：

“任何动摇都只能损害无产阶级专政的声威，导致无谓的流血牺牲。”他谈到反革命活动越来越严重，并强调说，只有始终一贯地、坚决地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才能避免反革命活动的猖獗和随之而来的必然的流血。他还谈到，战胜反革命和饥荒都有必要加强城乡无产阶级的兄弟联盟。他特别强调说：“只有保持和加强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我们才能达到想要达到的目的。”讲话在最后又提到反对动摇和妥协的斗争：

“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终将到来。为了能盼到这一天，为了使已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能团结一致地、有把握地盼到这一天……其前提除了加强劳动纪律外必定是加强团结和彻底实现的专政。”

除库恩外还有不少人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朗德莱尔也发了言，他也谴责了右翼社会民主党人越来越卖力地散布失败主义情绪。他说：“战士们正在前线拚搏，在打胜仗，他们并不诘问目的是什么，如果在后方还有人缺乏信心，那是可卑的。”

在以后的几天里，虽然敌人的反抗愈益加强，其组织性日益

好转，红军仍在继续向前推进。第6师的先头部队于6月10日到达巴尔特福，把在斯洛伐克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分割成两半。当第3师在高劳姆以西进行顽强的斗争时，第5师占领了蒂索尔茨和罗日组。

开始向北部进军还不到两个星期，红军英雄的无产阶级战士就向敌人的阵地推进了150多公里，解放了匈牙利北部和斯洛伐克东部的大部分。

在红军取得的胜利中，国际主义部队中的斯洛伐克战士建立了不朽的业绩，他们懂得战争不仅是匈牙利人民的事，而且也是社会主义世界革命斗争的一部分。《考绍红色报》1919年6月13日写道：“格默尔和佐约姆的斯洛伐克族无产阶级战士在左翼取得的重大胜利，导致了科尔波瑙和谢尔迈茨巴尼奥的解放……对自由的向往鼓舞了斯洛伐克无产者，使他们成为优秀战士。”

红军占领地区的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族男人成批地报名参军。在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军队的后方，表示同情匈牙利红军的越来越多。捷克斯洛伐克的首脑们对斯洛伐克劳动人民采取了非常措施。6月5日，宣布全斯洛伐克戒严和设立特别法庭。

皮乔内在一份总结报告中说：“这些法规可能减少一些敌对行动，但并没有完全把它镇压下去。后方的射击事件、怠工活动和破坏铁路与通讯线路的活动仍时有发生。”

斯洛伐克广大地区的解放使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获得了新的胜利，6月16日，在埃派尔耶什宣告成立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从而欧洲革命运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基地。

刚成立的斯洛伐克苏维埃政府向全世界劳动者发表宣言：

“致全世界无产者：以不可阻挡之势胜利前进的世界革命以新的、伟大的成果丰富了至今取得的成就。在清除了帝国主义的斯洛伐克土地上，今天成立了独立的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斯洛伐克的工人、士兵和农业无产者通过这一行动，进一步扩大

了俄国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已为之铺平了道路的革命阵线。他们使世界苏维埃的伟大思想更加深入人心。新生的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把它已经取得胜利的兄弟——俄、匈苏维埃共和国视为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并使自己置身于国际无产阶级力量的保护之下，置身于轮廓愈益鲜明的统一的、团结的工人共产国际的保护之下。”

年轻的斯洛伐克无产阶级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已经迈出了第一步。把工厂和银行收归了社会所有，为改善劳动人民的社会福利条件采取了许多措施，制定了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建立了工农苏维埃，并着手组建斯洛伐克红军。

## 十二

# 无产阶级专政的 困难在增长

---

尽管前线取得节节胜利，但是，在生活的许多重要领域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困难。

主要的食品和生活用品越来越匮乏。

在许多厂矿企业里，尽管劳动者的生活十分艰苦，但是他们仍然加紧生产。这是无产阶级自觉性的杰出典范，在切佩尔的许多军工厂，在化学工业、面粉工业和煤矿，如在埃格尔切希煤矿，生产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增加了。但是，大多数工厂的劳动生产率明显下降了。朗格机械厂的生产下降了30%，勒克厂的生产下降了25%，其他工厂也和这两个厂相差不多。煤的产量也下降了10%—38%。

生产下降的最基本原因之一是普遍缺乏原料。由于战争期间的掠夺式经营和后来的经济封锁，原料贮备枯竭。补充原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无法解决的。

工人阶级的最有觉悟分子于4月底5月初响应无产阶级政权拿起武器的号召，参加了红军。在工厂，恰好是他们能够起很大的作用，他们能够用自己的榜样和语言鼓励工人们尽到自己的职责。把劳动时间减到8小时、取消计件工资、普遍实行计时工资

也使觉悟不太高的工人的劳动纪律松弛起来，有觉悟的工人参军后这种情况更加严重。

工人们对这种现象也越来越有意见，他们认为这种情况不应再继续下去，为了全体工人阶级的利益，应该恢复计件工资制。

小手工业者（他们为国家提供不少商品）由于缺乏原料、通货膨胀和白币等原因，大部分已停止了营业，这也助长了商品的匮乏。

首都和外地较大城市的食品供应很困难。虽然对基本食品实行了凭证供应，但是有时候油和肉凭证也保证不了供应。

在匈牙利，即使和平时期每到春末夏初食品储备也严重减少。而1919年，由于长期战争和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食品储备几乎完全枯竭。农村中也有成百万人缺少食品，当地的工人苏维埃常务委员会也要关心他们，这就使城市的食品供应更加困难。

外蒂萨农业区的丢失以及苏维埃共和国正在进行生死搏斗，首先应该保证红军战士的供应等，这些都加剧了食品供应的困难。

前面我们曾经谈到，缺乏工业品和财政危机对城乡交换非常不利。还应该提到，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短时间内，还没有找到一个收购和供应食品的合适形式。

“多瑙河西部能够提供大量的肉食，但是没有运输机构。”汉布尔格尔在苏维埃政府5月23日会议上说。

毫无疑问，食品的确十分匮乏，但是并没有发生饥荒，在匈牙利任何人都没有受到饥饿的威胁。蔬菜供应相对说来比较充分（把布达佩斯的赛马场也改成菜园了）。牛奶的供应组织得较好，首都的儿童和病人不缺乏这种重要营养品。

维也纳靠协约国提供食品，而那里的食品供应却比匈牙利首都差得多。

由于国内外困难的增加，有一些劳动者开始感到疲惫和不满。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也想方设法加剧这种情绪，让劳动者反对苏维埃共和国。反革命分子别出心裁地散布谣言和进行诬蔑。他们到处散布谣言说，供应困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后果，协约国期待着苏维埃政府辞职，以便源源地把大批食品和各种货物运给匈牙利。他们在排队买食品的无产阶级妇女中散布谣言说，一部分人民委员带着家眷在苏维埃公寓（原匈牙利旅馆）里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这种说法完全不真实，根据革命苏维埃政府的决议，住在苏维埃公寓里的人要和工人在食堂吃的完全一样。有些人本来可以在苏维埃公寓里吃午饭，但是，他们还是选择了别的地方（如记者俱乐部吃得比较好一些）。

无可否认，苏维埃政府采取的某些措施事与愿违，激起一部分劳动者的不满。如大多数男人感到禁酒不得人心，这也使生产葡萄的人处境困难。

农民对不搞土地改革感到失望，他们的不满情绪表现得越来越尖锐。瓦伦廷·奥尔弗雷德5月24日在布达佩斯中央工人、士兵苏维埃会议上的发言反映了这个情况。他汇报了他在米什科尔茨附近的农民中进行考察所得到的体会：

“居住在那一带的穷苦农民还没有感觉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任何摸得着、看得见的证据和优越性，而这些他们是应该感觉到的。我的印象是：我们那些同志没有得到任何摸得着或看得见的好处，没有得到任何能够使他们相信真理在我们一边的东西。所以有必要在这方面做工作，给他们一些好处。在布达佩斯，我们对无产阶级很慷慨，但没有给外地农民和其他穷苦人一些能够把他们争取过来的东西，而他们除了自由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

革命苏维埃政府也想给予有地农民一些东西，以便把他们同无产阶级专政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基于这种考虑，于5月初取消了农民的土地税。但是后来证实这一措施是错误的，其效果恰与



苏维埃政府的愿望相反。有地的农民根本不缺钱，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交税对他们说来并不特别困难。苏维埃政府的措施反而使“政府要没收有地农民的土地”的谣言有了市场。有谣言说，取消土地税表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已经不把小地产视为农民的财产。这一措施之所以错误，还在于它没有把拥有小块地产的半无产者同拥有100霍尔特的富裕农民区分开来，它不仅没有促进农村阶级斗争的开展，反而散布了“农民的统一”的幻想。

农业工人协会应该担负从政治上教育农村劳动者的任务。但是，由于它在组织上有弱点和领导人在政治上犯了错误而不能胜任这一工作。协会领导机构中有把农民同产业工人对立起来的偏向。协会的报纸《世界自由报》在5月底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中城市工人压迫了农民无产阶级，并强调说：“掌握国家权力……是农业工人的权利和义务。”

5月30日，尼斯托尔·久尔吉在《世界自由报》上发表社论抨击这种有害的观点，他认为如果没有产业工人的帮助，在阶级斗争中农业无产阶级是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的。在6月初召开的农业工人代表大会上，不少发言人也持同样的观点。尽管这样，尼斯托尔的文章和代表大会的正确观点都没有能抵销农业工人协会右翼领导人蛊惑人心的宣传对农业劳动者所起的破坏作用。

3月21日以后，长期被搞得糊里糊涂和吓得要死的剥削阶级逐渐清醒过来。

4月底5月初，在罗马尼亚封建贵族军队发动进攻的危急情况下，反革命分子在全国许多地方公开亮出了旗子。他们于5月1日在埃格尔逮捕了地方工人苏维埃常务委员会的委员，由反革命军官组成的军事指挥部掌握了政权。他们把地方的资产阶级武装起来，但是这些“英雄的”反革命分子见到红军派去维持秩序的一个营的士兵时，就不战而逃，跑到捷克斯洛伐克部队占领

区。在珍珠市也有类似的情况。在豪特万，反革命分子投靠了由于态度反动早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期就已臭名昭著的伊格洛机枪队。打垮这支部队动用了较大的力量，派了一支由近300名海军士兵组成的支队才把他们镇压下去。

5月初在多瑙河西部许多地方——白堡、代韦切尔、乔尔瑙和其他一些地方——反革命分子暂时篡夺了政权。

5月10日公布了一个布达佩斯阴谋集团被揭穿的消息，这个集团主要是由职业军官组成的。阴谋活动的基地之一是“匈牙利人觉醒社”。他们为推翻苏维埃共和国和谋杀无产阶级专政领导人制订了庞大的计划。在被揭露前，他们的实际活动并没有超出在私人宅邸和音乐娱乐场所举行典型绅士式的、伴有吉卜赛音乐的、吵吵嚷嚷的宣誓的范围。

5月16日在拉科什保洛陶又逮捕了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阴谋分子把进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宣传和策划武装的反革命叛乱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是警官。这一阴谋案同旧警察局局长迭茨和他周围的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以科尔文·奥托为首的内务人民委员会政治部在侦破反革命阴谋案件中表现很出色。科尔文是位温文尔雅，充满浪漫主义的青年人，他虽然出身豪门，但却成为匈牙利反军国主义运动的一个领袖和匈牙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他具有揭露反革命破坏活动的特殊才能。

5月底6月初，多瑙河西部又成了反革命活动的场所。

5月29日，一些反革命军官和穆拉松博特县工人苏维埃常务委员会少数成员在该县接管了政权，宣布成立“穆拉共和国”和脱离苏维埃共和国。反革命分子大约拥有1000人的武装力量，他们向附近的乡镇发起进攻。

穆拉松博特叛乱是一个反革命总体计划的一部分。根据计划，起义应该扩展到整个多瑙河西部。5月31日，在托尔诺州、托

尔诺陶马希爆发了主要依靠富农和富有的实业家的反革命叛乱。

6月1日松博特海伊的铁路工人举行罢工。他们提出的是经济口号，而实际上是想达到反革命目的。罢工很快蔓延到多瑙河西部大部分铁路工厂。个别地方的机关职员也参加了罢工。

6月5日，克塞格、克塞格附近的村庄和肖普朗州的许多乡镇也发生了武装暴乱。

革命苏维埃政府清楚地知道，多瑙河西部反革命运动的扩大将使无产阶级专政濒于危境，因而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打击这些活动。他们于5月30日宣布多瑙河西部的五个州为作战区，数天后又宣布整个多瑙河西部地区为作战区。

多瑙河西部地区的军队和红色卫队的工人团在几天之内就击败了反革命分子。之所以能这么快地把叛乱镇压下去是因为多瑙河西部城镇的无产者对苏维埃共和国怀着赤胆忠心。暴乱没能得到工人和贫农的帮助，相反，在许多地方工人和贫农积极地参加了镇压反革命的活动。

铁路员工的罢工也在短时间内结束了。铁路员工们很快认识到，罢工只对那些想在匈牙利恢复资本家和地主统治的反人民力量有利，他们懂得了：当工人农民的最优秀分子在同入侵者进行殊死斗争的时刻，他们也应尽自己的义务。

逃亡到国外去的贵族、资本家、政客和军官在苏维埃共和国领土上发生的反革命运动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反革命流亡者的头目竭力促使协约国发动武装干涉，占领匈牙利。恰是那些想在推翻苏维埃共和国之后把自己装扮成匈牙利爱国主义的化身，声言要把收复领土作为自己政策轴心的人，肆无忌惮地将国家出卖给列强，以便借助他们恢复对匈牙利劳动者的政治统治和经济统治。

“逃亡到维也纳的匈牙利政客们拜访了法国驻维也纳的代表阿里兹，请求协约国帮助镇压布尔什维主义。”一个在维也纳的

匈牙利反革命小组的头目格拉兹·古斯塔夫这样写道。他们也向英美外交家提出了类似要求。

4月12日，在维也纳的匈牙利反革命分子们为了统一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活动，建立了反布尔什维主义委员会（ABC），贝特兰·伊斯特万伯爵、泰莱基·帕尔伯爵、劳道伊·盖代翁伯爵、齐奇·盖萨伯爵、齐奇·伊斯特万伯爵和什姆雷恰尼·久尔吉在该委员会担任领导职务。

反革命分子需要钱，因此他们向罗特席尔德银行提出借一笔巨款，但是罗特席尔德银行不同意匈牙利贵族们以在匈牙利的地产作抵押。由于有些匈牙利贵族在奥地利也有大量土地，罗特席尔德银行坚持要用这些土地作抵押。然而这些伟大的“爱国者们”不愿意冒这个风险，他们只愿意拿现在已经属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地产作抵押。

因此，他们另想办法搞钱。5月2日夜里，一个流亡军官组织武装袭击了苏维埃共和国在银行街的公使馆，在陶卡奇-托尔瓦伊·约瑟夫伯爵带领下抢劫了近1.4亿匈克郎、7万法国法郎和3万瑞士法郎。绑走了公使波尔加尔·埃莱克和公使馆另一名官员。奥地利当局虽然将绑架的外交官释放了，但并没有把被盗的钱追回来。

流亡分子生活腐化，把抢到的钱的大部分都挥霍掉了，但是有一部分确实用来支持匈牙利反革命叛乱，例如ABC曾寄给穆拉松博特反革命分子100万匈克郎。

5月5日，在反革命流亡者另一个聚会场所奥劳德成立了以卡罗伊·久洛伯爵为首政府，不久，首府迁至塞格德。反革命分子希望协约国承认他们的政府，但是协约国不愿意这样做。阿里兹——正如格拉兹·古斯塔夫在《革命的时代》一书中所写的——声称，协约国只承认那样的政府：它不是在占领区进行活动，而是在“一块匈牙利国土上掌握实权，不论这块土地

多么小。”阿里兹还补充说：“布达佩斯不一定要属于这块国土。”驻维也纳的英国使团长坎宁安上校也持同样的立场。

反革命分子同每一个对无产阶级专政抱有敌对情绪的人都有联系。驻多瑙河西部的第2军的参谋长克劳埃嫩布罗克·埃德加耳和他周围的人同反布尔什维主义委员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通过第2军，他们在多瑙河西部的一些地区得以建成一个反革命网。乔尔瑙的叛乱，就象铁路员工罢工一样，和维也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十三

# 匈牙利社会党内 矛盾激化

---

5、6月间，共产党人和越来越向他们靠拢的真诚接受无产阶级专政观点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同右翼和中间派首脑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矛盾的根源在于右派和中派首脑的态度。他们主要是迫于形势和从策略考虑才于3月21日接受了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则越来越公开地否认1919年3月21日通过的共同纲领。

观点分歧的焦点是对党和工会在无产阶级专政中所起作用的想法。

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反对阶级异己的乌合之众通过工会涌进党内。这些人日益公开地为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工会的领导人由于突然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而冲昏头脑，他们没有阻止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分子涌进党内，甚至他们本人也支持这样做。

4月，雷瓦伊《要纯洁的无产阶级政策》一文的发表曾引起一场争论。当时右翼普遍保持沉默，5月他们变得越来越积极并逐渐转入反攻。

两党联合后，工人运动的重点从党组织转移到工会组织。党组织的作用受到很大的限制。共产党领导人自己也认为，在无产阶级

阶级专政中，各级苏维埃应该承担起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的任务。他们没有把党的书记处当作无产阶级专政最主要的政治领导机构，而是把革命苏维埃政府当作最主要的政治领导机构。但是，各级苏维埃不可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库恩·贝拉在《对轻信的人的几点意见》一文中分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教训。他写道：“社会民主党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从工人苏维埃中搞了一个扩大的代表机构。这些工人苏维埃不是把根子扎在企业中，扎在工人群众中，而是扎在党和工会的领导中。在专政条件下选举产生的工人苏维埃既不能反映无产阶级优秀分子的面貌，也不能反映广大群众的面貌。”

在这种情况下，工会领导人的地位（就是工人群众在1919年3月不愿意跟着他们走的那些工会领导人的地位）又逐渐加强了。

工会的官僚机构能够以独特的方式利用红军的胜利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想方设法破坏这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自卫战争的也恰是这个工会机构。它把5月2日以后动员工人阶级参战的工作归功于自己，把它当作自己教育和组织工作的成绩。

5月11日，库恩·贝拉开始在旧议会下院会议厅作一系列为召开党代表大会做准备的报告。在这些报告中，他总结了党的纲领的一些基本问题。在第二个报告中，库恩提出了如下坚决的要求：“必须把工会同党组织分开，必须建立纯洁的无产阶级组织，必须纯洁党的队伍，必须加强党，使它更加坚强、团结和更加守纪律，以便能作为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站在坚定的原则基础上，指导党在工人苏维埃中的政策，指导党在专政的经济组织的成熟（成熟一词为“生活”之误——作者注）中的经济政策。”库恩指出，工会在无产阶级专政中应该完成经济任务，起组织和动员作用。“但是党不能容许把所有的人都吸收到自己的组织中来，它只能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和优秀分子的组织。在整个工人运动中，在工人运动的顶峰——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中，党组织应该在原则上和理论上起指导作用。”

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已经习惯于工会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都起重大作用。在无产阶级专政中，工会的作用应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局限于动员劳动人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直接保卫劳动人民的利益。对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来说，这一主张同他们是格格不入的，是不能接受的。共产党人对匈牙利工会运动中出现的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倾向所作的批评，他们无法接受，也不想接受。

《人民之声报》在5月16日社论中谈到工会问题。文章是针对工会理事会关于大量增加会员的报告而写的。作者只字未提工会会员的大量增加会使成千上万阶级异己分子和没有政治觉悟的分子进入联合党。

《人民之声报》拒绝了对工会领导人的工作所作的批评，同时认为“许多人无数次阐明，工会官僚主义会阻碍工会组织灵活性的发挥，使其作用于外部的力量萎靡不振，而最糟的则是它将削弱阶级斗争的力量，降低其尖锐性。然而这种工会官僚主义是不可能是在匈牙利滋长起来的。只有在发达兴旺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工会运动才会犯这类错误。”

社论认为匈牙利工会运动的领导工作同西方国家的不一样。关于工会领导人，社论说：“这些人是完全本着马克思的精神进行工作的。”作者否认工会运动的领导有妥协的趋势，他认为，“在匈牙利工会运动中，丝毫没有削弱阶级斗争锋芒的迹象，整个工会运动的行动都促使了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文章还认为，匈牙利工人阶级的革命性、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都表明工会没有官僚主义，它的领导人充满革命精神。

对于《人民之声报》社论的论点，共产党人不能不予以答复，因此，矿工出身的共产党员人民委员菲埃德莱尔·莱热于次日，1919年5月17日也在《人民之声报》上发表文章，抨击这种论点。他指出，即使匈牙利的工会运动没有降低到某些其他国家



的水平，“我们这里也有特殊的组织上政治上的派别，它反对一切革命行动，它始终想把工人阶级的力量集中于眼前可以达到的目标上，集中于实现微薄的工资要求和工时要求上，然后把这些微小成果当作固定价格来对待。就连这些要求，他们也不是想通过斗争，而是想通过妥协来实现。这一流派的代言人首先是工会职员，对他们来说，任何较大胆的行动只是空谈。”

前一天的社论提到，在匈牙利工会运动中丝毫没有削弱阶级斗争锋芒迹象，针对这一论点，菲埃德莱尔提到工会领导人战时的表现：他们为了取得一些小小的让步，竟以支持统治阶级的帝国主义战争为代价。他强调说，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不能归功于工会领导人：“工人阶级的现在和未来基于自己的力量。”

争论继续进行着，越来越激烈，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大。

在5月18日，即星期日的《人民之声报》上，维尔特奈尔·雅各布，一个不小的人物起来庇护工会领导人，他说：谴责工会右翼领导人的活动“就是谴责匈牙利整个工人运动”。他攻击共产党人，说他们大多数只是在几个月前参加工人运动的。共产党领导人中确实有这样的年青人，他们在匈牙利共产党成立前不是社会民主党党员。他们在党外进行活动，参加反军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其原因首先在于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搞妥协。“抛弃怀疑，让工会工作吧！”维尔特奈尔在文章中这样蛊惑人心地说，好象共产党人真的妨碍了工会领导人完成自己的基本职责，妨碍了他们动员工人阶级参加革命的卫国战争和社会主义的生产工作一样。

右翼很快就意识到，在关于工会的争论中隐藏着对他们有利的、可以挖掘的潜力。由于两党合并后共产党人同工厂的工人断绝了组织上的联系，企业里工人的情绪逐渐由工会控制。最革命、最有觉悟的工人都参军了，这使他们的企图更容易实现。他们以工人运动受了所谓的委屈为由，借机煽动工人起来反对共产

党人。5月24日，《人民之声报》以《一百万有组织的工人》为题发表文章，其中写道：“匈牙利工人阶级所以能处于今天的地位完全应该归功于工会。”文章隐晦地说共产党人“是一些在已摆好的无产阶级自由和无产阶级政权的筵席上坐享其成的人”。

激烈的论争并不只限于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在各级苏维埃，在工厂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由于没有独立的共产党，右翼处于可靠的优势地位。匈牙利工人阶级还不具备那种政治素养和经验，即没有共产党的指点，他们自己就能够弄清例如工会和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作用等问题。

共产党人和左翼社会党人同右翼社会党人和中间派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问题上也有尖锐的原则分歧。

无产阶级专政的真诚拥护者想采取果断的措施，以巩固工人阶级的政权，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建设社会主义和阻止反革命进行活动。右翼社会党人和中间派对这一切措施都表示反对。

有人早在3月21日就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只具有临时的过渡性质。这些人把苏维埃政府的每一项果断措施都看成是在一段段地焚烧复辟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桥梁。他们并不真正为在北线取得的军事胜利感到高兴，因为他们认为，对协约国的每一个打击，都将使协商更加困难。

为了剥削阶级的利益，他们利用自己的地位竭力滥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律和法令。苏维埃共和国社会供应人民委员埃尔代伊·莫尔(社会民主党右翼分子)以高价买下了在商业收归社会所有时扣留的商品。他在苏维埃共和国被推翻后说：“在维护商人的利益方面我走得很远。我命令老店主继续留在原位，以变化了的形式继续领导自己的店铺，以便有朝一日商店重又归他们所有时，不失去他们的老主顾。”

库菲·西格蒙德是主张“缓和”无产阶级专政“方法”的代

表和斗士。这一时期，他同许多其他中间派一样，已经认为如果不对3月2日通过的基本原则作根本修改，苏维埃共和国就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他以为，通过向被推翻的统治阶级作出让步，能够在内政和外交上为工人政权的继续存在创造有利的形势，能够为恢复3月21日以前的状况和为工人政权“深思熟虑”的引退创造有利的形势。

库菲在发表于1919年6月5日《人》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有些人认为在专政彻底实现的条件——世界革命到来之前，应该执行比现在温和和速度较慢的政策，我本人也是其中的一员。”

库菲和与他持同一观点的人都指控共产党人是恐怖主义分子，因为共产党人想用强硬的手段对待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对待反革命分子。当在全国各地反革命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叛乱的军官、富农等残暴地屠杀和折磨地方苏维埃政权的代表时，库菲要求给那些与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以人道主义的待遇。

苏维埃共和国对犯罪分子的态度是人道的、宽宏大量的。就连战犯、残酷屠杀工人的刽子手们也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我们不能，也不想讨还资产阶级国家百年来所欠的血债！现在所谈的不是算账，而是报复。我们无法进行报复，如果我们对资产阶级法庭所干的坏事都给予报复，那末我们什么别的事情也干不了。我们不想报复，因为已经没有必要报复了。”布达佩斯革命法庭主席共产党人拉科什·费伦茨在1919年3月28日《红色报》上这样写道。

下列材料可以证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法庭不想利用报复这种暴力手段：到1919年6月10日为止，在革命法庭所作的判决中，有30.5%处以罚金，36.7%是六个月以下的徒刑，判五年以上徒刑的只占7.2%。判死刑的有0.81%，但是其中执行的只有0.35%。在评价上述材料时应该注意到战争状态的特殊情况，在这种情况下

下每个国家都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

如果拿苏维埃共和国的司法同1848—1849年匈牙利资产阶级革命和自由斗争时期的司法相比较，关于“共产党恐怖”的诬蔑更是站不住脚。

1849年3—8月，政治和特别法庭处决了155人。此外，军事法庭判处了40—50人死刑。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总共判处了153人死刑。其中119人是政治犯，6人是军事罪，28人是普通的刑事犯罪。

在对材料进行对比时不能忽视，1848—1849年被处决的人中绝大多数是农民，而1919年，由于政治原因而被处决的人中，近90%是军官、富农、地主、资本家、高级官员。

5月底，释放了被监禁的人质，他们是过去统治阶级的成员。

《人民之声报》5月25日写道：“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胜利地反击了进攻者。大批涌进的敌军在无产阶级的铜墙铁壁上撞得头破血流。苏维埃共和国在极其危险的时刻抓了人质，这样做并不是出于报复。目前，苏维埃共和国已不受直接危险的威胁，革命苏维埃政府决定释放所有的人质。”反革命分子认为苏维埃政府采取这一步骤是软弱的表现，于是更加变本加厉地进行活动。

反对反革命分子、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到了共产党人和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的肩上，他们勇敢忘我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他们意识到，态度不坚决和宽容不仅威胁无产阶级专政的安全，而且与坚决、强硬的斗争相比，会不可避免地付出更大的代价。

萨姆埃里·蒂波尔在镇压武装的反革命叛乱中表现很突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把萨姆埃里说成是残忍到极点的人，认为他对反革命分子毫无理由地动辄判处死刑。这是对萨姆埃里的诬蔑，但他并没有被这些诬蔑所吓倒，他仍然同那些想夺取工人阶级政权的人作坚决的斗争。萨姆埃里7月初对《快报》驻布达佩

斯记者谈话时说：

“实际上，我也和别人一样，并不嗜血成性……我坚决主张无产阶级专政要严厉些，因为这样做会减少流血，也就是说，这对资产阶级也是有利的，因为不这样做会使他们产生错觉，好象他们所面临的只是一种过渡现象，而这无助于去适应新制度。我在这里对你讲的东西可能不会使那些只从报纸上了解我们的人感到满意。很遗憾，我无法把反革命分子的头皮<sup>①</sup>拿给你看，更无法让你看折叠式绞刑架，尽管报刊说，不带这种绞刑架，我是从来不出门的。”

苏维埃政府和党的领导内部出现的矛盾为反革命分子壮了胆。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不想错过机会，他们通过把社会民主主义同共产主义对立起来和接过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口号的方法，来加强自己的阵地和把反革命复辟的企图披上蒙骗劳动群众的外衣。

自从同布朗进行谈判以来，右派和中间派首脑一直幻想在协约国的支持下，能够从无产阶级专政过渡到一个较温和的社会党政府。

5月，钢铁工人工会领导人召集几个工会的代表到布达佩斯奥博尼路21号改革派教会的学生宿舍开会。有15人到会。钢铁工人工会的一个领导人向他们讲了会议的目的：工会采取措施消灭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时候已经到来。他说，问题之所以有现实意义，是因为苏维埃政府想在北部战线发动攻势，军事人民委员会委托工会拟定应征工人的名单。他强调说，这意味着战争责任的臭名将落到工会身上。他建议召集所有专业工会的领导人开会讨论这个问题。

两天后，几乎所有工会的领导人都出席了会议。他们商定下

---

<sup>①</sup> 从前，北美印第安人把敌人的头皮带发割下来，当做战利品。

一次将邀请苏维埃政府的成员参加讨论。

一两天后，苏维埃政府有几个成员，其中也包括库恩·贝拉出席了在奥博尼路召开的会议。库恩·贝拉表示，工会领导人所设想的回头路是不现实的。他说，如果消灭了无产阶级专政，随之而来的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库恩因为还有别的事情，不久就离开了会场。接着发言的还有佩耶尔和库菲，他们当然反对库恩的意见。

后来，佩耶尔同几个人在一起拜访了英国驻布达佩斯使团的一名没有影响的成员富利曼大尉，想通过他取得协约国对匈牙利工会领导人执行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计划的支持。富利曼未能做出任何具体的许诺，只是答应将工会领导人的要求转告他的上级。

在另一次库恩和伯姆也参加了的会议上，佩耶尔向与会者介绍了同富利曼进行谈判的情况。库恩·贝拉指出，事态的发展证实他本人是对的。他提醒佩耶尔等人，他反对抛开苏维埃政府同协约国代表举行会谈。伯姆知道富利曼是个微不足道的人物，因此他建议工会停止这种活动，因为这样会严重地影响军队的士气。

佩耶尔之流不顾警告，继续进行破坏活动。他们决定扩大自己活动的范围，让各行业工会的男代表投票表态，是赞成无产阶级专政继续存在下去，还是赞同工会领导人的立场。木材工人和书籍装订工人代表赞成佩耶尔等人的观点。钢铁工人代表的决定有决定性的意义。佩耶尔在历时两天的会议上介绍了工会领导人的决议。但是他的目的没有达到，因为钢铁工人受库恩·贝拉在会上的讲话的影响，主张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奥博尼路的会议自然不可能保密。布达佩斯工人苏维埃500人的委员会里有一个人发言说：

“大家都知道，同外国使团的协商已进行了几天，甚至几周，然而，工人和士兵苏维埃还没有听到外交人民委员们关于谈

判情况的报告。我们知道，从协约国使团那里、从帝国主义者那里不可能得到什么好处，但是资产阶级在这种紧要关头想使人们相信，想使工人阶级相信，现在回到旧制度对工人阶级来说也许更有利，免得万一丧失帮助我们摆脱困境的时机。”

6月10日以后，右翼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又到了富利曼那儿，这次是由维尔特奈尔率领。富利曼告诉他们，上级组织不愿意支持旨在建立独立的社会民主党政府的行动。

7月初，伯姆召集和他观点相同的党和工会的领导人开秘密会议，目的是商谈策划反对共产党人的行动。

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机构内部矛盾激化到这种地步，损害了工人阶级政权的威信，妨碍了苏维埃共和国目标的实现，妨碍了同被推翻的统治阶级的反革命企图作坚决的斗争。

共产党和左翼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不愿作原则让步，他们一再强调维护领导团结一致的必要性。库恩·贝拉几乎在每次讲话中都强调维护团结的重要性。

他在5月23日《人民之声报》社论中写道：“毫无例外地统一各种力量，统一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把它纳入紧密的、牢固的、守纪律的、特别是有组织的团结中去，是革命生存的条件！”

……一切其他利益都要服从统一发挥整个无产阶级力量的利益。在统一发挥力量的利益面前，各种想法都应成为意见，而不应成为向任何方向的单独行动。”

## 十四

# 党代表大会

---

6月12日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会场设在国会大厦的会议厅内。开会前做了专门的布置，各包厢都用红布装饰起来。讲台上方画的皇冠被头戴象征自由的红帽、胸佩五星的工人形象所代替，它象征匈牙利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墙上挂满了新画，象征着解放了的工人阶级的生活。

会前发生的事件已经为代表大会罩上了党内两派大冲突的阴影。库菲和维尔特奈尔在杂志《人》上拟定了向共产党人发起进攻的纲领。维尔特奈尔的文章直接号召公开反对共产党人。他说，无产阶级专政在军事上的巩固和有利的国外事件使我们“能够享用一些进行必要批评的奢侈。”维尔特奈尔在文章中谈到“一个小集团”想“对大多数工人”实行恐怖。每个读者都明白，这是指共产党人说的。后来，他在书中写了他这篇文章的用意：“要鼓励我们的代表在党代会上自由发言，反对布尔什维克分子的恐怖。”

党代会的代表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由党和工会领导人指定的。这样，参加党代会的321名代表中，大多数人与其说代表了群众的情绪，不如说代表了工会的官僚主义。

党代会的原定日程是：修改党纲和党章、讨论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形势、选举党的领导机构。讨论国家经济和政治形势一项后



来从日程中撤销了。

高尔保伊在党代会上致开幕词。他利用这一场合为对待工会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态度问题定了基调。他强调说，社会主义革命的每一项成就都是工会教育的结果。他不顾事实地说，那些以前想用民主（指资产阶级民主）方式达到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3月21日自愿地，“不受外部的压力”地接受了无产阶级专政。

在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俄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意大利共产党人和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发表贺词后，库恩·贝拉介绍了党纲草案。他在原则性的序言里分析了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阶段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以及导致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过程。他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到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途径。党纲草案确定党参加第三国际。库恩在介绍党的行动纲领的同时分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他指出，无产阶级通过少数积极分子——党——实行的专政是过渡性质的。“在过渡时期实行彻底的、坚决的专政，利用一切手段推动坚决实行专政，这是革命工人政党的任务。”库恩赞成毫不动摇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库恩还谈到党的政治要求。他强调了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必要性。在谈到加强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的重要性时，他说，在保证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情况下，仅仅局限于武装产业无产阶级是不对的，还应该扩大到武装农业工人。在谈到民族问题时，他说：“随着资产阶级统治的消灭，民族压迫也消失了。”

“作为联邦共和国的拥护者，我们要通过保证最完全的民族自治和文化自治，通过保证自主和独立，建立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体系。”在经济任务方面，库恩强调企业集中与经济集中的必要性和加强财政监督的必要性。

库恩把农业问题作为纲领的一个中心问题来谈。他认为在大部分农业区实现了集体耕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成就。针对那

种认为有必要将生产合作社国有化的观点，他说，在农民小生产者经过合作社喜欢上集体生产之前，要在农业中实行国家经营是不正确的。他强调必须巩固工业和农业无产阶级的兄弟联盟。

他认为对老年人和残废者实行保险和进一步提高工业卫生水平是社会福利和劳动保护的义务。

在两党联合时只为党取了暂时的名称。当时决定将来由党代表大会在听取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意见之后再决定党的正式名称。库恩告诉代表大会，关于这个问题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应该把党的名称定为“匈牙利社会党”，另一种认为应改名为“匈牙利共产党”，第三种认为应改为“匈牙利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党”。库恩本人认为命名为“匈牙利共产党”较适宜。

库恩讲话后展开了讨论，多数发言人谈了两个问题：专政的方法和党的名称。

正象所预料的那样，库菲·西格蒙德是那些批评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主张“实行较缓和的”专政的人的主要代言人。他又一次阐述了5月底6月初已经在许多地方发表过的观点：

“当世界革命在多数国家强大到使无产阶级足以阻止反革命活动之前就不该采用统一的专政纲领，而应该象老社会民主党和现在的各工人党那样有一个最后的和过渡性的纲领。我认为在世界革命没有成为现实之前，专政需要有一个过渡性的纲领。这个纲领在保留旧法规的实质性部分的同时，宜实行较有节制的政策，实行更能考虑实际情况的政策，要用聪明的法规，而不是用恐怖手段阻止反革命的蔓延。”库菲把那些对付反革命分子的法规称为“刁难人的政策”，“极度的残暴”，“无谓的折磨人”，他认为对待那些“在斗争中反正要处于劣势的人”采取这种办法是多余的。

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无产阶级专政采取的若干过头措施在某些劳动者阶层中也引起了反感，而工人阶级本应在斗争中把他们

争取到自己这边来。有些法规还没有具备经济和政治条件（例如收归社会所有的幅度太大），因此它们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基础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但是库菲极力主张的那种让步超出了对那些过激做法和草率措施的修正。这种让步将为那些阴谋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提供更大的方便。

共产党人和左翼社会民主党人都反对库菲的观点。

鲁道什·拉斯洛驳斥了库菲理论的基本论点，即世界革命没有到来之前应该放松专政。他指出，正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只在两个国家取得了胜利，所以匈牙利工人阶级必须无情地实行专政。如果无产阶级革命在全世界或者世界大多数国家取得胜利，工人阶级对待资产阶级就会宽容得多。

萨姆埃里·蒂波尔在发言中分析了某些人极力主张的人道主义观点在反革命的实践中是如何得到贯彻的：

“一些同志在布达佩斯批评别人，宣传人道主义，然而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批评和人道主义信仰在外地人们的心灵中被歪曲成什么样子。同志们不知道，在布达佩斯发出的人道主义口号到了外地就变成了‘打倒共产党人’。”他说，乔尔瑙那里的反革命分子起初表示支持社会民主党人，然而当他们取得政权后，就在逮捕共产党人的同时，逮捕了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

奥尔巴里·久洛提醒大家注意，温和的方法将为反革命活动提供条件，如果发生反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将被迫采取最强硬的手段，而这必然会导致流血。

拉科西·马加什拒绝了库菲的那种说法，即反革命活动是由专政的强有力措施引起的。他指出，匈牙利工人阶级政权对反革命采取的是防御方法，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措施在所有情况下都是由反革命分子的武装挑衅引起的。

除多数发言人反对库菲的观点外，社会民主党的一些前领导人也尖锐地批评了库菲的妥协思想。波加尼·约瑟夫强调说，错

误的根源并不在于专政实行得过分，而是恰恰相反，在于对被推翻的统治阶级成员的态度过分宽大，所作的让步太多。

汉布尔格尔·耶诺明确指出：有些人在批评无产阶级专政方法，而实际上他们是不同意无产阶级专政本身。

“用不着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问题，而是应该讨论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应该讨论在社会党内有些组织和个人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那些不同意我们观点的人，可以自己去作出结论。我们现在在假惺惺地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问题，而实际上是有些人根本不能容忍无产阶级专政，我认为这是恶意宣传。”他用下面的例子证明自己的话是有根据的：矿业工会的一个领导人当着科姆洛矿工们的面说，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失败了，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

波卡尼·德热也批评了工会，他说，工会不愿意起到它在无产阶级专政中应该起的历史作用。

关于党的名称问题，库菲建议命名为“匈牙利社会党”。他的理由是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并没有作出决议只吸收以共产党命名的党参加国际。

库菲发言后，波尔·埃尔诺宣读了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信中建议党代会将党的名称定为“匈牙利联合共产党”。

共产党人强调说，党的名称并不是表面的东西。鲁道什指出：当反革命分子试图利用党内存在的矛盾时，拒绝以共产党命名就是把武器交到资产阶级手里。

波卡尼赞成共产党的名称，他提出了一系列令人信服的论据。他说，接受党纲和参加共产国际很自然地也应该承担共产党的名称。他提醒与会者注意，在社会党的名称之下，各种妥协的混合物遍及欧洲。匈牙利工人阶级不可能指望西方的社会民主党给予声援，但却可以指望共产党人的声援。

对党纲的讨论情绪没有这么高。大多数发言人——16个人

——明确表示接受共产党人的观点，只有库菲等7人公开表示赞成反对派的纲领。无疑，大多数与会者都同意库菲的观点。然而这一点在发言中没有反映出来。库菲所代表的观点在工人群众中并没有什么市场。因此有右倾观点的代表不愿意公开反对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不愿意公开否认联合时通过的共同纲领。他们认为，与公开的原则性争论和思想斗争相比，采用政变式的方法更为适宜。他们认为在原则冲突中他们很难占上风，但是他们可以利用多数，在投票时相对说来能够比较容易地战胜左派。

库恩·贝拉为党纲的讨论作了结论。他宣布，关于党的名称问题已同库菲和维尔特奈尔取得一致意见，他们建议代表大会接受“匈牙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名称。

库恩接着坚决反对库菲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所持的机会主义立场：

“毋庸置疑，在对待专政的方法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的。但是，专政的方法有自己的标准，如果有人想去掉这种标准，那就不是什么方法上的分歧了。同志们，专政无疑是压迫，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过渡状态，如果谁想以人道主义理想的口号消除这种压迫，就不是什么专政方法问题上的分歧，而是对专政的攻击。”

库恩在结束语末尾再次强调，纲领本身并不能保证团结，团结应该在革命行动中体现出来。

后来的事件从各方面都证实了库恩的论断是正确的。

修改党章的报告人是法尔卡什·伊斯特万，他是党章草案的起草人之一，是党书记处的一个有右倾思想的成员。

党章的第一条是讲什么人可以被吸收入党，什么人不能入党。法尔卡什在谈到这一条时说，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对党进行清洗，只应把真正的无产阶级分子留在党内。他认为这一主张是

不能接受的。他说：“我们没有必要自己制造一种使人们远离党的借口。”法尔卡什不愿承认，战后的几个月中投机分子和还不具备工人阶级革命先锋队成员条件的人都涌进党内来。

他也反对关于党员要有预备期的建议，他的口号是不应在信任问题上对党员加以区别。

他也不赞成把党和工会分开。

青年工人们请求党的领导机构在党章里规定：把青年工人组织到全国青年工人联盟的地方组织中去，这些组织不要给他们增加物质负担。他们要求全国青年工人联盟在党的领导机构的监督下活动，党的地方书记处有义务促进全国青年工人联盟各地方组织的工作。法尔卡什拒绝了这个建议。他说：“青年工人自己不要另外成立党，不要谈政治。”他坚持仍保留原来起草的党章，上面没有提到全国青年工人联盟。

党代会的第二天，在讨论党章时，代表们的情绪比第一天要高得多。原因之一是：12日下午，一伙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开始积极活动，他们想利用到会的右派在数量上的优势，推翻以前的协议，政变式地把共产党人赶出党的领导机构。

共产党人批评了党章，因为它不符合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布达佩斯第五区党组织的负责人基什·拉约什说：“我们的党组织不能成为一个随便进进出出的团体。”他还说：“在很多区人们都不清楚哪些人是党员。”

匈牙利社会党罗马尼亚党组一位负责人斯特伦加尔·代姆杨·萨瓦说，党章中缺乏贯穿于党纲中的精神。另一个发言人也发表了同样的想法，他认为“情况确实是，党纲草案就象一顶象征自由的红帽子，上面再套一顶旧式的高筒大礼帽。”

凡反对右翼社会民主党人观点的发言都被声音越来越大的插话所干扰。霍尔蒂·埃米尔想本着共产主义精神对党章发表意见，他们却不让他说话。

万察克·亚诺什在讨论中代表提名委员会宣布，他们将发两种选票，因为除提名委员会的建议外还收到另一种建议。他的话更大大加剧了紧张气氛。

关于党章的讨论最后以折衷的决议告终。党代会把党章草案退还给党的领导机构，责成新领导机构澄清有争议的问题，到下一届党代会为止，按新的党领导机构所通过的党章执行。

党章讨论结束后，接着就是选举党的领导机构。右翼多数派通过了一项反建议，把大多数共产党人和左翼社会民主党人排除在领导机构之外，连工人们最喜欢、最爱戴的领导波卡尼·德热也没有当选，因为他勇敢正直地站在共产党人的立场上。

共产党人不甘心于工会官僚主义的代表们撕毁协议，按照他们的面貌改造党的领导机构。库恩·贝拉和其他当选的共产党人向大会主席高尔保伊递交了书面声明，表示他们不接受这种选举，如果不改变，共产党人就将保留在党内和苏维埃政府内的行动自由，并向工人群众公布此事。这意味着公开的决裂。

伯姆这时把库菲和维尔特奈尔拉到一边，建议他们接受库恩等人提出的挑战。他认为这是决裂的好时机。库菲等人同意伯姆的意见，但是他们很清楚，如果他们得不到布达佩斯卫戍部队的支持，在反对共产党人问题上，他们就将一事无成。他们决定吸收布达佩斯武装力量司令，这个对他们说来从各方面都靠得住的豪布里赫·约瑟夫参加讨论。使他们大为吃惊的是：豪布里赫表示，他支持共产党人的一切行动，他还向高尔保伊递交了关于这方面的书面声明。

伯姆·维尔莫什在他的书中写道：“这一立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旦发生武装冲突，一部分工人可能在当时受人们欢迎的豪布里赫的领导下站在共产党人一边参加战斗。”

后来，伯姆不得不让步。经朗德莱尔的调解，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国会大厦的一个大厅坐下来开会，他们经过激烈

的争论达成协议，建议代表大会将选举结果作废，接受原来的正式名单。接着，代表大会一致欢呼通过了原来所建议的党的领导成员名单：鲍亚基·费伦茨、波卡尼·德热、伯姆·维尔莫什、高尔保伊·山道尔、库恩·贝拉、库菲·西格蒙德、朗德莱尔·耶诺、尼斯托尔·久尔吉、波尔·埃尔诺、鲁道什·拉斯洛、瓦戈·贝拉、万图什·卡洛伊和维尔特奈尔·雅各布等。检查委员会成员有：豪布里赫·约瑟夫、霍罗维茨·加博尔、波加尼·约瑟夫、万察克·亚诺什和韦尔奈尔·耶诺等。

党代会并没有解决在党的领导人之间存在的矛盾，相反地使它们更加表面化了。一般说来，所通过的党纲正确地提出了党所面临的任務，尽管还有一些缺点，它仍可以为统一的行动提供适当的原则基础，但是，党和工会的右翼领导人实际上根本不愿意接受和执行党纲。这一点早已在党代会上得到了证实。

党代会通过的妥协方案反映了力量对比的特点：右翼依靠工会官僚机构，利用一部分劳动者由于无产阶级专政遇到了困难而产生的不满情绪，竟敢冒险同共产党人公开决裂，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他们还是力不从心。

两党的联合导致了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有可能保留自己的全部地位，导致了共产党组织的消灭并使它失去同群众的组织联系。党代会表明，这种联合方式产生了多么严重的后果。



## 十五

# 北部战线重又 开始战斗

---

按军队总司令部原来的计划，红军在打击了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军队之后，应该横渡蒂萨河对付罗马尼亚军队。

6月9日，朗德莱尔建议改变原计划。

他说：“捷克人还没有被打垮，我们只是在后卫战斗中使他们遭到较大的损失，如果我们不继续进行刚刚顺利开始的对他们的战斗，或者只用次要的力量进行战斗，那就不能排除他们发起反攻的可能性。军指挥部认为在彻底消灭捷克军队之前就开始在外蒂萨同罗马尼亚人作战是不现实的。”

军队总司令部经过权衡，基本上接受了第3军指挥部的建议，决定在打罗马尼亚军队之前先消灭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为此，决定向多瑙河以北集结较大的力量，在西部发动攻势，而对撤退到海尔纳德河和上瓦格谷地的敌军只作观察，用向鲁特考方向推进的部队强迫他们撤离瓦格谷地。

这个决定是很正确的，因为在西斯洛伐克驻扎着大量没有动用过的捷克斯洛伐克部队，一旦红军进攻罗马尼亚人，他们就能给予已削弱了的北线红军留守部队以沉重打击。

6月10日以后的几天，北部战线暂时得到了巩固。红军在准

备新的攻势的同时，进行了改组，一般说来，只限于保卫已取得的阵地。

斯洛伐克敌军于6月10日至17日多次试图击退红军，但是只取得局部胜利。

当红军在为发动新攻势做准备时，捷克斯洛伐克军队西线指挥部为了赶在匈牙利人之前发动进攻作了不懈努力。法国将军密特尔奥塞（他接替了因失败而被解职的皮乔内的职位。6月初，用法国军官撤换了所有在斯洛伐克军队中服役的意大利军官，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失败的祸根。）在关于斯洛伐克战役的总结报告中写道：“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在敌人做好进攻准备之前，迅速采取行动并发动进攻。”

6月16日，密特尔奥塞用两个师的力量对保卫莱沃的红军部队发起进攻。红军在这里只驻有三个营和一个炮连。如果这时已经到达新集结地区的第4师不赶紧前来支援，红军在敌人的优势兵力面前就不得不放弃莱沃镇。敌人经过精心准备的进攻就这样惨遭失败。

6月17日，集结在多瑙河以北地区的红军部队开始向西推进。军队司令部为指挥这一战役建立了一个新的军指挥部，辖第3、第4和第8等3个师。波加尼担任了新建第5军的军长。

6月17日和18日，第8师成功地向埃尔谢克乌伊瓦尔方向挺进。6月18日，它的前锋在埃尔谢克乌伊瓦尔以北到达了尼特劳河，然后横渡尼特劳河占领了邦凯西村。后来，部队又向南，开始向埃尔谢克乌伊瓦尔进逼。

第8师向前推进使斯洛伐克军队的领导人非常担忧。他们的忧虑不仅是因为埃尔谢克乌伊瓦尔的命运已经注定，而且是因为担心很快失去波若尼，斯洛伐克的部长斯罗巴尔对此情景描写得十分生动：

“6月18日晚10时，密特尔奥塞将军来到我的房间，请求我

……同政府一起撤离波若尼去特伦钦或布尔诺，因为我们的人现在正从埃尔谢克乌伊瓦尔撤退，去波若尼的路已为匈牙利敞开了。

我问他：‘没有任何援兵能阻挡住进逼的匈牙利士兵吗？’

‘没有’他回答说……”，斯罗巴尔接着写道，这一时期，在波若尼市内只有微不足道和不可靠的保安队。然后他继续写道：

“我考虑了我们在市内的情况。我们只有几个士兵，就是在多瑙河桥头值勤的卫兵。对岸……站着匈牙利人。城里有两万名有组织的布尔什维克工人和同情布尔什维克的匈牙利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他们显然是在等待着匈牙利人的到来。一旦这些人举行起义，波若尼的命运就注定了。政府所有的成员都会被吊死在路灯柱上。”

然而6月18日后，红军充满胜利希望的进攻势头遭到了破坏。

协约国立即向处于困境的同盟者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们借助于帝国主义外交的欺骗手段取得了使用武力未能得到的东西。

克雷孟梭代表巴黎和会于6月7日照会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要求停战。照会说，协约国的意图是想邀请匈牙利政府的代表参加巴黎和会。克雷孟梭提到，协约国想结束敌对行动，他想用阻止罗马尼亚军队向前推进、阻止塞尔维亚和法国军队进攻匈牙利南线等来证明他的话是对的。照会最后威胁苏维埃共和国说，如果它继续作战，就将受到有力的制裁。

“四人会议”在向匈牙利发出调解照会的同时，采取措施扩大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武装干涉，这表明帝国主义外交在采用两面派的欺骗手腕。

克雷孟梭把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照会的副本寄往布拉格给佩莱将军，并且通知他，弗朗歇·德斯佩里已接到指示，准备对布达佩斯发动集中的进攻。

这份照会的目的显然是为处于紧急关头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提供喘息机会。库恩·贝拉代表革命苏维埃政府发了复照。他指出，敌对行动是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军队挑起的。他建议，原奥匈帝国崩溃后成立的各国召开一个较小范围的会议解决他们相互间的问题。

6月13日，克雷孟梭代表协约国再次照会匈牙利苏维埃政府，照会为匈牙利划定了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同罗马尼亚的新边界线，要求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尽快将部队撤到新划定的边界线以内。

1919年6月19日《人民之声报》就照会内容写道：

“如果盟国和参战国从6月14日中午起的四天内没有从他们驻当地的代表那里获悉这一规定已被切实执行，他们就可以认为有向前推进或者采取任何其他有助于确保公正和平的措施的自由。

一旦匈牙利军队撤离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军队就将立即撤回。”

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人対是否接受协约国的这一照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大多数右派和中间派领导人都热烈欢迎协约国的这一步骤，因为他们认为这证明了从内部推翻苏维埃共和国的设想再次处于重要地位。他们指望协约国在签订和约的同时提出一些政治条件。这些条件将为建立一个代表他们的方针的政府奠定基础。

伯姆认为有必要接受最后通牒，理由是红军已经精疲力竭，不能长期胜任所面临的任务。

库恩·贝拉和一部分共产党人也建议接受照会。他们的观点自然与伯姆及其同伙完全不同。他们认识到，无论国际形势，还是国内条件都要求作出妥协。他们认为，停战能使无产阶级专政取得喘息机会和——即使作出一定的让步——建立一种使政权得

以巩固和等待国际条件向有利的方向转化的局面。后来库恩·贝拉这样总结了他当时的想法：

“我曾经想，应该争取到一个象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那样的和约，在这期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内部事务整顿好，大致上解决反革命问题，尤其是整顿军队，期待俄国军事形势的好转和世界革命在西方取得新的胜利。”

库恩把协约国的照会和党的领导机构对照会的态度告诉了列宁。列宁很快就给他复信，并且提醒他不要轻信协约国的诺言。

“您开始同协约国谈判当然是对的。应该开始进行谈判，必须利用一切哪怕可以争得暂时的停战或和平的可能性，以便使人民得到休息。但是一分钟也不要相信协约国，它在欺骗你们，它只是为了赢得时间好更有效地扼杀你们和我们。”<sup>①</sup>

库恩·贝拉当天就电复列宁：

“亲爱的列宁同志：

十分感谢您来电赞同我的外交政策。我感到骄傲的是，我是您最好的学生之一；但是我认为在一个问题上我还胜过您，这就是：*mala fides*。<sup>②</sup>我想，我对协约国是有清楚认识的。我知道，它们正在同我们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停战，而不是和平。这是生死的搏斗。再一次感谢您的来电。

您的敬仰者：库恩·贝拉”

后来的情况说明库恩·贝拉的这封电报——说轻一些——过于自信。

新选出的党领导机构于6月15日晚开会讨论如何给协约国复照的问题。党的领导机构以多数通过决定：应该通知他们，苏维

---

① 《列宁全集》第36卷，第535页。

② 拉丁语，此处意为：“不信任”。——译者

埃共和国愿意接受协约国的要求。

库恩·贝拉根据党领导机构决议的精神，把这一决定通知了克雷孟梭，并且告诉他，红军将停止进攻。

在另一份照会上，库恩告诉克雷孟梭，由于捷克斯洛伐克部队不停止敌对行动，红军不得不继续作战。

6月16日，伯姆以命令形式向红军传达了协约国的照会：

“协约国照会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要求撤离一部分解放区，为此，他们也将使罗马尼亚帝国主义军队撤出大部分非法占领的地区。”接着，他命令部队停战。

伯姆发布命令后不久，各报都刊登了协约国的照会和苏维埃政府的复照。

所有这一切都对战士们的情绪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那些已经了解边界走向的（这一边界线远远在战线之后）指战员们对继续挺进已经没有兴趣，因为占领的地区到头来还得放弃。越来越多的战士认为“边界已经确定，我们的政府要改变也无能为力。”

第5军指挥部在6月19日的报告里是这样描述部队士气的：

“士兵们看了报上的消息，士气低落，不愿意继续进攻。结果，至今仍没有能占领埃尔谢克乌伊瓦尔”，“由于最后几天报纸上的消息，部队的战斗力大大下降了，情绪消沉或者想谈政治。部队不想进攻，相反，把提出的措施看成是领导人自作主张、滥用职权。”

后来，北部战线的红军部队只进行一些防御性的战斗。

后方供应困难的增长、反革命活动的加强、党和国家领导内部矛盾的激化等令人不安的消息，都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和士兵的情绪，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尽管这样，红军部队本来还能够完成自己的使命，然而，接受协约国的最后通牒使他们觉得继续作出牺牲已经没有意义。

右翼——首先是伯姆——在1919年和以后竭力想证明，他们之所以主张接受协约国的要求，是因为部队已经精疲力尽，斗志衰退。北部战线的红军士兵，其中有不少年岁较大的士兵，已经极度疲劳，否认这一点是不对的。进攻战和运动战的艰苦环境向他们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达到这些要求他们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但是，战争也使对方精疲力尽。捷克斯洛伐克部队的大多数士兵没有把战争当作自己的事业，因此，参加战斗不积极。“纪律状况离要求差得很远。虽然给部队增派了宪兵和在后方设立警戒线，仍有不少人开小差，放弃哨位”，“部队减员情况十分严重，倒不是因为伤亡多，而是因为很多人开了小差，自伤的人数也成倍地增长。”西部军团指挥部的报告在谈到斯洛伐克部队的情况时这样写道。

“匈牙利的炮兵优势对我们的士兵起着直接的瓦解作用。”我们可以在捷克斯洛伐克史学家撰写的关于斯洛伐克战争的史料中找到大量类似的提法。

## 十六

# 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

6月14日，党代会结束后召开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无产阶级专政最高权力机构的代表：背着背包的农民和工人在这个星期六的早晨聚集在城市剧院里开会。

舞台披上了革命的红装。正面挂着饰有月桂花环的苏维埃徽的五角星，讲台布满了红花。讲台后面是主席团的桌子和人民委员、外宾们的座位。

根据苏维埃共和国临时宪法，每5万劳动者可以选1名代表参加全国会议。因此，到会的代表大多数是从农村来的，产业工人没有按照他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中所起的作用派出代表。这也给会议的讨论打上了烙印。

第一天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星期天选举各委员会委员和讨论议程。

16日（星期一）作了第一个报告。

第一项议程是讨论经济形势。人民委员瓦尔加·耶诺向代表们介绍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就和问题。他谈了社会化工作和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机构问题，批评了在这方面出现的错误以及企业和全国性的经济单位所表现出来的官僚主义，分析了生产倒退的原因。他认为，“经过工会领导人热情的宣传工作，工人们已经认识到只有劳动好才能生活好，因此产量开始提高，工厂里



的劳动纪律也开始恢复”，从这一点说，苏维埃共和国已经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瓦尔加同后来的发言人一样，对新成立的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作抱着很大的希望。这些委员会是苏维埃政府为了消除由各经济机构各行其是造成的无计划状态，以便实行统一领导而设立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是由各个经济人民委员会（农业、社会供应、交通、财政、社会生产委员会）合并而成的，主任是瓦尔加·耶诺。后来又建立了各级国民经济委员会。

报告人批评了地方工人苏维埃常务委员会，因为他们时常执行地方主义的政策，把本地区的利益放在全国性的利益之上。他指出不收土地税是不对的，并敦促实行土地价值税。

人民委员兰捷尔·久洛接着作了关于苏维埃国家的财政问题的报告。他分析了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困难、通货膨胀和货币危机的原因。他认为有必要实行阶级价格政策，以阻止在工人前面抢购消费品。根据这种价格政策，工人和农业无产者可以以便宜得多的价格购买必需品。兰捷尔还认为有必要精简经济管理机构，合并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

农业人民委员汉布尔格尔·耶诺谈了农业问题。他认为成功地阻止了分配土地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大政绩。他认为分地会使无产阶级专政在供应上面临难以解决的任务。他说：“如果把土地分散成众多的小块，不论通过什么形式实现这种分散，今天，苏维埃共和国将会受到饥荒的威胁。”他认为，从在政治上把农业无产阶级组织起来的角度看，合作社形式是非常重要的：“使农业无产阶级革命化的最重要手段就是生产合作社制度本身。”

苏维埃政府也受到不少批评，因为它把大地产的下限定为100霍尔特。汉布尔格尔说，100霍尔特的地产多数不是由一块土地，而是由许多块分散的土地组成，社会主义的农业大企业吸收不了这些土地。他认为由于缺乏劳动力和实行地皮价值税，20—

100 霍尔特的地产迟早会被迫走合作化道路，转为大企业生产。

汉布尔格尔认为有必要指出，让旧农场的管理人员，尤其是其较年轻者来领导生产合作社是很成功的作法。

在谈到农业生产的领导问题时，他认为有必要成立两个中心：一个中心领导已被收归社会所有的大土地生产，另一个中心领导农民手里的私有土地的生产。

他对农产品产量作了估算后说，为了保证城市居民的供应，不可避免地要用现金支付农业工资超过口粮的部分。

代表大会的人员构成明显地给经济问题的讨论打上了烙印。大部分发言人都谈到地方工人苏维埃常务委员会的困难、问题以及他们所受到的真假委屈（大多是微不足道的）。在这次会上，匈牙利工人运动发展中的一个严重缺陷暴露了出来：对农业无产阶级的组织工作和唤起他们阶级觉悟的工作处于落后状态。某些发言带有反对城市的情绪。有人对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休戚相关的关系不理解。原来，地方工人苏维埃混进不少不适宜的人，他们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也常常表达他们小资产阶级的、涣散组织的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对苏维埃政府和中央机关的一些措施进行了相当尖锐的、正确或不正确的批评，但是对于苏维埃政府将大地产收归社会所有的措施的正确性任何人没有提出争议。尽管这样，一部分农民代表发言中——可能是不自觉地——潜藏着一种想法，即农村从无产阶级专政得到的东西比城市工人要少。

许多农村代表对把旧农场的管理人员和土地所有者安排到合作社的领导岗位上去的作法提出了批评。农业人民委员们解释说，采取这种措施对生产有利，并答应收割入库后将改变这种状况。

在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也反映出一个事实，即农民政策、农村阶级斗争的一些基本原则问题没有得到澄清。把反对资本主义和反对富农的作法同侵犯拥有中小地产农民的利益混淆在一

起。没有人——连人民委员中也没有人——试图对农村阶级关系作出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遵循的农民政策。匈牙利无产阶级领导中的这一重大弱点在党代会和党纲中就已经反映出来。

苏维埃代表大会使一个问题更加明确了：即加强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生死存亡问题。许多发言人强调指出，应该改进农村的政治教育工作，把它放在新的基础上。

6月19日，中断了对经济问题的争论，转而讨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对外政策。

这项议程的报告人是库恩·贝拉。他在报告中分析了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形势。他指出，战胜国的和平主义掩盖了帝国主义的横暴野心和旨在践踏一切革命运动的意图。他谈到了奥匈帝国崩溃后新成立的那些民族国家，指出“他们的扩张主义政策比那些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大国还要明显和贪婪”。他分析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并得出结论说，这些矛盾“使协约国不可能对匈牙利采取一致的行动”。

库恩对欧洲革命运动的看法是乐观的。他认为，匈牙利无产阶级可以有把握地指望西欧工人阶级的声援。

协约国的最后通牒在库恩的报告中占中心地位。

他认为有必要接受照会，理由是签订和约对匈牙利来说很重要，同邻国建立经济联系，创造一种新的外交局面，让各邻国的无产阶级明白，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是一切民族压迫的敌人，这些也都很重要。他认为，即使所签订的和约对我们是不利的，它的寿命也不会比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长，因为战胜国的无产阶级自己会起来撕毁它。

在报告后的讨论中，大多数发言人都对接受最后通牒和红军撤退表示担忧。

波加尼·约瑟夫说：“同志们！我赞成谈判，然而，我一刻也不会同意我们真的作出让步。”接着他说，撤退对红军来说在

心理上是致命的，它将使苏维埃共和国陷入困境，并将把解放区的无产阶级拱手送给帝国主义。

哈伊杜·久洛反对没有得到保证就接受最后通牒。他说：“我相信，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照会，就会来一个新照会，提出新的要求。如果我们又接受了，还会来一个照会，提出另外的要求，最后，如果我们满足了他们所有的愿望……他们最后的一个愿望必定是要苏维埃政府让位。”

萨姆埃里·蒂波尔态度鲜明地反对撤退。他指出：“现在需要满足的完全是一些协约国没有向我们作出任何保证的要求。”他也提醒说，撤退会给红军带来严重的后果：

“在我们把已经解放了的土地交还给剥削者、资本家的时候，绝不能把部队的进攻精神也让出去。从5月2日以来我们成功地把这种精神灌输给了匈牙利无产阶级红军。与此同时，我们还不知道会不会有新的奴役、新的压迫从南部威胁我们。”

萨姆埃里强调说，在决定问题时也应该考虑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际主义义务。在协约国千方百计地想要蹂躏俄国无产阶级时，匈牙利工人阶级不能停止战斗。

库菲·西格蒙德接着发言，他同前面的许多发言相反，赞成接受最后通牒。他一面强调有必要取得喘息机会，一面指控那些拒绝无条件接受协约国照会的人是以救世主自居，是民族主义者，甚至是军国主义者。

由于库恩和库菲都援引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例子，肖普朗州的苏维埃政府委员盖尔奈尔·山道尔（他曾在俄国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参加了革命斗争）把苏维埃俄国1918年的情况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情况作了对比。他指出：5月2日签订一个布列斯特式的和约还是有意义的，正象俄国也是在没有军队的时候签订了那样的和约，但是当红军追赶敌人的时候把布列斯特和约当作范例就不对了。

虽然大多数发言人都反对无条件接受协约国的照会和撤退红军，但是代表大会在库恩作出答复之后一致通过了他在报告中提出的决议案，即认为革命苏维埃政府在缔结和约方面所采取的步骤和对克雷孟梭照会所表示的态度是正确的，有根据的。决议案的通过不仅是因为库恩·贝拉有崇高的威望。无疑，他提出的一个个论据对那些不同意接受克雷孟梭照会的人是有影响的。库恩在答词中——同库菲的观点完全划清界限——重申，能使欧洲革命取得进展的并不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在优势的敌人面前英勇地流尽最后一滴血，而是在欧洲各国无产阶级起来战胜剥削者之前，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继续存在下去和保住革命火种——哪怕是以暂时的撤退为代价。这个论点对于那些同库恩·贝拉一样深信欧洲革命——首先是德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人来说是很有说服力的。尽管忧虑和恐惧没有完全消失，但是他们希望在今后的谈判过程中协约国能作出实现自己诺言的保证。最后，大家通过了报告和决议案。

6月21日轮到伯姆·维尔莫什作军事形势的报告。这个报告完全是为接受协约国的照会和撤退红军的思想服务的。伯姆把军队的情况说得一团漆黑。报告的大部分是批评后方，他认为后方把军队丢弃了。他隐晦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即工人阶级不愿意再为继续战斗作出牺牲，因此有必要接受协约国提出的要求，撤退红军。他本人不想公开表态，而是要那些同意他的观点的人说话：“你们说说你们的意见吧！说说我们五、六个人在一起谈到的意见。”

伯姆作完报告后，库恩第一个发言。在他的发言中可以感觉出来，他受到了伯姆关于北部战线部队情绪的一面之词的影响。他说：“我所得到的情报从各方面都证实了伯姆同志所讲的话。”接着，他强调说，没有强大的红军就不可能执行任何对外政策。签订和约并不意味着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不需要一支

强大的、能够击退协约国或白卫军进攻的红军。他赞成加强后方、增加对红军的支援。他认为动员农业无产阶级起来同农村中的反革命活动作斗争和参加红军尤其重要。

人民委员桑托·贝拉谈到军队的补充问题。他说，尽管革命苏维埃政府下令实行劳动者普遍的防卫义务制，但在布达佩斯和外边都很难付诸实施，因为有人在进行失败主义和反革命的宣传，特别是近一星期这种宣传甚为猖狂。他对库菲和与他持同一观点的人说：“今天有人说我们在制造新军国主义，并对此进行毁谤、诬蔑和散布真正的失败主义情绪，殊不知对在前线作战的红军战士伤害最大的恰恰是他们，把宣传材料交给牧师和极右派的也恰恰是他们。”桑托也认为动员农村很重要，“应该把阶级斗争带进农村。应该把农村分成两部分：无地的无产者和劳动工人，地主。”

到会的许多贫农代表说，农业无产阶级准备为苏维埃共和国而战。

一个头发花白的农民代表说：“我是佩斯州多瑙韦切县的贫农代表，我有五个孩子，他们都是受过训练的士兵，最小的一个可能正在蒂萨河边的某个地方流血，我独自一人在家，我请保姆同志给我，给一个五个孩子的爸爸开具证明，准许我这个57岁的人到我最小的儿子那儿去，我要证明，土地的劳动者、小土地占有者或农民并没有丧失革命的情感，他们既然能劳动一辈子，也能为争取自由和美好生活而战死。”

有些人说农民不愿意为无产阶级专政拿起武器，针对这些不正确的、过头的说法，朗德莱尔说，农民战士“尽管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不那么清楚，但是在思想感情上，比起许多卑鄙的、失败主义的政府委员来，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要忠实得多。”

不少人批判了机会主义的观点，机会主义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库菲。恰恰是库菲的老战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早期的领导

人态度显明地反对党内、工会内和苏维埃政府内的叛卖和破坏活动。

农业人民委员尼斯托尔·久尔吉说：“我尊重库菲同志，我多次和他在一起走路，他无休止地谈论他的极右观点，不停地、滔滔不绝地谈。这种态度对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是个重大打击。我不怀疑他的正直和好意，我不想说他是反革命，但他的所作所为简直荒唐透顶。无产阶级专政只能建立在坚强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上。如果我们的队伍里有人持这种观点并竭尽全力叫喊：‘我们不是野蛮人’，我们就无法同全世界的资产阶级作战。这种‘非野蛮行为’总是表现在我们把无产者枪毙，但却把所有反革命分子都释放掉。”

朗德莱尔在说到那些从背后袭击工人阶级的人时态度更为直率：“有些人在声称自己是社会民主党人时就是黄色的，就是工贼，就是恶棍。后来，他们成了政府委员或担任了别的什么职务，现在他们在傻笑，在幸灾乐祸，并以此作为失败主义的依据。”

在讨论时，不少人谈到对反革命开展斗争的问题。他们批评了那种时常表现出来的不彻底、不得力的作法和苏维埃共和国一些国家机构的有害的自由主义，这些都促使苏维埃共和国的敌人组织起来。

代表大会在讨论了军事问题之后作出一项决议：

“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深切感觉到，强大的红军是无产阶级统治的唯一保证。因此，为了加强红军，特颁布总动员令，并指定苏维埃政府具体负责实施。在总动员的实施方式和时间方面，苏维埃政府要时刻想到，在今天，总动员对我们来说是性命攸关的问题。每一个工人苏维埃成员的光荣职责就是不论在前线，还是在后方，一定要全力以赴，使动员工作顺利地进行。”

代表大会已经开了一个多星期了，首都和外地的局势越来越

紧张，而各级领导人却在无休止地讨论一些在多数情况下是无紧要的问题。他们列举了农村存在的各种问题。

这种情况当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第八天，大会主席团不得不提议：取消一项看来是最重要的议程——革命和反革命问题。

6月22日和23日讨论宪法草案。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宪法比革命苏维埃政府早些时候制订的临时宪法要详细得多。

匈牙利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规定：“在苏维埃共和国，无产阶级掌握一切自由、权利和政权，目的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统治，代之以社会主义的生产制度和社会制度”，“苏维埃共和国是工人、士兵、农民苏维埃的共和国”，“苏维埃共和国是各族自由人民的联盟”。

宪法规定了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规定苏维埃共和国给予外国革命者以避难权，还规定苏维埃共和国不承认种族或民族的差别。

宪法详细地谈到了中央苏维埃政权和地方苏维埃政权的组织机构、职权和任务。有专门的章节对选举权和预算权等问题作出了规定。

宪法最后一章谈到各民族的权利。

大会最后一天选举了中央联邦执行委员会。在两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之间，由它行使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职权。

中央联邦执行委员会当天就选出了人民委员和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苏维埃政府主席是高尔保伊·山道尔，副主席是多乌洛克·安托尔。瓦尔加·耶诺、尼斯托尔·久尔吉、兰捷尔·久洛和鲍亚基·费伦茨当选为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外交人民委员是库恩·贝拉，军事人民委员是桑托·贝拉，内政人民委员是朗德莱尔·耶诺，司法人民委员是阿戈什通·彼得，人民福利和公共卫生人民委员是古特·安道尔，教育人民委员是波加尼·约瑟夫，德意志族人民委员是考尔玛尔·亨利，喀尔巴阡乌克兰



族人民委员是什泰凡·阿戈什通。万察克·亚诺什、哈伊杜·久洛和拉科西·马加什当选为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

人民委员中没有库菲、维尔特奈尔和伯姆，他们不愿意在苏维埃政府中担任职务，以免束缚自己的手脚。

萨姆埃里、万图什、菲埃德莱尔、瓦戈、海维希和卢卡奇等不少共产党人也落选了。

全国青年工人联盟代表大会与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同时召开的。这个会议的气氛与党代会和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气氛大不相同。青年们热烈欢迎库恩·贝拉、海维希·久洛、卢卡奇·久尔吉和拉科西·马加什等共产党人民委员在大会上的讲话。前社会民主党人中只有波卡尼出席了。正如兰捷尔·约瑟夫所描述的，青年人中间有不少人准备把他赶下台，只要他说一句敌对的话（波卡尼过去曾代表党领导机构敌视青年工人的立场，多次和青年工人们作对）。

“而现在，波卡尼走上讲台，这样开始了他的讲话：

‘我的孩子们！……’眼泪在他那美丽的褐色眼睛里闪烁，他的声音激动得有点颤抖。这不是虚假的激动，对此，我们有敏锐的耳朵和眼睛。特别是对波卡尼这个人，我们不想喜欢他。

‘请允许我把你们称呼为我的孩子们’老波卡尼发出低沉而悦耳的声音。‘因为我作为青年工人第一次热情地参加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现在社会主义将由你们实现。’

波卡尼谈到他的青年时代，谈到过去的斗争和过去的贫困。多么动人的讲话！不象今天人们的讲话，而是旧式的、充满诗意的讲话。我们直想笑他，但是这个回忆起他过去的纯洁心灵的老战士使我们感动了，我们——青年工人代表大会是他过去理想的实现者。我们被感动了，如果不是不好意思，整个自豪的青年工人代表大会都哭了……他讲话后爆发的掌声超过了任何人！我多

次捏我的大腿，为的是不要哭出声来，不要表现出来我是一个小男孩。”兰捷尔·约瑟夫在他的书中这样写道。不是一个杰出的演说家吸引了听众，而是一个工人领袖的真诚话语感动了每一个人，他一度曾离开了青年时代的革命精神，今天他又回到这种精神中来了。

代表大会的多数发言都表达了青年们英勇的、战斗的共产主义观点。正当党内和工会内右派加强破坏工作的时候，青年工人们表示坚信共产主义思想。代表大会接受了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工人联盟的名称，这一事实雄辩地证明：青年队伍中的革命精神比成年人组织中的革命精神要强大得多。

## 十七

### 六月二十四日： 布达佩斯的 反革命叛乱

---

6月24日的前一天，布达佩斯的气氛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反革命分子的行动越来越明目张胆了。教会反动势力的活动也非常猖獗。反动派和过去多次所做的一样，现在也企图用反犹太主义和煽动教派之间的仇恨使没有觉悟的劳动者为他们的反革命、反人民的目的服务。

6月23日，首都召开了50多个群众大会，向劳动人民介绍政治形势、食品和商品供应困难的原因及反革命的阴谋活动等。会上，劳动者们一致通过了决议。决议说：

“大会决定，必须对一切教派的和反革命的宣传进行最尖锐的斗争。大会号召全体工人把那些想在工人阶级内部煽动后退或不满情绪以及煽动教派之间互相仇视的人从自己的队伍中清除出去。大会要求苏维埃政府对一切反革命和教派的煽动实行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

苏维埃政府准备着对付带威胁性的事件。

革命苏维埃政府23日授予布达佩斯城防司令豪布里赫即决裁

判权。6月24日，各报刊登了豪布里赫关于禁止一切集会和游行的命令。

24日下午，布达佩斯工人士兵苏维埃中央开会，日程上唯一的问题是：反对反革命的斗争。

第一个实质性的发言还没有讲完，工人苏维埃的右翼和左翼就激烈争吵起来。右翼的定调人是根德尔·费伦茨，他明显地想挑起事端，目的是使共产党人在苏维埃中无能为力。大厅中的气氛几乎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正当喧闹的争吵达到高潮时，萨姆埃里·蒂波尔的兄弟萨姆埃里·久尔吉出现在大厅门口，他大声叫嚷：“同志们！你们还在这里讲话，多瑙河舰队正打着红白绿三色旗在街上游行，现在可能已经占领了匈牙利饭店。”

6月24日的叛乱是反革命分子长期精心策划的。头目都是豪布里赫身边的人。反革命军事参谋部的一个成员赫尼格·维尔莫什是布达佩斯钢铁工人师师长。豪布里赫的参谋长洛伊托什大尉也是一个阴谋分子。

在战争时期，赫尼格曾是豪布里赫的指挥官，由于豪布里赫的好心，他才当上了一个最重要的武装保安部队的领导。豪布里赫对他的政治立场是毫不怀疑的。赫尼格拒绝签署自己的“红军兵役证”，甚至以命令形式禁止他的部下这样做。虽然政治委员们多次向豪布里赫告发他的反革命态度，而豪布里赫却总是追究政治委员们的责任，任凭赫尼格继续进行叛卖活动。

天主教社会党人、匈牙利人觉醒社和其他反革命组织的代表于5月24日前后，在派雷尼·西格蒙德男爵主持下开会讨论叛乱的具体计划。原来，他们能够动员参加武装叛乱的不超过数百人。

反革命分子们认为，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公开分裂将为他们的行动创造有利的前提。6月初，他们同工会右翼的两个首脑：万察克·亚诺什和米雅基奇·费伦茨取得了直接联系。他们

告诉阴谋家们，他们认为在工人当中“搞反革命的条件还不够成熟。”

工人阶级的专职领导人愿意同那些准备以武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分子进行谈判，这一事实本身对叛乱分子下决心产生很大的影响。

赫尼格在为反革命军事法庭所写的供词中讲道：“万察克等人同我们的代表进行谈判，他们不掩饰工人中确实有骚动，这一事实使我下决心从12日开始做好最周密的准备，以便在有利时机来临时，哪怕用现有的力量开始行动……我认为其基本条件就是指望工人内部不和的激化。”

6月10日以后发生的事件使赫尼格不敢执行他的计划。6月11日派雷尼男爵和他的一些同伙被捕了。内务人民委员会政治部也审问了赫尼格，由于豪布里赫出面干涉，才免于被捕。同反革命分子的愿望相反，党代会上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没有发生决裂。

由于赫尼格被吓住了，反革命的策划工作由一个名叫莱姆拜尔科维奇的大尉接了过去。

为了取得成功，他也同英国驻布达佩斯使团取得了联系。在布达佩斯6月反革命叛乱爆发之前就被苏维埃共和国内务机关逮捕的迭茨在他的书中写道：“博物馆守卫费涅什·德热通过这里英国外交使团的领导人富利曼司令向协约国报告了反革命计划，同时介绍了反革命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已故的莱姆拜尔科维奇·耶诺大尉……莱姆拜尔科维奇·耶诺大尉和费涅什·德热同富利曼司令保持着经常的联系。”

反革命分子们计划开始时先在外地举行暴动，当首都的保安部队都奔赴那里以后，再在布达佩斯开始武装暴动。

比佐尼·拉斯洛在他的书中写道：“他们想，农村的暴动将牵制住外地的红军，甚至得从首都派部队下去，这样，反革命分

子就能打败留在首都的少数部队。”

按照反革命分子的计划，6月19日在考洛乔县举行了反革命暴动。当地的富农武装支队在两个大尉和两个上尉的率领下袭击考洛乔的少数红色卫队，并解除了他们的武装，逮捕了地方工人苏维埃的成员，残酷杀害了党组织的主席和文书。然后，他们从考洛乔出发，偷袭邻近的乡镇，解除了一小股红色卫队的武装，很快控制了该县的大部分地区。多瑙河右岸的塞克萨德、托尔诺、波克什、多瑙城堡一带和奥索德、佩采尔附近都发生了反革命暴乱。

反革命分子的希望——以农村暴动长期牵制首都和外地的保安队——破灭了。6月21日，在萨姆埃里·蒂波尔的率领下开始向叛匪进击。反革命分子在多瑙保陶伊前用两门大炮和五挺机枪进行顽强抵抗，红色卫队队员们经过五小时的战斗把他们赶跑了。叛乱分子逃到了考洛乔，在那儿请求驻在军事分界线上的南斯拉夫军队占领考洛乔以拯救他们，当请求遭到拒绝后，他们就逃跑到军事分界线那边去了。

托尔诺州和奥索德、佩采尔的反革命叛乱很快都被镇压下去了。

事件证明，叛乱分子没有能使广大农民群众站在自己一边。这是很快把他们镇压下去的根本原因。

6月24日反革命行动的军事基础是由多瑙河舰队、卢多维卡军事学院和恩克斯炮兵营构成。按照计划，首先应由恩克斯炮兵营向市区开炮以表示行动的开始。多瑙河舰队应该从河上袭击苏维埃大厦以支持市内反革命组织的活动。卢多维卡军事学院的任务是占领电话总局和首都其他几个有战略意义的据点。

多瑙河舰队的军官团在奥匈帝国皇家军队里也是个有特权的贵族集团，他们痛恨无产阶级专政。老布达军港的政治代表安克奈尔（社会民主党右翼分子）在反革命阴谋活动中，从内部策应

了他们。安克奈尔同一部分工会领导人关系密切，他使军官们相信，一旦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可以指望得到布达佩斯一部分工人领袖的支持。他说这个话不是没有根据的，当我们了解了豪布里赫、万察克、米雅基奇和其他人的作用之后就可以知道，这是显而易见的。安克奈尔6月23日把舰队的政治委员们召集到埃斯泰尔戈姆开会，告诉他们下列计划：迫使革命苏维埃政府辞职，代之以“民族的社会民主党”政府。虽然会议对这一计划没有表示拥护，但是与会者中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动员红色卫队和军队的相应力量挫败他们的阴谋，这一事实也证明有一部分政治委员是多么不坚定。

卢多维卡军事学院的学员都是被无产阶级专政推翻的制度的剥削阶级子弟。苏维埃政府——相信这些年青人能够改造好——给他们提供机会，让他们完成已开始的学业。但是卢多维卡军事学院的军官们向他们灌输了仇恨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们的出身以及父母的影响使这种仇恨更加深了。

恩克斯兵营归赫尼格领导。反革命分子的秘密武器库就设在这里，他们并把一部分赫尼格信得过的军官组织起来了。

6月24日清晨，莱姆拜尔科维奇通知洛伊托什，准备在下午发动反革命暴乱，并给他分配任务，要他说服豪布里赫把下属的武装部队调去支持反革命行动。

下午，洛伊托什告诉豪布里赫：一个反政府的示威正在准备中，要他不要忘记自己的许诺——一旦发生反革命骚动，他将站在工人部队的前列予以支持。豪布里赫没有认真对待这一消息（至少洛伊托什大尉后来是这么说的）。下面的假设或许可能性更大一些：在没有证实行动确有把握取得成功之前，豪布里赫不愿意贸然参加这一行动。作为苏维埃共和国的人民委员，没有断然拒绝参加反革命行动，不逮捕洛伊托什，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镇压正在策划中的叛乱，这些事实都使参谋长洛伊托什相信豪布里

赫本人也插手了这件事。因此，当下午4时，洛伊托什桌子上的电话铃响了，有人问：“汽车可以去红堡<sup>①</sup>吗？”他立即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这时，恩克斯兵营响起了炮声。

兵营的军官们上午就让士兵们做好迎接事变的准备。“小伙子们，今天我们要做些事情！在豪布里赫同志率领下，我们将让人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专政，什么是真正的共产主义。”

与炮击同时，有三艘快艇驶向多瑙河，到新佩斯时就开始向修道院射击，苏维埃共和国时期这里驻有一支保安队。新佩斯的毛乌特奈尔皮革厂的卫队也加入反革命队伍，他们在工厂挂起了象征民族的红白绿三色旗，每人都佩带上用三色彩带做的徽章去瓦茨路游行。快艇继续往前开，直到南面的铁路桥，然后，回转过来，在链子桥附近放慢速度，对苏维埃大厦进行炮击。接着，有两艘向多瑙河上游驶去，第三艘开往切佩尔方向。

卢多维卡军事学院有一个支队占领了约瑟夫电话局。他们封锁了通往学院的所有道路，向每一个走近的人开火。

炮击开始后不久，库恩·贝拉、桑托·贝拉和红色卫队的共产党指挥官杨启克·费伦茨出现在第4军指挥部豪布里赫那里，他们接过了镇压反革命的指挥权。豪布里赫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采取适当措施镇压叛乱者，至少在表面上要这样做。

共产党领导人命令布达佩斯工人营处于戒备状态，待命行动，委派桑托·贝拉指挥反快艇的斗争，委托豪布里赫夺回约瑟夫电话局。

库恩·贝拉从第4军指挥部前往格德勒了解军队总司令部的情绪和意图，晚上回到布达佩斯，向桑托等人汇报说：“那里的

---

<sup>①</sup> 语义双关，布达佩斯郊区确有一个村镇叫皮利什红堡，简称红堡。



情况给我的印象不好。虽然没有直接的危险，但是伯姆·维尔莫什、军官们和兵营的红色卫队队员们的表现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我们决定派一个工人营到格德勒保卫军队司令部。”桑托·贝拉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库恩的意见从各方面看都是正确的。反革命的组织者同红军参谋部也建立了联系，参谋部一些有影响的人物保证给他们以支持。迭茨后来谈到了这种联系：“参谋部的一个成员毛多尼茨基·厄登大尉（我曾经在布达佩斯和格德勒同他进行过初步谈判）受参谋部的委托声称：只要反革命活动组织得周密，格德勒参谋部将十分情愿地予以支持。其方式是：集中可靠的部队，派他们去进攻布达佩斯以及通过发布内容矛盾的命令制造混乱。”

反革命策动者指望叛乱开始以后布达佩斯城防部队至少有一部分能站到他们那一边，布达佩斯的大多数市民也会投靠他们。

但是，事件一开始就证明他们的算盘打错了。

布达佩斯的劳动群众并没有投靠反革命分子，而是反对他们。不仅工人谴责叛乱者，而且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层也远离他们。赫尼格等人估计将有几千人到那里报到并领取武器。与此相反，6月24日总共只约有200个反革命分子聚集到了那里，其中三分之一是奥匈帝国的职业军官。

尽管第4军指挥部进行了抵制，然而由于反革命分子缺乏群众支持，布达佩斯保安队轻而易举地占了上风。

恩克斯兵营的士兵们起初以为发给他们的炮弹不是实弹。然而他们很快发现军官们抱有反革命目的，欺骗了他们。于是就把军官们抓了起来，押送到红色卫队去。

新佩斯的士兵和工人们很快解除了毛乌特奈尔皮革厂反革命匪徒的武装。最先是派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代表团（其中有伊雷什·贝拉）到工厂去说服叛乱分子放下武器。但是他们被抓起来了。很快到达的工人营用机枪射击工厂大门。反革命分子就把俘

虏放在门口，以阻止继续射击。保安队员们停止了射击。当工厂再次打开大门以后，一个非武装红军开始同反革命头子进行谈判。有个新佩斯的共产党员利用反革命头子忙于谈判的时机跑到工厂的大门口，对着叛乱者喊道：来了一个恐怖营，如果不投降，就马上用大炮和飞机包围工厂。工厂卫队吓破了胆，立即放下了武器。就这样，他们把布达佩斯叛乱的一个重要据点消灭了。

解除卢多维卡军事学院学员的武装经过较大的战斗和付出了较大的牺牲。

前面我们曾经提到，给豪布里赫下达的命令是指挥对卢多维卡军事学院的叛乱者作战。但是他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干。夜里，当桑托到约瑟夫电话局时，惊异地发现，派去镇压盘踞在电话局的卢多维卡军事学院学员的部队没有一人受伤。这说明他们没有真正试图占领电话局。

卢多维卡军事学院的叛乱分子同毛乌特奈尔工厂的叛乱者一样，把在电话局抓到的共产党员们捆绑起来放在大门口，以使进行围攻的部队首先击中他们。

经过一个晚上和一个通宵的漫长时间，仍没有对占领卢多维卡军事学院和附近地带的叛乱分子发动认真的攻击。

第41钢铁工人红色团原政治委员在回忆录里写道：“根据命令，我们不能开火，与此相反，卢多维卡军事学院的反革命匪徒并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向我们射击。我们的同志对命令感到困惑不解，很不安，很紧张，因此我们不顾命令，也放了几枪。”

有个支队的军官明显地抵制进攻卢多维卡军事学院的叛匪，士兵们不得不当场把他打死。

由于第4军指挥部和军官们的抵制，对军事学院叛乱分子的进攻只在凌晨的几个小时内进行得比较坚决。经过短时间的战斗，他们抵抗不住了。当豪布里赫在其他人民委员们的压力下打

电话给军事学院的指挥官，要他们放下武器时，学院大楼和约瑟夫电话局内的叛乱分子都投降了。

当保安队员们进入军事学院大楼时，看到了一个被暗杀的政治委员的尸体，他们深感愤慨，而军事学院那些参加叛乱的年青人却没有受到任何惩处。

到了6月25日早晨，只有快艇甲板上的几十平方米还属于反革命分子们。他们的处境已经完全没有希望，因为他们既搞不到食品，也搞不到燃料。星期三上午11时左右，前一天向北驶去的两艘快艇（多瑙河舰队的几艘其他舰艇也加入了他们一伙）回来了，停在苏维埃大厦前。然而迎接他们的是来自四面八方的炮火，就连停泊在布达岸边的船只也用机枪向他们射击。红军炮兵设在格列尔特山上的大炮也打响了。快艇的指挥官们看到他们的希望已经完全破灭，就决计离开首都向南驶去，准备逃往南斯拉夫。

这时在波克什镇附近停泊着多瑙河舰队的两艘巡逻艇——“维扎号”和“克姆泊号”。向边界方向逃跑的反革命分子号召这两只巡逻艇的水兵也参加他们的行列。但是水兵们没有响应他们的号召。这两艘巡逻艇红色水兵的表现鼓舞了叛乱舰只中“劳动号”的水兵们，他们把军官们抓了起来，脱离了叛乱舰艇的编队并向他们开了火。“劳动号”的一颗炮弹正击中指挥舰的装甲指挥塔，打死打伤一些叛乱军官。力量悬殊的战斗开始了。“劳动号”的桅杆上重又飘扬起红旗，快艇的炮火把它击沉了。“劳动号”船员们遭到了重大的损失，但是他们挽救了红军水兵的声誉。

6月24日的反革命叛乱使那种骗人的假人道主义的危险性更明显了，领导机构中的右翼分子利用它想方设法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为控制反革命所作的努力。6月25日和以后的几天里，劳动群众在各种会议上：工厂大会、工人苏维埃常委会和军人集会上谴责了对反革命分子的自由主义，要求采取坚决措施保卫无产阶级

专政。

有一段时期，似乎社会民主党右翼也突然感觉到，他们的政策隐藏着很大的危险。

高尔保伊在中央执行委员会6月25日会上说：“在首都发生的反革命尝试所掀起的肮脏波涛说明无产阶级应该时刻准备着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和任务。昨天的反革命尝试未能实现其煽动者的企图：即在工人队伍里制造恐慌、混乱。恰恰相反，它将促使无产阶级把自己的队伍锻炼得更加团结统一、更加强大。”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动员对反革命进行反击。库恩·贝拉第一个发言，他指出，那些以为资产阶级会甘心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大错特错了。接着他说：“虽然这次反革命尝试使无产阶级更加坚强，为无产阶级显示自己的力量提供了机会，但是，我们应该痛心地承认，迄今我们对待专政的那种惯常的错误是造成这次惨痛事件的原因。我们之中任何人都从未主张过作无谓的流血牺牲，从未主张过以流血为乐，但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懂得，资产阶级决不甘心无产阶级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并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建立起自己的统治。”

库恩建议执行委员会作出决议，规定应该“最完全地和用最无情的手段”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次会上，没有一个发言人发表右倾机会主义观点。那些以前为反革命推波助澜的人现在或者缄默不语，或者不出席会议。所有发言人都同意库恩的提案，会议一致通过了这一议案。

虽然右派和投靠他们的中间派在反革命事件后的几天内普遍退却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尽力阻挠对在反革命事件中犯有罪行的人给予应有的处罚。

布达佩斯军事法庭把6月24日反革命事件头目中的11人判处了死刑，66人被判处期限不同的有期徒刑，对其中16人的判决暂缓执行，如果他们再次参加反革命活动时将一并执行。卢多维卡军

事学院的学员们被处以劳动教养。社会民主党右派阿戈什通·彼得领导的司法人民委员会阻止了对死刑的执行。

这一案件被拖了很长时间，后来，革命苏维埃政府于7月10日颁布了一项法令，使判决无法执行。法令规定：如果军事法庭宣布的死刑于48小时内未能执行，即应改为无期徒刑。

豪布里赫给了洛伊托什去维也纳的通行证，久里埃根据豪布里赫的请求把赫尼格派往格德勒，后来又让他去农村“度假”。

豪布里赫留在原职。虽然科尔文·奥托打了两次报告，说事实可以证明，豪布里赫有参加反革命活动的严重罪行，但是，当时革命苏维埃政府内部的力量对比悬殊，同意撤换他的票数不够。

## 十八

# 红军的撤退

---

根据革命苏维埃政府的决议，命令北部战线的红军部队停止战斗。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也停止了战斗活动。

6月24日上午，革命苏维埃政府又开会研究北部战线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并作出决议，要求延长停战时间，因为协约国没有就罗马尼亚军队撤出外蒂萨问题作出保证，革命苏维埃政府想利用这一段时间补充和重新调整红军部队，以便在没有保证的情况下红军可以继续发动攻势。

但是，这一努力失败了。

当波加尼·约瑟夫在苏维埃政府会议后重返前线时，他体会到，部队的战斗力和士气比伯姆讲的要好得多。6月25日，他致电库恩·贝拉说：“我在前线看到的情况比我们在听了汇报之后所想象的要好得多。”他断定，破坏部队战斗精神的首先不是体力的疲劳和缺乏增援，而是那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领导内部出现矛盾的消息和传到前线的失败主义情绪。

伯姆等人没有从反革命事件中吸取足够的教训。朗德莱尔在关于红军斗争一文中写道：“6月30日，在撤退命令发布之前，伯姆及其同伙使用宣传手段有组织地瓦解部队，用命令和规定有意识地把战斗力降到最低限度。”

无产阶级专政领导机关内部矛盾的激化使政权在职业军官中

的威信大大下降了。5月2日以后无产阶级的干劲还曾经使那些对工人阶级统治表示反感的人受到感动，而现在，军官们的情绪受日益公开的争吵的影响越来越趋向反革命了。

军官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表面的表现形式是民族主义。6、7月间，他们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在军队里用红白绿的民族旗代替红旗。

读者可能会感到奇怪，在今天看来这一很自然的要求，在当时曾激起大多数共产党人的强烈反对。在今天看来是自然和正确的东西，而在1919年却不一定是这样。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诞生时，是一株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新芽。它的领导人和工人都把世界革命的继续发展、周围各国无产阶级的声援看成是苏维埃共和国存在的最主要保证。匈牙利无产阶级军队的红旗象征着这支军队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个支队，不是为了压迫其他民族，而是为了解放自己和世界劳动人民而进行战斗。匈牙利无产阶级的军队在这面红旗取得了北部战线的胜利，国际军团的战士们也是在这面红旗下和匈牙利人并肩战斗的。1919年有人散布谣言说，在匈牙利，布尔什维主义只是被用来掩饰为保卫领土完整而进行的斗争。如果在当时使用民族旗帜就会使周围各国的劳动人民和士兵对这些造谣诬蔑信以为真。

这个问题自然要比这里所能说明的复杂得多。在深入分析这一问题时，无疑还要考虑到其他因素。朗德莱尔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忠诚和他的国际主义精神是不容置疑的，他在这方面主张达成某种妥协并不是偶然的。关键在于军官们的这种要求并不是出于民族情感，而是要把红军用于反革命目的。要求使用民族旗帜，喊得最响的是那些把红军的作战计划送给敌人并千方百计破坏红军的供应和领导的人，他们竭力使英勇保卫祖国的红军遭受失败。6月24日叛乱的快艇就是打着民族的旗帜逃到敌人那儿去的。

提出使用民族旗帜的口号为的是使在红军要害部门供职的职

业军官们实现政治上的统一，为的是反对无产阶级。与要求使用民族旗帜的同时，军官中还开始散布下面的口号：我们不打我们匈牙利弟兄。霍尔蒂这时已经在塞格德组织自己的“民族军队”。

争论达到了极为激烈的程度，6月23日，在军队司令部召开的会议上，在使用民族旗帜的问题上，师长贝凯希公开唱反革命的调子，如果别人不及时阻止的话，第6师的政治委员明尼赫·费伦茨就会把他击毙。

宣布停战后，革命苏维埃政府和各报接到许多来自前线和后方的电报，劳动人民和士兵们在电报中对撤出北部解放区提出抗议。

虽然库恩·贝拉在6月24日和25日发电报请求克雷孟梭，要巴黎和会作出保证，即如果匈牙利部队撤出北部占领区，罗马尼亚军队也要撤出外蒂萨。然而巴黎没有作出任何答复。佩莱以最后通牒形式要求红军于6月30日午夜前撤回回到协约国所划定的边界线上。党的领导机构于6月28日，革命苏维埃政府于6月29日分别作出撤退的决议。

6月30日，库恩·贝拉在中央联邦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谈到了促使苏维埃政府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他说，不是对外关系方面的原因，而是国内的混乱局面促使苏维埃政府作出这一决定。

“我是希望通过这一行动为在国内建立经济机构，主要是建立行政机构创造条件，革命的浪潮席卷着沃土，也夹有污垢，我们要清除这些污垢。”库恩希望这一喘息机会能为消灭反革命、彻底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所采取的措施、重新整顿军队和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提供条件。

萨姆埃里也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发了言。他很痛心地说：“内部的破坏活动竟然削弱和动摇了外交政策的支柱——军队，使它无法存在下去。”他指出，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作出的决定



一项也没有实现。他当面指责在座的罗奈伊（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前他曾是司法人民委员，后来当了副内务人民委员，他借口“缺乏实物证据”阻挠对反革命分子采取行动）说：“十分尊敬的罗奈伊同志，昨天，你总应该在那18口棺材里看到反革命事件的实物证据！这些就是这一反革命事件的实物证据，而您却几乎把这一事件的全部头目都释放了！您饶恕了这一事件的所有首领。”

他说，只有当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在加强内部组织性的工作中不再执行在组建军队时执行的那种政策，喘息才会有好处。他批评军队的领导人对待职业军官的反革命破坏活动采取自由主义态度。他认为对农民采取的政策是令人不安的。最后，他要求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人认真反躬自省一番，谁想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应该成为一个坚决的、有献身精神的革命战士，如果不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用着再说什么，不需要打招呼就可以走开，大门是敞开着，如果不向东走，可以向西走。”

至于罗奈伊是如何答复萨姆埃里的，没有记载，因为根据他的请求，速记员们被从大厅打发走了。但是，事实是任何解释也改变不了的。

人们普遍认为，国家被限制在协约国所规定的边界线内是不会有生命力的。但是瓦尔加·耶诺在发言中表示深信，尽管会有困难，无产阶级专政在较小的地区内也能存在。

北线的红军部队于6月30日开始撤退。

革命苏维埃政府向战士们发表了宣言，说明撤退的必要性，并号召他们要守纪律，要坚持下去，要保持战斗意志。

“现在无产阶级祖国的利益暂时不要求你们向前推进和继续取得胜利。无产阶级祖国现在要你们作出更大的牺牲，要求你们撤离在胜利的战役中占领的一部分地区并转移到另一个地区，这个地区目前被罗马尼亚封建贵族的强盗军队所占领。

……如果强盗们不来骚扰我们，我们就把时间用来在苏维埃共和国内部巩固劳动人民的政权，用来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机构，实现我们的目标：不劳动者不得食；实行工人参加管理；建立廉洁奉公的行政管理机构；最终使劳动人民摆脱游手好闲和寄生生活。”

革命苏维埃政府充满激情的号召没有能消除大多数红军战士严重的失望情绪。

“难道我们作战就是为了撤退吗？如果捷克帝国主义军队比我们强大，把我们打败了，我们不会感到痛苦。除非我们被叛徒包围，否则是不会把用鲜血换来的土地白白送给人家的。大家都这么想和这么说。”

红军的撤退一般说来是有秩序的。尽管敌人违背协议，在个别地方袭击了撤退的军队，但是没有发生较大的冲突。

撤退后，斯特罗姆菲尔德·奥勒尔辞职了，他的名字是同红军取得的许多胜利分不开的。

斯特罗姆菲尔德也摆脱不了部队情绪对他的影响。来自后方的不利消息、军队补充的困难、政治领导机构中出现的争吵都使他情绪低落。军官们越来越明显地反对政治领导，对他无疑也是有影响的。

使斯特罗姆菲尔德作出这一决定的决定性因素是命令部队撤退。撤退后，他认为自己为巩固军队和为组织保卫国家所作的努力已经变得没有意义。他在给革命苏维埃政府的信中写道：“接受最后通牒就意味着投降……把胜利挺进的军队撤回会使军队瓦解，其后果将是无政府状态。如果我们不接受最后通牒，我们的日子会极不好过，然而，如果无产阶级深深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胜利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即使被打败了，那也只是暂时的。”

斯特罗姆菲尔德辞去参谋部的领导职务造成了当时未能预见到的灾难性后果。

撤退后，改组了红军。解散了第5军，波加尼和克劳埃嫩布罗克又接替了第2军的领导。第1军集中在多瑙河和蒂萨河之间的南部地带；第2军在多瑙河西部；第3军在米什科尔茨—托考伊—沙托劳尔姚新地附近；第4军继续留在首都。

大多数部队存在失望、沮丧情绪。第3师指挥部于7月5日报告说：“撤离在向前挺进时夺回的领土，特别是鉴于大部分战士是那一地区的人，对战士们的情绪和军事素质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撤退特别使红军工人团的战士们感到沮丧。他们感到自己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已经白费了。

由于撤离北部占领区，军队参谋部和部队的军官的情绪出现了转折。大多数军官同红军的唯一联系，可以说就是想在红军中实现自己的民族主义目标——夺回被占领的土地。这种联系于6月30日断了，此后，大部分军官认为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让反革命统治是最主要的目标。

7月初，革命苏维埃政府讨论了如何安排从北部战线解脱出来的红军的问题。有些人认为从此将会出现一段较长的和平时期，因此他们建议将大多数工人士兵复员。苏维埃政府大多数成员认为让工人营复员将是个无法挽回的错误，因为这将意味着，正当反革命分子活动十分猖獗的时候，使军队丧失最有觉悟的成分。最后，根据朗德莱尔提议，革命苏维埃政府于7月4日决定将工人营补充后调往多瑙河西部，让他们去征集食品。

撤退后，可以明显感觉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群众基础在继续下降，特别在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层中是这样。5、6月份的节节胜利对这部分群众产生的影响现在已走向它的反面。当部队在前方取得胜利时，让后方人民放弃一些东西，他们还容易接受。现在则认为所作的一切牺牲都是徒劳无益的。

当部队和后方人民得知罗马尼亚封建贵族政府拒绝撤离外蒂

萨时，他们的情绪更坏了。

瑞士通讯社于6月29日就转发了罗马尼亚新闻社发布的消息，即罗马尼亚部长会议拒绝执行巴黎和会的决议。“在没有得到下列保证之前，罗马尼亚不能撤回部队，即匈牙利要有一个受祖国信任并能履行所承担的义务的政府。”

许多人都曾经担心，帝国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要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诺言。这种担心现在已经证明是对的。

后来，库恩·贝拉本人也承认，那些原来要他在协约国没有保证的情况下履行他们的要求时加小心的人是对的：

“与我相比，蒂波尔是对的，应该要求协约国作出保证；不立即开始谈判就停战甚至撤出部队是不对的。”

## 十九

# 试图巩固军队和后方， 无产阶级专政领导 机构内部发生叛变

---

苏维埃共和国的一些领导人忠于无产阶级专政，认真对待关于巩固工人阶级政权和充分利用喘息机会的决议。7月初，他们就全力以赴地去巩固军队和后方。

7月12日，革命苏维埃政府宣布实行普遍兵役制。对出身于资产阶级的男人来说，服兵役实际上就是服劳役。

同一天，下令动员后备役军官服现役。

为了提高军队的士气，对军队的政治代表工作加强了领导。明尼赫·费伦茨在第6师胜利的斗争中很受群众的拥戴，被任命为军队总司令部政治委员。

对经济生活也开始进行整顿。

对居民和部队的食品供应是全国最重大的问题之一，因此解决这一问题是最紧迫的任务。革命苏维埃政府决定，借助军队的力量在全国农业区，首先是在多瑙河西部征集食品。把提高某些食品的定量和将库存的衣物鞋子等分配给大企业的工人列入计划。

计划中的食品征集工作又提出一个紧迫的问题（这一问题在

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也曾经出现过），如果不采取有效的办法加强工人和贫农的联盟，就会给苏维埃共和国造成严重的后果。

6月底7月初，为了加强工农联盟、揭露反革命、唤醒农业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开始在农村大力开展宣传工作。《人民之声报》6月28日写道：“在村镇，到处都有我们的宣传员，他们向贫苦农民证明，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要求他们站在城市无产阶级一边，而不要站到富农的营垒中去。”

在革命苏维埃政府7月4日会议上产生了一个想法，即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农民基础，必须有限制地分配土地。波加尼建议，把拥有100霍尔特土地的人的土地没收一部分，10霍尔特10霍尔特地分给贫农。他说：“这样就可以在各个农村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一支由农业工人和小土地拥有者组成的卫队。”尼斯托尔认为分地是危险的，会导致生产合作社瓦解。他建议，把拥有100霍尔特的土地没收一部分作为建房地皮分配给农民，每户2霍尔特。革命苏维埃政府责成国民经济委员会提出给拥有100霍尔特地产的人留多少土地的建议。

取消有地农民的赋税，在财政和政治上都造成了不良的后果，苏维埃政府于7月17日决定重新征收乡镇税。

无产阶级专政某些国家机构的官僚主义和隐藏在国家机关里的阶级异己分子的破坏活动，象沉重的镣铐一样阻碍着旨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措施的执行。《红色报》1919年7月8日写道：

“各人民委员会和其他机关里充满了反革命分子。他们凭搞秘密的破坏活动和凭磨洋工从苏维埃共和国领取工资。这些道德高尚的绅士们毫不犹豫地从这个想置其于死地的制度那里领取金钱。但是无产阶级不能容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苏维埃共和国需要廉洁奉公的行政管理机构，需要无产阶级的行政机构，它不需要官僚主义的机构。因此，迅速改组行政机构，立即撤换不可靠的人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反官僚主义叫得最响的是右派领导人。实际上，他们什么也没有干，甚至竭力把那些敌视无产阶级专政的大资产阶级分子和贵族分子留在他们所领导的单位里。共产党人在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是坚决的。库恩·贝拉7月初在外交人民委员会里解雇了近100名不可靠的专家（其中有不少是贵族，他们是革命苏维埃政府改选前担任副外交人民委员的阿戈什通·彼得的保护对象）。

没有人效法他的榜样。

共产党人意识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主要障碍是缺少一个坚强团结、能够和愿意为苏维埃共和国而战、能够动员劳动群众去保卫祖国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革命的先锋队。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共产党人开始在两方面进行工作。凡在领导机构中共产党人还拥有一定影响的党组织内对党员进行了审查，毫不留情地把那些不够条件的投机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清除出党。

与此同时，为了把共产党人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和为了给共产党的新生创造条件，也迈出了初步的、还不够坚定的步子。

虽然共产党人和真诚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所作的努力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成绩，但是这些为巩固苏维埃共和国而作的努力并没有能达到目的。

7月，工会内的右派工人领袖加紧了在工人群众中搞破坏活动。

他们在工人群众中散发秘密传单，煽动他们起来消灭共产党人，建立社会民主党政府。他们在企业里要工人投票赞成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最主要的理由当然是协约国将支持右派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政府，将给匈牙利运送大量食品，这样，食品问题就解决了。有一张秘密传单煽动说：“你们应该在各工厂、在各种会议上以及在报告会和其他各种集会上，要求举行全体工委会

员的无记名投票，决定是赞成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建立由布清格尔、高拉米、佩德尔和维尔特奈尔等人组成的清一色的社会福利部。”

这种破坏活动自然会对红军，首先是对工人营产生影响。

“从部队复员的人都被安排在邮局和工厂做很舒服的工作，而士兵们还一直在战场受苦，工会对待他们的家属也很不好，有些家属根本就没有拿到食品供应证，他们的一个战友在前线阵亡，他的妻子既没有得到抚恤金也没有得到战时补助。……由于工会的煽动，家属们纷纷给他们写信，要他们回家，因为别人都在家里。还说是否留在战场上全凭自愿。‘佩斯已经没有蠢驴，因为他们都上了战场’这句话已经成为谚语在流传。”第1师指挥部的一份报告在描述第7工人团士兵的思想和情绪时这样写道。

5月2日以后，以工厂为单位把工人组织起来的作法加速了对工人的动员工作。当工人营胜利挺进时这一作法没有表现出什么问题。但是在撤退后却产生了不利的后果。企业中工会领导人进行的破坏活动直接影响了部队。上述第1师指挥部的报告指出，工人部队几乎是“工会运动的继续，他们奉行的政策和工会的政策一样，也就是采取罢工和对抗的态度。”

明尼赫·费伦茨根据自己在一个工人分队里得到的感受，于7月12日建议停止按工厂和专业对工人团进行补充，因为这样无法执行军队的纪律。

对专政进行破坏的不仅仅是工会。

伯姆于7月5日召集党和政府的一些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开会。他再次建议依靠军队消灭共产党人，消灭无产阶级专政。他请求他们支持这一建议。尽管在座的人当中有一部分同意，但是改变还是没有搞成。在这次会议上，豪布里赫表示愿意帮忙，而维尔特奈尔反对。他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即使取得了政权，也保持不



住。

为了通过武装政变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豪布里赫独自采取了一些措施。他拜访了久里埃，此人在斯特罗姆菲尔德辞职后被任命为总参谋长。他的反革命观点豪布里赫也是了解的。豪布里赫对他说，为推翻苏维埃制度“应该做点什么事情”。久里埃表示同意，并建议他利用布达佩斯部队首先起事。但是，豪布里赫没敢下此决心。

7月15、16日，中央联邦执行委员会举行了为时两天的会议，研究无产阶级专政的最紧迫的政治问题 and 经济问题。会上摆出了苏维埃共和国内部的种种困难。

库恩·贝拉作了报告。他不加掩饰地分析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势，并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在政权、经济和道义上都处在危机中。

库恩认为，政权危机一方面表现在害怕反革命的各种活动，另一方面表现在不愿意采取坚决措施以巩固和最后建成无产阶级专政。库恩认为经济危机的原因是缺乏食品和组织社会主义生产方面的困难。他认为道义危机的最主要因素是各个单位所表现出来的腐败现象。

报告强调说，不仅一部分群众有悲观失望的情绪，而且许多领导人也是这样。库恩·贝拉认为这种悲观情绪的主要根源在于有些人感到失望，他们之所以投靠无产阶级专政，仅仅是因为他们认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不久即将到来。他严厉地谴责了那些由于国际形势的决定性革命转折没有到来而想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人。

库恩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是乐观的。他相信帝国主义没有力量进攻苏维埃共和国。他对第三国际关于敦促支持苏维埃俄国和苏维埃匈牙利的呼吁书以及将在7月21日组织的世界罢工抱很大的

希望。

他在报告中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危机的出路在于克服摇摆性，同反革命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克服营私舞弊和加强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权机构。他认为当前首先要解决的任务是改选工人苏维埃，进一步体现无产阶级在各级苏维埃的领导作用。他还强调要加强农村保安队的工作。他认为进一步实现经济和技术集中是稳定经济形势的最重要手段。

受库恩·贝拉批评的人在会上不露声色。库恩在报告中矛头对着他们，指责他们动摇和想恢复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绝大多数发言人同意这个报告，同意库恩对形势所作的分析和为解决存在的问题建议采取的措施。

唯独维尔特奈尔公开发表了同报告截然相反的意见。他否认前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领导人想成立一个没有共产党人的政府。他说，一部分工人变成了“新资产阶级”，它压迫、扰乱和折磨着成千上万的无产者。他认为首先应通过消灭营私舞弊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加强专政的严厉来同反革命进行斗争。

多数发言人认为不是无产阶级而仅仅是某些领导人动摇了对专政的信念。他们对苏维埃政府进行了批评，因为它没有切实贯彻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全力消灭反革命的决议。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名叫哈伊杜·久洛的发言人问道，苏维埃政府是否按照执行委员会的精神办事？库恩给予了否定的回答，他说，他不能对这种政策承担责任。

执行委员会通过了报告所阐述的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委员都将致力于执行这些决议。

伯姆及其同伙的策略是：在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工人苏维埃里接受旨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决议，然后竭力阻挠这些决议的执行；指责反革命，然后庇护反革命的头头，强调团结的必要性；与此同时策划反对共产党人的政变。

除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外，阴谋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另一个据点是红军参谋部。

参谋部巧妙地破坏了红军的补充、装备和供应工作。参谋部的一个高级官员毛耶尔一切伊科维奇·卡罗伊在1927年7月10日的《匈牙利人》上发表一篇题为《是匈牙利把欧洲从布尔什维主义中拯救出来》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他和他的同伙都认为选择抵制方式是对的。而这种抵制方式使动员工作无法顺利开展，使红军因无法得到补充而失去战斗力，即使放弃收复被占领的土地，也在所不惜。军事组织者没有让有经验的后备部队去做动员工作，而是将这一复杂的组织工作交给完全不了解情况和不熟悉军事的工人苏维埃去做。为了不让红军通过突然征兵的办法得到补充，他们先颁布《征兵》令，使征兵工作拖了几个星期。最后由于检查身体等原因没有取得多大成绩。

在红军领导部门工作的反革命分子很清楚，尽管红军的撤退产生了不良影响，但是，喘息机会仍将使部队和后方有可能得到巩固，从而使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企图不能得逞。

久里埃·费伦茨在1927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了参谋部在1919年搞的在世界史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叛卖行径。

久里埃写道，他接受总参谋长职务的真正意图是要利用这个职位推翻无产阶级专政。

司令部的叛徒们分析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形势，得出的结论是利用国内的反革命力量不可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

“至于苏维埃政府的内部形势，应该权衡下列情况：

6月24日的反革命事件表明了资产阶级是无组织的；军队打捷克人打得很好——因此，它能够维持内部秩序；工人的情绪虽然不象共产党人那样，但是恢复旧的社会制度，他们连听都不要听，因此暂时不能利用工人进行反革命活动。”反革命分子们在7月初是这样评价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形势的。

由于红军指挥官的职务大部分是由持反革命观点的职业军官担任的，因此，很容易产生带领军队到布达佩斯推翻苏维埃政府的想法。但是，反革命分子们知道不能利用红军干这种事。“军队撤离前线后，由于人民委员们做了宣传鼓动工作，部队的士气又高昂了。我从许多地方得到过这样的报告。因此，那时部队不可能承担这种任务。我不怀疑这种尝试首先将导致格德勒军官们被捕，大部分军官将会因此被处死。”

久里埃等人根据对形势的分析决定迫使红军去进行一项注定要失败的行动，这一行动将把红军毁掉并将招致协约国新的进攻。“我们的这些考虑迫使我决定带领部队去打敌人，而不考虑部队的状况和敌人的力量如何，也不考虑战斗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参谋部内的反革命分子们决定向防守在蒂萨河左岸的罗马尼亚军队发动进攻。

“有一点军队司令部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这支士气低下、技术装备低劣的军队不可能胜任这种难度的战役，不可能横渡蒂萨河去攻打没有受过挫折、以逸待劳的罗马尼亚军队……要不要在没有成功希望的情况下带领这支军队去蒂萨河，是个良心问题……应该承担责任。”司令部的两个高级军官在无产阶级专政被推翻不久这样写道。他们后来在反革命制度下爬上了高位。其中一人叫洛考托什·盖萨，后来当上了总理。

久里埃在征得伯爵的同意后，于7月5日发出关于准备外蒂萨战役的命令：

“不论罗马尼亚人是否撤离外蒂萨，军队司令部的意图是要以大部分兵力横渡蒂萨河，暂且进逼到（协约国）强加给我们的军事分界线为止。”

伯爵不久前还竭力阻止北部战线的红军向前挺进，并借口军队士气衰退强迫人们接受撤出被占领的地区，现在不进行辩论、不

加考虑就同意进攻！6月30日至7月7日这一段时间内，军队和后方的情况都没有发生那么大的变化以至有理由来实现这一决定性的转折。伯姆在《在两次革命的烈火中》一书中用很大的篇幅谈到那些不可避免地使红军撤离北部战线的因素。但是他却只字不提，为什么在几天之内他就对部队和后方战斗力的看法发生决定性的变化。

7月10日，他们把库恩·贝拉和朗德莱尔·耶诺请到格德勒军队总司令部，向他们通报了准备进攻外蒂萨的计划。

库恩·贝拉在萨姆埃里·蒂波尔的题为《警报》一书的前言里写道：他不同意进攻的想法，萨姆埃里也持同样的观点。

“当我告诉他（指萨姆埃里——译者），只要他们不再一次派法国和罗马尼亚军队去反对苏维埃俄国，我就不同意在罗马尼亚战线上开始新的战役。他完全赞成我的观点。（我的这一观点没有被多数人接受，因此在罗马尼亚战线上开始了进攻）萨姆埃里在谈话间重复道：

‘在克雷孟梭照会问题上，在从斯洛伐克撤退问题上，我现在仍然认为我的观点是对的。但是现在不是谈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从多数人通过的东西中吸取教训。不应该开始新战役，而应该执行你在接受克雷孟梭照会问题上所谈的计划。’”

而革命苏维埃政府批准了新攻势计划。

朗德莱尔就这一决定写道：

“有许多严肃理由反对这一计划。但是决定发动攻势基于下列重大的考虑：一、农民兵团是被罗马尼亚人从现在根据克雷孟梭照会应该撤出的地区打退的，士兵们很不安，因为他们受骗了。二、得知准确的情报，即罗马尼亚人将于7月23日攻打布达佩斯。”

除了朗德莱尔所列举的想法外，无疑还有几种因素促使苏维埃政府成员接受了久里埃的挑衅性计划。他们想，如果打了胜

仗，会使部队更加团结和斗志昂扬，消除因为撤出北部战线而产生的沮丧情绪。收割已在进行，他们非常希望拿到外蒂萨的粮食以保证全国的食品供应。

显然，心理因素也对苏维埃政府的立场起了很大的作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自己也感到有责任，因为他们受了克雷孟梭诺言的欺骗，撤出了部队，从而给苏维埃共和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他们想消除他们的决定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不惜诉诸武力也要迫使协约国履行他们的诺言。

这些因素也许能够使人理解革命苏维埃政府的态度，但是不能改变接受久里埃等人的计划是个致命的错误这一事实。

无论是根据国际形势的演变，还是根据苏维埃共和国国内的形势，都没有理由作出这一决定。利用现有的红军力量，即使有好的领导和各种有利的条件，也不可能指望在短期内给外蒂萨的罗马尼亚军队以决定性的打击。而战斗的拖延将为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南斯拉夫部队集中进攻创造有利的条件。苏维埃共和国的进攻给帝国主义者提供了口实，把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不可能同它和平地达成协议。

## 二十

# 帝国主义策划再次 进攻苏维埃共和国

---

帝国主义准备进攻的消息促使革命苏维埃政府成员通过了在外蒂萨发动攻势的计划，这一点不是没有根据的。

我们已经提到过，6月7日克雷孟梭在向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交出第一份照会的同时已经下令为集中力量进攻苏维埃共和国做准备。福煦同弗朗歌·德斯佩里根据他的指示制定了进攻计划。但是计划需要动用的兵力太大，以致无法实现。正如克雷孟梭在巴黎和会的一次会议上所说的，将军们所制定的计划“比拿破仑占领莫斯科的军事计划更加野心勃勃。”

克雷孟梭一刻也没有认真想过要同匈牙利苏维埃政府签订和约。红军撤退后，他们继续准备对匈牙利发动进攻。当库恩·贝拉在照会中要求克雷孟梭履行诺言时，他们答复说，协约国不能同苏维埃政府谈判，因为它撕毁了和约。

7月11日，战胜国首脑又把匈牙利问题提上议程。福煦元帅在会上讲了进攻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

“统一的指挥部无疑是战役取胜的第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还要考虑战役要占用多少时间。看来，不可能以一次闪电式的进攻结束战争。这样，部队就需要补充。显然，为此需要寻求邻国

的支持。在我们制定计划前，就需要澄清，这些国家能够做些什么，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出配合以及是否愿意按统一指挥行动。我们想要达到的结果是：一、打败匈牙利军队；二、占领布达佩斯。利用现有的力量达到第一个目的不是轻而易举的。达到第二个目的更难，因为布达佩斯是匈牙利大平原的中心堡垒。”和会首脑委托福煦元帅同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取得联系，了解他们能提供多少兵力参加统一的进攻。

7月15日，捷克总统马萨里克在电报中简短地通知福煦：“我们的军队由您支配。”

罗马尼亚军队总参谋长普雷桑7月17日通知他：“罗马尼亚将提供最广泛的可能性。”此外还告诉他，必要时，他们还可以从德涅斯特河岸调两个师。

7月17日，福煦向和会提出武装进攻苏维埃共和国的计划。他说，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政府都表示愿意参加这一行动。他们所能提供的兵力连同法国驻匈牙利的军队一共将近22万，其中16万是士兵。

福煦将红军和协约国的兵力进行了对比，并得出结论说，对苏维埃共和国的进攻有成功的希望。但是在发动进攻之前，他认为有必要对军事技术装备加以补充和建立一个统一的指挥部。

在发动进攻问题上，和会这一次也没有最后表态。列强首脑们担心参加一次新的流血战争将激起本国劳动者的愤慨。

塞格德市的匈牙利反革命分子在对苏维埃共和国发动武装进攻问题上也不甘落后。

以霍尔蒂·米克洛什为国防部长的塞格德“政府”竭力想建立一支反革命“军队”。他们开始在塞格德市周围的村庄募兵，但成绩不大。不少地方的农民把募兵队赶走了。塞格德“政府”的军事国务秘书根柏什·久洛不得不请求保安队出来帮助开展招募工作和保护募兵委员会。霍尔蒂等人的爱国主义空话鼓舞不了



农民，不能动员他们参加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战争。塞格德反革命“军队”募兵委员会主任季奇·奥洛达尔伯爵抱怨说：“农民都变坏了。他们只强调‘我们在战争中已经流过血了，现在该让别人去了，让老爷阶级去吧！’”塞格德反革命政府的思想家佐德劳韦茨神甫建议以“耶稣爱的名义”采用暴力手段进行募兵，以保证成功。

“佐德劳韦茨要求军事政府在招募时施加一些压力，因为他认为否则整个募兵活动必将失败。”

虽然塞格德的反革命分子们竭尽了全力，但是仍然未能为他们的军队招募到多少人。

正如萨波·拉斯洛（根本不能认为他是同情苏维埃共和国的）在他的小册子里所写的，塞格德的匈牙利地方军队“有一点酷似哥伦比亚军队，即官比兵多得多。塞格德‘白军’共有3500名校尉级军官，2500名士兵和800名宪兵。”2500名士兵中大多数也是士级职业军官。

霍尔蒂等人同红军总参谋部的反革命军官们建立了联系。7月11日，根柏什在写给他们的信中发出了下列指示：

“一、把赤色分子从军队中清除出去。

二、清洗过的军队不要举行进攻。

三、驻扎在索尔诺克—布达佩斯铁路以南的各师必须是有民族感情的部队，由他们来执行反革命任务，由格德勒<sup>①</sup>确定这些师什么时候能够做好反革命准备，由塞格德决定最后的起事日期。”

根柏什在一封较长的信中要久里埃领导这一反革命政变。

“你要把反革命工作抓起来，要把赤色部队从布达佩斯——索尔诺克以南的多瑙河——蒂萨河之间的地区撤走，把有民族感

---

<sup>①</sup> 地名，是军队总司令部的所在地。这里指总司令部。——译者

情的各师集中在布达佩斯一带做好准备，由你决定哪一天开始搞反革命和投奔霍尔蒂。”根柏什在信中这样写道。

久里埃不久复信塞格德：

“我一向非常关注你们的利益。关于你的提议，现在无法具体讨论，因为已经开始了。以后将由形势和环境确定我们可以干些什么。”久里埃信中所写的“开始了”是指红军已开始对外蒂萨发动攻势。

当久里埃接到根柏什的信时，进攻外蒂萨的计划已经无法更改了。由于他感到部队的反革命情绪对实行公开政变来说还不够强烈，所以他坚持了原来的想法：用进攻使红军失败的办法搞垮红军。

## 外蒂萨的军事攻势

总参谋部的叛徒们蓄意使红军卷入灾难。

7月份，对军队的最高政治监督和指挥放松了，这对他们的活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忠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委员们过去同军队总司令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7月份对军队的领导注意得比较少了。他们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同反革命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的斗争上了。大家都担负着过重的工作。在7月，大多数右派工人领袖逐渐隐退，他们原来承担的任务也要忠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去完成。库恩·贝拉以超人的精力进行工作，他几乎挑起了领导无产阶级国家的所有担子。朗德莱尔除担任第3军的指挥官外，还领导内务人民委员会和铁路工作。其他人也都在超负荷地工作。

伯姆担任红军的领导职务只到7月14日为止。他采取的最后措施是进一步作出让步，为军队中的反革命军官的活动大开方便之门：他发布命令，规定指挥官有权逮捕干涉本部队战役指挥的政治委员。伯姆毫不怀疑，职业军官们将利用这项命令为他们的反革命目的服务。由于共产党和左派社会民主党军事领导人的坚决抗议才收回了这项命令。

7月21日，伯姆接任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驻维也纳大使馆的领导工作。朗德莱尔只是在发动攻势前不久才当上红军总司

令。可以说，进攻的准备工作几乎完全是由久里埃一手包办的。参谋部的叛徒们竭力使红军在外蒂萨河战役中吃败仗。

进攻时出动的军队人数比占领外蒂萨的罗马尼亚军队的人数要少得多。红军的进攻部队只集中了78个营、3个骑兵队和91个炮兵连。罗马尼亚干涉军在外蒂萨有92个步兵营，58个骑兵连，此外，还有30多个炮兵连。红军炮兵在数量上的优势只是表面的。近半数的炮都是十厘米的榴弹炮，炮弹只够一两天用的。战斗打响后，将近百分之五十的红军炮兵已经丧失了战斗力。如果我们注意到7月20日的红军兵力和装备一览表上共有161个营，就更可以看出叛卖行径了。面对着经过充分休息、为数众多、守在宽阔的蒂萨河后面并且只出动了不到百分之五十兵力的罗马尼亚军队，红军的力量相形之下太单薄了。161个营中大部分有别的任务，有的营的战斗力低下。

总参谋部交给进攻部队的是无法执行的任务。在确定进攻部队的前进方向时，总参谋部的着眼点是不给红军部队的左右翼安排策应部队，从而给敌人的包围战创造了良好的机会。第3军的参谋长向久里埃提出意见，说他太忽视对主力进攻部队侧翼的保证工作了。久里埃没有作解释。E.A.巴特利特在《中欧的悲剧》一书中，在谈到久里埃的作战计划时说：“可以肯定地说，主帅有意让人攻击自己部队侧翼的计划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总参谋部有意制定这样坏的作战计划，以使敌人能更容易地消灭进攻部队。为此，他们还设法把总攻作战计划和红军进攻部队的兵力装备一览表都交给罗马尼亚司令部。根据资料，不只一份，而是许多份作战计划落到了苏维埃共和国的敌人手里。他们先把参谋部的秘密军事文件交给维也纳的反布尔什维克的委员会，再由这个委员会将文件转交给英国驻维也纳的军事使团。英国人把它们复印出来寄给各盟国的总参谋部。他们还给坎宁安侯爵开具英国信使证，让他把这些材料送到塞格德。塞格德的反革命分子

把作战计划转交给特鲁布里奇海军上将。他肯定又把这些转交给罗马尼亚总参谋部。但是罗马尼亚司令部这时很可能已经从法国人那里得到了所有的情报。马尔达雷斯库将军在一本描述1918年至1919年与匈牙利军队作战的书中提到，有个军官携带红军总司令部的作战计划逃到了他们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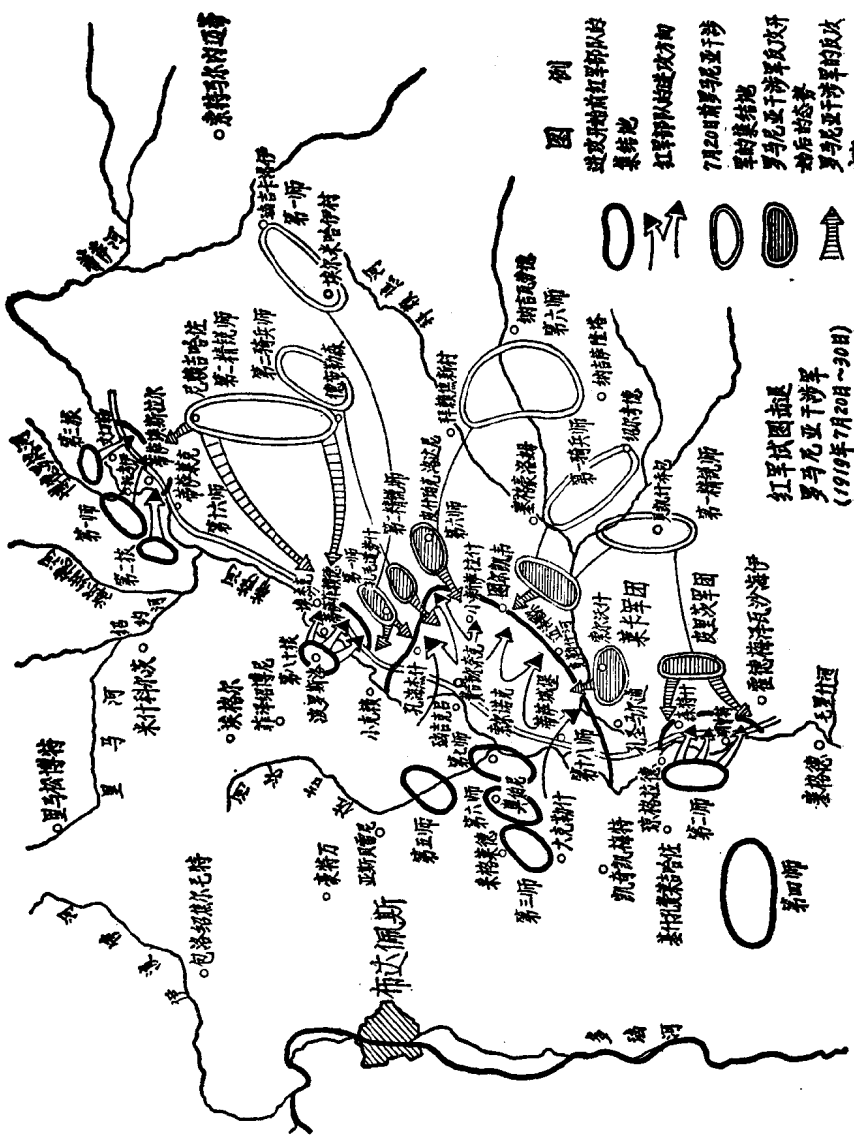
更有甚者，在许多地方给进攻部队提供的不是实弹，而是空包弹，给炮兵运送口径不吻合的炮弹。部队未能及时得到渡河工具，或者得到的是残缺不全的渡河工具。

苏维埃共和国被推翻后，叛徒们都得到了奖赏。同一个反革命制度，在把斯特罗姆菲尔德投入监狱的同时却把叛徒们提升到最高的职位。他们让久里埃退休了，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的贩卖行径已经众所周知，而这大大有损“民族军”的声誉。其他人都爬上了高位。在红军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反革命分子中，除洛考托什外还有人当上了总理。希特勒的一个现行官——斯托姚伊·德迈，在1919年曾是苏维埃共和国军事人民委员会侦察部的部长（他当时名叫斯托姚科维奇）。红军的一个师长韦尔特·亨利克当上了总参谋长。在红军中当过高级指挥官的贝尔迪·奥洛约什被晋升为中将，让他负责领导童子军运动。还可以列举许多人的名字。

根据进攻计划，主要应该打击索尔诺克—纳吉瓦劳德—瑙吉莱陶方向的敌人。这一任务交给了第1军。军指挥部下属4个师（第2、5、6、7师）。第5、第6和第7师应该在索尔诺克城渡过蒂萨河，第2师应该在琼格拉德渡过蒂萨河。

由第1师和第2、第3旅组成的第3军的任务是，主力在托考伊、非主力在瑙吉法卢、蒂萨多布和鲍尔绍渡过蒂萨河。该军主要的进攻方向是尼赖吉哈佐。第3军原来由朗德莱尔领导，现在波卡尼接替了他的工作。

第80旅应该在第1军和第3军之间，从波罗斯洛出发向蒂萨



**图 例**

- 逆时针地红军的阵地
- 集结地
- 红军部队进攻方向
- 7月20日前罗马尼亚干涉军的集结地
- 罗马尼亚干涉军反攻及开动的状态
- 罗马尼亚干涉军的反攻方向



**红军试图图拉**  
 罗马尼亚干涉军  
 (1919年7月20日~30日)

菲赖德—德布勒森一带挺进。

7月20日拂晓，经过大规模的炮火准备后开始大举进攻。

横渡蒂萨河不论对哪一支军队来说都是个艰巨的任务。大多数桥梁早已被罗马尼亚军队炸毁。只有索尔诺克的公路桥掌握在红军手里，但是通过分洪区的那一段也被敌人炸毁了。渡河的工具很少，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由于反革命的破坏，现有的工具也不是全部都能用的。

集中在索尔诺克的210门炮的炮火给予敌人沉重的打击，摧毁了敌人的第一道防线。早晨9时，第6、第7师的大部分人都渡过了蒂萨河。到晚上，进攻的全部主力都在蒂萨河东边建起了桥头堡。

第2师也过了河，并且开始向森特什方向挺进。第3军的进攻也很成功，它的部队在不少地方都渡过去了，在左岸有了立足点。

进攻的第二天，敌人的抵抗明显加强了。主力继续向前挺进。第2师也赢得了一些地盘，成功地占领了森特什和塞格堡，但是敌人对第3军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有个团被他们打散了。

第80旅的渡河工具还没有到达，7月21日，他们试着用应急工具渡过蒂萨河。除了缺少渡河工具外，炮兵的弱点对该旅的战斗力也很有影响。这个旅是由国际营组成的。职业军官们对这些国际主义战士特别反感。军队总司令部为这次进攻共集中了91个炮兵连，而第80旅总共只得到1个炮兵连。这个唯一的炮兵连的炮陆陆续续都不能用了。供应他们的弹药也不够。迟到的补充弹药大部分是空弹。

军队总司令部十分了解阻碍第80旅打胜仗的原因，尽管这样，仍然强迫他们渡河。21日，他们尽了最大努力，只有一些小分队渡过了蒂萨河。7月22日，4个营中有3个营到了河左岸。

7月22日和23日，第1军继续向前挺进。总司令部指示第1军指挥部迅速前进。虽然第1军指挥部感到担忧，还是把3个师

都带到进攻的第一线。这一指示使第1军处于没有后备力量的境地，无法应付敌人可能进行的包围战。

这一措施的险恶用心是十分明显的，因为总参谋部的计划只要求第2师和第80旅在形式上掩护主力的侧翼，只让他们在无关紧要的地区向前推进。23日，第2师在较小的敌人部队的压力下就开始后退并放弃了塞格堡、明曾特和森特什。

直到7月23日，红军的进攻部队还没有遇到敌人的主力。罗马尼亚参谋部的大多数师都在离前线较远的地方贮备着。由于他们熟悉红军的作战计划，知道自己在力量上处于优势，所以他们在期待有利时机的到来，以保证攻击匈牙利主力侧翼的战斗取得胜利。

罗马尼亚驻外蒂萨部队司令马尔达雷斯库将军从进攻开始后的头三天的事态中就能够得出结论，他所得到的作战计划是可信的。24日，他认为将贮备的主力投入战斗的时机已到。

24日下午，有2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开始向索尔诺克部队左翼的第6师发起进攻。他们的优势兵力迫使这个艰苦奋斗的红军师撤退了。

他们对第80旅也开始大举反攻。1个骑兵团、1个步兵团和2个营偷袭了轻率地忽略了防御的第80旅。

由于敌人出其不意的强大攻势，国际营开始边战斗边往蒂萨河方向撤退。第80旅的唯一炮兵连的火炮的射击间隔时间越来越长，后来陆续都不响了。

弹药用完了。不仅火炮停止了射击，战士们也陆续停止开枪。补充的弹药很晚才到达波罗斯洛火车站。战士们把弹药箱从车厢里卸下来以后急忙送给战斗在蒂萨河左岸处境越来越绝望的战友。

有一个波兰国际主义战士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拖着沉重的箱子和自己的武器匍匐前进，为的是尽快地到达火线。我们



的战友们也向我们爬过来。他们又脏、又饿，受尽了折磨，气得直骂。我们把弹药交给他们，赶紧回来再拿弹药箱。战友们在前线打开了箱子。电话员叫我们到营地接电话，从听筒里传来可怕的怒骂声：‘叛变！’他们绝望地叫喊着。我们打开了第一个箱子，第二个箱子，第十个箱子，看到的都是空弹，而不是实弹。前线一片混乱。”

事件的另一个参加者写道：“罗马尼亚人把红军挤到蒂萨河边，许多人丧生。后来，我们也要撤退到菲泽绍博尼，那时，我们看到船和浮桥船早已放在菲泽绍博尼车站的支线轨道上。这才使我们完全明白了，我们的队伍里有叛徒。”

第80旅参加蒂萨菲赖德战斗的共有1226人，这一天，有893人牺牲或被俘。

久里埃在1927年7月16日的《匈牙利人》上写道：“这个旅的被歼灭确实没有使我感到伤心。”

这一天，在蒂萨河前线北翼，敌人对第3军也开始大举反攻。有些地方进行了肉搏战。第3军顶住了敌人的围攻，虽然遭受损失，仍随时准备着向前挺进。

久里埃在进攻开始的头几天，在侧翼没有相应保证的情况下把部队往前赶，现在，当敌人将主力投入战斗时，他又毫无道理地命令部队迅速撤退。7月25日，进攻部队的大部分已被召回到蒂萨线的后面。7月25日，敌人没有用大量兵力反击第3军，但是，总参谋长还是给他们下指示：“第3军要在夜里把部队撤到蒂萨河西岸，将桥拆掉，后备力量安排在塞伦奇、蒂萨卢茨附近。”

士兵们和忠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指挥官们都认为参谋部的命令完全令人无法理解。他们更加相信自己被出卖了。反对总参谋部和前职业军官的情绪越来越激烈。久里埃在前面提到的文章中写道：“到处都可以听到，部队里有一股强烈反对职业军官的思

潮，认为他们是有意制造倒霉的人，幸亏运动没有爆发出来。”

令人费解的、叛卖性的命令使部队的士气大大低落。不是敌人的打击，而是参谋部的叛卖瓦解了部队，第3军为此提供了很好的例子。布置撤退后，第3军指挥部7月26日在给总司令部的报告中写道：

“军指挥部要求：一、正式、公开地以文字形式肯定以下事实：第3军的常胜部队仅仅是由于考虑到全局才被迫这样行动的。部队绝大多数人直到最后都是愿意进攻的。”

从蒂萨河撤回以后，军指挥部所描写的完全是另一种情绪：

“把军队撤到蒂萨河西岸完全破坏了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这一失败使大家感到参加战斗是徒劳无益的，对以后的战斗也不抱成功的希望。”

撤退对参加战斗的其他红军部队也有同样的影响。第1军于7月26日报告说：“支持部队的道义力量在多数连队正在消失，某些连队的组织性已开始涣散。”

7月27日，最后一批红军部队也撤退到蒂萨河后面。

为什么叛徒们能够这么自由地进行活动？领导军队的共产党人和左翼社会民主党人怎么能容忍发出旨在搞垮军队的命令呢？

总司令朗德莱尔没有军事方面的经验。他那渊博的学识、智慧、工人运动中取得的经验、他的声望和受人爱戴，从各方面看，都使他在一名正直的、受过很好训练的参谋长的协助下，能够胜任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在1919年要求他担任的总司令职务。自然，他对战术和战役等专业问题不可能知道得很多。这就是他没有能识破久里埃作法的叛卖性的原因。

我们不能忘记，在向北部进军时，朗德莱尔的参谋长也是久里埃，一般说来，他当时还没有竭力让下属部队打败仗。朗德莱尔根据北部战役的经验，对他的参谋长是信任的，而久里埃却用卑鄙的背叛回敬他的信任。

部队中政治教育工作的薄弱无疑也为叛变开了方便之门。部队政治代表大多是由党书记处指定的，他们当中不少人的政治立场同佩耶尔和伯姆一样。共产党人或象后来的匈牙利社会工人党领导人瓦吉·伊斯特万那样的左翼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代表，与反革命分子进行了斗争，但是没有取得多大成效。他们抓起来或告发的那些人都受到右翼的庇护，并被放跑了。没有独立的共产党，在这方面也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事态的发展是如此的迅速，叛卖的后果这么快地变得无可挽回，使革命苏维埃政府的左派（他们的精力还受到别的事件的牵制）即使在那几天看到叛卖的事实，也很难改变这种局面。

## 二十二

### 最后的几天

---

被出卖和被摧垮的红军的失败对无产阶级专政是个致命的打击。群众感到无比的绝望和痛苦。

除了前线的失败外，又受到一次新的打击，即7月21日的世界罢工在最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

7月21日，有几个国家，如奥地利和罗马尼亚的产业工人举行总罢工和英勇的示威，表示对俄国和匈牙利无产阶级的声援。但是，在那些从胜利角度来看最有决定意义的国家里，政府在右派工人领袖的协助下阻止了工人罢工。

匈牙利革命者对这次世界罢工抱有过大的希望，因此当希望不能兑现的时候，就感到非常沮丧。7月21日以后，群众更加感到国家孤立无援。

国际形势的不利变化使那些认为无产阶级的命运取决于世界革命即将胜利的人们感到失望，而对世界罢工所抱的希望破灭更使他们失望到了极点。在此以前，苏维埃俄国的红军停止向西推进、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推翻、维也纳无产阶级6月行动的被镇压以及对德和约的签订，也严重地影响了某些领导和群众对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有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的信念。

伯姆等人认为红军在前线遭受的损失和7月21日世界罢工的失败证明了他们观点是正确的。他们更加积极地致力于建立一个

能得到协约国支持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其使命是消灭无产阶级专政和逐渐恢复资产阶级制度。这也是伯姆在维也纳活动的中心。

通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介绍，伯姆同协约国的使团取得了联系。7月23日，协约国驻维也纳的代表们讨论了那些可以构成同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谈判的基础的条件。这些条件实质上反映了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右派以前同协约国代表达成的协议。

7月24日，维尔特奈尔和佩耶尔也抵达维也纳。此后，他们三个人一起继续策划消灭无产阶级专政。

7月25日，巴黎和会研究了协约国驻维也纳代表同伯姆进行谈判的情况。美国“救济机构”的负责人、后来的美国总统胡佛向会议介绍了同伯姆谈判的结果：

“伯姆将军声称，只要协约国能相应地支持他，在停止封锁、进口食品和开放多瑙河航运上作出一定的承诺，他本人愿意建立社会民主党政府，并担任这个政府临时的统治者。剥夺库恩·贝拉的权力。这样，一切恐怖行动都将停止，秩序也将恢复。”

英国外交大臣巴尔弗对伯姆不信任。他认为，最妥当的办法是伯姆借助红军的力量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军事专制，目的是召开立宪会议。他说：“这种解决办法有很大的优点。在我们这些国家，到处都有一些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同情布尔什维克纲领的组织。这一部分群众最坚决地反对对布尔什维克采取军事行动。如果通过伯姆将军开始做些工作，就可以避免这种不愉快的事情。”

库利奇让巴尔弗放心，他说，伯姆是个靠得住的人，因为他的政治观点不是左倾的，而是右倾的。

会议表示要问一下福煦将军，在了解了他的意见后再作决定，从而结束了这一问题的讨论。

次日，即7月26日，和会又回到这个问题上。又一次提出用

统一的兵力进攻苏维埃共和国的想法。虽然巴尔弗顽固坚持诉诸武力，但是克雷孟梭和意大利外长蒂托尼借口内政原因拒绝了这一建议。最后达成协议，公开发表一项声明。声明说：协约国愿意同匈牙利签订和约，撤出外蒂萨，取消封锁并提供食品，但是不愿意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进行谈判。

协约国在欧洲没有食品贮备，不可能向匈牙利提供大量食品。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等战胜国在食品供应上也存在困难。帝国主义政客们自然不是真想解决匈牙利缺乏食品的问题。这些同克雷孟梭6月的照会一样，都是阴谋，他们的诺言也只是为了欺骗苏维埃政府，欺骗匈牙利人民。

协约国的声明说苏维埃政府“不代表人民的意志”。恰恰相反，在苏维埃共和国之前的匈牙利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象革命苏维埃政府那样通过广泛的、民主的选举产生。后来的几个月中，协约国证实了他们认为什么样的政府才能代表“人民的意志”：他们容忍，甚至支持弗里德里希·胡萨尔和西蒙尼谢毛且<sup>①</sup>等人和其他人的肆无忌惮的白色恐怖政府。

《人民之声报》于7月30日全文刊登了协约国的声明。声明的瓦解作用更加深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危机。

伯姆等人在维也纳已经开始讨论新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成员的名单，外蒂萨的罗马尼亚军队正准备过河和进攻布达佩斯，而无

---

<sup>①</sup> 弗里德里希·伊斯特万（1883—1951），于1919年3月推翻了佩德尔·久洛的所谓工会政府并出任总理。他大搞白色恐怖并完成了佩德尔等人已开始的资本主义复辟。同年11月让位给胡萨尔政府。

胡萨尔·卡罗伊（1882—1941），自1919年11月至1920年3月任总理。他的政府致力于把反革命制度合法化。

西蒙尼谢毛且·山道尔（1864—1946），自1920年3月至7月任总理。他把白色恐怖制度化并力主参加对苏联的武装干涉。在他任总理期间签订了特里阿农和约。

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还在继续运转，好象一切都平安无事一样，好象匈牙利人民距离反革命和白色恐怖掌权并不是只有几天之隔一样。

工人阶级——匈牙利劳动人民最优秀的分子不愿意也不能相信，年轻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会被推翻。他们干得非常起劲：组织孩子们度假，致力于加强劳动纪律，开办无产阶级军事指挥官训练班，搞学校改革，为改善首都食品供应而斗争，在原则性文章中阐述与发展科学文献有关的问题……，对所发生的事情，他们谁也没有思想准备。

匈牙利军事领导人没有估计到罗马尼亚部队这时会渡过蒂萨河继续进攻。当第3军参谋长7月30日向总司令部打听敌人的意图时，总参谋部的一个军官带着匈牙利职业军官特有的绅士般的局限性和自满的民族主义情绪回答说：“罗马尼亚人并不是一些有胆略的能干的人。”

那位参谋部军官先生大错特错了。

罗马尼亚从北摩尔德瓦和巴纳特抽调部队加强他们在外蒂萨的部队（兵力增加到119个步兵营、60个骑兵连、98个炮兵连）。7月30日凌晨，他们开始横渡蒂萨河。

罗马尼亚先头部队在蒂萨洛达尼和陶克陶凯内兹过了河。继他们之后一些强大的部队在蒂萨伯也过了河。久里埃没有试图阻止他们向前推进。正象他没有组织蒂萨战线的防御一样，他对消灭敌人在蒂萨河右岸建立的桥头堡也进行抵制。为了使人们无法保卫布达佩斯，他下令停止了长期以来进行的加固首都的工程，并解散了负责进行加固工作的桥头堡师。

库恩·贝拉在7月多次请求苏联领导人，要乌克兰红军进攻比萨拉比亚以减轻苏维埃共和国东线的负担。7月30日，他再次

打电报给列宁：

“列宁，莫斯科

请您施加影响，早日促成对罗马尼亚人的进攻。我军的重编工作进展迅速。

罗马尼亚人以为我们软弱无力，要是他们把主要力量调到比萨拉比亚，那就太好了。

对我的请求请尽快予以考虑。”

在当时的军事形势下，苏维埃俄国没有可能在德涅斯特河流域布署一支足以迫使罗马尼亚军事领导人作出削弱匈牙利战线并把兵力调往东部战线的决定的军队。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所发生的事情与此恰恰相反。

苏维埃俄国和乌克兰的军事形势在7月非常严重。6月底，邓尼金已经到了察里津，7月3日，他发布了进攻莫斯科的命令。

列宁在7月9日给党组织的信中写道：“社会主义革命的危急关头甚至是最危急的关头到了。”<sup>①</sup>

由于不能削弱反邓尼金的战线，苏联红军领导人和匈牙利苏维埃政府取得一致意见，把战斗在其他战线的匈牙利国际主义战士集中起来，投入对罗马尼亚封建贵族军队的斗争。

列宁7月31日通过苏维埃共和国驻莫斯科公使捎口信给库恩·贝拉说：“我们将尽一切可能帮助我们的匈牙利朋友，但是我们的力量太少了。我们在乌拉尔的胜利解放了匈牙利战俘，我们急忙派他们去乌克兰的罗马尼亚战线。”

列宁在另一份电报中强调说：“我们了解匈牙利严重而危险的形势，而且正在尽我们的能力来做。但是迅速援助有时是力所不及的。请努力尽可能多坚持些时间。每一周都是宝贵的。请在布达佩斯储存物资，加固城防。”<sup>②</sup>列宁还提醒库恩·贝拉注意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29卷，第397页。

<sup>②</sup> 《列宁文稿》第7卷，第519页。



4月份他向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人建议的那些措施，它关系到从根本上改善产业工人、农业工人和小农的生活状况，对资产阶级要严加控制，大力加强国防和宣传教育工作等。

7月30日，库恩·贝拉前往奥地利边界基拉伊希达，在那里同伯姆、佩耶尔和维尔特奈尔进行了会晤。伯姆等人竭力说服他，要革命苏维埃政府辞职，并把政权交给右派社会民主党政府。库恩没有同意。由于他还不知道罗马尼亚军队渡河的消息，以为他们不会继续进攻，因此，他对军事形势的看法是乐观的。列强们短期内不可能进行军事干涉这一点，他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关于巴黎和会上发生的事他的消息很灵通）。

第二天，库恩对形势的看法已经严重得多了。

和往常一样，这一天晚上，一些人民委员和苏维埃干部聚集在苏维埃大厦库恩·贝拉房间里，讨论国家形势。大家都知道，无产阶级专政已危在旦夕。红军动摇了，有些部队开始瓦解，而敌人在蒂萨战线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兵力。

许多人还抱着希望：如果每个人民委员都上前线，可以让士兵们振作起来，可以巩固军队，可以阻止和打退敌人。他们希望能重新过5月的日子。

库恩·贝拉和好几个人一起于深夜前往采格莱德。他们在第1军军长瓦戈·贝拉的专用列车里讨论了苏维埃政府应怎么办的问题。

会上，久里埃说形势已经完全没有指望了。他下午就竭力说服朗德莱尔，强调继续抵抗已毫无目的。

除他以外，与会者中间只有波卡尼认为继续努力已没有前途。库恩·贝拉、朗德莱尔、波加尼、汉布尔格尔等其他人都认为不应放弃继续斗争。

总司令部根据人民委员们的决定命令部队进行反击。

库恩当天夜里回到布达佩斯。许多人没有睡，一直等着

他。在库恩、萨姆埃里、鲍亚基、汉布尔格尔、维尔特奈尔、豪布里赫和其他人参加下召开了一个临时会议。共产党人要求出动拥有23个营和2万多枪支的布达佩斯第4军抵抗罗马尼亚干涉军。第4军的许多战士也对迫使他们困在那里表示不满。

豪布里赫和维尔特奈尔建议苏维埃政府辞职，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争论没有作出最后决定而告终。

这是个炎热的夜晚。全市都入睡了。

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领导人夜不能寐。

这是苏维埃共和国最后的一个夜晚。

8月1日来临了。

从布达佩斯工人群众热烈庆祝无产阶级专政成立以来，已经过去了133天。

在这闷热的星期五，没有什么令人高兴的理由。

布达佩斯商店关闭着的窗户上、墙上、广告柱上还贴着欢呼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的标语和宣传画。

清晨，生活和往常一样开始了。但是，城市笼罩着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氛。从前线传来使人压抑的消息。反革命分子们有意在城市里散布消息：“罗马尼亚人正在向布达佩斯推进。”

然而，共产党的大多数干部还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他们以为，关于军队瓦解和苏维埃共和国的危机的消息是反革命宣传机构造出来的。他们对形势的严重性是清楚的，但是，他们希望无产阶级专政能够象往常一样战胜困难。对反革命的得势和有组织的撤退谁也没有思想准备。

一清早，有两个军官来到格德勒见久里埃。他们告诉总参谋长，他们是受豪布里赫的委托来的，豪布里赫捎口信说，他想利用第4军在上午进行政变式的夺权。执行计划时请求总参谋部给予支持。

久里埃答应给予支持，但是他告诉豪布里赫，政变已经没有必要，因为据他所知，上午革命苏维埃政府不需要任何暴力干预就将自动辞职。

这一天，还有另一个更令久里埃不愉快的来访者来到格德勒。此人就是斯特罗姆菲尔德。他绝望地、因受到良心的谴责而痛苦地从希欧福克跑到布达佩斯，又从那里来到总司令部。他不能理解，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灾难。久里埃不自然地向他作了说明，他这才明白情况已无可挽回，于是怀着极其不安的心情回到希欧福克。

久里埃得到的情报是站得住脚的。上午，在党的领导机构和苏维埃政府的联席会议上，右派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苏维埃政府决定辞职。库恩·贝拉和大部分共产党人在会议开始时主张继续斗争。他们一直抱着希望，认为只要求助布达佩斯中央工人士兵苏维埃，它会再次动员匈牙利无产阶级起来捍卫祖国，一定会再现5月的美好日子。最后还是豪布里赫的话对争论起了决定性作用。据来自总司令部的消息，前线完全崩溃，继续抵抗已没有可能。根据这一情况，革命苏维埃政府决定辞职，并把政权转交给由工会领导人组成的政府。

下午3时，布达佩斯中央工人士兵苏维埃在新的城市大厦会议厅召开最后一次会议。

到会的还是那些曾经在3月21日热烈地通过了关于宣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决议，曾经在5月2日勇敢地挺身而出保卫苏维埃共和国从而使事件发生新的转折的人。

现在，他们没有发表热烈的讲话。布达佩斯中央工人士兵苏维埃在悲愤，他们开会是为向无产阶级专政惜别。

比尔曼·伊斯特万致开幕词，接着，罗奈伊·佐尔坦讲话。他在一小时的讲话中谈了革命苏维埃政府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

最后，库恩·贝拉对工人苏维埃成员们讲了话。他原来不想

讲话，但是决议里规定他必须讲。大家都清楚，如果库恩·贝拉不出席工人苏维埃会议或不讲话，工人代表们就会怀疑是右派发动了政变。库恩同罗奈伊一样，痛苦绝望地指责背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们，接着他说：

“我本希望产生别的结局，本希望无产阶级专政能进行街垒战，能宣布宁死也不放弃统治……。”

我之所以同意这种变化（我认为这是暂时的过渡状态），我之所以不手持武器进行抵抗，是因为我认为这样能保证生产，这样他们或许不会拿走生产资料。”

“痛苦的工作在等待着那些将在整个过渡时期内进行工作的同志。我想，资产阶级专政对他们不会比对我们宽大些，但他们在此时此刻是历史必然性的工具，这个工作不可能做好，但要老老实实地做。不可能做好，因为这对无产阶级没有好处，他们无能为力，但他们可以老老实实地做。在这一过渡时期内我们将靠边站，如有可能，我们将保持阶级的团结，如没有可能，我们就用别的方式战斗，以便今后能以新的力量、更丰富的经验、在更现实的环境中、同更成熟的无产阶级一起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行新的斗争，开创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期。”

讲完话，他急忙走下讲台。全场起立，掌声达数分钟之久，表示向他告别。他虽然在形式上只是一个人民委员，但是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公认他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领袖。

在这一届工人苏维埃会议上没有发生争论。比尔曼致简短的闭幕词后就宣告结束。

人们怀着压抑的心情，茫然地、充满疑虑地散去了，不知道明天会带来什么？

一些社会民主党和工会领导人没有出席工人苏维埃的会议。他们在忙着组织新政府。

新政府不需要工人阶级的代表批准。政府委员感到只要协约

国的首脑们同意就足够了。

库恩·贝拉说，新政府的工作“不可能做好，但要老老实实地做”。佩德尔政府没有老老实实地做工作。他当权六天就为反革命的恐怖专政打下了基础。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令人震惊的宣言中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发布了匈牙利事件的消息：

“同志们！

发生了可怕的叛卖事件。匈牙利苏维埃政权由于帝国主义强盗们和社会民主党叛徒们的可怕的出卖垮台了……。

共产国际号召匈牙利无产阶级要坚定不移，要有男子汉大丈夫的气魄，要坚持斗争。同志们！起来干吧！要毫不迟缓地组织地下的共产党！匈牙利血的教训教育了全世界无产者，同社会民主党妥协分子不可能进行任何联合和任何妥协。应该把这些妥协的叛徒领袖清除出去。应该让新人来领导运动，这些人要从工人阶级中产生，因为胜利是属于他们的，而不是属于敌人的。

苏维埃匈牙利失败了——苏维埃匈牙利万岁！

匈牙利共产党万岁！

世界工人革命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

\* \* \*

经过了133天的英勇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在匈牙利上空降下来了。

几十年来，人们往往把“失败”这个概念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联系起来。“无产阶级专政失败了！”反革命分子在欢呼。他们想使工人阶级和他们自己相信，在匈牙利建立工人农民的社会主义国家，取消大地产和大资本政权的任何尝试从一开始就没有生命力。“无产阶级专政失败了！”那些右派社会民主党首领

也在叫喊。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匈牙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已经成熟。他们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在他们一开始就认为注定要失败的苏维埃共和国里担任角色。

“失败”这一概念在共产党人的词汇里也取得了公民权。

革命被击败后，在一个长时期中，人们把注意力放在分析所犯的错误、内部存在的问题和叛变上，而这些往往掩盖了一个基本事实，即第一个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由于内部的组织机构问题，不是因为不成熟和没有生命力，也不是由于叛徒们的破坏才宣告失败，它是被力量大许多倍的反革命武装干涉打败的。

一个小小的国家，在同四面八方包围它的优势兵力作战中，不仅能长期英勇地坚持住，而且还有力量在政治、经济生活和文化等一切领域奠定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的基础，这在世界史上是少有的。

可以说，苏维埃共和国的所有创造、成就都是在战争中诞生的，当时的军事形势是：干涉军总能从某个方向逼近首都，有时只剩下100公里路。匈牙利无产阶级依靠在世界大战中被洗劫、被搞垮的经济，在基本原料来源被敌人的占领和封锁切断的情况下进行着革命的卫国战争，而它的对手却不仅能依靠比红军强许多倍的军事优势，而且还能得到战胜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苏维埃政府在敌军没有占领首都和红军还没有被全部歼灭之前就自动辞职的事实，并不能改变无产阶级专政是在武装斗争中被优势兵力战败的这一实质，虽然它无疑影响了事件的面貌。

在两党联合时和在解决土地问题以及其他任务时所犯的 错误，无疑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抵抗力量，然而，这些错误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孕育着失败的原因。许多例子都表明，尽管环境复杂，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仍有力量很快认识和改正错误。既然苏维埃共和国有可能进行和平建设，毫无疑问，他们也能消除错误

及其后果。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失败后的25年是在黑暗中、在受尽压迫和苦难中渡过的。

匈牙利人民、匈牙利工人阶级要流多少泪和血，直至过了四分之一世纪才能在自己的祖国重新欢庆自由。这自由是匈牙利无产阶级在1919年热切盼望的军队带给匈牙利的。

库恩·贝拉没有说错：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最优秀分子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中，“以新的力量、更丰富的经验、在更现实的环境中、同更成熟的无产阶级一起”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行新的斗争。

匈牙利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经验，以及那些鼓舞人心的回忆，大大地推进了这一斗争的胜利结束。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史

作者 = (匈) 利泊塔伊·埃尔文

页数 = 331

SS号 = 10117515

出版日期 = 1987年03月第1版